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会刊 2021 年总第 10 期

The IFF Magazine www.iff.org.cn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7 届全球年会 (F20 峰会)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20 ANNUAL MEETING
(F20 SUMMIT)

特刊

MEETING COLLECTION

全面可持续发展 ——共商合作与危机应对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7 届全球年会 (F20 峰会) 围绕“全面可持续发展——共商合作与危机应对”主题，深入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路径和举措，为构建全球开放共赢新格局建言献策。



关于IFF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由中国主导，总部设在北京的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2003年10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G20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 20）”。

国际金融论坛（IFF）从创立至今，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50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200多位全球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共计2000多名世界特邀嘉宾，100000多名全球业界精英参与了IFF历届年会和相关活动，在促进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学术研究中发挥了较好作用，取得了广泛国际影响。

宗旨

自2003年创立以来，国际金融论坛（IFF）秉持和遵循“全面可持续发展——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的宗旨，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远见、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目标

国际金融论坛（IFF）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确保独立、客观、前瞻和包容性，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通过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促进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以下目标：

1. 全球金融战略对话平台；
2. 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3. 全球金融创新实践平台；
4. 全球金融研究智库平台；
5. 全球金融人才培养平台。

本特刊选用文章根据 IFF 第 17 届全球年会现场发言速记整理，部分文章未经本人审核，特此说明。



国际金融论坛（IFF）会刊
2021年总第10期
www.iff.org.cn

主办单位
Host
国际金融论坛（IFF）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大会主席 / 副主席
IFF Conference Chair / Vice Chair
周小川
ZHOU Xiaochuan
黎晓宏 朱光耀
LI Xiaohong, ZHU Guangyao,
姜 洋 陈文辉 温国辉
JIANG Yang, CHEN Wenhui, WEN Guohui

理事会
IFF Board of Governors
韩升洙 赫尔曼·范龙佩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Han Seung-soo, Herman Van Rompuy,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肖卡特·阿齐兹 让·克洛德·特里谢 祝宪 周汉民
Shaukat Aziz, Jean-Claude Trichet, ZHU Xian, ZHOU Hanmin
梁锦松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Antony Leung, Edmond Alphandéry, Sultan Bin Nasser Al Suwaidi
洛朗·法比尤斯 珍妮·希普利 阿罗约 鸠山由纪夫
Laurent Fabius, Jenny Shipley, Gloria, Yukio Hatoyama
埃内斯托·塞迪略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 吉耶尔莫·奥特兹 查尔斯·达拉拉
Ernesto Zedillo, Mehmet Simsek, Guillermo Ortiz, Charles H. Dallara
戴青丽 李纪珠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Deborah Lehr, Dr. Jih-Chu Lee, Alessandro Golombiewski Teixeira
安雅山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 钮小鹏 方风雷
Yasser Elnaggar, James Rothschild, Rick Niu, FANG Fenglei
李梅 史蒂芬·格罗夫 赵晓宇 弗兰克·莱博曼
Li Mei, Stephen P. Groff, ZHAO Xiaoyu, Frank Rijsberman

顾问委员会
IFF Advisory Committee
让·克洛德·特里谢 利奥·梅拉梅德 王梦奎 白川方明
Jean-Claude Trichet, Leo Melamed, WANG Mengkui, Masaaki Shirakawa
包润石 多明戈·卡瓦罗 卡拉·希尔斯 何亚非 霍斯特·克勒
Richard A. Boucher, Domingo Cavallo, Carla Hills, HE Yafei, Horst Köhler
克里斯托弗·希尔 林毅夫 马儒沛 魏欧林 雅各布·弗兰克
Christopher R. Hill, Justin Lin, Ma Rupei, Olin Wethington, Jacob Frenkel
维姆·科克 于洪君 海梅·卡鲁阿纳
Wim Kok, Yu Hongjun, Jaime Caruana

董事长 / 创始秘书长
Chairman of the board
IFF founding secretary-general
张继中
ZHANG Jizhong

编辑委员会
Editorial Board
张继中 林建海 陈炳才 唐丁丁 庄巨忠
ZHANG Jizhong, Lin Jianhai, CHEN Bincai, TANG Dingding, ZHUANG
Juzhong
夏乐 王元丰 王燕 尼古拉斯·霍普 玛莎·万德博格
XIA Le, WANG Yuanfeng, WANG Yan, Nicholas Hope, Marsha Vande
Berg

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陈炳才 庄珏 刘振东 吴立新
CHEN Bincai, Joanna Zhuang, Liu Zhendong, WU Lixin

地 址
Address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 35 号 11 层
11 / F, 35 Jinshifang,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邮编 100033
Post Code / 100033
电话 86-10-85351188
Office Tel / 86-10-85351188
E-mail / info@iff.org.cn
www.iff.org.cn

版权声明
COPYRIGHT STATEMENT
本刊内容由国际金融论坛（IFF）独家拥有，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或摘抄。
The content is exclusively ownership by the IFF, without
permission, can't be reproduced or copied.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7 届全球年会（F20 峰会）于 2020 年 11 月 20-22 日在广州南沙举行。本届年会以“全面可持续发展——共商合作与危机应对”为主题，来自全球近 200 位财经政要、金融领袖、商界大咖及专家学者，深入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经济、金融的影响以及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和举措，为构建全球开放共赢新格局建言献策。本届年会首次面向全球观众提供在线直播。第四届丝路国际联盟（SRIA）大会在年会期间举行。

作为创立于中国，由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和联合国参与发起成立的国际金融外交及战略智库平台，国际金融论坛（IFF）与全球 200 多位财经政要、金融领袖、专家学者，5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和合作伙伴关系。国际金融论坛（IFF）正日益重要地发挥着“非官方 G20”的作用，成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国际金融论坛（IFF）将进一步充分利用和发挥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实践创新、全球智库和人才培养这五大功能，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我们特别出版本期国际金融论坛（IFF）2020 年第 17 届全球年会（F20 峰会）特刊，以共享智慧与真知灼见。



张继中，董事长
国际金融论坛（IFF）
创始秘书长

IFF 17th
2003-2020
ANNIVERSARY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7 届全球年会 (F20 峰会)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20 ANNUAL MEETING
F20 SUMMIT



全球金融 F20
金融服务世界



目录 CONTENTS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7 届全球年会 (F20 峰会) 围绕“全面可持续发展——共商合作与危机应对”主题, 深入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影响,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路径和举措, 为构建全球开放共赢新格局建言献策。



P4 / 大会致辞

古特雷斯 联合国秘书长
何厚铨 全国政协副主席
高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黎晓宏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常务副主席

P10 / 全体大会主旨发言

全面可持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与阻力

P36 / IFF 学术圆桌会议

世界新变局、新形势与未来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增长动力与全球治理



P43 / IFF 政策对话

新局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机遇与挑战
WTO 改革与未来的世界贸易体制

P79 / IFF 圆桌会议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与发展
全球碳定价机制

P104 / IFF 夜话

中美合作与未来对话会



P111 / IFF 峰会

资本市场峰会
全球资本市场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2020 丝路国际联盟 (SRIA) 大会
疫情后的“一带一路”及其绿色发展
金融科技峰会
金融科技主流化——金融科技创新产品和服务
绿色金融峰会
全球绿色金融——实践与创新

■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 联合国秘书长

国际金融论坛 第17届全球年会致辞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

很荣幸在 IFF 第 17 届全球年会上致辞。

本次会议召开之际，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数持续攀升。纵观全球，政策应对滞后，致使经济社会遭受巨大影响。本次疫情不仅暴露了公共卫生系统的脆弱性，还突显了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心余力绌。我们必须解决当下危机，重建更美好未来。

国际金融肩负重大使命。各国需要获得更多流动性和资源来应对危机和促进复苏。受危机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汇款和其他金融流量锐减。债务高企，新一轮主权债务危机或将来临。许多国家急需债务救济。

令人欣慰的是，20 国集团将“暂停偿债倡议”延长了 6 个月，对脆弱国家保障国内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可谓解了燃眉之急。但要应对本次巨大挑战，还需要更多支持。我将继续推动“暂停偿债倡议”延长至 2021 年底，此外，同样关键的是，要扩大倡议涵盖范围，支持所有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国际支持对寻求解决途径至关重要，它能够帮助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重回正轨。作为一种强大的反周期力量，全球公共金融必须关注两个关键优先事项。

第一，要投入最需要帮助的行业和国家，短期而言，要投入卫生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长期来看，要涵盖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

第二，要充分利用私有和国内融资，通过加强税收系统、使用激励和担保等具体工具两方面来实现。

当下危机也让我们认识到，需要建立“新社会合约”，从而建立普惠、坚韧、可持续型社会。发起“新全球协议”将有助于解决共同问题，确保全球政治经济系统能够保障重要的全球公共福祉。新冠肺炎疫苗就是一种全球性公共福祉产品。我们必须确保，届时每个人都有机会接种疫苗，而且能够承担接种费用。“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计划”是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将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但我们需要 350 亿美元来扩大其实施范围。解决气候危机也将带来全球性公共福祉。



我很欣慰，最近几个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和英国，宣布加入承诺实现“净零排放”的国家行列。新西兰、英国等国家也采取措施推动气候相关的财务披露，值得嘉许。

各国政府既要保障完成其短期行动、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和恢复计划，还要确保其“国家自主贡献”符合《巴黎气候协定》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私有部门也要担起责任。我们要重新确定全球金融系统的导向，引导所有参与方在决策时考虑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风险。

此外，还要利用数字科技。新冠肺炎危机加速了新科技的发展，比如，使金融服务和社会保障系统得以普及。但同时，数字科技也加剧了数字鸿沟与不平等现象。我们要加快国际合作步伐，加强知识交流与能力建设。我们的行动要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气候协定》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为指引。这是我们伟大行动和变革的灯塔。

最后，祝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7 届全球年会取得丰硕成果。



■ 何厚铨 /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际金融论坛 第17届全球年会贺函

贺 函

欣悉国际金融论坛第 17 届全球年会即将举行，谨此致以热烈的祝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带来的冲击，令各国经济、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更需要携手前行，共克时艰，共同应对足以危及到世界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变数。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大时刻，围绕“全面可持续发展——共商合作与危机应对”为主题的国际金融论坛第 17 届全球年会是全方位探索中国与世界共商合作与危机应对的重要平台，透过集思广益、建言献策，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探索新出路。

再次祝愿国际金融论坛第 17 届全球年会圆满成功！

全国政协副主席
何厚铨



■ 高燕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国际金融论坛 第17届全球年会开幕式致辞

尊敬的周小川副主席、张硕辅书记、张新副省长、黎晓宏常务副主席，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由中国贸促会、国际金融论坛、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金融论坛第 17 届全球年会隆重开幕。我谨代表中国贸促会，对在会上、线下参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各有关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国际金融论坛创立 17 年来，影响力不断提升，全球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创新实践、战略智库、人才集聚等平台作用日益凸显。在全球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探索世界经济复苏道路的重要时刻，本届年会聚焦“全面可持续发展——共商合作与危机应对”这一主题，开展广泛研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可持续发展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相近、理念相通，都将造福全人类、惠及全世界。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此后 15 年世界各国的发展与国际合作勾画了蓝图。中

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不断加强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20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这为我们携手应对疫情影响、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这次疫情再次说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赢得全球抗疫最终胜利，还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危机考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围绕发挥金融的支撑保障作用，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我提四点建议。

一是聚焦共同发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我们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畅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推动金融机构提供更多高质量、低成本、可持续的投融资服务和产品，为促进各国设施联通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二是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营造良好合作环境。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前提，封闭必然导致落后。金融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更加需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行业生态。我们要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各国加强金融政策协调和规则标准联通，携手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担、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国际金融领域治理能力提升，为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勇于开拓创新，激发合作发展新动能。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为应对全球性发展挑战提供了新路径。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积极稳妥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大力支持创新创业主体，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发展成果转化。

四是坚持互利共赢，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彼此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多样化合作，打造更多国际金融交流合作机制和平台，提供更优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深化双边、多边、区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使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金融创新服务和经济增长成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十四五”时期发展作出全面规划。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将如期实现，明年起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将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将持续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进一步敞开，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方面做了大量积极探索。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区等战略部署全面实施，广东必将在深化金融领域创新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贸促会作为全国性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愿同有关各方携手努力，进一步将国际金融论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同时着力支持中外企业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最后，祝本届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 黎晓宏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常务副主席

国际金融论坛 第17届全球年会开幕式致辞

尊敬的各位主席、各位成员，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会广州，参加国际金融论坛第17届全球年会！

与去年不同的是，我们来到了广州南沙。这是国际金融论坛会址落户南沙自贸区之后的第一次年会；2020年也是会址奠基建设的开局之年，非常具有纪念意义。在此，我代表国际金融论坛，向出席会议的各位主席、理事成员、有关国际政要和领导人，国际国内财经领袖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时，我也代表国际金融论坛，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南沙自贸区对论坛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加强疫情防治政策的沟通、交流与协调。疫情之下，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迫切需要稳固全球开放基本格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沟通与协调，将疫情对经济和就业的冲击减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加强疫情防治政策的沟通、交流与协调。

少到最低。着眼短期，要尽全力提供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确保不发生重大人道主义灾难；着眼长期，要避免市场结构、市场体系严重受损，防止世界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萎缩，金融发挥了重要的逆势调节作用。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采取流动性宽松政策，避免糟糕的经济基本面以及市场情绪加速“灰



犀牛”的到来，引发“黑天鹅”事件。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货币放了就要收，杠杆率升了必须要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理论界，已经开始前瞻性讨论疫后货币金融政策的“常规化”退出问题。希望国际金融论坛发挥全球金融交流与合作、沟通与对话的国际平台作用，关注和研讨国际金融局势变化，围绕当前和下一阶段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难题，出谋划策，共克时艰。

中国一直致力于积极支持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2020年初，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20年以来，在复杂内外环境下，中国金融开放不断取得新的重要进展；近期，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协议 RCEP 成功签署。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止。

2020 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着眼2021年“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中国将致力于构建



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绿色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金融稳定做出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在此特殊时期，我们按照既定的年会计划，邀请到众多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机构领导，邀请到有关国家的前政要以及财经领导专家，并如期召开会议，实属不易。这是克服困难、协调多方取得的成果。一些国际组织机构领导人和前国家政要，因为疫情不能直接参会，但他们都对论坛年会召开给予积极的支持，踊跃参与线上和视频发言。本次年会，实行线上和线下会议结合召开，这在国际金融论坛也是第一次。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疫情中断了物理的交通，但中断不了我们的通讯和联系，更中断不了我们深厚的友谊和感情！通过创新联系和沟通、交流方式，我们以新的方式又聚集到了一起。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集聚思想和智慧，一定能够寻找到解决当前时局挑战和压力的方法和思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国际金融论坛是全球金融领域 F20，是全球高级别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致力于国际金融交流与合作。在过去的17年，国际金融论坛发挥了全球金融交流与合作、沟通与对话的国际平台作用，希望国际金融论坛继续关注和研讨国际经济、金融变化和趋势，围绕国际经济和金融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难题，共商对策，共克时艰，为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与稳定贡献更多智慧。

最后，祝贺国际金融论坛年会如期召开，祝年会圆满成功！希望广州市、南沙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也祝愿各位成员、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全体大会主旨发言

周小川： 加强中欧气候合作，争取按计划实现碳中和	11	莫里斯·格林伯格： 共建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关系	23
阿尔米达·萨尔西亚·阿里沙赫巴纳： 利用区域合作助力亚太地区经济复苏	13	李勇： 联合国工发组织助力成员国“绿色复苏”	24
赫尔曼·范龙佩： 世界各国共生共荣	14	金墉： 跨越壁垒，实现全球合作共商	26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开放是欧盟和全世界的最佳选择	16	金立群： 新型发展模式重启全球经济	28
韩升洙： 短期“绿色协议”向长期“绿色增长”转型	18	马可： 全球化的“新蜕变”	30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	林建海： 新形势下的挑战和机遇	32
陆克文： 抓住机遇实现“绿色复苏”	22	中尾武彦： 如何实现后疫情时代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34

■ 周小川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大会主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加强国际气候合作， 争取按计划实现碳中和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习主席在多次论述中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逐步扭转了持续多年的将发展与气候变化对立起来的思维。

二氧化碳排放市场是绿色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分配与使用机制。就其性质而言，碳市场是一种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金融市场，涉及多种

不确定性的风险定价、跨期配置投资及风险管理。实现碳中和或者净零排放需要大量科技创新，因而需要大量投资去谋求新技术、新装备和新工艺，并且通过未来碳减排或者碳沉降的配额收入来回收投资。在此过程中存在大量期限转换和风险管理，也有许多和其他绿色金融领域交叉或合作的内容。

第一，实现碳中和，中国需要加紧努力，并明确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指标。总量指标明确以后，我们会发现，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



习主席在多次论述中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逐步扭转了持续多年的将发展与气候变化对立起来的思维。

第二，除了能源、交通等主要行业，未来的碳中和计划需要许多行业参与进来。各个行业都要制定有关碳排放和减排的计划，并针对新技术、新工艺的减排效果制定参数。

第三，在实现以上目标的后半期，更多精力要转向碳沉降，这样才能确保在计划时间内实现碳中和。

第四，实现碳减排和碳中和要明确激励机制。目前两种主要的激励机制，一个是二氧化碳排放市场，一个是碳税。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讲，二氧化碳排放市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更大潜力；碳税的制定要参照碳市场所形成的价格。

第五，各国除了为本国的碳排放及碳中和制订计划，还需要考虑跨境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国际航线的飞机及国际贸易海运的船只等。在此方面，中欧合作具有很大的潜力，或者说是亚欧两大洲的合作具有很大的潜力，也非常必要。

在碳减排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碳市场要像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一样，建立和完善互联互通机制。全世界的储蓄和投资是流动的，气候投融资更是如此，如果投资有收益，也是全球性的收益。将市场割裂开来，定价就会出现波动，也会使市场效率降低，过度投机滋生，同时也不利于互通有无，不利于协调全球行动。在此基础上，各国还要共同研究合理的碳价格机制，防止价格大起大落。理论上说市场规模越大，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也就越稳定、越合理。

第二，借鉴沪港通、深港通及沪伦通等经验，可以尝试先研究中国或者亚洲碳市场与欧洲碳市场相连接的问题。欧盟很早就针对跨国碳排放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设想，但是过去各国对此认识不足，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当时都不赞成欧盟对于进出港飞机的碳排放予以收费的做法。随着对于气候变化方面的觉悟不断提高，各国之间跨境合作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

第三，碳排放收费所获得的收入如何管理，如何支配使用，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参与方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全球性财政机构，并对碳收入专款专用，可以避免争议，当然这也并不容易。比如中欧或者亚欧之间可以研究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处理跨欧亚交通的排放问题，收入交给基金管理，用于发展新型交通，或其他减排、碳沉降方面的应用。这样的尝试可以为未来打下基础，并在碳交易更成熟的时候，对其他含碳的成本和费用进行管理。

第四，研究气候变化的国际交易，包括货物、服务、设备与技术的交易，应该实行零关税、零壁垒。减排和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大量技术和设备支持，不仅应该把壁垒降下来，同时还要利用多种绿色金融机制加以配合和支持，使这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 阿尔米达·萨尔西亚·阿里沙赫巴纳 /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

利用区域合作 助力亚太地区经济复苏

2015 年联合国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来，成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并不平衡。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历了收入大幅度下降、贫穷和营养不良，虽然优质教育和廉价能源的普及在过去几年中有所改善，然而不平等现象仍在扩大。很多国家的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进程仍然滞后。实现环境目标的进展总体滞后，这是整个亚太区域持续关切的问题。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亚太区域现在正面临多重冲击。社会经济的脆弱愈发突出，各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萎缩。金融体系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发展资源需求。这些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暴露了我们的体制准备并不充分，治理机制也不堪一击。

如何重建更美好的未来？各成员国一直在执行务实政策，拯救人民的生命和生计，并确保可持续的恢复。

2020 年 5 月通过的亚太经社会决议，旨在开展区域合作应对流行病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危机，有助于应对新冠病毒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该区域未来的大流行病和相关的规模危机。

有鉴于此，强调利用区域合作的四个政策优先事项：第一，保护人民。各国政府正在制定政策包括社会保护制度、医疗保障和技术创新来保护最弱势群体，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女企业家获得资金支持，这些都是重建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抓手。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让数据更容易获得，加强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系统，使每个人、每个地方都可以平等地获得社会保障福利。

第二，确保经济复苏。在 2020 年的前 3 个季度中，各国政府也在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措施以及创新的融资战略，克服资源限制并缓解政府压力。财政挑战不仅需要国际协作应对，例如延期偿还债务，也需要采取国家行动，提高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探索可持续性的债券，创新融资工具，比如四个 SDG 投资的步骤。重要的是，这一政策必须符合《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

第三，恢复及增强供应链和互联设施的韧性。亚太



经社会的成员国一直在积极采取政策措施，以确保区域贸易和投资流动的稳定和顺利运作。亚太经社会的政府间协定和框架，例如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一直支持政府促进跨境互联互通，涵盖了亚洲和太平洋的所有五个次区域。通过聚焦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字金融，政府致力于保障和完善向公民和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

第四，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目前，各国政府持之以恒地执行加速经济脱碳和绿色发展的政策。不能一味采取老一套政策，来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有必要与私营部门合作，采取具体行动减少对那些正在造成环境退化的污染行业的投资。亚太经社会正在与成员国和利益攸关方合作，制定一套次区域和区域协作性举措，以及减轻未来流行病的框架。我们可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紧急情况，在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加强合作。

在区域一级，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正在加强多边平台，更好地了解成员国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如何合作和利用、学习彼此的最佳实践、知识和经验。致力于强调整个政府和整个社会对重建更美好未来的重要性。亚太经社会与联合国系统一起，正在利用区域合作支持有韧性的复苏，以及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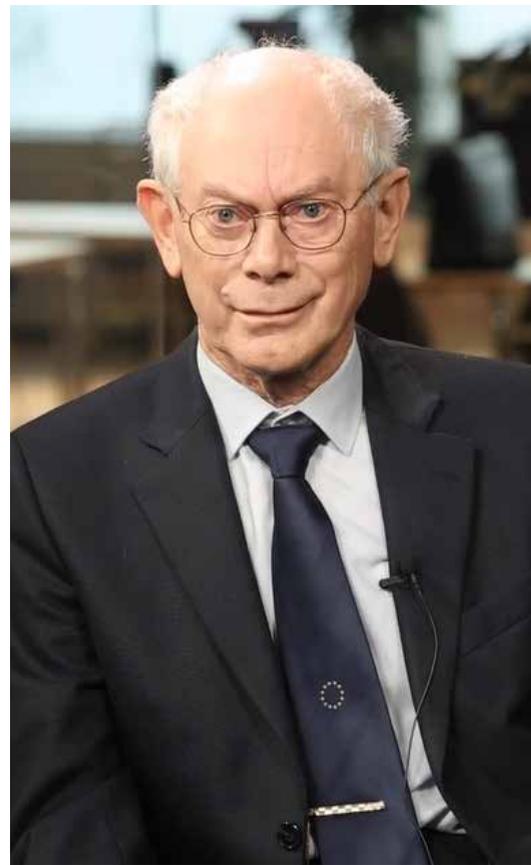
■ 赫尔曼·范龙佩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首任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世界各国共生共荣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经济之外的事件带来的危机可谓灭顶之灾，它如同山林大火，迅速席卷全球。这次危机暴露了我们的弱点：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也揭示了因全球流动、价值链和分工，互相依存的关系，以及全球治理的缺位、多边机制形同虚设，导致全球性问题难以解决。希腊语中“pan”意为“整体”——本次疫情是全球性的，而解决方法却是国家的，甚至是民族的。

本次危机之前，世界赤贫人口已有所减少，不平等的现象也得以改善，但如今，功亏一篑。应该从当前持续的危机中吸取的最根本教训是：必须挽救和重振多边主义。之所以言之凿凿，是因为本次疫情决不会是最后一次。新冠肺炎疫情让人意识到，世界各国是共生共荣的，而人类与自然的纽带脆弱不堪。开展疫情后的恢复工作，必须凝神聚气、加大力度，尽快实现全球绿色转型的承诺。本次危机影响之广、规模之大，全世界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将其解决。欧盟和中国致力于 2050 和 2060 年实现碳中和。本次危机造成的影响，无论对于欧盟还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于经济，都极其严重。

欧盟的卫生医疗条件仍待完善，在 2020 年 3~4 月第一轮疫情爆发时，欧盟本可以开展更多协调工作，但欧盟成员国主管卫生政策的部门几乎都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随着新一轮感染人数激增，欧盟和各国领导人似乎已达成共识，必须为公民的健康而共同奋斗。欧盟的优势在于一以贯之地维护商品自由流通，并很快恢复了人员的自由流动。自 6 月以来，4.47 亿公民组成的欧盟单一市场得到了充分保障。欧盟的经济实力非常强，本可以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因此，27 个欧盟国家一致同意，设立恢复基金，总金额达 7500 亿欧元，其中 3900 亿欧元为无偿拨款。这笔基金将纳入欧洲的 7 年预算，为欧洲经济总量贡献 1.8 万亿欧元，占欧洲 GDP 的 12%。欧盟委员会将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基金预算也将打破在欧盟实施已久的预算平衡政策。该基金作为经济复苏资金，将主要用于帮助当前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资金则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本基金必然不能重走老路，也就是以道路和港口等基建为基础重振经济之路。



今天的欧盟碳排放量只占全球的 8%，欧盟目前关注的重点是生态转型和数字转型，并通过这种方式应对全球气候挑战。如此一来，就能够在危机管理体制中建立长期视野，而过去，我们常常目光短浅。然而，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疫情的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经济：一方面，经济活动停摆，许多公司在封锁中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失业人数剧增，收入锐减，购买力下降。2020 年，家庭和企业的预防性储蓄大幅上升，同样抑制了经济增长。

2020 年欧元区 GDP 下降幅度或将达到 8%。未来两年，按同比计算，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幅度将被控制在 1% 左右，但整个欧元区下降幅度将达到 4%。但是，

2020 年失业人数几乎未见上升，相较于一年前，失业人数增幅低于经济活跃人口的 1%，这得益于欧盟委员会出资建立的休假计划。此外，政府在许多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如为大量贷款提供国家担保。德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好。这充分说明，本此危机应对中，打破了多少惯例。

对个人和企业的扶助资金最终由预算承担，预算赤字已从 2019 年的不到 1% 上升至近 9%。但金融市场并未对此表现出担忧情绪，目前利率达到几个世纪以来的最低值，这得益于欧洲央行的宽松政策，美国、日本等地也有类似情况。现在的问题不是财政紧缩。在欧盟内部乃至全球范围，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果不尽相同。医疗卫生方面表现最好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最高。欧盟成员国中一些国家在第一轮疫情中表现良好，但在第二轮爆发期间沦陷。有些国家为了尽快开放经济，不计代价，结果疫情反弹，经济复苏功亏一篑。这说明，卫生健康与国家财富是相辅相成的。除了欧盟和中国，英美两国和许多新兴经济体都遭遇了类似情况。

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倾注在疫苗上。推广疫苗也需要欧盟内部以及全世界范围齐心协力。欧盟已经就推广疫苗开展了一致行动，这是全球范围和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推广行动。我多次提及“团结一致”这个概念，因为只有团结一致，欧盟协作、国际协作才能得以开展和持续。团结更深层的动机是“充分理解自身利益”，这是一种结果为导向的团结。即便是出于经济上的互相依存，也必须团结起来。此外，减少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对富裕国家来说也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充分理解”。欧盟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行动，这与每个主要债权国都息息相关。

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是否在后疫情时期会变得截然不同？虽然目前还未抵达那个未来，但不久，将目睹大量企业被收购和重大破产事件，尤其是许多支持性政策到期后，与流动性、休闲娱乐和会展相关的行业将难以为继。

数字化行业是本次疫情的大赢家，尤其是该行业中的那些龙头企业。同时，在世界各地有一种趋势，即国家和企业出现了脱钩的倾向，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都出现了这种迹象。虽然全球化的顶峰无疑已经过去，但我并不相信全球化会“开倒车”。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表明中国将更关注自身发展，以国内需求驱动经济增长，投

新冠肺炎疫情让人意识到，世界各国是共生共荣的，而人类与自然的纽带脆弱不堪。开展疫情后的恢复工作，必须凝神聚气、加大力度，尽快实现全球绿色转型的承诺。本次危机影响之广、规模之大，全世界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将其解决。

资着眼于自主科技发展，减少对其他国家的技术依赖，实现“科技独立”。

再看欧盟，“主权意识”的崛起同样不容小觑，尤其是在数字、通讯、国防、医药、医疗设备、食物、化石燃料、移民、货币政策等领域。这一趋势就如同细水长流，绵绵不绝。欧盟将在这些领域挖掘自身潜力，根据自身利益和价值观建立管理体系。这样就能避免对少数几个供应商的依赖。欧盟致力于实现上述目标，同时也会充分尊重国际规则，因为国际规则是多边主义的基石。同时，欧盟希望其他全球伙伴、竞争者和对手能够同样遵守规则。欧盟希望结束当前的贸易战，以及公开或变相的保护主义，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有所作为。欧盟仍然相信一种“修正”的全球化，一种考虑气候变化的全球化，尤其应重视 2015 年 12 月的《巴黎协定》，以及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在此背景下，中国和欧盟需要在 2020 年年底前达成投资协议。机会就在眼前，必须行动起来，何况双方都已表现出政治意愿。本次协议的签署将证明，观念不同能够通过对话解决，而非关税战争。对话是对战的反面。在过去的 12 年里，国际和欧洲的议程一直受到冲击。面临重重危机，银行危机、欧元区危机、经济危机、移民危机、恐怖主义和流行病。每一次，欧盟都能设法克服危机，尽管本次疫情尚未彻底结束，恐怖主义也尚未终结。所有欧盟国家正在合作处理危机，同时尊重彼此的政治社会制度与原则。无论如何，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全球合作。全球性问题需要更多的全球性解决方案。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仍对国际合作心怀希望，更多的希望。我们的世界本应如此！

■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首任主席、葡萄牙前总理

开放是欧盟和全世界的最佳选择



从欧洲角度谈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一些看法。首先,我想把它与金融危机作比较。金融危机爆发时,为了保证危机应对的成效,欧盟委员会经历了重重困难。

那不仅是一次金融危机,因为后来它演变成了主权债务危机,既有经济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当时,有很多人开始质疑欧元的可持续性和欧盟的未来,而欧盟成功拯救了欧元,证明了欧盟有能力应对金融危机。如今,欧洲已经基本摆脱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但是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打破一些禁忌,还需要开辟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最终,欧洲国家成功走出了金融危机,欧元还成为了世界主要货币之一。

本次危机与那次金融危机不同,因为其源头并非经

济金融,而是外源性因素,是一场大流行病,这实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其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到目前为止,欧盟在本次危机应对中的表现可圈可点,总体而言,欧盟成员国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的应对做得不错。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影响的财政和货币措施应该迅速、有力,且相互协调。本次危机中,欧盟成员国反应迅速,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支持计划,同时提高了卫生医疗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愈发灵活的国家援助计划,以及欧盟财政预算规则的暂停,预算规则约束到 2021 年才会重新生效。此外,还有两项作为补充的欧盟级别的重要财政计划。其中一项开始于 2020 年 4 月,另一项将在近期实施,就是价值 7500 亿欧元的欧盟恢复基金,该基金是欧盟下一个 7 年期预算的一部分,总额为 1.8 万亿欧元,目前其还有待各国最终审批。

这一应对计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欧盟的债券发行,因为在未来几年里,欧盟将发行约 8500 亿欧元的联合债券,其中包括 1000 亿欧元的共同失业再保险计划,和 7500 亿欧元的欧盟恢复基金,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7 年前讨论过是否有可能在欧盟内部实现一定水平的债务中和。如今,这一目标已经实现了。

欧盟内部很常见的情况是,每当遇到危机时,就会加大改革的步伐。现在,欧盟正在大踏步地改革,目的是应对更加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欧盟投资银行也作出了大胆且果断的应对。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从危机爆发算起,加上之后的三年,欧洲中央银行花了约 4 年的时间才宣布著名的“不计代价”危机应对政策。但这次,欧洲央行不到 4 周就宣布了不设限政策,不仅大幅度提升了货币刺激的力度,还愿意为应对危机改变一些政策。

整体而言,欧盟现在正以实际行动显示其应对危机的决心。话虽如此,也必须清楚,欧盟目前有 27 个成员国,当决策遇到困难时,并不能像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样,



可以由中央作出决定。在欧盟,做出决策需要各成员国彼此达成一致。也就是说,27 个多元化的国家需要达成共识,因此应对危机的时间自然需要更多,不过好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已有许多共同点。虽然有时欧盟各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轻重缓急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对目前的财政和货币应对措施感到很满意。

接下来谈谈国际局势的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影响最终如何,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要明白,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其中有些变化并非突如其来、从天而降,而是在疫情前就已存在,只是随着趋势的扩大和加速日渐突出而已。

我经常谈到四种趋势,称之为四个 D。因为在英语和多数欧洲国家语言里,这四个趋势的首字母都是 D,即去全球化、去多样化、数字化和去城镇化。去全球化已经开始了,至少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增速已逐渐放缓。全球化并未开始全面倒退,这一点仍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定程度的去全球化,包括科技领域的脱钩。当然,中美两国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也是去全球化趋势的一部分。除了脱钩和去全球化,在欧洲还经常提到去多样化,因为欧洲企业正试图将供应链带回到离欧洲更近的地区,从而避免过于依赖远程供应链。这也是去全球化的一部分,至少目前是去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能就此断定全球化将走向终结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与此同时,数字化进程也在推进。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常态,过去不习惯使用数字化通讯方式的个人和社会正在逐渐适应,而且数字化进程仍将继续,其应用范围,不仅是通讯领域,还有很多其他领域,例如金融交易领域,可能出现数字化新型货币。一直以来“无形的全球化”的数字化,将展现出惊人的发展速度并会对未来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外,脱碳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脱碳与气候问

题紧密关联,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因为人类比以往更加重视身体健康,所以更加重视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及气候的未来。这是目前存在的一些发展趋势,在这些领域,要继续合作。

当今世界地理分化严重,两极化加剧,在此情况下,应放下分歧,尽管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不可避免,有时甚至存在经济竞争。比如在欧盟内部,就存在国家间的竞争,在各成员国内则存在企业间竞争。但问题不在于竞争,而在于如何避免竞争升级成为对峙,以及防止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意识到这些分歧,要去化解、解决这些分歧,防止分歧破坏世界三大经济体,即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整体关系,因为这三大经济体是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最重要的三大经济体。

公共卫生是一种全球公共利益,此外,金融稳定、自由公平贸易、国际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都属于全球公共利益。

要继续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多边秩序、放下分歧、认清需求,创造包括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在内的共同公共福祉。

我很荣幸被选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主席,这一领域非常需要通力合作。此外,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加入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该计划旨在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确保新冠肺炎疫苗有公平、免税的接种途径。希望全球能有更多的国家加入这项计划。公共卫生是一种全球公共利益,此外,金融稳定、自由公平贸易、国际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都属于全球公共利益。我们要认清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并建立一种国际秩序,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为人类谋福祉,这一点更加重要。

放眼全球,有一个问题尚无定论:一方面,全球摩擦不断,另一方面,全球流通不息。世界走势将何去何从?是摩擦还是流通?流通是指思想、商品、投资的流通及合作;摩擦是指本土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我的立场是支持欧盟各国和全世界建立开放的全球秩序,因为开放是未来发展的最佳道路。

■ 韩升洙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短期“绿色协议”向 长期“绿色增长”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生态和社会的挑战，其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在近代史中都是罕见的。更令人担忧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仅仅是一个预兆，今后人类还需要面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预计，疫情将使全球经济总量损失数万亿美元，失去几百万个工作岗位，数百万人将重返贫困，再次遭受饥饿和疾病之苦。

由于社会最脆弱的一环遭受疫情的冲击最大，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许多来之不易的进展都可能功亏一篑。

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了更多短期回报，节约了更多长期成本。要抓紧实施高回报的绿色项目，投资开发可再生能源

史无前例的危机需要非同寻常的应对措施，应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结构，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安全、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并保证其长期繁荣。应启动振兴经济的新模式，为人类和地球福祉而投资。不能再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而牺牲地球和人类的长远利益。这个重要信息必须由国际金融论坛 (IFF) 传达出去。

金融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进可持续性未来的投资。金融市场不能继续忽略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能仅关注短期收益的最大化，否则，所有短期收益随时可能被抹去，比如一次突如其来的流行病。即便是出于金融资源的安全性考虑，金融市场和政策的基本规则也需要有所改善，不能只关注短期收益，这样才能创造更多长期投资机会，为地球和人类创造更多福祉。金融行业不应

继续仅以短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金融业的安全与繁荣取决于能否重建公共卫生系统、敬畏大自然。为此，应尽可能投资于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应对行动，并且要以同样的干劲和动力，调动数万亿美元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复苏的基础是长期的经济结构重组，即对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入。决不能在金融投资过程中继续忽视公共卫生、社会安全、教育、干净水源、绿色能源及气候应对行动，只顾短期的经济产出是极大的错误。对社会包容性与低碳转型的投入，能够促进经济重构、创造就业机会。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起了“绿色新政”倡议，当时我任韩国总理，是发起人之一，但遗憾的是这一倡议未能长久实施。这一次，不能重蹈覆辙，不能在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急于求成。短期的“绿色协议”必须转型成为长期的方式，促进“绿色增长”：通过气候投资战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创造低碳未来。实现《巴黎协定》1.5°C 的温度控制目标，需要调动的金融资源相比于新冠肺炎疫情仅是一小部分。提前投入数十亿资金用于生态危机的预防，胜于危机袭来时数万亿资金的慌忙倾注。

全球性环境突发状况，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若不加以遏制，可能导致的社会、经济损失将远高于新冠肺炎疫情。要将经济复苏计划的目标设定为“重建更美好未来”，经济复苏计划必须推动投资政策的变化，从而保障长期繁荣。“重建更美好未来”意味着刺激投资和推动社会变化，减少不可预知冲击带来的风险，提高应对冲击的韧性，无论冲击来自于疾病还是环境恶化。要“重建更美好未来”，实现《巴黎协定》，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更易实现，需要有魄力的经济转型，将金融流量导向低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的发展路径。

单纯依赖政府预算中的公共资金无法实现绿色未来。必须制订计划，鼓励股市中寻找投资机会的私人资金，使其流向绿色项目。事实证明，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创



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了更多短期回报，节约了更多长期成本。要抓紧实施高回报的绿色项目，投资开发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和太阳能。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每一美元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而且不易受到离岸外包的影响。

借助国际金融论坛，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金融政策的制定出谋划策，汇聚智慧，绿色和包容性的复苏可为长期投资创造巨大的机遇。定位金融业在绿色包容性复苏中的角色。就这一点，我想向习近平主席致敬，他在联合国大会的历史性讲话中提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目前最重要、最伟大的气候承诺。因为中国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 28%，高于美国和欧盟的排放总和。如果中国实现“碳中和”，全球气温预计将降低 0.2°C - 0.3°C。

于中国而言，实现“碳中和”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因为中国现在仍然十分依赖化石燃料，但中国有自己的优势，而且态度坚决。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生产国和消费国。全球三分之一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都在中国。中国的电动汽车占全球总量近一半，电动公交车和电动两轮车在全球总量的占比分别是 98% 和 99%。中国的电池生产世界领先，这

些电池可为电动车供能，将可再生能源储存到电网。到 2025 年，中国的电池总容量将接近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两倍。

中国利用清洁能源和规模经济，将这些科技原本高昂的成本降低到了足以与各地化石燃料相匹敌的水平。大型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项目对于全球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口来说，是最便宜的新能源发电方式。很快，新建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将比运营现有的煤电厂更加便宜。电动汽车和电动公交车的成本持续下降，预计未来五年内将会与污染危害较大的燃油车一样便宜。相信中国会再次取得工业化的成功，正如此前以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化进程一样，中国在 2060 年也一定能够成功实现碳中和。中国具备充分的技术能力、金融实力和政治意愿来实现 2060 年的碳中和愿景。

我们要借助国际金融论坛这一平台，率先发掘巨大的投资和金融机会，这些机会将随着中国实现碳中和而扩大。习主席有一个伟大的愿景能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就是 2015 年 9 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出的“全球能源互联网 (GEI)”倡议。“全球能源互联网”倡议旨在通过高压超级电网连接全球清洁能源电网。这一全球愿景能够真正革新电网概念，促进未来可持续能源发展。届时，照耀半个地球表面的太阳能就可以立即传送到另一个半球，为那里的夜间照明供电。

“全球能源互联网”可以先连接中国和中亚国家，例如途经丝绸之路上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这种做法对人类的另一个益处就是复兴咸海，咸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海之一，现在由于缺水已经迅速干涸。20 世纪 60 年代，河流改道用于棉花等作物的灌溉工程，但有了“全球能源互联网”，河流可不再用于灌溉棉花，阿姆河、锡尔河等水源会被引入咸海。超级电网网络能够将地球上的沙漠和荒地变成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中心，进而成为全球经济的电力中心。中国引领的“全球能源互联网”由超级电网技术供能，将为 2050 年全球实现碳中和奠定关键基础。“全球能源互联网”将为全球创造巨大的投资机遇。国际金融论坛可以提供金融战略和政策，刺激投资新机遇，促进全球超级电网的建立。

中国引领高碳经济结构向碳中和绿色经济体系转型的进程中，国际金融论坛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国际金融论坛于 2020 年设立了“全球绿色金融创新奖”，通过这一奖项的设立，国际金融论坛可以推动 2050 年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这将是国际金融论坛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个重大飞跃，将造福人类，尤其是我们的子孙后代。

■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菲律宾前总统、菲律宾众议院前议长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 2020 年世界上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国。中国仍是主要国家中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而且可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4 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6%；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21 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3%。照此增长率，到 2035 年，即 15 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过一篇文章，该文基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做出预测，中国在 2024 年就会赶上美国。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在有生之年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中国是第一个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负增长中复苏的经济体，这并不出人意料。自 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就已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战略规划和坚决贯彻落实的做法的确卓有成效。中国同样也曾面临就业岗位不足的问题，但政府设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互联网销售和夜市经济。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的这些创举为经济总量较小的国家提供了实践经验。这些创新的日常商业模式，套用一個流行语，可能成为“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中国重启经济能够为周边国家的经济带来正面溢出



效应。简而言之，这将成为最重要的动力，推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复苏先人一步，所产生的全球性放大效应，能够促进资本和科技流通。中国环球网 2020 年 5 月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企业最有可能寻求出口、并购以及海外投资机会。科技方面，在 2020 年 3 月的一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包括数字新基建政策在内的“工业互联网”发展中的重大举措。

在后疫情时代，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领域——中国的人民币。早在 2009 年，中国就发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表明人民币向国际化迈出了重要一步。2010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呼吁，摒弃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2015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中国趁热打铁，同年推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2016 年，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都是合理的举措，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 贸易额约占世界的 12%，而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仅占 2% 左右。2016 年，《环球时报》报道称，中国将“根据中国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规定，给予美国 2500 亿元人民币的配额”。但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之后，这些举措似乎后劲不足，原因在于美国政策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受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的影响，严重偏离了国际正常状态。内无助推力，外有美国对世界货币交易的控制，使政治得以趁机介入本应纯粹的商业体系。拭目以待新一届美国政府，看其将如何看待人民币这一世界主要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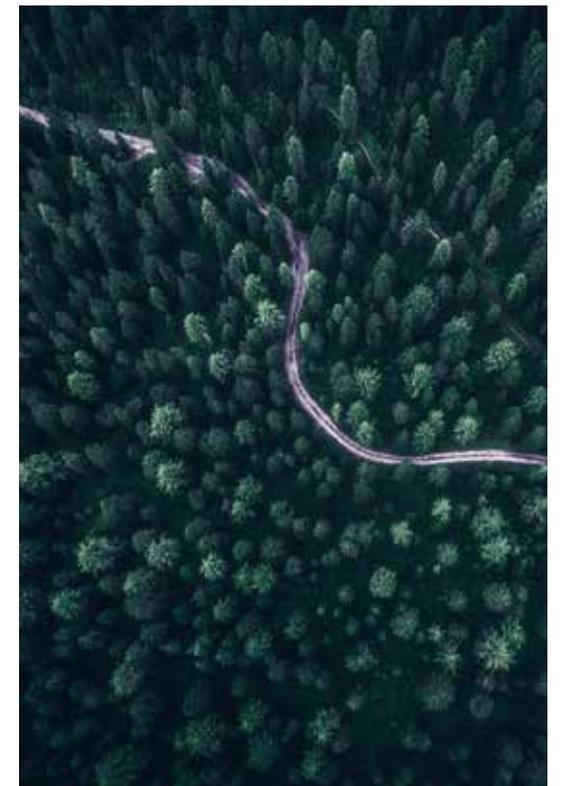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动力减退，在后疫情时代，新冠肺炎疫情的余波必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阻力之一。应该思考当前形势与 2008 年全球经济衰退之间有哪些差异。2008 年的经济衰退源于金融业的次贷危机，而目前的全球经济衰退有更广泛的原因，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大部分劳动力和消费者群体活动，使商业活动骤减，几乎所有行业无一幸免。从这个意义上说，复苏的起点可能比上次更广、更深。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将面临多方面的阻力，麦肯锡公司列举了以下几个受疫情影响最严重，因而也最难恢复的领域：1. 最弱势群体，包括收入最低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2. 小企业；3. 创新领域；4. 密集性接触行业，如住宿、餐饮、零售和制造业等；5. 数字鸿沟；6. 特大城市。因此，从本次疫情中恢复花费的时间越长，那么恢复的起点就越广、越深。

新冠肺炎疫情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研发新疫苗，中国在疫苗研发方面领先其他国家，这“将对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共福祉”。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

“如果以邻为壑、隔岸观火，别国的威胁迟早会变成自己的挑战。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发展的另一阻力，在于互相依存以及共赢合作的模式受到挑战，大国敌对，输赢对立的博弈论甚嚣尘上。美国政府采取了保守主义政策，过去的贸易协定在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看来过于妥协。幸运的是中国的政策带来了转机。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就坚定不移地支持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化。

最后，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作为结束语，“如果以邻为壑、隔岸观火，别国的威胁迟早会变成自己的挑战。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 陆克文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三届主席、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澳大利亚前总理

抓住机遇 实现“绿色复苏”

在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主席为中国发展绘就了宏伟蓝图，宣布了未来 5 年和 15 年的发展目标——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3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至现有水平的三倍；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在核心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使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长期来看，最为重要的是习主席承诺，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实现碳中和。要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中国必须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经济结构进行重大改革，并始终保持政策连续性。诚然，实现这些目标并非易事。但一旦实现，对中国和全世界都将有重大意义。

总体而言，中国未来几年将面临三大相互关联的机遇和一大风险，需要引起诸位的注意。

第一个机遇，是继续发展经济，继续打好扶贫攻坚战，帮助数百万人进入中产阶级，提高其生活质量。扶贫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之本，是习主席“双循环”战略的基础，能让中国更强大。

第二个机遇，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和更广泛的经济增长，成为真正的“绿色复苏”，从而在未来实现低碳发展。中国的绿色复苏将发挥重要作用，在引领未来关键的绿色科技和方案导向方面，创造出大量新兴中产阶级岗位，引领世界预防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第三个机遇，是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大国担当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做出贡献，并且引领经济复苏。中国不应仅确保国内经济增长，还要积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中国做到了这一点，不但能在气候行动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球释放积极信号，缓解全球风险；并且可以此为契机，利用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为中国创造一个更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样，这也会促进多边体系在贸易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良性运转。

然而，要充分利用上述机会，中国也要注意规避风险。王岐山和刘鹤两位领导人在 2020 年 10 月讲话中表示，



中国系统性风险目前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必须严加控制，包括杠杆过高、金融投机和房地产泡沫。全球债务屡创新高，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史无前例，这些都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极大风险。但如果中国能够成功避免上述风险，就有望牢牢抓住上述机遇，取得更好的经济和环境发展成果，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此外，未来重要的不仅只有中国在国内的举措，还有其在国际上的一举一动。“一带一路”国家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不能只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需要使用高排放能源的产业，也不能一味鼓励“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煤矿业。人类所做的一切都会受到地球同等的回馈。最终，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都会加剧全球气候变暖，无论排放国是中国、印度、美国，还是“一带一路”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实现全面绿色发展对于人类未来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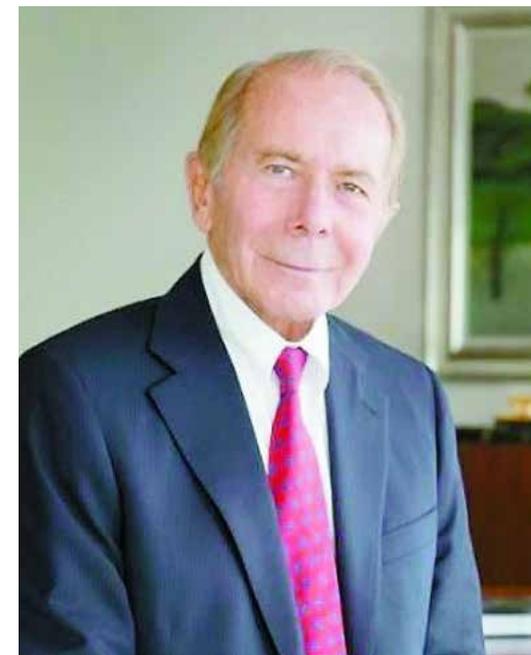
■ 莫里斯·格林伯格 / 世界金融保险之父、C.V.史带集团董事长

共建互利共赢的 中美合作关系

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每个中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大约十年内将发展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中国公民来到美国接受教育，之后再回到中国，成为政商两界的领军人物。

今天的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在国内市场与其他国家展开公平竞争，众多中国企业也已经在海外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美国对中国的贡献是值得注意的。1972 年，尼克松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签署了《上海公报》，重新建立了中美双边关系。在总统历史性访华期间，增进中美间的建设性关系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

1979 年，卡特担任总统期间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1981 年，里根政府为中国设立了单独的贸易类别，免除了中国受到的诸多限制。2001 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时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促成中国入世，我深感自豪。



目前中国不断推出更多新的开放政策，尤其是金融领域。与此同时，中国也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开放政策提供法律支持。

我的公司史带保险公司于 1919 年在上海成立，是首家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保险公司。1975 年，我作为史带的负责人首次到访中国，与当时中国唯一的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建立了联系。我们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对其员工开展了大量培训，安排其再保险业务，帮助他们拓展业务量。

随着与中国的合作日益加深，史带尽一切可能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提供帮助。1992 年，史带的一家子公司在上海等地区获得了 8 个地区性牌照，成为唯一的外商独资寿险公司。在中国引入了代理机制，这一机制迅速普及，为中国创造了约 100 万个就业岗位。

时光如梭，中国的许多领域已不再需要优惠性贸易和投资条款。推进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于中国有益。目前中国不断推出更多新的开放政策，尤其是金融领域。与此同时，中国也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开放政策提供法律支持。

在现有国际规范还未达成一致的领域，中国可以以身作则，创造公平的环境。这不仅是贸易上的问题，因为这同时关乎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

希望美国、中国和其他世界领导人都能认识到保持建设性和开放性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应该抱着真诚的态度，开展更多互惠互利的双边合作。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将成为一剂强心剂，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格局中为无数不安的人带来宽慰。

■ 李勇 / 联合国工业和发展组织 (UNIDO) 总干事

联合国工发组织助力成员国 “绿色复苏”

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刻，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公众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而且已经并将继续给全球发展构成巨大挑战。据预测，到 2020 年底，全球经济将萎缩约 6%。最近几个月，我们已然目睹了全球产业供应链中断，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金融市场波动，这些因素都减缓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疫情爆发前，全球经济已呈现增长乏力，其结果是制造业生产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贫困加剧，而且，受影响最大的往往是世界上最脆弱的群体。

自危机开始以来，全球约 81% 的国家工业生产平均下降 6%。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预计将下降 30% 以上，这已经是最乐观的估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已处于 2010 年以来的次低水平，处于上次全球金融危机余波的影响之下。

2020 年 6 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了《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本年度全球外国投资将减少 40%，2021 年将进一步下降 5%-10%。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投资将下降得更厉害，因为他们的第一产业和制造业都非常依赖外国直接投资，而这些产业在疫情中大受打击。

此外，我们还面临着多边主义的退缩，对全球化不满和不信任情绪的蔓延，债务违约风险的增加，以及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和严重。这些因素交织，使可持续金融面临更多困难，会进一步削弱我们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因此，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妥善解决。

工业发展组织是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致力于应对新冠病毒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我们正在制定有针对性的全面服务计划，满足各成员国的具体需求，目的是促进经济复苏，向更强大、更具包容性、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转型。本次疫情危机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种种封锁措施造成需求减少，导致许多中小企业面临流动性问题，而中小企业在全球附加值、贸易



和就业上占有很大份额。虽然各国都在寻求运用政策机制解决这场流动性危机，以保障中小企业的生存，但同时也需要为经济可持续复苏提供支持。

为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挪威开发合作署公布了一个全新的大型规划框架，即全球市场准入计划 (GMAP)。全球市场准入计划旨在应对质量和合规方面的重大挑战，这正是发展中国家进入海外市场时所面临的难题。该框架将加强支持优质基础设施机构的技术能力，它还将支持中小企业达到国际标准和法规的要求，并帮助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下一阶段，该框架将在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和缅甸等国家实施。这个合作倡议框架也有助于我们的成员国从危机中恢复时重新获得竞争力。

我们倡导的复苏不仅是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社会的包容，它还必须是“绿色”的复苏。本次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其能够加快向绿色产业过渡，推进“绿色工业革命”。工发组织全力支持成员

国的“绿色复苏”，帮助成员国落实绿色标准和认证，实施有针对性的绿色产业政策，助力创新和经济循环，促进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帮助政府和行业协会支持绿色就业和可持续能源发展。各国政府已经投入大量公共资源支持绿色复苏，据经合组织估计，资金总额至少已达到 3120 亿美元。

然而，绿色和非绿色投资之间的平衡仍需改善。以能源行业为例，20 国集团提供的支持中，仍有 47% 的投资用于化石燃料。政策变革势在必行。支持绿色投资，利用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是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工发组织正积极利用私营部门投资，促进行业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我们的投资与技术促进办公室遍布全球，在各地发挥作用。为成员国提供减少风险的创新型管理办法，对其国内的复苏非常关键。

此外，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为投资创造有利环境，对于疫情后的可持续恢复至关重要。中国政府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促进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互联互通、知识共享以及私营部门的投资。近年来，工发组织与中国合作紧密，通过各种具体方案和项目进一步扩大，合作涵盖全球价值链发展联合研究、工业园区国际准则、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框架内的其他倡议。

为支持经济复苏，工发组织还与发展金融机构合作，比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加大对可持续基础设施和产业的投入。目前，与发展金融机构合作已成为我们国家伙伴关系方案的一部分，这种合作在未来还将持续。

工发组织相信，支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就能够推动向低碳经济的包容性和绿色转型的发展，利用创新解决方案实现经济可持续复苏。我相信，今天的会议将涌现真知灼见，探索可行方案，促进这一转变的实现，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 金墉 / 第12任世界银行行长

跨越壁垒， 实现全球合作共商

全面可持续发展，全球领导人共商合作与危机应对，对于渡过这一历史性难关非常重要。与全球金融危机不同的是，本次全球疫情带来的影响巨大，无人幸免。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加严重，这些国家急需让中国发生巨变的那种投资与机会。

我永远不会忘记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第一次到访中国的经历。我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长大，来中国之前，只知道中国非常贫穷。2012年，我首次到访北京，当时感到极为惊讶，因为看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短短 30 年内 8 亿人口脱贫。

我在研究中国的发展历程时，发现有些基本面从未变过，未来也不会改变，这对在后疫情时代思考全面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基础设施投资是关键。我在世行的任期将尽时，去了一次贵州，当时贵州是中国第三大贫困省。尽管如此，贵州省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贵州已经在努力成为重要的全球电子商务枢纽，专注于各类商品的出口，包括猕猴桃、辣子



鸡和茅台酒。贵州的发展战略很清晰：落实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创业、全球互联和经济繁荣创造机会。

非洲、南亚、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的国家，急需基础设施投资和全球贸易。2019年我离开世界银行，就是为了将更多私营部门投资引向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拖累了这一进程。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加速发展中国家从疫情中恢复的进程，因此应该优先落实。加强公路、港口、电网、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

世界银行等多边机制的重要性未来不会动摇。然而，目前的多边或双边援助机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无法满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必须寻求新的合作途径，真正让所有人有机会改善生活质量。

从中国、韩国、日本等成功的亚洲经济体的经验中，还可以学到的是，贸易规则要保持开放。2020年11月，15个成员国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涵盖全球近30%的人口，以及世界30%的GDP。一旦各成员国完成审批，RCEP国家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园区。那么，在2022年就能看到这种伙伴关系对区域、对全球带来的福祉。

全面可持续发展，全球领导人共商合作与危机应对，对于渡过这一历史性难关非常重要。与全球金融危机不同的是，本次全球疫情带来的影响巨大，无人幸免。

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政府转向对内发展，民族主义和仇外浪潮兴起，作为全球多边组织世界银行的前任行长，我深感担忧。这些事态的发展，在当前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和气候变化威胁形势下，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应对以上挑战都需要加强合作，而非减少合作；需要支持多边主义，而非削弱多边主义；需要更加重视合作，而非忽视合作，需要跨越地理、文化和语言壁垒，互相理解。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亲身经历。我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最后几次到访非洲时，去过坦桑尼亚，并且按照惯例，到访了一所学校的教室，在座的都是10到11岁的学生。我问他们：“大家长大后想做什么？”一



图为金墉 4 岁照片

名小男孩站起来答道：“我想成为世界银行行长。”在场的老师和我的工作人

员都笑了。这是我 4 岁时的照片，那时我还和家人一起住在韩国。那是 1963 年，在这一年，世界银行是这样描述我出生的国家的：“韩国远离全球主要贸易路线，人口密集，增长速度快，但自然资源匮乏。无论如何，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韩国都难以为国民提供匮乏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物资。而且韩国必须意识到，即便是出于最美好的愿望，实施最恰当的政策，韩国要实现经济自给自足也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且这一进程非常缓慢。”

在坦桑尼亚的那间教室，笑声平息后，我告诉那个小男孩，“不要因为别人一句否定的话，就认定你无法成为世界银行行长，或者认定你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 1963 年，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乔治·戴维·伍兹，来到韩国首尔参观当年我的学前班课堂的话，他一定想象不到教室里坐着他未来的继任者之一。所有人都应得到机会自由地去追求梦想。

希望来年，能够共同看到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投资繁荣，全球贸易势头强劲，最重要的是全球将合作共商，共同应对这次最大的挑战。

■ 金立群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新型发展模式 重启全球经济

过去十几年，国际金融论坛 (IFF) 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促进了金融和商业领域的政要、专家学者，及智库成员的交流与沟通。国际金融论坛的讨论话题广泛，探究了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我有幸出任过国际金融论坛的成员，直接参与了论坛的会议活动，并从与各位嘉宾的交流互动中受益匪浅。

国际金融论坛第 17 届全球年会召开之时，世界各国正在奋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遭到疫情重创，世界各地均出现经济负增长，只有少数经济体得以幸免。在此环境下，IFF 第 17 届全球年会上开展的探讨，关注各国政府为控制疫情采取的行动，从而尽快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尽管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但也不必对中短期形势感到过于悲观。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中国首当其冲，但同时，中国借助有效措施和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最先使疫情得到了控制。中国疫情的控制，甚至出现在新冠肺炎疫苗普及之前。目前，中国是唯一复苏势头强劲的国家，2020 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9%。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政策得当，行动有效，就有可能在短期内摆脱疫情影响。

鉴于当前经济下行的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与正常商业周期关系不大，因此扭转局势十分困难，况且目前正常商业周期也处于下行阶段。为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只是权宜之计，无法持续创造就业机会，也无法修复断裂的全球生产链，因为现在仍需保持社交距离，服务业仍处于停摆状态。如果想恢复经济增长，只有靠普及安全有效的疫苗。各国一定要利用手中的资源和技术尽快研发和生产出安全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

人们每次都能从灾难中汲取教训，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果从灾难中得出错误结论，做出错误的决定，只会让事态进一步恶化，雪上加霜。全球生产链的中断不是故步自封的理由，也不应该对贸易和跨境投资敬而远之。退出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关闭经济开放的大门，最终只能招致更多灾祸。



2020 年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医疗是全球经济最薄弱的环节。许多国家的医疗行业急需投资。要探究气候和健康风险之间的复杂关系。重启全球经济，要与新型发展模式并行，要在发展过程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金融机构应该负起责任，重新思考发展融资的途径。过去，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错误的投资决策往往导致债务高企，最终殃及整个金融系统崩溃。与此同时，最迫切需要融资的是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等可减缓资源枯竭的领域，或者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科技，但这些领域和科技仍然遭到忽视，原因仅仅是投资者认为这方面的投资风险高，难预料或难以产生短期回报。解决新冠肺炎疫情不能靠经济或金融手段解决。

思考发展战略时，应适当强调医疗等领域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这与 IFF 本届年会的主题息息相关。多边发展银行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其独特的引导作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认真思考其自身作用，在亚投行战略目标指导下，为上述领域提供融资，投资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

除了新冠病毒，还有大量议题值得我们在 IFF 全球年会上关注。国际金融的基础设施及业务运营需要做出重大转变，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将迎来重大变革。人工智能、金融科技、5G 等技术正在快速改变世界。而这些变化对于人类社会是福是祸，仍需拭目以待。

因此，要从全新的视角审视世界。必须对这种不可逆的趋势保持足够高的敏感度，不能只关注自己熟悉的领域，否则就极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迷失方向。

国际金融论坛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让我们可以针

医疗是全球经济最薄弱的环节。许多国家的医疗行业急需投资。要探究气候和健康风险之间的复杂关系。重启全球经济，要与新型发展模式并行，要在发展过程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对上述议题畅所欲言。国际金融论坛 (IFF) 将继续聚焦金融，同时也会超越狭义的金融领域。正因如此，在当前环境下举办 IFF 全球年会才显得愈发重要。



■ 马可 / 新开发银行行长

全球化的“新蜕变”

当今世界发生了什么？最精确的描述就是全球化正在转型，即全球化的“新蜕变”。其实全球化的第一次转变，就发生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历史上至少有两个时刻，都和今天正在经历的情况非常相似。1989 年，柏林墙倒塌，随后 1991 年，苏联解体，市场的力量推动了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国际投资不断增加。国外直接投资加强并扩张了商品的国际供应链，使一件商品同时来自许多

不同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做出贡献，并让全球受益。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才是正确的方向。

国家：即使是像排球这样简单和低附加值的商品，皮革可能来自德国，胶水可能来自泰国，而营销由巴西负责。

不同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做出贡献，并让全球受益。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才是正确的方向。

在这一时期，区域一体化及深化进程也逐步在世界各地兴起，比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盟和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等。这些区域一体化进展可视作全球化的先导。总体而言，从 1989 年柏林墙倒塌，直至 2008 年经济大衰退，世界的确经历了深刻的全球化。

但随着 2008 年大衰退的到来，雷曼兄弟破产，与上述时期对比，全球化又开始了新的历程。全球贸易开放程度降低，增长速度低于全球 GDP 增速。旧时代的进口替代政策卷土重来，多国政府实行本地化的政策，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货物交易减少，更多地集中在单一地区内部。换言之，2008 年至今是全球化的另一个阶段，去全球化的风险正在显现。

目前，世界各地互联互通程度有待提高，那么人类将继续走向去全球化，还是开创新的未来？实际上，情况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人类正面临着全球化的新蜕变。全球化未来的形态有很多方面，但以下三个方面对未来



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新兴市场七国 (E7) 在全球 GDP 中的经济比重已经超过了老牌的七国集团 (G7)。传统意义的七国集团，即成熟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GDP，总和约为 40 万亿美元；新兴市场七国，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GDP 总和则达到了 53 万亿美元。

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日益密切。以巴西为例，2020 年 1-10 月，巴西对孟加拉国的出口总量，大于对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出口的总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将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E7 将比 G7 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更大比重。

第二，与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有关。全球价值链范围极广，不仅包含全球供应链，也包含消费链。新兴市场在国际贸易中参与度提高，对规模、速度和投资有了更多话语权。例如，中国已成为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之一。

最近有观点认为，地缘政治将成为最重要的驱动力，重新配置新的价值链。地缘政治将发挥重要作用，不应刻意淡化。此外，至少还有三大因素，将对价值链的重

新配置产生重要或更深远的影响。

第一个因素是世界一些最重要经济体的自然演变，比如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在研发创新上的投资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0.2%；而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超过 2%，非常接近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不再是一个低成本或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者；相反，中国在许多先进技术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一些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中国地缘经济邻国，如越南、印尼、缅甸、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印度。这个现象在历史上其实也并不新鲜，比如 1970-1980 年的亚洲四小龙就取代了日本成为低成本、低工资制造业基地。但这一次是中国，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相关影响也将更加广泛。

第二个因素是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最近，亚洲地区诞生了一项重要的国际贸易协议，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贸易层面，该协定会涉及国际间的商品交换；而在企业层面，则会影响投资的流动。

第三个因素是有些国家主动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对外国直接投资更加开放。

第三，展望未来，全球化的蜕变也会受到人才观念的强烈影响。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称之为“人才主义”。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落幕，随之而来的是人才主义时代，因为人才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国际经济学里比较优势的概念，更是最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人才与挑战的复杂性有关，各国都会变得更加复杂。突破自我，必须要回应时代号召，除了擅长的领域以外，必须发掘自身的其他潜力。

此外，在全球化继续蜕变的进程中，包括新开发银行在内的国际开发银行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应关注三个重点领域。

1. 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基础设施，以及新型的技术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不仅能解决 19-20 世纪的需求，也能满足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需求。因此，新开发银行的工作不仅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要为未来铺设道路。

2.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如出口主导模式、国内主导模式、公共部门及私营部门主导的模式，都需要重新定义。新开发银行应在对话中发挥作用。

3. 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全球合作的世界，新开发银行应建立必要的协作框架，使各国能够走到一起，在共同关切的领域开展建设性工作，续写全球化的下一篇章。

林建海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秘书长

新形势下的挑战和机遇

展望和挑战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十分严峻。这次疫情也引发了自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向何处去成了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

总体来看，目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前景高度不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最新预测表明，2020 年全球经济负增长 4.4%。其中发达经济体负增长 5.8%，除中国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预计负增长 5.7%，美国负增长 4.3%，欧元区负增长 8.3%。在假设疫情能得到控制的前提下，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有所回升。中国是 2020 年全球唯一能够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预计增速 1.9%，2021 年可达 8% 以上。

中国高效、果断地控制了病毒的传播，并在短期内施行了有效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这两个因素使中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发挥了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然而，在全球许多其他国家，新病例仍在大幅增长，全球经济前景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脆弱性大幅上升。目前全球公共债务达到历史最高点，约占 GDP 的 100%，许多国家面临高债务风险。同时，公司债券、违约率和潜在的破产风险也在上升。虽然目前银行资本比较充裕，但如果经济前景恶化，银行资本可能短缺，估计可高达 2000 多亿美元。

第二，劳动力市场修复需要时间。目前全球的就

业仍远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2020 年第二季度全球工作时间减少了 14%，相当于损失了 4 亿个全职工作。劳动力市场更加两极化，低收入工人、年轻人和女性工作者受到的失业影响相对更大。这也表明，在危机中，更需要关心弱势群体的生活和生存状况。

第三，全球经济衰退会加剧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IMF 预计，在未来的五年间，全球累计产出将损失 28 万亿美元。今年，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整体的产出预计低于去年水平，许多国家的经济规模要到 2022 年之后才能逐渐回到危机前水平。这意味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下降，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将会倒退。

危机带来的变化和机遇

展望未来，这场危机将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四个方面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机遇。

首先，全球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将是未来的重大趋势。调查显示，欧洲封锁期间，有 50% 左右的员工在远程工作；其中，只有 10% 的员工希望今后重返办公室。疫情期间，人们也越来越习惯电子商务，一般零售购物越来越多地被电子商务取代。更多的公司采用数字技术提高供应链的多元化和采购效率。另外，可以预计今后许多教育课程、国际会议、研讨会等都可以通过远程网络来进行，IFF 第 17 届全球年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而，数字技术将会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服务业可能再次驱动全球化浪潮，特别是一些专业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其业务可以通过科技远程来实现。随着科技的进步，服务业的全球化可能进一步发展，其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大幅提高。

第三，医疗卫生行业也将大幅

我们面临的是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要使全球经济从这场危机中恢复，需要在经济复苏和避免风险中找到恰当的政策平衡，也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实施重大政策合作。



发展。这次疫情展示了加强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药品疫苗研发，老人康复中心，卫生环境等。控制疫情是经济复苏的前提，医疗事业的发展将为经济高质量持续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环保行业的投入也会快速增加。研究发现，空气污染较高的地区，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和住院率也比较高。近些年自然灾害的频发也和环境污染以及气温上升息息相关。因而，绿色项目、清洁能源等方面投资有望大幅加强。

我们面临的是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要使全球经济从这场危机中恢复，需要在经济复苏和避免风险中找到恰当的政策平衡，也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实施重大政策合作。在有效应对危机的同时，需要及时把握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趋势和机遇。只有这样，才能登高望远，永无止境，从而创造更加繁荣的未来。

■ 中尾武彦 / 亚洲开发银行 (ADB) 前行长、日本瑞穗研究所主席

如何实现后疫情时代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从 2013 年起至 2020 年 1 月，我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当回到东京时，完全没料到世界各国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

国际社会当前的议题是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以及疫情结束后如何恢复经济发展。具体谈谈四个问题。一是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二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三是社会分化。四是全球化和多边主义。

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议题之一，或者说经济恢复过程中、甚至是疫情期间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亚洲尤其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天气与日俱增，包括台风、干旱、洪涝、高温天气和海平面上升。但好在我们正在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可再生能源价格持续下降，将可再生能源储存至电网的技术也在以高于预期的速度不断发展。此外，绿色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也有很多技术可以用于适应性措施，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比如，全球定位系统和滴灌技术可用于农业，从而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应对洪涝和干旱，可种植抗逆性更高的水稻品种；可以建设更牢固耐用的高速公路；在城市规划与灾害防控管理中应用防灾地图。

除了气候变化，还面临长期贫困、性别不平等、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资源稀缺等问题。这些都属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范围。此外，还需采取行动，在各国建设涉及能源、交通和城区等领域的优质基础设施。

第二点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今，世界各国基本都在调整财政、货币及金融政策来保障就业、住房和企业发展。与此同时，舆论也不乏对企业道德风险的担忧。但是，仍然要对企业予以支持，即使在没有新冠肺炎的时候，这些支持也是企业赖以生存所必须的。宁可失之过于谨慎也不能坐以待毙。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占 GDP 的比例与日俱增，中央银行用于购买政府债券的支出不断增加，而且为了给金融业以支持，基础货币总量也在增加。由于时间紧张，无法有选择性地采取措施，只能笼统地扩大支出。就算这些款项最终没用于消费



和投资，也可以变成储蓄，用于购买政府债券。综上所述，目前各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也不会出现政府债务危机，抑或利率飙升、汇率暴跌的情况。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不能无止境地拉高债务占 GDP 的比例。在这点上，必须达成共识。后疫情时代，要开始思考如何将财政和货币政策重回正轨。

第三点是如何应对各国的社会分化。全球化和科技发展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和贫富差距，而社会分化却不止于此。社会分化正在引发地区分化、宗教分化、信仰分化和伦理分化等问题，并且开始损害主权国家的正常运转，进而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安全。

因此，要建立累进税制，并确保其恰当的执行，同

时提供优质的教育以及医疗等公共服务，帮助弱势群体。例如，中国的户口管理系统区分开了城镇和农村人口，虽然现在正在逐渐放松要求，但改革的步伐还应当进一步加快。再举一个例子，平台企业集聚了大量财富、收入、人力资源和科技。如何通过税收政策、竞争政策以及数据和隐私政策来解决平台企业的垄断问题？应该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考虑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社会分化等问题导致了全球化和多边机制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贸易和人员交流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社会的努力，全球化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福祉。最近，国家之间大量的资本流通和数字科技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

但现在，全球化可能需要经历一定程度的调整。各国都在担心国家安全、技术窃取和贸易泄密等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灾害等突发事件可能对供应链造成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各国日益重视医药和医疗物资供应的安全。为此，各国将加大国内生产，减少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但是，即便出现部分调整，全球化也不应该倒退，因为全球化的倒退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有鉴于此，必须维护多边机构的发展，包括 20 国集团、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

但是基于稳定、健康的主权国家的国际合作框架对于各国人民长期、全面的利益同样不可或缺。

银行。当然在国际社会中，基于选民和纳税人的主权国家才是对人民福祉和公共财富负责的主体，因此主权国家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基于稳定、健康的主权国家的国际合作框架对于各国人民长期、全面的利益同样不可或缺。

希望 IFF 第 17 届全球年会能够提供交流机会，探讨未来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IFF 学术圆桌会议

张慎峰： RCEP 签署具有重大意义，我国自贸协定 落实工作仍待改进	37	夏乐： 货币互换与国际金融安全网建设	41
庄巨忠： 亚洲经济过去 50 年成功的经验	39	沈建光： 在全球疫情阴霾中，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亮点	42

■ 张慎峰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RCEP 签署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自贸协定落实工作仍待改进



最近，大家在工作生活中的热门词汇，应该就是 RCEP。就 RCEP 的签订和大家交流一些我的看法。

现在世界经贸的发展主要依靠两个车轮驱动，一个是国际性组织——WTO，另一个是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全球正在发挥作用的自由贸易协定有 400 多项。近两年，由于 WTO 的机制出现问题，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自由贸易协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目前，我国同 26 个国家签订了 19 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最为可喜的就是被全球关注和热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 历经 8 年漫长而艰辛的谈判，最终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这意味着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经济发展增速最快的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自贸区。粗略估算，RCEP 协定成员国的总人口、经济总量以及贸易总量大约分别占到了

全球的 30%。这是到目前为止全球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最复杂，也是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区。

全面、准确地认识 RCEP 的重要意义

首先，RCEP 的签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就贸易领域而言，该协议签署有利于促进我国进口的多元化、激发进口潜力、优化进口结构，尤其可以扩大先进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国内需求的资源性商品的进口数量。

其次，RCEP 的签署有利于稳定中国对区域内各国的出口规模，对于稳住外贸基本盘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RCEP 的签署将助力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型经济体的发展，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也能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第四，从政治方面看，RCEP 的签署有利于巩固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增强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性，也体现了中国对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支持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所以，RCEP 的最终签署可以说是一场多边主义的胜利，是自由贸易的胜利，也是全球化的胜利。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借助东风、乘势而上、大力推动我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工作。

理智、清晰地查找我国自贸协定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总共签署了 19 项自由贸易协定，覆盖 26 个国家，与自贸协定国家开展贸易量占到总贸易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与中国的经济总量相比，我国目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可以说是比较少的。不仅覆盖面较小，且实际的使用效率也不是很高。

大部分自贸协定签订之后，在产业中游、下游以及推广、实施环节还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根据有关方面

提供的进出口企业申领数据计算, 2014 至 2018 年, 我国企业自贸协定利用率从 9.7% 提升到 16.7%。虽然最近两年有大幅度提升, 部分地区或省份单项自贸协定利用率甚至突破 60%、70%, 但就这十几个自贸协定的全局而言, 我国的自贸协定利用率还是大大地低于发达国家。例如, 目前美国普遍达到 24%, 日本接近 50%, 韩国达到 75%, 澳大利亚与智利、日本、泰国间的自贸协定利用率大部分高于 90%。

认真、客观地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自贸协定相关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值得深刻反思, 总结来看,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原因一, 自贸协定推广体制本身应当进一步优化。政府部门的协同效率、上下游各个环节的协同效果、政府与企业间的转化效率还有待提升。在这方面, 我认为比较有借鉴意义的是韩国。韩国在自贸协定使用上推行的是举国体制, 政府出台专门的政策法案, 由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派出公务员和关税师等专业人员, 联合组成 FTA 贸易综合支援中心。支援中心实行集中办公, 中心人员拥有稳定的任期和薪资, 并且长期开展培训。这些措施使韩国的自贸协定能在最短时间里, 在最大范围内

和最深层次上惠及大大小小的企业。

原因二, 到目前为止, 对于自贸协定利用率, 我国仍然缺少全国统一的、权威的评估机构和评估数据, 缺乏统一的、客观的评价标准。

原因三, 社会化的整体推广普及工作亟待加强。

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对于中国自贸协定存在的问题, 我想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解决措施。

一方面, 应继续与更多经济体商谈, 以期加入更多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前面提到, 我国与自由贸易伙伴发生的贸易量只占总贸易量的三分之一, 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 我们应尽早启动与中欧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 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尽可能早地取得一些实质性成果。比如支持香港尽早加入 RCEP。同时对 CPTTP 这样高质量、高水平的自贸协定, 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 认真研究。

另一方面, 在实际工作当中, 应加大自贸协定面向企业的宣传推广力度, 使相关部门费尽周折谈下来的自贸协定能尽快惠及千万企业, 保证自贸协定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

■ 庄巨忠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席首席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原副首席经济学家

亚洲经济过去50年成功的经验



尽管目前在全球广大地区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许多亚洲国家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这些并不能掩盖亚太地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导致亚洲成功的因素有许多, 包括地区总体上的和平和稳定, 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人口红利, 以及经济体之间的收敛过程。但亚洲开发银行 2020 年出版的新书——《亚洲繁荣之路: 50 年政策、市场和科技发展的回顾》认为, 亚洲二战后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建设。尽管该书跟疫情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跟我们讨论疫情后全球和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作为该书的主要作者之一, 我想作一简单介绍。

亚行的新书认为, 虽然过去 50 年亚洲各国在政策组合和执行上存在差异, 偶尔还会出现挫折和逆转, 但成功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奉行了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 第一, 依靠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推动经济增长, 利用政府干预弥补市场的不足; 第二, 鼓励制造业发展和制造业出口, 同时推动农业和服务业现

代化; 第三, 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 把科技进步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途径之一; 第四, 开放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 第五, 鼓励国内储蓄和资本积累; 第六, 重视对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第七, 促进减贫和增长的包容性; 第八, 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九, 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

除了对上述因素进行深入讨论以外, 我们还探讨了几个发展政策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亚洲的发展经验是不是有独到之处? 在讨论亚洲经济成功经验时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 是否存在一个亚洲发展模式, 强调政府作用, 以区别于基于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我们认为, 回顾亚洲半个多世纪发展史,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改革开放, 和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所倡导的政策建议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些改革开放措施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亚洲发展模式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没有大的差别。但是, 与其他国家相比, 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执行这些政策和改革措施时, 采取了比较务实的做法, 循序渐进。从这个角度看, 亚洲发展有独到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 产业政策的作用。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 如果运用不当, 会导致不正当竞争和效率低下。但如果运用得当, 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产业发展。

制度和治理确实很重要, 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取决于一个国家发展阶段中制度和治理的具体内容。一个国家在低收入阶段, 政府能力和监管的质量可能非常重要。



如果产业政策能够促进竞争,明确政策目标和条款,并且透明有效地执行,则更有可能成功。

第三个问题,发展中国家能不能绕过工业化,也即通过从农业向服务业直接转型,从而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对中国而言是无可争议的。工业化和制造业对中国的高速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对南亚国家如印度、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这是一个经常讨论和引起争议的话题。我们在书中指出,世界上现有的高收入国家,在其发展历史上,制造业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看制造业占 GDP 的份额还是看其创造的就业。因为制造业有一些很重要的特征,比如较高的需求的收入弹性、规模经济效应、出口和创汇的能力等等。所以,从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很难绕过工业化。

最后一个问题,制度和治理的作用。制度和治理很重要,但亚洲国家制度和治理的全球排名通常都很低,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制度和治理确实很重要,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取决于一个国家发展阶段中制度和治理的具体内容。一个国家在低收入阶段,政府能力和监管的质量可能非常重要。但是,在高收入阶段,制度和治理的其他方面,比如说更加广泛的参与和法治建设,还有控

制腐败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

尽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亚洲仍然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没有理由骄傲自满。2018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 13% 左右。即使到 21 世纪中期,亚洲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能够达到 50%——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亚洲世纪”的主要指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亚洲人口就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亚洲面临的挑战包括持续的贫困、收入差距的扩大、性别差距、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医疗、教育、电力、安全饮用水等服务的不足。目前还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反映了亚洲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存在许多短板,需要加强投资。

最后,亚行的新书指出,亚洲经济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成功令人振奋,但亚洲要达到西方过去五个世纪以来的影响力,还要假以时日。亚洲必须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为科技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更加清晰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为建设更加包容、一体化和繁荣的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 夏乐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原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互换与 国际金融安全网建设

在 2019 年国际金融论坛 (IFF) 年会上,我向诸位学术委员和理事们汇报过当时的一项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民银行和其他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没有想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严重冲击,央行货币互换在 2020 年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2020 年 3 月,国际金融体系在疫情的冲击下出现剧烈波动,那段时间国际金融形势曾一度非常紧张,美国股市几次熔断。而美元对其他货币互换的基差也曾达到非常高的点位,标志着出现全球范围的“美元荒”。这种不稳定状况的最终解决主要依靠美联储与其他央行的美元货币互换。2020 年以前美联储与其五个伙伴央行,即瑞士央行、英格兰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已经建立了常备货币互换机制。在 2020 年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不稳定后,美联储迅速利用建立的货币互换机制向这五家伙伴央行注入美元流动性,随即美联储把货币互换扩大到另外 9 家央行,最终通过 14 家央行

和美联储的货币互换平息了国际“美元荒”,避免了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和扩散。

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我之前研究的结论,即央行间的货币互换是有效的。其实早在 2009 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美国就曾与这 14 家央行签订过同样的货币互换协定,并进行流动性操作。其后有很多学者对于这些货币互换的有效性和实际效果进行研究。2020 年这次央行货币互换的使用,比 2009 年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机制的有效性。

此外,美联储的货币互换实践也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安全网由什么来支撑?以前通常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来帮助平衡不同国家的国际收支,但是这次实践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那就是美联储货币互换体系在未来国际金融安全网方面可能将依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只有 14 家央行参与美元货币互换,而且这 14

家央行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安全网之外。这启发我们思考,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安全网应该具备怎样的结构?也许我们需要建立不同层次的安全网,除美国及其关系友好的国家建立的这层安全网外,再建立其他层的金融体系安全网,以照顾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最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也在大力推行人民币货币互换体系,目前已与 30 多个国家的央行签订了人民币货币互换协定。我之前的研究表明,这些货币互换在推动相关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展望未来,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货币互换将会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是同目前一样只承担推动双边贸易结算的作用,还是像美联储的美元货币互换机制一样,最终形成全球金融体系安全网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 沈建光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京东集团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在全球疫情阴霾中， 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亮点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反而逆势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预测欧美国家 2020 年 GDP 或为负增长，但中国 GDP 仍能保持增长 2% 以上。从第三季度开始，尤其到现在的第四季度，中国消费水平明显在快速复苏。京东大数据显示，我国珠宝、化妆品及各类奢侈品的消费增长非常迅速，大大超过了必需品的消费。

从进出口增速来看，最近中国进出口形势也超出预期，尤其是出口，实现了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对美国出口增长更是超过 30%。目前全球依然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之下，像欧洲、英国很多正经受着疫情第二波冲击的国家，再次宣布封城，其生产恢复势必遭受影响。相较之下，中国生产恢复非常迅速，并且带动了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恢复生产，一方面满足了复苏的国内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因疫情生产陷入困境国家的消费需求。也正因如此，最近中国的出口表现非常强劲，各大港口满负荷运转，航运价格也大幅度上升。

从全球投资来看，中国的投资市场逐渐回暖、明显复苏。为应对疫情，世界各国持续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全球进入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时期。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从宽松转为收紧，中国利率已经开始上行。中国应该是当前全世界唯一一个货币政策转向的国家，其结果就是人民币明显走强。不仅如此，由于货币政策收紧，中国利率高企，全球投资者资金流入中国，中国的债券市场受到国际投资者的追捧。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抓住机遇，继续扩大、深化金融市场开放，积极鼓励外国资本流入。因此，在 2020 年全球外资流动下降的大背景下，外资对中国的投入呈现正增长，形成了一个中国“一枝独秀”的独特现象。

从行业发展来看，实业资本流入、股票和债券资本流入，都使人民币出现了不小的升值。在这一轮经济复苏中，中国的数字经济产业可谓一马当先，电商、物流、科技金融等行业都在疫情冲击背景下，表现出了强大的生产力和生命力。



中国经济率先迅速复苏的关键因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防疫措施有效，快速控制了疫情；第二，创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的高歌猛进；第三，中国采取的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有效、适度。这些因素仍会持续，所以在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有效控制，全球经济深陷阴霾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仍会是一个亮眼的闪光点。

IFF 政策对话 新变局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 机遇与挑战

赫尔曼·范龙佩： 经济重启促进社会凝聚力	44	郝福满： 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52
让·克洛德·特里谢： 疫情以来欧盟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和趋势	46	朱光耀： G20 应承担财政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主导角色	53
史蒂芬·格罗夫： 扩大财政支出，实现可持续发展	48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疫情重构财政货币政策框架	54
泽田康幸： 亚洲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及趋势	49	亨德里克·巴科灵： 疫情期间德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经验分享	55
埃里克·博格洛夫： 通过储备资金和全球合作来应对第二波疫情	50	刘尚希： 疫情控制是财政、货币政策效应产生的前提	56

■ 赫尔曼·范龙佩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首任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经济重启 促进社会凝聚力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延续了欧洲过去十年来经历的各种危机，包括银行危机、欧元危机、经济危机、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显然，前三种危机对就业和经济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欧盟也从中吸取了很多教训。

2010 至 2012 年欧元区危机发生时，欧盟最大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纠正预算失衡。实际上，这种通缩政策是金融市场强加给欧元区的——因为金融市场错误地认为，某些欧元区国家会无法偿还公共债务。以希腊为例，由于调拨大量资金对财政紧缩补救，以及 GDP 损

深层问题往往在危机中浮现，或将加剧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因此，欧洲复苏基金将精准支援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区域及当地经济

失 25%，致使难以积累起公共财政资金。有鉴于此，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欧盟很快转向扩张性财政政策，弥补危机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欧盟改变了货币政策的方向。欧元区危机爆发之初，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没有那么宽松，与美国、英国和日本央行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当时欧元区的经济复苏速度落后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2015 年，欧洲中央银行 (ECB) 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欧洲央行强化了这种非常规扩张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或可称为一个大型资产购买计划。然而，货币政策也有局限性。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强劲增长，居民银行存款增加，意味着民众较为谨慎。如果钱只是存在银行里，那么增加货币供应量就没有意义，最有效的政策应该是加大财政刺激。

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形成互补。如果利率一直维持在极低水平，甚至是长期的负利率，那么财政赤字就会比较容易弥补。货币政策部门和成员国政府在此方面共同努力，试图抵消需求的下降。欧盟委员会首次成为资本市场上的主要债权方，支持复苏基金和其他支出，出资金额达 1 万亿欧元。

欧元区的公共债务不断攀升，未来三年，占 GDP 的比例将从去年的 86% 上升到 102%。欧元区的平均预算赤字将增加，从 2019 年占 GDP 的 0.6% 升至 2020 年的 8.8% 左右。这个数值预计到 2021 年将减半，即 4.7%，但仍然高于财政制度中 3% 的基准。

这种政策上的巨大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改变了许多思维定式，包括对通胀和对加大公共开支的恐惧。欧元区的公共支出正在增加，占 GDP 比例从 2019 年的 47% 上升到 2020 年的 55%，2021 年占 GDP 的比例预计为 50%。无论如何，欧盟都希望在不影响其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下应对这场危机。

欧盟不仅吸取了教训，还从早先的改革中获益。例如，欧洲央行对所有主要欧洲银行实施了有效监管。上次危机中，欧洲各银行资本不足，是造成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但这次，这些银行对于解决问题做出了贡献。诚然，不良贷款的规模会增加，但各银行应该继续保持良好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以便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资金。

然而，这并不代表公共贷款可以没有限制、不受限制，而是意味着，政府能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大量借贷。另一方面，设置经济增长目标，是为了缓解和弥补日益升高的赤字和债务。由于复苏措施是暂时的，因此预计借款同样只是一时的增长。

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利率，就能避免陷入恶性循环，利息负担和债务就不会继续增长。此外，预测显示，尽管公共债务异常高企，但利率很低，偿债成本将保持历史低位。即便利率上升，债务的平均期限较长，比如英国是 15 年，那么整体融资成本也不会发生很大变化。

然而，人们最关心的是疫情能否尽快得到控制。尽



管各国政府竭尽所能保护经济，但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爆发依然会造成严重打击。健康和财富密不可分，政策的各个方面也存在着互相关联。防疫措施在落实过程中任何的延误，所造成的影响，将在健康、经济和公共财政领域形成滚雪球效应。各国不能为过去的观念所束缚，急需政治魄力，采取公正公平的措施。

与十年前的危机相比，另一个巨大的差异在于，金融市场正在推动欧元走强，但与此同时，利率处于几个世纪的最低水平。对欧元崩溃的担忧如今已不复存在。

此外，目前的复苏计划与过去的差别在于，欧盟现在希望长期和短期目标能够彼此协调。人们一致认为，长期政策的重点在于提高生产力，从而提高生活水平，适应后疫情时代。这就需要数字和绿色基础设施进行更多公共投资，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便劳动力能尽快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新兴工作岗位。

欧盟经济的重启要为“绿色新政”服务，致力于在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复苏计划总金额为 1.8 万亿欧元，占欧盟 GDP 的 12%，预计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资金将用于实现该目标。欧盟计划，203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比 1990 年降低 50%-55%。2020 年的排放量已比 30 年前减少了 23%，而经济增长了 60%，相信能够达到 20% 的减排目标。因此，经济重启将为经济社会的生态转型服务；同时，欧洲也能够与中国一道，共同履行 2015 年的《巴黎协定》。

货币政策同样也需要重视“绿色新政”。比如，欧洲央行高度重视绿色债券，这是一种创举。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已将“绿色”作为欧洲央行战略评估的关键要素。欧洲央行目前屡屡受到批评，就是因为其债券购买计划（量化宽松政策之一）偏向污染较严重的棕色产业。2020 年，全球绿色债券的发行量已增长 12% 以上，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大关；欧洲各银行售出绿色债券达 190 亿欧元，创下历史纪录。

经济重启还能促进欧盟内部的社会凝聚力。新冠肺炎疫情对综合实力较弱的国家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造成了更大冲击。深层问题往往在危机中浮现，或将加剧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因此，欧洲复苏基金将精准支援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区域及当地经济。此外，日益加深的平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发达国家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抬头。因此，经济复苏必须惠及所有人。

这场危机也迫使企业、人民和政府提高适应性和韧性。推行限制性措施诚然需要政治领导，也要争取民众支持。这是欧洲社会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疫情前的生活常态已经一去不复返——所幸，很多人已经坦然接受。

■ 让·克洛德·特里谢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

疫情以来欧盟的 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和趋势

目前的疫情，眼下的危机，政府及央行的应对措施，这些都是全球以及欧洲正在发生的突发事件。

这次疫情跟以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很不一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各国遭受的冲击是突发性的，程度剧烈，而且冲击来自与经济金融毫无关联的领域，这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危机解决方案。中长期来看，解决方案与财政和货币政策关系不大，从某种角度上说，关键还是取决于医学的发展和疫苗的有效性。

再次，供应端和需求端同时停摆——这也是现在最大、最直接的困难和挑战。经济受挫，陷入倒退，很多数据让人触目惊心。比如 2020 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9.5%；欧盟下降了 14.2%；印度的降幅则高达 24%。危机所造成的后果也是前所未有的。

最后，为什么说这次疫情是一次深远的危机，而且让人们有非常深刻的忧虑呢？因为这次危机出现的时候，发达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刚好处于一个脆弱的时期，很可能进入衰退期。在疫情发生之前，发达经济体就已经出现了衰退的苗头，比如美国。美国保持了长时间的经济繁荣，维持的时间可以说是二战以来最长的一段繁荣期。如果发生危机，央行会尽力避免货币贬值等风险，但人们也会担忧市场出现其他金融问题，比如市场泡沫。

所幸，本次突发危机中，各国央行行动迅速，大胆施策，行之有效，令人赞赏。央行的行动主要有几个目标，包括避免重大的金融危机发生，确保市场流动性。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央行采取措施保障市场的流动性，确保融资能够尽量做到和正常时期一样。比如，美国 70% 的融资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完成，政府在危机发生后对这一方面非常重视；而欧洲 70% 的融资通过商业银行来提供，所以银行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尽管美国和欧洲位于大西洋两岸，系统体系不同，但都出现了强烈的货币政策调整需求。对于各国央行来说，经济面临着巨大的衰退风险，



加之疫情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必须实施更多的经济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

本次疫情中，欧洲央行应对危机的力度、广度、速度，都是值得肯定的，我简单讲五个方面。欧洲央行加大力度实施资产购买计划，规模达 1200 亿欧元；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方案，分为两个阶段，总金额为 1-1.5 万亿欧元，这也是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另外三个措施常常被忽视，但其实也很重要，即结构调整，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放宽抵押以及一些监管措施。

刚才已经提到，在欧洲，银行的作用非常重要。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的总金额由欧洲央行决定，而银行需要的资金达到了 1.31 万亿欧元。目前，欧洲央行实施的所有措施，总金额为 2.66 万亿欧元，可以看到欧洲央行的力度还是很大的。

此外，欧洲各国政府在本次疫情间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财政政策、债务、各方面的保障上做了很多工作，在社会保障上支出的金额也达到了万亿的数量级。根据 IMF 预测，欧元区的公共融资赤字将达 -10%，之前正常的水平不超过 -3%；美国的公共融资赤字则将达

到 -18%，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同时，在机构层面，欧洲还有两个救助计划，分别为 5400 亿和 7500 亿欧元。这些计划的推出，可以说是过去的 35 年当中，欧盟所做出的非常重要的决策，规模也突破了常规政策。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重要变革，影响深远，变革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这种加速颠覆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化。数字化颠覆了整个世界经济的不同领域。

第二，绿色革命。本次新冠病毒疫情让人们意识到了除了气候变化以外其他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绿色转型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社会不平等。比如疫情等因素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对不同经济体而言也是如此。有的经济体非常有韧性，比如中国，很快就能恢复经济，而其他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据 IMF 预测，2021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或将达到 8% 以上；而同期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率分别为 3.1% 和

我们不应该拒绝全球化，而是改进全球化。全球贸易需要采取措施，避免全球价值链因为个别因素遭到破坏。在展望新型全球化的同时，要将风险最小化。

5.2%。本次疫情也凸显了欧盟自身的问题，因此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来深化欧盟自身内部的建设。

第四，我们不应该拒绝全球化，而是改进全球化。全球贸易需要采取措施，避免全球价值链因为个别因素遭到破坏。在展望新型全球化的同时，要将风险最小化。同时，各国也应该重新审视市场经济的意义，继续推行多边主义，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这是在病毒爆发初期各国非常欠缺的一点。相信通过采取措施，世界很快就能恢复以往的常态，并且恢复对于多边主义的信心。



■ 史蒂芬·格罗夫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沙特阿拉伯国家发展基金最高执行官

扩大财政支出， 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和以往的类型完全不同，各国央行的应对非常地强硬果断，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大量注入流动性，购买各类资产。事实上，现在全球 60% 的经济体，超过 95% 的发达经济体，都已经出现了不到 1% 的低利率，甚至 20% 的经济体出现负利率。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斯也曾提到，要小心全球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方面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各国差不多已经使出浑身解数，因此国家层面继续出台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非常有限，在下一阶段需要考虑使用财政政策来实施复苏计划。同样，也希望国际金融机构能够更多地伸出援手，加大支持力度，帮助有困难的国家渡过难关。

目前最大的风险是偿债能力的问题。全世界的企业现在都需要资金支持。各国在恢复到常态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在此期间需要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可能是未来政策的侧重点。未来的财政政策应该针对以下三个方面：解决卫生危机，扩大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调整生产力，扩大就业；实现可持续和更具韧性的发展。

就业是很关键的一环。政府需要支持企业维持经营，确保企业有偿债能力，并且持续创造新岗位。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世界各国都需要考虑银行承担的风险和企业的偿债能力，从过去的次贷危机中吸取教训，从体系上解决此类问题，相关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地放松、放宽，让企业能够有更多时间偿还债务。同时，政府应该给企业提供补贴用于招聘，发展及资助中期公共项目，向企业提供一些工作岗位。

未来发展要更可持续，必须考虑新的重点方面，比如说气候变化、绿色转型。通过开发价格比较低的新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相关领域的补贴，减少财政负担。同时，加快绿色投资，实现绿色复苏，还要积极主动地在碳税、碳价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绿色发展和保障民生、公共事业并重，确保公共项目的支出，在分配上有策略性的侧重，保障在疫情中受影响较大的弱势群体的福祉。

当然，出台所有举措都有成本，如何合理配置财政



资金，妥善管控债务水平，对政府而言也是一种挑战。现在各国利率普遍很低，政府确实可以利用低利率举债，但不能得意忘形。解决债务问题必然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需要开源节流。节流，就是在支出方面做决策，比如能源转型，减少补贴；开源，就是要考虑未来的收入来源，比如调整税收体系，实施分级税收制度，减少浪费型支出。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归到之前的政策，而是尽可能把钱花在刀刃上，使得财政能够更加可持续。

■ 泽田康幸 / 亚洲开发银行 (ADB) 首席经济学家

亚洲的财政、货币 政策效应及趋势

一、财政及货币政策的情况

各国政府正在推行一系列的抗疫措施，涉及的金额和规模非常大。亚洲开发银行 (ADB) 相关数据库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ADB 的成员国，即 46 个亚太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目前实施的支持政策及救助计划总金额达 3.7 万亿美元，相当于本区域 GDP 的 15%。其中，中国出台的支持政策金额占 80%，达到 2.3 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 GDP 的 17%。总体来说，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力度都是很大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现金或者转账形式提供的直接收入补助，第二种是增加流动性和信贷。中国的救助计划中，两者的占比分别为 60% 和 40%。

二、亚洲各国的情况

自 2020 年 3 月起，亚洲各国央行推行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并且降低政策利率以缓解流动性短缺。个别国家的融资很紧张，中小企业急需资金，难以正常开展金融服务。ADB 对东南亚四国的调查显示，其中一半中小企业面临流动性约束问题，难以获得融资，也引发了对于偿债能力和企业存续的担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造成金融业的动荡。考虑到这样的情况，货币及财政政策应该继续提供支持，采取宽松的政策，辅以针对性的措施。金融体系内有了充足的流动性，央行也要注意避免流动性陷阱，防范投机行为的出现，有效地把资金导向实体经济，确保有需要的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能够获得资金。



三、财政货币化

自疫情发生以来，许多国家的央行购买了大量的政府债券为财政刺激措施提供资金，而这些财政刺激对支撑经济非常重要。有人把此举当作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因为央行购买政府债券并没有导致如标准教科书所描述的高通胀。事实上，欧洲央行、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在过去十几年的经历表明这种做法并不一定会导致高通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央行对财政的支持会通过其他途径加以中和。所以说，我们在亚洲经济发展中将会看到、或者已经看到的是“日本模式”，而非“阿根廷模式”。但是必须强调，尽管财政货币化可以作为一种非常规手段用来应对疫情和疫情导致的经济萎缩，当疫情结束、经济恢复正常时，政府必须回归严格的财政纪律，以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 埃里克·博格洛夫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首席经济学家

通过储备资金和全球合作 来应对第二波疫情

目前世界各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财政及货币政策，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在第一轮疫情中的应对政策是相对成功的，但发达国家，如欧洲和美国都已陷入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显然对经济造成了影响。此前，2020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主要是基于8月份左右的表现，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显然没有预料到第二波、第三波疫情的接连爆发，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比预测数据更不理想。

这次疫情确实会给经济带来漫长的阴影，它是当前人类面对的最大危机，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威胁，是70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上的问题早在本次医疗卫生危机之前就已经浮现。发达国家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举措，力度可谓前所未有；同时，新兴市场参照和效仿发达国家，并且根据自身情况改进。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同样不能以割裂的视角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它们是密不可分的，货币政策也给财政政策提供了许多支持。在这次疫情当中，很多层面都是结合在一起进行考虑的。疫苗的研发和接种会给全世界带来希望，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疫情，但目前我们仍无力及时阻止第二波疫情在欧美地区及很多新兴经济体肆虐。接下来，希望各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应对这种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与之前的危机非常不一样，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2020年3月，新兴市场短期资本流动突然“急刹车”，比较符合人们对于危机爆发的认知；然而到了9月，新兴市场大部分的短期资金都已经回流——但股票市场指数波动很大，说明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反映了世界经济目前的状态。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央行采取了许多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应对危机，并



没有引发通胀。我们可以看到，央行可以影响金融市场的运作，而且没有引起通胀，那么说明通胀没有那么难以控制，而且央行有能力来控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通胀。这事关央行的公信力，对于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第二，为什么现在的新兴经济体能够采取这样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呢？尽管各国都深知高负债率的严重性，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新兴经济体从中获得的利益要大得多。在过去，人们普遍担忧发达国家的政策会对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但本次危机则不尽然。发达国家央行强劲的货币及财政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直接帮助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局势的稳定起到了正面作用。

发展中国家实施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的极限在哪里？这些刺激是否足以应对第二波的疫情？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疫情影响下，企业大量借贷，意味着风险在不断增加，但这些经济体的金融业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具备相应的能力来应对这样的情况。如果这

些企业破产，很可能也会波及金融行业。因此，如果出现通胀，很可能先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并对汇率造成影响。

最后，我想对如何防控第二波疫情提出几点想法。央行在继续实施刺激政策的过程中，其实有效性越来越低，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支持正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对发达国家而言，政府债务增加问题不大；但新兴经济体的能力相对有限，很难长时间维系现在这样的非常规政策，面临通胀和汇率波动的风险，公共债务和公司债务问题突出，同时还要考虑偿付问题。

如果疫情继续发展，IMF 这样的国际多边机构以及新开发银行就应该主动作为，进一步支持各国的防控工作。诚然，IMF 已经为许多国家提供支持，但从金额来看还远远不够；同时需要做好未雨绸缪的打算，确保在第二波疫情来临的时候，有充足的资金储备。此外，针对现在的特殊情况，IMF 应该放宽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以增加本国的资金流动性，这也是 IMF 加大支持力度的一种方式。

■ 郝福满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货币和财政之间的界限现在越来越模糊，在这场危机以前的金融危机中，政府大多使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而非财政政策。从目前来看，本次危机绝非寻常。那么这次危机到底哪里不寻常，又将持续多长时间呢？

比尔·盖茨曾于 2014 年做过一次 TED 演讲，他估计，如果发生全球大流行病，经济损失将达到 3 万亿美元。在当时，3 万亿美元已是天文数字；而在大流行病真正发生的今天，世界已经付出 18 万亿美元的代价。其中，GDP 损失达到 6 万亿美元，其余 12 万亿美元用于政府的各类干预及救助措施。为应对这次疫情，各国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尽量减小疫情的冲击和影响。

随着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和上市，大部分国家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接种疫苗，接种之后情况又会如何呢？后疫情时代必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很多新技术的发展初具雏形，很多行业已经意识到必须要转型。比如，线上会议这种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很多人现在居家办公，人们意识到，上班不一定要去办公室。那么，未来办公楼的需求就会减少，办公楼里用到的羊毛地毯也会相应减少；没有人使用羊毛地毯，那么羊毛价格就会崩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这种连锁反应致使很多商品的价格都受到了影响。

面对这样的结果，必须要做出应对。目前，各国普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并通过财政补充政策为企业提供流动性。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需要生存下来。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市场资源没有重新配置，导致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很多皮包公司。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有些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市场资源需要重新配置。夕阳行业必须向新兴产业、绿色产业、可持续性产业转型，供应链也要适应这种新常态。

要进行大规模快速重组，就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把企业进行重新分类和资产配置，让符合要求的企业获得成长。因此，货币政策尤其是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要做好结构性转型的准备。如果只是一味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像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一样，生产率增长持



续低迷。

目前的一个重要风险是财政政策可能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现在各国政府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利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利率，继续扩大借贷规模问题也不大。但是美国和欧洲采取的财政政策不足，这个问题需要重视。新兴国家在此方面有些积极的进展，通过财政政策支持了内需，并且挖掘了新的增长点。比如，中国大力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了许多传统产业以外的新兴领域，其他国家也效仿这种做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刺激内需。

货币和财政政策应该联动发挥作用，并且以财政政策为主，继续引导经济增长。同样，监管政策也要到位，调整产业结构，确保在全球化时代中适者生存，保护劳动力。新兴产业的发展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要鼓励市场竞争。比如，目前已有几家科技巨头企业形成了行业垄断，监管政策应该介入监管，确保能够让全世界都参与竞争。

■ 朱光耀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

G20 应承担财政和货币政策 国际协调的主导角色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巨大危机，世界各国都在这次危机中付出了极大代价。疫情对政策协调也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本次疫情危机相较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在财政、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方面有很大区别。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有一个全球协同合作机制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而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至今依然没有一个类似、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与此同时，在普遍低利率的环境中，全球负利率债券目前已有 17 万亿美元，高负债将带来巨大的挑战。

从财政政策角度来说，高负债并不是一个好事。目前付息成本比较低，对于政府预算来说是减轻了负担，低利率把付息的负担降低了，这是好事。但对长期机构债务存在巨大不利影响，加上目前又缺乏国际协调，单边主义对于所有国家都有很大的不利影响，对于美国也同样没有益处。2008 年，美国受到金融危机冲击，那时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大型经济体联手起来，制定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不幸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到今时今日却没有真正的协调可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虽然肩负起了一定的国际协调责任，但其作为一个国际机构，在高层决策上作用有限，因为它对所有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做的并不多。那么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危机和挑战？

第一，所有国家应回归正确轨道，共同携手应对疫情危机，付出的经济代价主要由财政承担。这个代价并不很大，可能是 12 万亿、15 万亿或 18 万亿美元，决策

者应该意识到财政要发挥主要作用，且货币政策必须与财政政策相配合。面对目前的负利率环境，所有经济体都应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在 G20 框架下发挥更大的作用。2009 年以来，世界已普遍认同 G20 是最大的政治协调平台。所以，通过 20 国集团协作，共同设计出一个新的政策合作框架，这是必要的制度安排，也是艰巨的工作，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每一个大型经济体，都应该根据其经济情况提高国内政策协调性。2020 年 3 月以来，美国财政部对国内政策做了一定程度的协调，但是到目前为止，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对于如何协调一致、共同提升美国民众的信心还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中国是 2020 年世界上唯一一个取得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中国在防疫、抗疫中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从政策层面看，中国 10 年期国债年息超过 3.3%，跟美国 10 年期国债利率的价差已达到 250 个基点，远远超出了 120 个正常基点。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两国的国债利差可以有一定幅度，但是利差达到 250 个基点，实在有点高了。要平衡，就需要两国都对其国内政策进行调整，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国际环境，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应该在国内有所协调，各方、各不同机构之间也要有所协调。同时应该在 G20 审慎的框架下进行全方位思考，全面规划 2020 年和 2021 年的经济。明年的经济情况如何谁都说不准，IMF 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会有 5.2% 的增长，但前提条件是疫情必须在 2020 年年底得到有效控制。

目前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之巨大，可以说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要应对这种系统性的危机，需要系统性的应对策略，特别是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作出国际协调和应对。在财政政策中，要考虑的是数字化经济和数字化潮流，目前来说有数字化货币，政策的框架也需要将数字化考虑在内。面对实实在在的挑战，需要脚踏实地的机构安排，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提出一个必要的制度安排。G20 应该成为制度安排的主导角色，每个国家都应该在一个宏观经济的框架当中制定自己的一套措施。

■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

疫情重构 财政货币政策框架

当下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时间节点。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和美国，正在经历第二波疫情。很多国家已经在第一波疫情中吸取教训，但目前欧美新感染病例、住院率以及死亡率，跟 2020 年 5 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各国采取了更加合理、有针对性的封锁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因而经济衰退的幅度比第一波疫情时有所放缓。数据显示第一波疫情时，欧洲各国 GDP 骤减 10%，现在只减少了 5%，显然是大有改观。

诸如封锁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与 1918 年

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采取的应对措施很相似，并非新鲜事物。这些措施会造成经济衰退，各国 GDP 下降幅度可能达到 10%-20%，相当惊人。这种经济衰退引发了欧美地区热烈讨论：这些防疫措施是否合理？防疫措施与经济增长之间该如何取舍？短期内肯定要保障防疫；而长远来看，要注重经济增长，防止出现更严重的经济衰退。总体而言，各国都已经从防疫工作中得到了经验和教训，会用更加正确、合理的方法应对疫情。相信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这次健康危机，第二波疫情会比第一波疫情应对得更好，交出更完美的答卷。

最近，制药界传来一个重大消息，已经研制出 3 种有效疫苗，分别来自美国企业辉瑞、莫德纳 (Moderna) 和欧洲的阿斯利康，这些疫苗有不同的作用机制，有望有效抑制病毒传播。虽然疫苗接种不一定能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但通过科学的努力，疫苗带来了应对这场危机的希望，带来了战胜疫情的曙光。因此，无论是从身体健康的角度，还是出于经济的原因，疫苗接种都是相当必要的。

欧洲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积极、有力的政策应对，并且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维度进行。短期主要有 4 个措施：欧洲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 (APP) 和三个财政政策，即临时性失业救助计划，欧洲稳定机制 (ESM)，以及欧洲投资银行 (EIB) 为企业提供投资支持。ESM 给希腊危机带来的后果各成员国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因此很多国家还没有真正实施。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最大程度上缓解疫情对于个人和家庭的影响和冲击，避免造成大量破产。

长期措施，即欧洲复苏计划，又称为 Next Generation EU，金额达到 750 亿欧元，在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预算。该计划旨在重新配置资源，实现经济转型，同时会更侧重于绿色和数字化等领域的投资。总而言之，短期政策是为了让经济生存下去，长期政策则会让经济更好、更有韧性地发展。

长远来看，度过本次危机后，欧洲或将面临低生产率、低消费、高财政赤字、高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的局面。全球债务占 GDP 的比例将达到 100%，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都会翻倍。欧洲复苏计划的资金来自欧洲的税收，由欧盟支持，而不是某个成员国。本次危机规模之大，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需要在欧盟层面上共同承担责任。这或许将成为欧洲的“汉密尔顿时刻”，只是不会吸收先前的债务，而是在未来共渡经济难关。

除此之外，整个世界还需要一个“布雷顿森林时刻”。现有的政策体系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需要对政策架构进行重新的设计，包括贸易框架，更平衡的政策架构，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不能像 3 年前一样，只有货币政策一根救命稻草。此外，需要考虑到汇率的变化，并且通过政策工具来解决庞大的公共债务，这不是一个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意大利，预计需要 10 年时间才能把公债的水平降至疫情前的水平。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欧洲、中国和美国的处境也比几个月前有所改善，各方开始通过重启多边主义的方式来解决，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布雷顿森林时刻”来临——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并提出必要的措施。

■ 亨德里克·巴科灵 / 德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主任

疫情期间德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经验分享

新冠病毒导致了战后经济最严重的衰退。从 2020 年夏季开始，德国已经出现了较快的经济复苏，但是由于感染人数仍然在不断上升，局势依然很脆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措施可能会导致德国以及欧洲经济恢复进一步放缓。德国政府预计，2020 年德国的 GDP 会降低 5.5%，2021 年会回升 4.4%，而 5.5% 的降幅与 2009 年金融危机时 GDP 的降幅大致相同。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欧洲央行以及欧盟成员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实施一系列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作为欧盟的一分子，除了德国国内层面的措施，德国也希望可以在欧盟层面做出努力，为欧盟政策的一体化做出相应贡献。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德国在危机中采取了迅速而果断的决策，直接的财政预算目前达到了国家 GDP 的 8.3%——国际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实施这种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除此以外，德国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保障措施，比如贷款和担保，从而确保 GDP 的稳定。在过去的一年中，德国审慎的财政政策为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打下了足够的基础。

德国采取的应对疫情措施具体有两个方面。短期内，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及时并且有针对性地刺激供给和需求侧，重振消费者信心，保障就业，并且在危机阶段为企业提供支持。经济刺激计划不但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还为今后的经济恢复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危机时期，人们心理上也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因此短期的稳定性措施势在必行，主要有两点：1. 在需求侧促进消费，例如短期增值税的减免以及 300 欧元的儿童补贴；2. 在供给侧推动企业的发展，例如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短期的援助政策维持流动性，以及折旧免税额方面的政策。在必要时，政府还会扩展支持措施覆盖的范围，比如让民众更易获得最低收入保障，或给予中小型企业紧急援助的资金。

另一方面是促进创新投资和绿色转型以应对气候变化。德国主要关注了绿色交通、能源转型以及数字化等几个方面，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新能源汽车补贴



和对充电桩投资等。德国还有 70 亿欧元的氢能源战略研发基金，以及人工智能和 5G、6G 技术各 20 亿欧元的研发资金。现在要评估这些措施的效果还为时过早，但目前一系列的指标非常符合预期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及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市场快速稳定了下来；但另一方面，也使银行的资产负债以及企业贷款陷入困境，对其他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公司无力偿还贷款以及坏账问题也值得关注。

如今的银行系统与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相比韧性更强。目前继续采取货币宽松政策来支持经济，待疫情过后，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会收缩，以应对未来出现的危机，公共融资的可持续性将得以夯实，并且能够进一步推动增长。

现在欧洲出现了第二波疫情，欧洲一些国家正在实施更长时间的封闭，这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德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经济的发展，评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把所有人带到了一个未知的区域，这要求各方必须加强交流学习，分析哪些措施是可行的，哪些是行不通的，从而不断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

■ 刘尚希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疫情控制是财政、货币政策效应产生的前提

疫情改变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性质和地位

财政、货币政策怎么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应从深层次去考虑。从表面上看，财政、货币政策应对的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疫情公共风险问题。平时，人们总是把财政、货币政策当成经济政策，但在当前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更多的是作为抗疫政策的辅助或配套政策来实施的。抗疫政策属于公共卫生政策，其核心是社会隔离、社交疏远以及疫苗、药物研发。从这一点来看，抗疫中的财政、货币政策跟以往有很大不同。以前是因为经济、金融系统内部出现问题，需要财政、

货币政策来施救，而当前经济下滑、失业增加、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更多的是疫情风险衍生出来的。所以，财政、货币政策效应产生的前提条件就是疫情能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这是讨论抗疫中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大小的一个前提。

疫情颠覆了人与自然的传统关系

怎么对疫情进行评估并做到有效控制呢？从全球来看，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全球的宏观政策缺少协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当前疫情

带来的衍生风险和挑战。对疫情的看法，在科技界有不同的观点，从社会层面来看，观点更是五花八门。此次疫情不像流感病毒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人类未曾知晓的深刻变化。人类靠知识、科技、医学的发展，构建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确定性，但新冠病毒颠覆了这一确定性，打乱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与自然的秩序。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存、发展产生的影响，不仅是表面看到的，还有更多表面看不到的需要进一步深度评估。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制，给人们带来很多信心和希望，但也不可轻视新冠病毒感染者治愈后情况，是否有后遗症？后遗症到底有哪些？

最近看到一个报告，出乎很多人意料，新冠病毒虽然于 2020 年初首先在中国爆发，但有研究表明 2019 年 9 月，意大利就已经出现了新冠病毒。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非常不幸的是，由于世界在抗击疫情上没有达成共识，现在新冠病毒依然在全球不断扩散，给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损害，颠覆了人与自然的传统关系。

疫情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需要探索新的实施机制

现在的财政、货币政策跟以往有很大不同，它是由疫情导致的，而不是由经济和金融系统本身导致的政策实施。具体而言，即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更多的是要应对疫情冲击以及疫情所衍生的各种各样的宏观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这是疫情中的财政、货币政策跟以往有很大区别的原因。除了原因不同之外，更大的不同在于政策作用对象更为宽泛，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以及所有人群和阶层。而且其作用传导机制更具有不确定性，传统路径、经验失效了。面对生产过剩危机，可以从扩大需求入手；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可以从资产收购入手；而面对疫情危机，只能从抗疫保民生入手。

现在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财政、货币政策产生的效果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就业得到保障，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相反，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国增加就业 1000 多万人。二是市场主体增加，没有出现大量企业倒闭。所以，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财政、货币政策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应当说是前所未有的，产生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不复存在，宏观政策由宏观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触发，不再是周期性发挥作用的短期政策，而是泛在的、长期性政策。

财政、货币政策将转变为内生的长期性政策

下一步该怎么办？明年的疫情和经济会怎么样？明年的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制定？这些全球面临的问题有很多不确定性，需要全盘考虑。继续用传统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很难得到答案。这些问题既带来了理论方面的挑战，也带来了实践方面的挑战。实践总是走在理论的前面，人类总是在实践中探索着往前走。总体而言，目前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多成效，但也有很多教训需要不断总结。当前最迫切的是需要共同协调、应对人类共同的敌人——疫情。只有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效果，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才能真正有成效。如果控制疫情这一基本前提没有实现，单纯就财政、货币政策本身去讨论其效果，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疫情防控常态化，意味着今后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将是疫情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如果说，疫情前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外生的，是被经济或金融问题触发的，那么疫情后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将转变为内生，是在宏观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之中的宏观政策。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不复存在，宏观政策由宏观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触发，不再是周期性发挥作用的短期政策，而是泛在的、长期性政策。政府赤字和债务变成常态，货币政策无通胀条件下的宽松也将是常态，以此构建宏观确定性，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为市场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宏观条件和环境。



■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首任主席、葡萄牙前总理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 2021年全球经济展望

众所周知，全球市场的决定因素包括市场和经济，不仅与地缘政治相关，还与科技进步紧密相关。如今，除了以上因素以外，影响全球市场的因素还包括疫苗和是否能研发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应对新冠肺炎。未来，全球将经历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学会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非常有必要。虽然疫苗的开发进展可喜，但目前也无法完全确定何时能够真正摆脱新冠肺炎。在影响宏观经济及全球市场形势的因素中，本次疫情可能最为重要的。

下面以高盛近期的研究数据做一些分析。第二波新冠肺炎爆发潮正席卷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已经重启部

分封锁措施。因此，高盛等国际金融机构下调了 2020 年第四季度及 2021 年第一季度的经济预测。欧洲经济在第四季度将大幅收缩，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环比下降约 2.3%；只有到 2021 年第一季度才会出现 0.5% 的正增长。2021 年冬季将出现较为显著的复苏，增幅为 5.3%——前提是 2021 年新冠肺炎疫苗能够广泛普及，有望在第三季度实现。此外，还需要全球经济良好发展及持续的货币和财政支持。

美国的经济增长面临一些风险。至今为止，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仍在激增，而且美国并未采取充分的防疫措施。预计 2021 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为 5.3%，将



IFF 政策对话 WTO 改革与未来的世界贸易体制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 2021 年全球经济展望	59	郑之杰： 全球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70
易小准：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与国家合作	61	祝宪： “两低一高”疫情背景下的世界贸易投资变动趋势	72
黄奇帆： 世界贸易组织变革中的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	63	张伟： 经济全球化与数字贸易全球化	74
周汉民： 世界贸易组织的危机和需要坚守的原则	66	孙元江： 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全球化道路依然漫漫	76
薄迈伦： 转变下的全球贸易体系改革	68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如何改革世界贸易组织	78
宁咏： 单边保护主义背景下 WTO 改革的三个核心	69		

实施进一步的财政刺激，加之疫苗的普及都可加快经济恢复。

放眼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世界经济收缩 3.9%，2021 年将出现 6% 的正增长。大多数人没有那么乐观，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增幅为 5%。高盛的前期比较乐观，是因为戴口罩等低成本防疫措施得到实施，以及疫苗普及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此外，我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就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主席。目前，我收到的关于疫苗研发和普及方面的消息都很振奋人心。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预计将继续，因此明年经济活动复苏将得到大力支持。中国极有可能是 2020 年唯一实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 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同比增长 7.5%，将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

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可能在未来 5 年选择较温和的政策。据估计，即便明年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劳动力市场也无法在一夜之间重回正轨，而且通货膨胀还会保持在央行基准以下。所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近几年利率或将不会大幅上升。此外，欧洲央行将很快实行额外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就在 2020 年 12 月。美联储采取了灵活的平均通胀目标，这符合高盛的预测。欧洲央行或将扩大疫情应急采购计划，继续实行这种有利政策，我一直称之为“货币激进主义”。总体上，宏观条件有利于经济复苏。

在其他更加具体的如股市场，预计欧洲市场每股收益将显著回升。经济增长加速和宽松政策双管齐下，十分有利于支持股市场。至于美国，疫苗对于美国的经济和市场发展非常重要，这也正是市场翘首以盼的，美国市场对于疫苗的期望甚至高于对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期望。因此目前已知的疫苗研发结果广受关注，并增强了市场信心。而且，市场往往提前做出决策，具有前瞻性。

未来，全球将经历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学会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非常有必要。虽然疫苗的开发进展可喜，但目前也无法完全确定何时能够真正摆脱新冠肺炎。在影响宏观经济及全球市场形势的因素中，本次疫情可能是最为重要的。



此外，选举对于政策和市场都很重要。拜登当选新任美国总统，但接下来美国议院内的观点很可能还是分裂的状态，放眼全球，拜登政府相比于前任，可预测性会较高，这对于经济增长也是有帮助的，但是部分紧张局面仍然会持续。

欧洲方面，欧盟应对经济和新冠肺炎冲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是快速、有力且相互协调的，并且现在已经有条件可开展对话，在各层面达成有关未来 7 年的预算协议，以便经济的恢复。欧盟还有希望提供 8500 亿欧元的资金，其中 1000 亿用于支持就业，7500 亿用于经济恢复。欧洲中央银行也会信守承诺，为银行提供强有力的资产收购能力和流动性。欧洲央行首先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紧急采购方案，6 月 4 日继续为采购方案提供了额外的 6000 亿欧元。现在欧洲央行开始思考可以恢复经济的其他创新性方法。近日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希望欧盟政府考虑将支持基金作为永久工具的可能性，她还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各国政府维持目前的财政支持以便经济的完全恢复。

虽然目前还无法百分百肯定，但全球疫情在 2021 年应该可以得到大致的控制。因此全球的经济在明年可能有很好的重启态势。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会需要一些时间，但强有力的反弹是有可能的，市场也会对经济发展有乐观预期。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如 G20 等，依然会合作。希望世卫组织、世贸组织和其他组织可有效合作，促进信心的恢复、经济的发展以及就业的繁荣。

■ 易小准 / 世界贸易组织 (WTO) 副总干事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与国家合作

在当前动荡形势下，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解决眼前的贸易挑战需要我们加强合作；世界贸易组织 (WTO) 当务之急就是推行改革，解决现有的挑战，其他的可以说都是偏离重点。

要理解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就要知道其诞生缘由。20 世纪上半叶，世界贸易体系在混乱中应运而生，它建立在一个简单而又有利的信念之上——只有实现全球的繁荣，世界才会迎来和平。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与发展，规则能够维护公众的安全。各国之间相互依赖使得彼此共生共荣。世界贸易不是经济民族主义或者零和博弈，而是倡导经济合作、互利共赢。这一愿景成效惊人。自 1945 年以来，贸易额上涨至原来的 37 倍，全球经济增长至原来的 8 倍；仅在过去 25 年间，就有 10 亿人口成功脱贫。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再次强调了世贸体系的重要性。尽管本次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但是并未如危机爆发之时部分人担心的那样，引起贸易系统的瓦解或者崩溃。全球供应链已经适应了新形势，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关键的医疗物资等产品持续跨境流通。以个人防护装备贸易为例，与去年同期相比，2020 年第二季度贸易额上升 92%，并且仍在持续增长。

世贸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贸易下降的情况远好于预期，跌幅比 2020 年 3 月最乐观的数值还要小，预计 2021 年全球贸易将显著恢复。虽然世界经济前景仍然低于平均走势水平，但全球贸易体系的韧性承受住了冲击，避免了更加恶劣的情形发生。

数字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意味着多边贸易体制未来将变得更加关键。区域贸易协定能够促进区域合作，却无法促进全球合作，无法解决全球的政策挑战——这两者正愈发变得密不可分。比如，数字贸易由于其自身无边界的性质，只能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得到妥善处理；渔业补贴、大多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区域协定能够包含美国、中国、欧盟和其他贸易大国，将所有国家和地区联系起来。只有世贸组织，能够帮助大型经济体解决分歧，并促成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但要发挥这一关键作用，世贸组织必须适应其创造的全球经济，并且与之共同成长、发展。显然，世贸组织的规则需要改进。世贸体制最后一次重大改革，是在 25 年前的乌拉圭回合中，那时互联网和全球价值链尚未普及，中国也还未加入世贸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经济演变的进程，尤其是数字化进程，从



而倒逼世贸组织的规则进一步与之匹配。此外，还要寻求更加灵活高效的方式，包括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所有成员不能再通过非黑即白的极端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如今，经济变化周期以周或者月为单位，不像过去那样，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够缔结贸易协定。

好消息是，现在世贸组织的改革已然启动，成员国间已经签署了多项多边协议，比如 2013 年的《贸易便利化协议》，2015 年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以及为了减少渔业补贴目前仍在持续进行的对话。志同道合的成员国还在探索电子商务领域投资便利化，以及促进小型企业贸易便利化的新规则。还有其他一些议题，比如服务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也在重启。

世贸组织的改革需求由来已久，组织自建立以来持续扩大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这是一个不断发展、适应和现代化的过程。世贸组织的改革需要国家之间合作来实现。今天的世贸体制是各国选择相互合作的结果，而非其原因。世贸体制得以成功，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贸易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规则可以巩固主权，而各国利益的提升日益取决于集体利益的提升。世贸组织缺乏改革并非阻碍成员国之间合作的理由，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成员国之间缺乏合作阻碍了世贸组织的改

世贸组织，能够帮助大型经济体解决分歧，并促成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但要发挥这一关键作用，世贸组织必须适应其创造的全球经济，并且与之共同成长、发展。

革。归根结底，修复贸易合作需要重建信任，尤其是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信任。如果没有信任，合作就无从谈起；而如果没有合作，世贸组织就无法有效运行。

展望世贸组织的未来，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多边合作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对于治理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来说不可或缺。如果摒弃开放、合作和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那么只能面对封闭、分裂和基于强权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中贸易关系由强权决定，各国经济更依赖于内部发展，企业将面临一个不明朗和无序的未来。这样的世界显然不可能更加繁荣、更加安全，也不可能更好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或者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的挑战，因为解决其中任何一项挑战都需要世界各国的齐心协力。



■ 黄奇帆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世界贸易组织变革中的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增长遭受重创，国际政治格局深刻调整。预计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经济 2020 年维持正增长。目前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也是 1870 年以来出现人均产出下降经济体数量最多的一年。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下变中有变。讨论 WTO 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都要放在这种变局中，既做因变量又做自变量，全面权衡和设计，努力在变局中开新局。

一、经济全球化尽管遭遇回头浪，但仍会在曲折中上升，FTA 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的流行。但人类的全球化事业是过去几十年、未来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中间某一时段会有磕磕碰碰，但绝不会出现全球化终止。从 10 年、20 年、30 年长周期时间来看，全球化总是在越来越深入、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在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

“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三零”规则凸显。其中，“零壁垒”和“零补贴”的实质是营商环境趋同，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

即使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时期，也不是没有全球化，而是基于美苏两个阵营的各自及相互的全球交往。苏联解体后的近三十年，美国一家独大、主导着全球化进程。这次疫情也必将重塑全球化的表现形态，将形成多极协调平衡的全球化。特别是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将出现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FTA)

与 WTO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刚刚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就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潮“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战略举措。

从长远看，各种双边、多边 FTA 总的演进方向是“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出现“三零”的基本原因是：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商品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间贸易，而是产品内贸易，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效应，极大地提高贸易成本。中间品要多次跨境贸易，即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很低，其贸易保护程度也会被放大。为此，“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三零”规则凸显。其中，“零壁垒”和“零补贴”的实质是营商环境趋同，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集中体现在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等八个方面。有人说，过去讲“三零”是因为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地球是平的。疫情之后，各国在考虑产业链安全，要重构全球产业链，“三零”的基础还存在吗？我认为，还是存在的。“三零”依然是大方向。因为经济全球化在螺旋中上升的趋势不是哪个政治家能改变的。尽管疫后产业链重构的基本方向是产业链在一个地域上形成集群，但仍依赖于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和优化配置。因此，“三零”的基本逻辑即使是在疫情冲击下，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仍然是成立的。

二、准确把握主要发达国家在 WTO 改革及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战略意图

从 2017 年至 2019 年，美国联合欧盟和日本先后五次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对 WTO 进行改革；同时频频通过双边或多边的经贸谈判达成高水平经贸规则。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美国的贸易政策可能会更加趋于理性，极有



规则不相容。日本、欧盟仍将采取不同形式跟随。美日欧在此问题上的核心是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个问题的形成既与美日欧意识形态上对华歧视、经济利益上对华排挤等意图有关，也与我国在部分领域（如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竞争性市场体制尚不完善有关，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增强斗争的主动性。

关于发展中国家身份待遇问题。2019年7月，美国政府发表《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地位备忘录》，以中国为例，

渲染所谓“最富有的经济体声称拥有发展中国家地位时，它们不仅损害其他发达经济体，同时也损害了真正需要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经济体”。从目前美国在各种场合推动的手段看，美国正力图以自己的标准和清单来替代世贸组织的标准和清单。中国于2001年以发展中成员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但长期以来就没有享受到完全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中国已经声明坚守“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分歧一时难以弥合。

深入分析主要发达国家在WTO改革及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战略意图和主要主张，发现其具有三重特性：一是上述政策诉求显然是服从和服务于其国家利益，是服务于其本国的经济利益甚至政治利益；二是部分主张的确是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下，为了促进更好的国际合作、提升资源要素跨国流动配置效率的安排；三是主要发达国家有意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主张。这三重特性交织在一起，需要认真鉴别，做到心中有数。对那些明显带有意识形态偏见、明目张胆挑战我主权的主张要坚决回击；对那些仅仅出于一己私利而提出来的主张则要利用多边关系在合纵连横中进行博弈、进行平衡；而对那些符合经济全球化大方向、符合国际经济规律、与中国改革方向大体一致的政策主张则要想办法克服困难予以采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塑造议题、提出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

可能重返多边贸易协议如TPP、联合盟友推动WTO朝着高标准经贸协定方向改革。

关于国有企业和产业补贴问题。2018年5月，美日欧贸易部长发布联合声明，提出针对第三国的国有企业补贴所造成的市场扭曲要制定新的贸易规则。美日欧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一些国家借助国有企业参与经济运行，严重损害了其他国家的相关群体，特别是这些国家还对国有企业进行产业补贴导致了市场扭曲。据此，欧盟于2019年出台《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对外国国有企业在境内的并购活动设置了更高的门槛和要求。针对这种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歧视行为，一方面固然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快健全国资监管体制；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在国际经贸协定谈判中据理力争，消除有关国家对我国国企的歧视和偏见，防止将国企问题政治化。

关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2017年10月，美国商务部依据《1930年关税法》中有关反倾销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发布报告称，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因为中国经济并没有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运行，目前不应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将维持对华反倾销的“替代国”做法。目前，从中美在世贸组织各个场合的辩论情况看，特别是2020年2月28日美国发布的“2020年总统贸易议程”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被美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类型的世贸组织成员，仍会被美国认定为与世贸组织多边

三、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参与推进WTO改革的坚实基础

从中国目前改革发展的现状看，应将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坚实基础。

一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2020年4月9日，中办、国办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一重磅文件。近年来，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中央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经过几年努力，经济运行中的短期结构性矛盾得到了缓解，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三去一降一补”治的是急症、解的是表，逻辑是从产品端的结构性矛盾出发、在企业端发力，通过淘汰过剩产能、出清僵尸企业、降低过高杠杆等措施纠正结构性失衡。但从企业端深挖下去，除了微观主体的治理机制和创新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外，作为投入的要素端的扭曲也是一大病症所在。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进而为产业链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可以说，要素市场化改革是继“三去一降一补”之后，又一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杰作，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渐入佳境的重要标志。接下来要重点落实好文件提出的政策措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

二是推进产业政策转型创新，加快构建竞争性市场体制。清理取消各类有悖公平竞争原则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加快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营造鼓励竞争、促进创新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和市场主体行为，促进形成竞争性市场体制。以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制定新兴产业监管规则。善于倾听市场主体和群众呼声，调动第三方、公众、媒体和专家等社会监督力量，形成共同参与治理的监管格局。要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是加快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不再是全面的以出口导向为主，而是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协调发展。中国将由过去单一的“引进来”转

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中国将在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快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中国将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在空间布局上，原来是沿海开放为主、一般经过几年试验再逐步推及到中西部地区；现在是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接下来将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增设更多的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最后，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由要素流通型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过去往往将出口多少、外资多少等作为开放的指标，今后将把推进规则制度型开放作为重点，实际上就是要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四、中国将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正加速演化。美国大选后，对华政策、经贸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长期来看至少“规则之争”是免不了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就是主动应对规则之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大举措。近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正式签署。这是一个先手棋，将进一步提升亚太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进而促进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接下来，要加快《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谈判和落地。在这个基础上，建议深入研究加入CPTPP的可行性。事实上，CPTPP的前身TPP就是奥巴马时期整出来的，其实已有对付中国的意思。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退出TPP甚至频频从其他多边机构或协定中“退群”，其目的是要建立更加偏向美国利益的“新群”。这一点民主、共和两党是一致的。目前，美日欧之间已就工业补贴、市场扭曲、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了共识，正在酝酿以所谓“公平贸易”为核心的经贸新规则，目标直指中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总统，因其多边主义的价值取向，极有可能会加快这一进程，甚至不排除恢复TPP或者提出更加全面、更具有挑战性的经贸规则。我们要积极参与和应对，化被动为主动，在谈判中发声，把我们的利益诉求讲出来，主动参与规则制定。

■ 周汉民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世界贸易组织的危机和需要坚守的原则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19 年来, 经贸发展突飞猛进, 从以下三组数据的对比就可一目了然。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 WTO, 当年中国 GDP 总量为 10.9 万亿元人民币, 2019 年中国 GDP 总量达到 99.1 万亿元人民币; 2001 年中国外汇储备为 2200 亿美元, 2019 年年底达到 3 万亿美元; 2001 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 5000 亿美元, 2019 年在受到连续 23 个月中美贸易战深度影响下, 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仍高居世界第一, 超过 4 万亿美元。中国加入 WTO 后, 不但经济发展令人瞩目, 更是积极抓住战略机遇,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把加入 WTO 产生的外在压力变为动力, 积极推进深化市场机制、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

世贸组织成立 20 余年来,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民生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单边和保护主义以及世贸组织体系的不够完善, 使其面临前所未

有的生存危机, 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愈加凸显。我个人认为 WTO 有三个危机表现得非常明显。

第一个是规则的危机。世界贸易组织议事规则只有一种即协商一致。前任 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在某个国家的强力逼迫下, 提前整一年退休。WTO 需要总干事吗? 答案是简单而明了的——需要。因此, 有 8 个成员推选出 8 个代表竞选总干事位置, 两位女士进入了最后的角逐。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共有 163 个成员, 其中有 162 个支持同一位候选人, 有一个成员对此表示反对, 最后形成了“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局面。由此可见世界贸易组织“协商一致”的议事规则受到了最为直接的挑战。截至 2020 年 11 月 21 日世界贸易组织仍然没有总干事, 而新任总干事本应在 2020 年 11 月 7 日产生, 这就是规则的危机。

第二个是议程的危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后续组

织, 成立于 1995 年 1 月 1 日, 其前身是成立于 1948 年 1 月 1 日的关税贸易总协定。关税贸易总协定从成立到结束的 47 年间, 总共完成了 7 轮谈判并催生出世界贸易组织。对比之下,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至今 25 年, 却连“多哈回合”谈判这一轮谈判都没有完成。议程的危机使世界贸易组织在人类社会急速前进的当下, 一再贻误解决问题的战机, 无法就重大问题解决规则的产生达成一致。

第三个是分化的危机。世界贸易组织共有 163 个成员, 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很有实力的群, 是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关键群。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 发达国家群提出了美国方案、欧盟方案、日本方案, 这三个方案最终合一。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过程中, 美国、欧盟和日本已经发表了三次相关的外长声明。发展中国家群本来有几个应该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因其产生重大分化, 使世界贸易组织在许多重大议程上, 无法形成较有影响力的政治判断和较为明确的政治趋向。

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 有些原则是必须坚守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大经济体, 在当今世界上要做的只有一个事情, 就是要践行毛泽东同志几十年前的教诲——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而对 WTO 最大的贡献就是规则的贡献。世界贸易组织是在规则危机形势下形成的一个国际组织, 因此我认为有三个原则必须要坚守。

第一个是非歧视原则。世界贸易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均起源于非歧视原则, 非歧视不是最高原则, 而是最低原则。所以在激烈的中美贸易战中, 主动挑衅方不仅在法律上无知, 在政治上更显狂妄。所以, 非歧视原则必须坚守。

第二个是保障各类成员发展的原则。各类成员指的就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成员, 这些成员都有发展的权利。要保障各类成员的发展原则, 体现了我们参与这次重大生存危机谈判的灵活性。不仅仅保障发展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 而且要保障所有成员的发展原则, 这是第二个必须坚守的原则。

第三个是坚守以和平谈判、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和程序解决贸易争端的原则。这个原则被某些成员彻底地践踏了, 不仅是总干事选举流程, 世界贸易组织最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上诉审”也已经被某个成员彻底瘫痪,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常设 7 个法官席位, 现在只剩下 1 位在任。美国对中国几千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 这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原则, 但世贸组织对此的裁决能执行吗? 结论是不能。因为这是一审专家意见, 还

不是上诉审的最后判断。

最后, 我谈谈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要做的三件事。第一是必须尽快激活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 打破争端解决机制已经不复存在的伪命题。从 2001 到 2008 年, 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原告的案子总计 17 个, 作为被告的案子远超 17 个, 中国的输率比赢率高, 但中国从来没有一天背弃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原则。因此,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成员遴选必须激活, 这是当下首要的工作, 中国要坚持这个原则。

第二是必须坚持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原则, 这也是中国与 20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自贸协定所坚持的原则。目前中国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有 8 个, 经过研究后积极准备谈判的还有 8 个。11 月 15 日, 15 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但每个成

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 有些原则是必须坚守的。第一个是非歧视原则; 第二个是保障各类成员发展的原则; 第三个是坚守以和平谈判、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和程序解决贸易争端的原则。

员国还需各自履行国内法律审批程序, 因此 RCEP 距离生效还有一至两年的时间。中国还要继续努力, 积极推进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谈判和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的谈判。CPTPP 是多边协定, 在多边协定中要坚持遵守贸易投资的自由与便利原则。

第三是必须反对某些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条款影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执行。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 这些国家跟中国一样已经确立了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 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一般原则, 并且在其国家法理中做了同样明确规定, 现在却用本国所谓国家安全相关法律, 如根据《1962 年贸易扩展法》的第 322 条和《1974 年贸易法》的第 301 条, 对某些国家发起大型贸易战, 这不合时宜, 也不符合国际规则。



■ 薄迈伦 / 美国全国商会高级副会长

转变下的全球贸易体系改革

约瑟夫·拜登成为美国第 46 任总统。他支持多边主义，信任以世贸组织 (WTO) 为代表的多边机构，支持公平竞争。美国全国商会将会和拜登总统的贸易代表办公室一起，支持世贸组织工作及其改革，提高其效率，有力解决 21 世纪的商业挑战。

同时，商会也期待和拜登总统共同解决当前的疫情问题，恢复美国经济，进一步加强科技的竞争力。美国全国商会一直致力于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尤其是对中国，因为与中国进行贸易，是互利共赢并且安全的，我们会致力于与中国一起消除两国贸易壁垒和摩擦。

中美两国在世贸组织中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世贸组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让成员国能够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全球增长与发展，享受贸易增长带来的好处——美国及美国企业从这种开放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受益。归根结底，我们希望世贸组织能够取得成功。

有观点认为，世贸组织所取得的成就早已是老黄历了，这并不正确。2017 年初，世贸组织的《贸易便利



化协定》正式生效，发挥了降低成本、促进竞争以及防止腐败的作用，每年国际商品贸易或将增加 1 万亿美元收益。

世贸组织确实需要进行改革，对不同的对象而言改革的内容也不同。对于美国全国商会及成员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点意见：

第一，协商。世贸组织共有 164 个成员国，体量巨大，有时谈判会受到个别成员的阻碍不能顺利进行。那么，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机制，让志同道合的大多数成员能够继续推进议程，从而排除少数异见者的影响？

第二，公平。世贸组织创立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平台，减少国家补贴和支持，确保国际贸易稳定，维护比较优势。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全球贸易中日益复杂，也越发突出。未来，世贸组织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管理规则，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能够在纯粹的商业环境中公平竞争。

第三，上诉机构目前已停摆将近一年。过去数年中，美国政府一直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提出意见，认为机构在执法过程中管得太宽，有时已经涉足世贸组织协定中未明确支持的领域。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开始阻挠上诉机构任命；而特朗普政府更是进一步阻止了总干事的任命。

好消息是，有望解决这些问题。新西兰驻世贸组织大使提出的“沃克原则”，或将完成上诉机构改革，并完成自身使命。目前，该提议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开展切实的工作，得到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支持，共同参与这项改革。

第四，下一任总干事的任命。非常希望能够和所有的成员国一起在明年初期确定最终人选。世贸组织要为所有成员服务，一位优秀的总干事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衷心希望世贸组织能够顺利运行，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支持多边主义的全球伙伴们能够走到一起，大家身体力行，共同推进世贸组织改革，让世贸组织能够真正履行职责，并实现所有成员国互利共赢。

■ 宁咏 /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

单边保护主义背景下 WTO 改革的三个核心

从关贸总协定到 WTO 的成立，是国际经济贸易体制的重大变革，对强化和完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规范国际贸易竞争规则，解决国际贸易争端，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WTO 涵盖全球 98% 的贸易额。2001 年到 2019 年，全球货物出口额从 6.2 万亿美元增加到 8.9 万亿美元；商业服务贸易出口额从 1.5 万亿美元增加到 6.0 万亿美元。WTO 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民众摆脱贫困，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加入 WTO 以后，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全面加强同多边贸易规则的对接，切实履行货物和服务开放承诺，为多边贸易体制有效运转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同时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到 2019 年末，中国已成为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连续 11 年稳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的巨大市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发展机遇。

然而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放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以及对现有贸易救济措施的误用和滥用，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WTO 在解决贸易争端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其推动多边谈判的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贸易结构的改变，WTO 的相关制度和机制也要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需要。

多边体制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基石，非歧视、开放等多边体制的核心价值，为国际贸易创造了稳定、可预见的竞争环境，推进多边进程是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佳渠道。推动 WTO 改革，核心在于坚持和完善 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属性，宗旨在于更好发挥 WTO 在全球多边治理体系中的积极作用。在当前形势下，迫切需要打破制约 WTO 发挥作用的要素，抓住改革重点，明确改革优先次序和时间表等具体议题，



加快建设一个开放、公正、透明、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多边贸易体制。围绕 WTO 改革核心，有三点建议：

一是完善机制。目前，作为 WTO 核心支柱的争端解决上诉机制，由于去年底到期离任的成员一直未能及时得到增补而陷入“停摆”，已经影响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运行。要抓紧研究维护 WTO 争端解决上诉机制正常运转的应对方案，打破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捍卫 WTO 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二是强化纪律。WTO 规则中“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赋予成员方自由裁量权，采取措施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是必要的贸易制度安排，其初衷是好的，但也容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目前，已有个别成员无视多边规则，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这一条款。应加强对使用这一条款的通报纪律和多边审议，强化对不符合 WTO 规则的单边主义措施的监督约束纪律。

三是提高效率。近些年，农业、发展等议题进展缓慢，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等议题久拖不决，WTO 的运行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各成员应积极探索改进议事规则，优化决策程序，提高 WTO 运行效率。

■ 郑之杰 /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

全球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的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关于 WTO 改革与未来世界贸易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未来仍然需要发挥 WTO 的作用。作为当今解决世界贸易争端的国际组织，WTO 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世界贸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稳定世界贸易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动世界贸易发展、保障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考验，世界贸易和投资大幅度萎缩。在这个背景下坚定地维护以 WTO 为基石的体制，更好地发挥 WTO

的作用，对恢复和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WTO 需要与时俱进，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发展不平衡点，如部分国家内部收入分配正在加剧失衡。全球化正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会，但给发达国家各阶层之间带来的不平衡问题却是过去没有被认识到的。这些问题与经济全球化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自身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只有通过推动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不能将这些问题归咎于经济一体化，要推动 WTO 改革、进一步提升 WTO 的作用，而不是摧毁 WTO。

要适应新的科技发展和由此带来的贸易发展新趋势，完善全球贸易规则。伴随着数字经济变革，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服务贸易成为最具活力的方式。从根本上看，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正不断提升，由 1970 年的 9% 上升到 2019 年的 24%。据 WTO 预测，该比重到 2040 年将上升至 50%。从内容看，通讯、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增速较快，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业贸易比重正有所下降。很多服务已经可以通过网络远程进行并实现跨境交付。要适应新趋势，需要充分考虑数字贸易科技发展等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加快国际沟通协调，完善相关贸易规则，为贸易发展制造强有力的环境。

第三，世界贸易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尽管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仍然不可阻挡。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衰退危机，需要各国开展更加深入务实的经贸合作，共塑高效的世界贸易体系。在当前 WTO 运营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各国也在探索建立一些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比如说经历了 8 年谈判，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15 国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这一符合 WTO 原则的协定。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潮流，有利于区域各国深化经贸合作，也能够向世界传递相关各国携手共塑发展的积极信号。未来，应进一步推动优化世界贸易体制，在坚定维护以 WTO 为基石的同时，积极开放投资贸易机制。推动“一带一路”等倡议，加快完善和实施适应数字贸易科技发展等新趋势的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的发展。

第四，在全球贸易中要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当前，全球发展鸿沟仍然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区域发展层次、教育文化水平、参与国际治理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全方位的差距，而国际贸易体系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是对贸易体制的校正。只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才能实现真正的贸易公平，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就不能真正地构建健康公平的世界贸易体制。未来，在 WTO 和各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中，应当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点。通过维护相关政策和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促成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贸易体制，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包容、更加平衡、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促进世界贸易发展要积极发挥金融作用。金融属于服务业，金融服务贸易不仅是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为商品服务贸易提供资金融通的媒介。世界贸易的持续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第五，促进世界贸易发展要积极发挥金融作用。金融属于服务业，金融服务贸易不仅是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为商品服务贸易提供资金融通的媒介。世界贸易的持续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服务更加安全，世界贸易才能够更加安全、健康和繁荣。各国应当结合实际，稳步推进金融开放，积极促进金融业深化发展，共同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国际金融机构应当增强创新能力，研发更多的全球化金融产品，提升跨境综合金融服务水平，为世界贸易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 祝宪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两低一高”疫情背景下的世界贸易投资变动趋势

新冠病毒所引发的疫情已经席卷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发生了 50 年来未曾见过的收缩，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贸易活动和资本流动也急剧萎缩。受到石油及大宗商品的价格冲击，部分国家的信用评级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下调。正常增长水平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了一轮经济负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2020 年的经济增速预计为 -5.7%，2021 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回升至 5%。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每一个经济体、每一个政府、每一个企业如何找到相对确定的因素从而作出理性的决策？我认为以目前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经济将面临“两低一高”的局面，即低增长、低利率和高杠杆。低增长是指全球经济可能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维持低速增长的态势；低利率是指由于各国为应对疫情大规模放松货币政策，使全球利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并且这种状况会持续一段时期。一高就是高债务杠杆，为了应对疫情，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开始大规模举债，全球债务杠杆相比疫情前发生了急剧增长。高杠杆对贸易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对以初级产品为主要贸易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低增长的经济环境下其出口会遇到更多阻力。从收入、贸易和经济增长各方面来看，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前的形势都不容乐观。

但是，疫情终将会逐步得到控制，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转机。当前全球合力抗击疫情的趋势，也为实现疫情后更加绿色、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疫情冲击使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而进一步推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和分散化的趋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至少在贸易和投资发展方面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区域性变化。比如亚太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以及以德国、法国为主的欧洲地区都出现了区域化的贸



易和投资趋势。这些区域化发展本身并不是彼此完全隔绝的，而是在疫情后由于产业链和贸易链重组形成的新趋势。

受疫情影响，旅行禁令、入境管控、封锁边界等措施可能形成新常态。这将使某些要素流动在短期内严重受损、生产和贸易活动进入放缓或停滞状态，并且使已经脆弱的全球贸易雪上加霜。根据 WTO 的预测，2020 年世界贸易额会下降 13%-32%，这一跌幅已经超过了上次金融危机时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最大的经济衰退。

在疫情冲击下，供应链转移以及“国产替代”趋势逐渐形成，疫情使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试图采取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经济循环模式。从世界贸易结构看，当前中间产品贸易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紧密

联系在一起，疫情对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尤其对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高、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造成的冲击更加巨大。

专家学者对于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改革已经做了很多论述，WTO 在运营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说明其确实需要改革。但是作为一名在多边机构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我认为 WTO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肯定，作为一个多边国际机构，WTO 所承受的各方面利益诉求和政治经济压力不是一般人所能设想的。

黄奇帆先生关于中国贸易及与美国之间的博弈等问题的见解非常精辟，我完全同意。对某些带有政治压力或意识形态偏见的诉求，应该坚决反对；对那些出于一己私利提出的意见，应该冷静谈判，并在对其以本国利益为重的做法予以理解基础上积极促成互谅互让的结果。

世界贸易走到今天已经跟二三十年前有所不同，在国际化的、全球化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应该有新的解决方

在疫情冲击下，供应链转移以及“国产替代”趋势逐渐形成，疫情使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试图采取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经济循环模式。

案。不应过多局限、拘泥于眼前，应该关注包括“十四五”规划在内的下一步改革开放措施。我们希望看到既符合发达国家、也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核心利益的公平贸易体系的产生。当然，这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清除重重阻碍并付出艰辛的努力，但是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仍是可以实现。



■ 张伟 /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首席专家

经济全球化与数字贸易全球化

我想从四个方面谈一下经济全球化与数字贸易全球化。

第一，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签署的意义是什么？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加速升温之际，15 个成员国历经 8 年坚持谈判，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意义十分重大。因此，经济全球化趋势总体上没有逆转，但是其格局确实发生了变化。当前，以 WTO 为主的多边经贸协调机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地区贸易协议、地区贸易合作在不断取代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现在全球基本形成了以中日韩为核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圈，以德国和法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经贸圈，以美国为中心节点的北美自贸圈。总之，尽管大的全球化趋势并没有发生逆转，但是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二，数字产品的属性到底是什么？最近签署的 RCEP，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跨境数据传输的规则，该规则明确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数字贸易的发展，限制成员国政府对数字贸易施加影响。数字产品、数字经济的属性是什么？数字高技术特性是其基本属性。数字技术是知识密集型产品，以数字为基本特性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是数字化底层技术的发展。

从传统贸易的角度来看，商业行为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竞争。但是数据形成的数据产品，并不带有竞争性，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开放式产品。因此数据产品的第一个特点是高技术非竞争性。数据产品的第二个特点是颠覆性。这个特点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互联网和宽带的出现使电话通信系统遭受毁灭性打击，



这说明现代技术必定颠覆传统，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第三个特点是数字产品的多样创新性。数据产品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创新，可以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数字产品可以通过机制协调和多元化协调实现利益平衡，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生成数字共享。我认为这就是目前数字经济的三个特性。

第三，数字贸易全球化还需要经过三道关。数字贸易可分为数字产品贸易、数据流两大部分，相比数字产品贸易，数据流形成的产品贸易理解起来要复杂一些。数字产品大体上仍属于货物贸易的范畴，但是数据流产生的产品大多属于服务贸易范畴。比如跨境电商是怎样承载数据流的？云是怎样流动的？对企业来讲，在商业运营实操中征收数字税要如何计算税基？如果不清楚基本的概念，未来的数字贸易全球化将无法进行下去。目前至少还需要三道关才能够达到数字贸易的全球化。

第一关，数据确权 and 认证。数据要素市场建立的基础就是要确定数字身份，这是要素市场的基石，换句话说就是要明确数据产生的主体。在认识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这个更加复杂的概念之前要先行确权。与使用权和自主权道理相同，数据流产生的内容必须要进行确权，而目前缺少一套比较系统的确权规则。确权了以后才能认证，认证以后各个国家才能够相互认证，只有相互认证才可以进行交易。

第二关，制定专门规则。目前 WTO 并没有针对数

字贸易出台对应规则，相关规则主要是 WTO 框架下的文本和附件，比如服务贸易协定、技术协定、知识产权协议、全球电子商务宣言等。这些内容对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缺乏改革的预见性，上述 WTO 框架下的规定都面临挑战和改革，以及被彻底转换、替代的可能。

第三关，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全球化发展使全球产品之间的分工得到进一步细化，全球产品生产由产业内分工走向产品内分工，通过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可以由不同的国家组装共同完成生产。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当中占比很大，2000 年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当中占比不到 30%，但是 2010 年却占到 70%。这说明几乎所有的产成品都是在多个国家经过多个层次进行组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完成一个大型的产品制造。数字产品嵌入到全球价值链，还涉及原产地追溯问题。将来贸易产品都会嵌入数字化追溯模块，只有把数字化产品标志做到基础化，数字产品的贸易全球化才会往前推进。

第四，中国应该如何建立数字贸易规则？第一，需要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第二，需要数据确权管理体系。第三，需要数字贸易立法体系。第四，需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谈判的制度性安排。

总而言之，无论数字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首先都需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RCEP 如何在今后落实？在落实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把自己事情做好。举个例子，零关税的进口对进口总体影响不大。目前我国进口平均关税水平仅为 7.4%，因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就更为重要。2019 年中国关税收入大约 3000 亿，但是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为 1.5 万亿。我国对高科技产品进口实行免税政策，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很多都还没有落实到位，所以需要更加积极地调整税收体制以及监管体制。由于增值税免税政策在整个增值税链条抵扣的中间环节密施，会造成抵扣链断开，进口环节免税由进口货物的购进企业承担，这有利于贸易环节，而不利于生产企业。这对生产企业很不公平，从而导致生产性企业不愿意与贸易性企业合作进口高科技产品。鉴于此，对这些制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全球数字贸易、进口贸易不会实现大的变化和高增长。



■ 孙元江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伙伴关系总监

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 全球化道路依然漫漫

一、RCEP 达成时间虽长，但意义重大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上《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全球形成了一个大的经济三角。

2012 年启动 RCEP 谈判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个谈判会历经 8 年之久。当初东盟十国发起谈判时，选择了 6 个与其签署过贸易协定的经济伙伴，所以是 16 家谈判方，这也解释了为何其中没有美国。东盟和 6 个与其已有贸易协定的经济伙伴谈判，貌似是个只需把规则统一一下的简单事情。但是，解决这个“简单”的事情用了 8 年时间。

RCEP 谈判在历经 8 年“长跑”之后，终于在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共 15 个国家（印度于 2020 年 7 月正式宣布退出 RCEP）形成了一个全球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化、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点，在 RCEP 谈判结束阶段，中国与日本、日本与韩国之间也同时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安排。RCEP 谈判如此艰难，主要是因为东盟之外的 6 个国家之间，尤其是中日韩三大经济巨头之间并不是都有贸易协定。

2012 年在启动 RCEP 谈判的时候，同时启动了中韩自由贸易谈判和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2014 年中韩双边谈判取得成功，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直到今天亦尚未完成。所以中国与日本、日本与韩国之间达成的双边关税减让安排是历史性的突破。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中日韩之间的谈判也会取得进展。

二、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值得期待

暂别一年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在网上以视频方式开幕。APEC 举行了 27 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领导人从未缺席。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 1993 年由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起，此后每年举办一次，一直是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风向标。但近两年该会议举办颇为不顺，2018 年因为中美之间爆发摩擦，首次在未发表共同声明情况下闭幕；2019 年由于智利国内因素没有举办。在 APEC 的议事日程中，贸易投资自由化、亚太自由贸易区都是重要议题。1994 年 APEC 在印尼茂物提出了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即“茂物目标”；2020 年 APEC 各成员国领导人为了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在马来西亚发布了“2040 年亚太经合组织布

特拉加亚愿景”。期待今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亚太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能够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三、中欧将达成投资协定

在双边领域，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刚刚发布，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已接近尾声，根据中国和欧盟领导人所达成的共识，谈判有望在 2020 年年底结束。中欧投资协定以前称为《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现改名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这不是简单的协定名称改变，而是实质变化。过去和任何国家谈投资的时候，只谈投资保护，不涉及自由化内容，没有市场准入的条款。《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则包含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均涉及自由化与市场准入条款。《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一旦签署，将取代中国与欧盟国家的投资保护协定。

四、全球化道路漫漫

以上所述传递了这样几个信息：

1. 区域和双边的贸易安排，仍是许多国家或者主要贸易伙伴追逐和依赖的合作机制保障，这不仅体现了各国经济相互关联的天然属性，也再次确认了贸易伙伴之间优势互补形成国际产业链的合理性。即便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产业体系完整的经济体，也同样需要大力拓展海外市场这个外部循环来参与国际产业链，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2. 经济发展离不开贸易投资的拉动作用，而贸易投资增长又离不开市场的不断开放，包括关税与非关税、投资限制的取消以及一些规则的简化。以 RCEP 为例，参与 RCEP 谈判的 16 个国家中有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也有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还有老挝、柬埔寨、缅甸等低收入国家。虽然各国发展水平不一样，但需求是一样的。各国经济都依赖更多外贸收入与投资资金，以维持并促进经济不断发展，因此都需要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

3. 在各国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普遍低迷的今天，中国经济的正增长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仍旧强调不会谋求“脱钩”或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而是提出共同繁荣与发展。中国对外开放非但没有止步，而且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包括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稳步推动金融市场准入、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强化深圳和浦东的改革开放举措、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习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中国政府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对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无疑是个明确的积极信号。

4. 未来挑战不小。区域经济一体化虽然有可喜的进展，但仍面临很多挑战。疫情仍在蔓延。尽管不断传来疫苗研发的好消息，但世卫组织认为 2021 年上半年疫苗供应还是很有限，这说明疫情对贸易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一段时间。此外，这些年被极端民族主义不断洗脑的逆全球化浪潮不可忽视，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仍处在岌岌可危

的境地，WTO 总干事的任命迟迟不能到位，因中美贸易摩擦出台的高关税和制裁留下了许多难以治愈的后遗症。回归全球化的正常秩序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各国还要继续上下求索。

五、自由化仍有很大空间

全球投资贸易化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以 RCEP 为例，90% 的零关税水平虽然很高，但离 WTO 允许的例外条件仍有差距，更不用说这个“减让”还有过渡期。日本清酒关税目前是 40%，按照协定安排，中国要等到 21 年后才能喝到不加关税的清酒。同样，日本人要免税喝绍兴黄酒，也要等到 21 年后。

自由化不仅体现在货物贸易的关税上，还体现在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投资限制减少等方面，还有一些规则问题，除了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传统规则外，还有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新议题，环保、劳工条款等也都是未来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里的新内容。也就是说未来的自贸协定不仅强调贸易自由，也要强调规则公平，只有达成全面、互惠、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才能真正对全球贸易体制形成补充作用。自由化是一个动态，协定是活的文件，随着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的深化，相信未来我们不用等到 21 年就能喝到免税的日本清酒和中国绍兴黄酒。

未来的自贸协定不仅强调贸易自由，也要强调规则公平。

■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如何改革世界贸易组织

一、认识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和地位

世界贸易组织 (WTO) 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1995 年正式成立后, WTO 经历了很多发展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 规则的制定以及全球贸易都有所提升。

WTO 改革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话题。很多国家以及很多人一直在攻击 WTO, 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总统, 他认为 WTO 亟须改革, 甚至认为 WTO 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种看法显然有问题。首先, 世界所有国家都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即世界贸易组织有存在的必要。其次, 不仅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改革, 每一个国际组织都需要改革, 全球的治理体系也需要改革。新开发银行副行长曾表示, 现在很多国际组织像世界贸易组织一样, 都面临很多压力。美国商会副总裁也讲过, 世界贸易组织在过去 5 年多的时间里, 将关税降低了 1.3 万亿美元,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二、明晰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分歧所在

很多人认为, 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及争端解决机制需要改革, 对 WTO 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 即所有成员国须达成共识感到不解。这些人不应忘记 WTO 于 1995 年创立之时, 所面对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世界最大贸易国——中国加入 WTO 之前, 通常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是非常有限的。因此, 才有了所有成员国须达成一致意见来制定规则这一做法。这样做不会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也不会阻碍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农业谈判比较滞后, 因为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准入上存在冲突。WTO 改革确实是必须的, 但是重点应在了解问题的根源, 有的放矢, 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改革。

现在至少有四五个不同的改革提议, 有来自美国、欧洲委员会、加拿大和另外 30 个国家, 也有韩国、日本和中国的提议, 它们遵循的改革路径都是类似的。需要明确的是 WTO 改革必须有这样一个方向, 即世界贸易组织永远要平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待遇, 并且要有解决争端的机制。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贸易政

策——这不仅仅是政策问题, 其中还蕴含着工业的创新。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提高国际谈判的透明度。但是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则, 就是应该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全球贸易体系, 国家的贸易规模无论大小都应享有同等对话的权利。

以上这些因素决定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本质。世界贸易组织目前正在推动自由贸易程序的建设, 各国也需要开放经济, 让各方都能够受益。另外电子商务, 尤其是世界贸易支付体系需要进一步讨论, 也需要更加现代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需要进一步改进国际支付体系, 各种不同的机制, 尤其在私营部门, 还有国际层面的金融贸易。

三、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离不开大国支持

有一些多边体制的优秀案例, 对于如何开展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有一些启示。没有美国和中国等贸易大国的领导, 要改革 WTO 是不可能的。希望倡导多边贸易主义的拜登总统, 能够与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一起, 重启世界贸易谈判, 使 WTO 改革进入正轨, 实现国际治理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更新和改革, 确保让所有人、所有国家以更加积极和可持续的方式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当中, 从而改革并升级世界贸易组织。



IFF 圆桌会议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与发展

方风雷：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动是发展前提	80	阮晓红： 从四个方面将南沙建设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86
李东荣： 大湾区建设与合作，从产业支持到人才建设的四点思考	81	余利明： 以“十四五”规划和国企改革视角，寻找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协同发展的新机遇	88
梁锦松： 发挥香港特区优势，助力大湾区发展	82	张维春： 三个“折叠”打造澳门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90
邱亿通： 深耕广州金融业，共同推动大湾区融通发展	84	赵晓宇： 人才流动为大湾区建设注入活力	92

■ 方风雷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厚朴投资创始人兼董事长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动是发展前提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伟大的构想，这是继香港回归并实行“一国两制”政策以后的合理延伸，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特别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取得伟大成绩以后，这两个区域的合理结合。

谈到粤港澳大湾区，时常会把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拿来作对比。实际上，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先天与其他湾区明显不同的特点，就是在粤港澳三地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法制和税收政策。正因如此，五大经济要素的流动都受到很大的限制。经济要素的流动性是衡量一个湾区发展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如何解决经济要素的流动这篇大文章，可以从最近几十年来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空间经济学中寻找灵感。

空间经济学和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也是当代经济学家对整个社会做出的伟大贡献。最早提出空间经济学概念的是沃尔特·艾萨德，我认为该领域内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是朱嘉明教授。朱教授最近讲到，大湾区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素流动困难，所以在珠海横琴第三届“十字门金融周”，朱教授发布了“数链计划”，通过数字金融构建数字经济，用数字经济包括生命科学等把各区域连通起来。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哪里要素流动顺畅哪里就可以发展，要素流动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因而也决定了该地区能否成为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进而决定其国际化程度。

在当前情况下，大湾区若想破局，必须从传统的思维中走出来。据统计，目前全球共有 130 多个自由港、2000 多个自由经济区，其中较为成功的仅有新加坡、香港、迪拜、瑞士、日内瓦和卢森堡等，而且它们有着共同特点：单一形态、小型经济体。在大湾区要赢得成功，还得做试点。我的个人建议是：大湾区要找试点，要找



能保证要素充分流动的试点，例如，澳门跟横琴紧密合作，建立“澳琴自由港”；香港跟南沙紧密合作，建立“港南沙自由港”。

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倘若无法建立这种体系，大湾区便难以协同发展。这种体系在“一国两制”体制下是可以实现的，也是“一国两制”中应有之意。以海南为参照，经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海南建立了一套自贸区法规，类似的或许也可以给澳门横琴自由港、香港南沙自由港制定法规，保证其经济要素充分流动，为大湾区注入蓬勃活力。

■ 李东荣 /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大湾区建设与合作——从产业支持到人才建设的四点思考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特别是金融怎么适应大湾区的发展、促进大湾区更好地前进，有四个个人观点。

第一个观点，深化对大湾区的认知。要正确认识当前所处的形势，深化对大湾区战略地位的认知。当前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面临诸多的挑战。来自各国的前政要谈论了很多重要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全球当前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有区域性的，也有全球性的。比如疫情的冲击，短时间内影响还在不断发展变化；又比如气候变化的挑战，连带着碳排放等一系列问题对各国产生影响；此外，去全球化、社会分化以及数字技术时代到来的挑战等等。所有的这些挑战，都将是影响全球或者某个区域今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提早认识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讨论大湾区的建设发展问题，前提是正确分析形势，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需要认真思考并与时俱进地去完善、深化认知，使其对大湾区的建设举措更加富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第二个观点，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湾区的发展，金融该怎么发挥作用？经济和金融的关系是非常清晰的，即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决定金融活动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实体经济做支撑，金融发展是无本之源。所以要发展大湾区，一定要把大湾区的实体经济基础夯得更实。目前，粤港澳三地经济结构各异、各有特色。但是粤港澳三地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市场意识、商品模式等等都有许多相近之处。广东省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正在迎头赶上；港澳具有多年所形成的、有历史积淀的良好基础条件，如果能将粤港澳三地的这些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形成三地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要把实体经济夯实好，才可以为金融的支持找到更精准的着力点。所以对于大湾区的建设，三地要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既包括软件部分，也包括硬件部分，例如交通、教育、基本的经济活动相配套的条件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等等。粤港澳三地更有机的经济协作结构，将是大湾区在未来长远发展的根本动力，实

体经济是大湾区真正实现国家战略所赋予的使命的最有力的支撑。

第三个观点，加快发展大湾区服务业。金融业要更好地适应大湾区的经济结构及经济社会的特点，为经济活动提供及时、有效、可持续的金融支持。服务业是大湾区的建设蓝图中



很重要的一步棋。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广东境内的经济已经迎头赶上，三地的融合发展也在不断加深，所以我认为大湾区的服务业已经具备进入更快发展的条件。如何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服务业？把三地的法律、经济、财会、技术各方面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包括人员方面、技术方面、基础设施方面、教育方面等等，同时借助金融业在其中的支持作用，助力上述优势更好地发挥。如果大湾区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促进服务业与其他产业更好地融合、配套，会给大湾区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支撑。其中，金融业应该着力于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这些前沿方向，使金融服务业更好地适应这个地区快速发展的需求。只要三地能在金融改革方面下好功夫，形成特色和优势，那么一定会奠定大湾区未来强有力的竞争力。

第四个观点，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最为关键。如何将粤港澳三地的教育资源最大程度地动员和组织起来，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趋势，培养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化人才，是衡量一个地区现实发展力和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非常重要。建议三地的教育部门及各级管理部门要形成共识，加快人才的教育、培养，结合大湾区未来的发展特点，为这个地区未来的竞争形成一个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 梁锦松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原司长

发挥香港特区优势，助力大湾区发展

大湾区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了解，可以说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引擎之一。大湾区一共有 9 个城市、2 个特别行政区，人口总量规模大，将近 8000 万的人口，已经差不多是一个西欧大国的人口数量。体量大之外，每一座城市在功能上还有很强的互补性，竞争不多。特别是深圳和香港，一个是创新的中心，一个是金融的中心，两座城市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

由于这种互补性，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我一直呼吁和推动五个要素在大湾区里的流通，这五个要素分别是：人流、货流、服务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这五个要素怎样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前提下加强流通，是需要去思考和推进的。

我相信香港能够在大湾区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乃至对全国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了香港“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香港特区现行的法律为普通法体系，法律条例应用上和国际接轨，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香港地区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经济，在金融的监管方面尤为受到国际投资者的认可。

另外，香港地区采用比较简单的税制，税率比较低，港币也可全自由兑换。在医疗方面，据美国的彭博社报道，香港地区的医疗制度最为有效，而事实上，香港地区的人均寿命也是全球最长，这里的生活质量和方式对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经济地位上，我认为香港的定位应该是“Manhattan

Plus”（曼哈顿+）。曼哈顿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并且同时存在多元经济发展。香港在两个重要领域上的优势，正好能发挥和担当“曼哈顿+”的功能角色：一是高等教育，二是医疗。

高等教育

一直以来，香港有 4 所大学全球排名 100 以内。特别是在大湾区内，香港这几所大学成绩斐然，当然大湾区其他大学的排名也一直都在上升。这在某种程度上展示出香港地区的科研能力。正如习总书记经常强调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而科研是推动创新的一个重要抓手。因此，我们需要思考怎么利用香港地区的大专院校更好地吸引全球的高端人才。目前，在中国的政策和政府的推动下，很多在美国或其他地区做研究、特别是在高等院校任教的人才都在思考到中国发展，因此我相信香港在吸引人才方面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相比内地的城市而言，香港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方式等因素，更能让这些海外的人才所适应。

最近，来自香港的科学园、科技创新园区的一份研究指出，香港可以依托大湾区内强大的市场和生产制造能力，在以下六个方面加强科研的力量：一是医疗科技，二是大数据跟人工智能，三是机械人，四是新材料，五是微电子半导体，第六是金融科技。香港与深圳地理位置上相邻，深圳的科技应用、专利数量等在我国名列前茅，而香港的大学则在基础研究、论文发表上成果颇丰，如果把两地优势相结合，本地区的综合实力可以跻身全球地区前三名之列。基于此，我相信香港的高等院校可以发挥其独特作用。

医疗方面

香港地区拥有全球最有效的医疗体系和前沿人才，深圳作为一个颇为年轻的城市，其优质的医疗机构规模还比较小，因此可以利用香港的医学院和医疗机构，为深圳乃至整个大湾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金融服务方面，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有三点发展方向值得大家思考和重视：

首先，香港地区可以在资本和融资方面助力中国企业的发展。过去几年，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颁布的新条例影响，迫使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需要研究从美国退市回归祖国的市场。这种情况下，选择在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交易所上市，可以帮助其吸引国际投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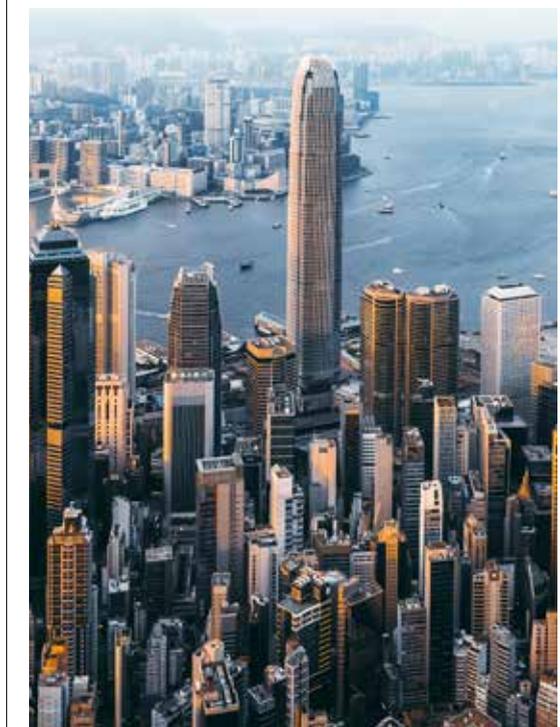
其次，香港地区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创新金融服务。可以考虑在香港地区进行一些金融创新，例如，2020 年的美国市场一半以上 IPO 都是 SPAC 或叫「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在香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坚定不移要走的道路，借助香港市场，比如在香港发行更多的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容许人民币的对冲产品，包括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等，这也是可以考虑的有力措施。

港监管充足的前提下，引入 SPAC 上市模式，可以为企业提供一种融资选择，这种金融创新是可以助推中国的创新企业发展的。

最后，香港地区可以帮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坚定不移要走的道路，借助香港市场，比如在香港发行更多的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容许人民币的对冲产品，包括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等，这也是可以考虑的有力措施。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通过之后，香港社会整体业已恢复稳定、和平的环境，希望大家能重新思考、把握各种机会，运用香港地区的优势来大湾区服务、为祖国服务。我深信香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大湾区的未来发展会更好。



■ 邱亿通 /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深耕广州金融业， 共同推动大湾区融通发展

近年来，广州市金融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防控金融风险三大任务，扎实推进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数据显示，金融业继续坐稳广州市第四大产业。2020 年前三季度全市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8.9%，占 GDP 比重 9.8%；金融业税收 374.4 亿元，同比增长 9.4%，占总税收比重为 9.5%；广州地区本外币存贷款余额 11.8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01%，其中各项存款余额 6.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45%，贷款余额 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73%，增速居北上广深津五大城市第一位；全市保费收入 1187.5 亿元，继续保持全国城市第三位；广州境内外上市公司累计已达 197 家，2020 年可增加 20 家，总市值约 3.3 万亿元；在第 28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广州位列全球第 21 位，并被评为全球 8 大金融科技中心。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广州将牢牢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通过加强市场互联互通，推动机构互设，不断深化落实中央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主要经验和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贯彻落实上级金融支持政策，并形成本地政策体系

(一) 对照细化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广州市关于推进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实施意见》及《广州市关于推进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并



于近期印发实施。

(二) 认真贯彻落实人民银行等国家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及广东省实施方案 80 条措施，制定出台广州市行动方案 66 条措施。

(三) 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特色鲜明的“1+N”政策体系。广州市《关于支持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若干规定》实施 6 年来，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出超 20 亿元；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项目实施 5 年来，累计评出广州高层次金融人才 1361 人，奖励资金达 1.76 亿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持续推进重大金融招商项目落地

(一) 积极推动筹建广州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落户在南沙。经过多年不懈努力，2020 年已经获得

国务院的批准，成立筹备组，将于近期正式挂牌运作。

(二) 全力推动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赋予广州的重大金融平台，力争早日能够获批落户南沙区。

三、积极推动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和金融机构互设

一是推动穗港、穗澳互设金融机构。香港富卫保险公司拟在广州设立合资寿险公司。香港独角兽企业货拉拉集团在我市独资设立第一家外资小额贷款公司。2020 年以来广州已成功推动九毛九等广州企业在香港上市。二是推动设立港澳保险服务中心，准备以三地车险作为切入点启动建设。

四、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

一方面是深化支付结算业务创新合作，推进大湾区支付结算服务互联互通。另一方面是推进资本项目便利化改革，探索实施更高层次的贸易投资便利化。

五、深入推进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作为全国第一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城市，广州市深入推进试验区各项工作并不断取得成效。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在穗银行机构绿色贷款余额超 3500 亿元，全市累计发行各类绿色债券超 690 亿元。

六、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金融平台

一是努力把国际金融城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示范区。二是高标准推进南沙国际金融岛建设，打造以国际金融论坛 (IFF) 永久会址为核心的金融要素聚集区。

七、不断提升金融国际化水平

举办 IFF 国际金融论坛全球年会、亚洲金融高峰论坛暨亚洲金融智库年会、中国风险投资论坛、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穗港澳金融合作推介会、金交会、湾区经济发展国际论坛等高端论坛，汇集全球智库资源为广州金融业发展建言献策。

从广州的实践来看，促进大湾区金融业合作发展的关键在于“融”和“通”，核心是创新突破，当前我们依然面临常态化疫情防控、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跨境规则对接难度大和标准体系不统一等困难。

下一步广州将继续携手香港、澳门、深圳等大湾区城市，推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推动建立大湾区金融监管工作协同机制，做好互联互通工作，加强跨城市、跨领域、跨界的金融监管工作。



■ 阮晓红 / 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副区长

从四个方面将南沙建设为 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提出了积极作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要求。

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为推动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新动能。

广州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几何中心，是广东唯一的国家级新区，也是广东自贸区最大的片区和广州市唯一的城市副中心。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布，明确将南沙建设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携手港澳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南沙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近期南沙又接连获批综合保税区和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还落地了国际航运保险业务税收优惠、启运港退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多重战略叠加优势更加突出，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南沙发展的重视和支持。

南沙也一直自觉扛起责任、抢抓机遇、积极作为，近 5 年来南沙的经济指标一直保持着年均两位数的增长。在 2020 年特殊的疫情背景下，南沙经济克服下行压力，依然平稳增长。地区生产总值超 1846 亿元，增长 7.5%；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922 亿元，增长 22.2%；进出口总值 2265 亿元；税收总收入 657 亿元。以上 4 项指标增速都位居广州市第一，累计落户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 197 个，南沙已经初步呈现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南沙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致力于打造制度开放型南沙

南沙始终对标最好、最优，大胆闯、大胆试，积极探索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南沙目前已经累计形成 689 项创新成果，其中 43 项在全国复制推广。南沙推出了贸易便利化的“三个全球”，首

创“全球溯源体系”“全球优品分拨中心”“全球报关服务系统”三大数字贸易服务平台，推动国际贸易规则数字化转型。据第三方机构评估，南沙的贸易便利化指数在全国排名第二。南沙还推进了群众办事的“三个 0”：首创商事登记确认制，实现企业注册“0 审批”；创新数字政府实践，推动政府服务“0 跑动”，目前一次都不用跑的政府服务事项占 86%；打造无证明自贸区，推动业务办理“0 证明”。

南沙还推动法律服务三地融合，与港、澳共建南沙国际仲裁中心，实现三地仲裁模式同步运行，起用大湾区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聚集区，现已聚集 30 多家涉外法律服务机构。

二、致力于打造创新驱动型南沙

近年来南沙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培育和发展内生动能，主要聚焦三个方面的创新：

首先，聚焦原始创新，高标准建设南沙科学城、中科院民族科学园。南沙将高标准建设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在其周边形成了一个孵化平台，呈现出积极引进和融入的态势。南沙还将加快推进高超声速风洞、冷泉系统等四大科学装置，打造大湾区综合性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主要承载区。

其次，聚焦产业创新，在千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南沙以广汽丰田、恒驰汽车为龙头，加快打造两个百万辆产能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大力发展人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智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创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

第三，聚焦环境创新，依托华南技术转移中心、香港独角兽牧场等平台，加快打造华南成果转化转移的新高地。

除了聚焦三个创新，我们还制定了具有竞争力的“1+1+10+N”的产业政策，其中的人才政策尤其令人瞩目并且极具竞争力，2019 年某位专家人才个人奖励就达到了近 800 万。南沙将加快建设国际化的人才特区，吸引海内外各类人才“智汇”南沙。

三、致力于打造门户枢纽型南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南沙目前正在推进国际航运、贸易、金融等门户枢纽功能，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重要枢纽平台。目前正在着力建设以下三个枢纽：

第一个是区域交通枢纽。广深港高铁庆盛站 30 分钟直达香港西九龙，正在加快推进深茂铁路、深中通道以及广州地铁 18 号线等重大项目，构建以南沙为中心的大湾区半小时交通圈，促进南沙从地理几何中心成为真正的交通中心、功能中心乃至经济中心。

第二个是国际航运贸易枢纽。南沙港区自 2004 年建成以来发展迅速，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超过百万标箱，2020 年已经达到 1722 万标箱，比 2015 年增长 46.3%，国际枢纽大港地位更加夯实。南沙的跨境电商、汽车平行进口等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进出口总额占广州市的四分之一。随着 2020 年先后获批综合保税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和 2021 年南沙港铁路投入使用，南沙国际大港的地位将更加牢固。

第三个是金融创新枢纽。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要求把南沙打造成经济服务的重要平台，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指导下，目前南沙已经集聚了金融类机构 6600 家，持牌法人机构 14 家。南沙已成为大湾区最大的飞机船舶租赁聚集区，广州期货交易所、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址等重大金融平台也落户南沙。积极开展自由贸易账户、跨境双向人民币融资以及外汇管理改革试点等跨境金融先行先试的政策。目前南沙正在加快制定金融的“十四五”规划，加快建设国际金融岛，积极筹建港澳保险售后服务中心和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着力打造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试验示范窗口。



四、着力打造联动共享型的南沙

南沙区位优势独特，是打造“融湾接海”共享型平台的最佳选择。当前南沙正在积极创新与周边区域的合作模式，力争在港澳合作区域协同发展当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包括建设粤港澳全面合作的示范区。

南沙与港澳合作历史悠久，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霍英东先生已经率先倡议开发南沙。进入大湾区时代，南沙将以基础设施“硬连通”、规则衔接“软连通”以及人文交流“心相通”为抓手，不断深化与港澳方面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现在已经有 4000 多家企业在港澳投资兴业，投资总额达到 1250 多亿美元。我们正在以南沙粤港深度合作园这一重要平台的建设为抓手，着力营造与港澳趋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环境，打造内地与港澳规则衔接的示范基地。

同时，建设广深双城联动的发展先行区。《广深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之后，正在积极落实推进当中。我们会优化调整南沙南部的万顷沙组团的功能布局，探索广深联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深化与前海的全方面合作，主动对接集聚深圳产业和人才等高端资源，推进环内湾区域公共服务共享平台的共建，打造粤港澳优质生活圈。

此外，还将与海南合作，建设海湾协同对接的先导区。2020 年 11 月 20 日，南沙与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我们将把握海南自贸港的战略机遇，以全球优品分拨中心等重大合作平台为纽带，开展航运物流、游轮游艇、健康旅游、海洋科技以及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的互补合作，打造海南自贸港与大湾区对接的先导区。

■ 余利明 / 国新国际执行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以“十四五”规划和国企改革视角，寻找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协同发展的新机遇

围绕“以‘十四五’规划和国企改革视角，寻找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协同发展的新机遇”的主题，主要有四个观点和一个建议。

第一个观点，香港亟须利用其独特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拓发展新局面

香港拥有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竞争优势。尽管这两年香港在爬坡过坎，但这只不过证明了香港需要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道路。即便在黑暴、疫情和美国制裁三重冲击下，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依然稳固，特别是为内地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市场机遇持续不断、前景不俗。截至目前，2020 年香港证券市场日均成交额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40%，IPO 市场比去年同期增长 60%，资金持续流入，港币的汇价不断触发强方的兑换保证。“十四五”规划中国家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主要手段，进行制度型开放，这将成为中国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的抓手。因此，香港如何利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以及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优势，融入国家制度型开放改革，开辟香港发展新路，成为亟须解决的全局性新问题。

第二个观点，澳门不断寻求金融业的突破口以促进经济适度多元

澳门在对接“十四五”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以珠海横琴为抓手，积极主动以开放和创新的思维持续推动金融业的发展。一是对接大型金融机构，比如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机构，拓展自己有优势的市场。二是发现细分市场，发展特色金融，发展债券交易市场与国有海外资产交易，完善本地货币市场人民币流动性安排，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尝试建立以人民币计价服务内地企业的澳门证券交易所。三是琴澳一体化，多渠道吸引内地投资者和基金，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和商业化。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框架下，相信澳门金融业可以取得



突破，实现错位发展。

第三个观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短板在于央企资源支撑不足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在内地一直表现非常亮眼，人均 GDP 与城市化率均优于长三角地区与京津冀地区，年人口增量也与这些地区持平。尽管受到疫情冲击，2020 年前三季度广东金融业仍是主要行业中第一个正增长的产业，新增的社会融资和新增信贷都居全国首位。从支撑金融业发展引擎来看，对比国内三大区域，京津冀区域主导是央企和地方国企，长三角地区是外企和央企驱

动，粤港澳大湾区的主力则是以华为为代表的民企。制约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短板在于央企资源支撑不足，在“十四五”规划强调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的背景之下，这个短板显得特别突出。

第四个观点，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带来制度型开放改革的机遇

“十四五”规划要求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近期公布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主要针对央企，要求在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上取得明显成效，要充分发挥世界一流企业创建专项工程的示范引领和突破带动作用。要结合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立央地合作的良好机制，助力区域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要突出抓好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的积极作用，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深度合作，形成互为融合、共同发展的局面。可以这样理解，“十四五”规划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强调制度型开放改革，对标世界一流，完善国有经济的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和行业发展。

一个建议：大湾区各方面应该携手合作，补足短板，以金融助力央企改革，实现合作共赢

建议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沟通协商，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向中央申请成立助力央企改革发展的特色合作平台，确定平台的非国有股东身份，以专项基金手段、以战略投资者的定位，稳步参与到央企混合所有制“三

年改革”工作当中去。粤港澳大湾区国企改革合作平台将有别于专注粤港澳内部区域发展特色的传统合作平台。在这个规划里，传统平台指的是内部的或者是在国内表现突出的地方性平台，比如前海、南沙、横琴等地方性的有特色的平台，而拟建立的改革合作平台应该是跳出粤港澳内部区域，构建粤港澳整体面向全国、对接世界的平台。期待用这样一个方式，使得合作平台和现有的传统平台兼容互补、协同发展。境内外联动的金融资本，与央企合作，既有利于央企对标世界一流、提高竞争力，在全球讲好中国特色故事，也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根据专业优势和资源特色，实现不分区域的金融协同发展。

在全球讲好中国特色故事，也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根据专业优势和资源特色，实现不分区域的金融协同发展。



■ 张维春 / 中华 (澳门) 金融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执行主席兼总裁

三个“折叠”打造澳门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中华 (澳门) 金融资产交易有限公司 (MOX) 成立于 2018 年, 是澳门首家提供债券登记托管、发行上市、交易结算的金融机构。在澳门经济多元化的安排下, MOX 填补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直接融资渠道的空白。2020 年 4 月, MOX 获得澳门金融管理局的同意批复, 推出了境外国有资产的交易, 也填补了境外国有资产交易所的空白。

截至目前为止, MOX 2020 年度发行的上市债券已经达到 1,000 多亿港元。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高维度的交易所, 依据之前的研究和探索, 尝试升维超越, 形成折叠化打造平台的理念。把不同的空间内容整合到 MOX 平台上来。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在产品维度上, 体现了固定收益类产品和权益类产品的有机结合。第二, 在市场维度上, 反应出交

易金融和世界金融的有机结合。第三, 在经营理念维度上, 是金融科技和金融道德结合并重。

一、固定收益类与权益类产品的折叠

在 MOX 产品的规划上, 一直致力于综合考虑区域的法律体系、市场规模和团队的市场覆盖能力, 将这三个“饼”叠加起来找交集, 这是一创新理念。在澳门, 作为首家金融交易平台, 市场的凝聚力、预热度以及法律法规都需要各界的通力合作。我们秉持着微创新、找交集的理念, 如通常说的那样找最大公约数, 在找交集中实现我们的创新。

基于这样的理念, 要找什么样的交集呢? 简单地讲, 是希望将债券市场和境外国有资产交易的产权市场在澳门叠加起来,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 MOX 的产品体系, 是固定收益的产品和权益类产品的折叠。MOX 的产品体系既可以由债券市场变换到境外国有资产的产权市场, 同时反过来也可以由产权市场变换到债券市场, 实现升维超越, 这样产品的维度显然比原来这两个产品都高。直线折叠就变成二维, 平面经过折叠就变成三维, 产品也是通过折叠实现升维。

2019 年, MOX 成功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债发行、澳门国际银行金融债发行, 以及大湾区的华发集团的企业债发行, 同时也对在澳门发行上市一些政策性银行、金融机构的债券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探索。这都是基于两个产品体系及维度的折叠带来的活力。

二、交易金融与世界金融的折叠

什么是交易金融? 世界金融? 其实这也是 MOX 的价值观念。既然是交易所, 肯定是要围绕交易、围绕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做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交易金融就是要尽快地在澳门形成活跃的二级债券市场, 这也是 MOX 的近期发展目标。积极引导全球各地, 尤其是粤港澳大

湾区的发行人到澳门来发行境外债券, 把澳门债券市场不断做大做强。同时, 积极探索与国际国内交易所联合, 以双挂牌、多挂牌的方式, 比如一手抓住卢森堡证券交易所、泛欧证券交易所, 另一手抓住 CCDC 中央结算公司以及内地的一些交易平台, 如深交所等, 实现了对接内地、对标国际的产品交易, 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正因为这种对接内地、对标国际的交易结构, 我们的交易金融理念也具备了世界金融的视角, 形成了交易金融和世界金融的折叠。这大大提升了 MOX 在债券市场、产权市场的竞争力, 也提升了 MOX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因此, 从方方面面来说, 这种安排实际上既符合澳门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需要, 更符合澳门作为链接内地与国际的“桥头堡”的布局 and 安排。

三、坚持金融科技和金融道德的折叠

谈起金融科技, 简而言之, 就是线下和线上的有机结合, 这也是 MOX 金融科技努力的方向。保证任何一个操作都具备线上的流程, 例如债券发行上市、登记托管、交易结算等, 我们在综合金融交易平台上实现了全流程线上操作, 这就是金融科技的力量。

金融道德的力量。如何把金融道德的理念和金融科技的理想结合起来形成我们的发展理念呢? 金融道德其实就是金融伦理, 一直秉持着多赢、双赢的原则。开展利他的模式, 希望通过平台的发展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金融道德其实就是金融伦理, 一直秉持着多赢、双赢的原则。开展利他的模式, 希望通过平台的发展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不仅仅关注 MOX 自身的发展。希望通过 MOX 的平台, 能够让各类型的参与者都能有所获益。因此, 在设计流程、规则和指导方针时, 坚决不玩零和游戏, 这是 MOX 始终秉承和坚持的金融道德理念, 并贯彻到行动中。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MOX 所创造的是一个集规范性、普惠性、正义性、高效性为一体的经营模式。

从金融科技的力量到金融道德的力量, 恰好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高度一致。实际上 MOX 从成立到现在, 谋求的是前三四年把基础打好, 目的是让这个平台可持续发展。

以上介绍的这三个折叠, 目的就是让 MOX 升维, 成为一个多维度的交易所, 而非平面单体的交易所。多维的交易所, 在面临商业竞争时, 才有可能降维打击, 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 展望一下未来。MOX 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成国际化的新型债券与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依托金融科技的力量、金融道德的力量, 向着国际化、规范化、定制化的方向不断前进。事实上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市场上标准化的产品已经变成传统金融的范畴了, MOX 一定要向定制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市场日新月异的投融资需求, 要求我们有定制化、规范化、国际化的交易平台, 并成长为利他金融服务的交易平台。我们既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也不会放弃当前标准化的传统工具, 比如探索标准化的资产证券化交易等业务的开展。

澳门政府 2021 年的施政报告已经发布, 明确提出要发展现代金融业, 加快建设澳门债券市场。长久以来, MOX 也是基于澳门政府的发展理念而不断地努力, 与相关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学习, 以期提升业务能力, 更好地打造澳门债券市场和境外国有产权市场。MOX 将继续积极推动澳门金融发展和经济适度多元化, 形成以债券市场为切入点的资本市场错位竞争、互补共生格局, 服务于国家战略, 服务于湾区建设。



■ 赵晓宇 /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亚洲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副行长

人才流动为大湾区建设注入活力

人力资源是各项经济要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国内有很多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优秀人才，他们中的一部分回国后选择落地香港，这其中有很多精英为我们所熟悉，像投资界的刘二飞、张利平，还有港交所的李小加等。他们都是留学之后回到香港成长起来的优秀国人投资家和证券界管理人员。同时也有一部分留学人才回国后选择落地内地，其中大多数同样成长为内地相关专业的精英，但也有一些人由于不适应内地的法律和社会环境，没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

这种不适应我也曾亲身感受。我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 5 年时间，刚到任时，我想把中国的发展理念带过去，最后不但以失败告终，反而我被亚洲开发银行改变了。

回到国内进入国家开发银行后，我又想把在亚洲开发银行学到的一些发展理念和国际开放性金融管理方式也带回来，可是由于水土不服根本实施不了。

所以我认为人才的流动、人才库的建立非常重要。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部门与行业协会应该坐在一起探讨一下，看看如何能从行业管理方式上进行突破，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让人才真正流动起来。比如日本的人才体制，就像是一个旋转门，体制内、体制外能互相转一转，不断地成长。

希望未来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人才的流动，开启改革创新，打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一流的湾区。



IFF 圆桌会议 全球碳定价机制

陈云贤： 通过建立碳金融体系促进中国经济双循环	94	库尔特·范登德： 欧盟碳市场简介	98
阿兰·奎内： 碳市场价格与碳税，孰优孰劣	95	李俊峰： 关于碳市场、碳定价若干问题的思考	100
张希良： 中国碳定价机制发展与国际合作展望	96	亚代尔·特纳： 英国碳市场简介	102
汤姆·豪斯： 碳定价在全球的实施情况	97		

■ 陈云贤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成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

通过建立碳金融体系 促进中国经济双循环

习近平主席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对此，我主要讲以下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方式。碳排放权的交易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定价由市场决定；一级市场中，政府在配置碳排放权的过程中可以参照如下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平均成本定价法：即各个区域政府在保持各碳排放主体收支平衡的情况下，采取尽可能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定价方式。

第二种方法是二部定价法，由两种要素构成定价体系。一个是与碳排放量无关的按月或按年支付的基本费用，二是按照碳排放量支付的从量费，这两个要素形成二部定价法。

第三种方法是负荷定价法，根据不同时间段和不同时期的需要，制定不同的价格。碳排放量高峰时收费最高，碳排放量最低时收费最低。

在确定参照一级市场碳排放权交易的三类方法过程当中，真正确定碳排放权定价的对象不仅包括了公共部门产生的碳排放量，还应包括私人部门产生的碳排放量。碳排放权定价的目的不仅在于有效遏制以二氧化碳为主的六种有害气体的排放量，更重要的是可以确保社会民众安居乐业的生活水准和生态环境。

二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目标。先来回溯一下历史。2011 年中国确立了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深圳、湖北、重庆、福建等地作为开展碳排放权的交易试点，到现在为止分为三个阶段：

2014 年-2016 年，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前期准备阶段；2016 年-2019 年，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阶段；



2019 年以后，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高速运转阶段。

截至 2020 年 8 月，试点省市的碳市场共覆盖了钢铁、电力、水泥等 20 多个行业。近 3000 家的企业，累计成交量超过 4 亿吨，累计成交额超过 90 亿元人民币，有效地推动了试点省市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下一步应该如何来推动相关工作的进程，也就是说如何实现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力争达到峰值，2060 年努力争取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除了如何确立生态补偿体系、如何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健全碳金融市场体系。在碳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过程当中，中国首先应该要全面提出建立统一的国内碳现货市场；第二，要同步创设碳期货交易所；第三，应该要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

例如，国家刚批准广州成立期货交易所，建议广州期货交易所应立足碳期货交易，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来抢占碳交易市场的话语权。这里就涉及到碳期货交易所如何来完善碳排放标准和基础交易机制的问题，也涉及到如何来合理设置交易标准及其交易机制的运转问题，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中国只有健全了碳现货市场、创设了碳期货市场、制定了碳排放标准和碳交易的标准、健全了碳资产财产权的保护法、制定了碳市场的国家和国际监管准则，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才能有效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2030 年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 阿兰·奎内 / 法国碳定价委员会主席、法国国家铁路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

碳市场价格与碳税，孰优孰劣

首先需要了解碳定价与碳管控的区别。如果仅依赖碳管控，即只设定限额，没有价格和交易机制，将无法保障得到最优结果。而碳定价发出了一个信号，促使经济、社会、公共部门和利害关系方改变行为方式和投资方式。碳定价有两种可行的方案，一种是碳税，另一种是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ETS)，价格取决于排放的限额。教科书对此的解释非常简短，如果能获得关于价格、数量以及配额等非常完善的信息，那么选择碳税还是 ETS 差别不大，因为两者通过定价或定量都可达成环境和经济效益。

当然，碳税和 ETS 两者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有两点。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完善的信息很难掌握，尤其是减排成本相关的信息。因此，当边际减排成本的不确定性较高时，使用碳税的效率会更高。根据马丁·魏茨曼的观点，碳税能够给边际减排成本规定上限。另一点主要差异更为实际，即还需要关注不同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是分散碳排放，比如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建立 ETS 显然更为复杂，这个时候国家会选择碳税；而就点源排放而言，建立 ETS 会较为容易。

直接用 ETS 取代碳税是不可行的，因为在选择 ETS 和碳税机制时面临的都是纷繁复杂、各不相同的情况。在设计不同政策计划的时候，无论是 ETS 还是碳税，要格外注意分别进行正确的考量，例如考虑计划的适用范围、税率、时间范围、收入再分配等，且应尽可能详细具体。

欧洲建立了一个巨大的 ETS 市场，覆盖 45% 的排放量，主要是发电厂和其他主要行业的设备设施。欧洲选择 ETS 有三个主要考量：一是借鉴了美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ETS 的一些成功实践案例；二是出于一些政治考量，需要为各国所接受——ETS 比起碳税有更高的接受度，它有一些免费的配额，一些产业及相关的设备设施也可不受限制。第三，在欧盟，设立 ETS 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碳税则需要全体一致同意，因此 ETS 会是一个相对容易的方案。

就欧洲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有众多定价计划。首先是针对发电厂基于拍卖的 ETS，成员国会将这项收入用于绿色支出。其次，ETS 同样覆盖大型工业设施，但这一项并不是基于拍卖，而是会有免费的配额。第三，欧洲还有非 ETS 领域，占据欧洲经济的 50%，这些领域

有时候会有国家碳税，有时候没有任何价格信号，也没有碳税。

实际上，现在也有一些碳定价计划正在审议过程中，今后还会有相关提案。首先是关于长期投资的价格信号稳定性问题，如何进行 ETS 的基本定价。其次还需要考虑再分配的问题，因为存在政治接受度、促进价格信号的稳定、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偿等考量。第三是如何扩大 ETS 的覆盖范围，尤其是需要覆盖涉及分散排放的领域。

有两种主要的 ETS 改革可协助这一过程。目前的 ETS 处于下游位置，可以将 ETS 向上游移动，将碳排放加入价值链中；二是要注意到相关收入的再分配。

最后一点是要思考如何在国家间建立更好的 ETS 联系。当然，为了达成这一点有很多值得做的工作，比如改善各国在机制上的设计，以及各国标准上的统一等。



■ 张希良 /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中国碳定价机制发展与 国际合作展望

中国的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覆盖了多个行业，尤其是一些能源密集型行业，全国总碳排放的 72% 左右被纳入到交易体系管理。2020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两个重要政策文件，对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进入交易运行阶段意义重大。

第二，对全国碳市场覆盖的主要行业（发电、建材、钢铁、有色、石化、化工、造纸）企业，开展了碳排放数据报告和核查。

第三，注册和交易系统建设方面，也有一些进展。据我观察，这个体系到 2021 年上半年，就可大致建设完成。所以，全国碳市场预期从 2021 年下半年开始在发电行业进行实际的交易运行。

第四，全国碳市场立法工作也有新的进展。国务院的全国碳市场管理条例有望在 2021 年发布，为全国碳

市场的健康运行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国家领导人对推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非常重视。韩正副总理在 2020 年 10 月 13 日视察生态环境部时，也强调要加快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设。对实现低碳能源转型和 2060 年碳中和目标而言，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是非常关键的政策抓手。要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能源系统需要颠覆性的变革，从目前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转变到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全国碳市场应该有一个底价，在“十四五”期间，碳价水平应该不低于 50 元/吨。此外，国际合作对碳定价机制形成十分重要。第一点，需要克服障碍，完成《巴黎协定》下的市场机制的碳盘，尽早达成国际协议。第二点，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能力。希望中国和欧盟可以携手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能力，推进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第三点，应该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消除全球碳市场建设中的数据透明度与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矛盾。



■ 汤姆·豪斯 / 国际能源署能源环境部部长

碳定价 在全球的实施情况

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省份或地区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状态、适用范围和发展均存在差异。在 ETS 领域很难突然出现重大的变革，因此大部分国家的 ETS 都是渐进式发展的，中国在此方面的发展很积极，北美地区也有一定进展。

加拿大建立了各种 ETS 机制，既有联邦层面的，也有各省层面的。这些机制都在不断发展，并且与北美各国都有所联系。美国地区也有很多 ETS 机制，多数是州层面的，比如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现在越来越多的州已加入其中；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与加拿大的碳交易机制有对接，限额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降低。同样，在北美的墨西哥也有自己的 ETS 机制。

然而，目前的碳交易都是区域性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推广到更多领域。这是为达成气候变化目标实施的政策工具之一，将为各国达成《巴黎协定》中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发挥巨大作用，需要有互动，同时在财政、经济或管理等众多领域补充相应措施。

世界银行针对世界各地碳定价以及 ETS 的情况做了统计，其中非常清晰地体现出碳定价另一有趣的现象。

这些机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各不相同，因而不同国家或各省碳定价的适用范围不同，税率和收入不同，形成了一个很清晰的区间。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理想的情况下是全世界的 ETS 能使用一套价格标准，但在实际中或许并不可行——无论是适用范围还是价格都需要渐进式的发展，并出台一些激励措施帮助最终实现减排目标。

无论是长期还是中期，无论是 ETS 还是碳税，碳定价的不同政策工具，都能够在各领域发挥作用。就短期而言，ETS 可发挥中间协调作用，如提供激励措施，减少化石燃料或低能效发电厂的使用，还可以为消费提供短期的价格信号，为政府提高直接收入。中期，ETS 能够带来资本市场的变化，推动低能效、高污染设施和资产的提早退役和改造，为投资提供中期的价格信号，确保低碳激励措施的落实。

国际能源署认为，这样的横向政策可以推动世界减排，同时也非常愿意与各国合作，让相关的政策更易理解和操作。同时，国际能源署也在帮助很多国家开发自己的 ETS，比如与清华大学合作，与泰国、南非也有合作，也在准备出版覆盖全球 ETS 的书籍，推广成功经验。



■ 库尔特·范登德 / OECD 税收政策管理中心税收与环境小组组长

欧盟碳市场简介

碳定价现在发展势头强劲，世界各地都有生动的案例。在此主要介绍一下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ETS) 的实践。

欧盟的 ETS 覆盖了 45% 的碳排放，主要包括发电厂以及工业；欧盟层面还有一个“责任分担决定”，涵盖建筑、交通和农业领域，占据欧盟 50% 以上的碳排放，各成员国根据自身情况设定具体目标。这是欧盟政策工具的大体情况。

欧盟 ETS 工具中“有效碳价”的概念，针对的是 23 个同时也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的欧盟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有效碳价是根据 ETS 的碳交易以及碳税体现的碳价信号得出的，同时还包括了燃油消费税，因为燃油税的基础与碳税类似或可转化为碳税。从广义的碳定价和有效碳价角度来看，道路运输领域的价格高昂，这并不是因为 ETS 和碳税，而是由燃油消费税导致的。

碳排放交易主要在工业和发电厂发挥作用，这些领域碳价信号主要来自 ETS。但这些领域存在门槛，因为 ETS 没有覆盖这些领域的方方面面。欧盟目前在审阅所有与碳定价相关的立法，包括 ETS 和《能源税指令》，也在考虑联合国的有关提案，比如碳边境调整。

欧盟在研究碳税或碳交易如何影响价格和排放问题时，应该全盘考虑，如讨论是否需要将 ETS 扩展到道路运输、居民建筑和商业建筑领域等。纵观欧盟 ETS 的价格走势，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价格都会有所波动。为了保证市场的流动性，自 2018 年市场稳定储备有所减少，这不是稳定价格的工具，而是市场流动性工具。自从引入这个工具以后，碳价有明显的上升，新冠肺炎爆发期间有暂时下降，之后价格再次回升。这就是欧盟 ETS 的运作机制。

2018 年和 2019 年由于市场稳定储备的下降，欧盟的碳价从 6 欧元涨到 25 欧元，碳排放因此减少 9%。2012 年至 2018 年，英国的碳价从 7 欧元大致增长到 36 欧元，碳排放下降 70%。可以看出如果价格提高 10% 左右，碳排放将会有明显下降。由此说明，ETS 的确起到了降低碳排放的作用。OECD 开展了经济方面的研究，显示从长远来看，欧盟 ETS 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不会减少工作岗位。这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提供的 ETS 有效的证据。

总结欧盟 ETS 自 2019 年以来的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稳定储备支持价格发现机制，其本身并不会导致价格的波动。碳价每吨增长 10% 左右，碳排放量降低 9%。电力行业出现了转变，从使用碳转变为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为了进一步减排，还需更高的价格和排污权拍卖，各行业需要引入并实施更多机制，同时兼顾政策考量。

展望未来，欧盟是否需要扩大 ETS 的基础，还是专注于电力和工业？究其本质，ETS 是主要的政策工具，还是一种配套支持方案？例如加州就有其他的政策工具，ETS 只发挥辅助作用。市场稳定储备是很好的工具，同时也可考虑设定碳的价格下限，确保长期的投资价格信号稳定。另外，免费额度是否需要逐步取消？这个问题可与碳边境税调整联系起来。

最后是收入的分配和使用。ETS 不再是一种边缘化的政策工具，已发展为如今的气候变化工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碳排放，意味着 ETS 已经进入了主流的宏观政策制定过程，这是个很大的成就。有人提出，ETS 的收入可用于欧盟现在的恢复方案。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暂且不论，但可以体现出，现在的 ETS 并非仅仅是气候变化的工具，而已经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 李俊峰 /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关于碳市场、碳定价若干问题的思考

碳市场和碳定价应该注意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要十分小心碳市场建立的难度。因为碳产品和任何一个产品都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商品而是无形的，是计算出来的。对它的设计需要一种精美的市场设计，才能体现出其魅力。无论是用定价还是碳税，都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的市场规则、严格的标准，或者严格的监管，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配额、核证、监测，甚至政府行为。碳市场建立的关键取决于政府的决心，如果政府没有决心这个市场就没了。比如，当年澳大利亚政府很有决心做碳市场，并且通过了议会立法，但随着该政府破产，议会马上把法律废除，然后其碳市场就没有了。对此我们必须十分小心。

第二，要十分小心判断或是预测碳的价格，尤其是

碳定价。在 2013 年 -2015 年，当时有包括清洁发展机制 (CDM) 在内三种减排机制，大部分专家彼时认为全球的碳减排成本大概是 100 美元 / 吨。但是当清洁发展机制 (CDM) 进入市场后，大概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把市场冲垮了。最早的时候有二三十美元、三五十美元一吨不同的产品，由于减排成本不同，可以有不同的价格出现在市场上。另外，就是技术的不断进步。2005 年的时候，太阳能发一度电 55 美分，算到一吨碳大概 300 美元，现在是 1.5 或 2 美分，是原来价格的 1/30，现在换算每吨碳的成本为 20 美元。判断未来碳价格的时候不可忽略时代进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给全球的碳统一定价时，就更要小心。

第三，全球的碳市场设计。如果是统一的商品，在全

球市场，大家相信会有一个统一的价格。但碳商品因为在每一个国家情况不同，它的定价不同，要制定一个全球的价格非常困难。拿中国和英国比较，最近几年来英国的减排主要是发电燃料的改变，从碳变成可再生能源了。中国和美国比较，天然气发电成本，以人民币计算，在美国差不多是 0.5 元 / 立方米，在中国是 3.6 元 / 立方米，大概高出 7 倍来。同样一个产品，在中国减排用天然气发电的时候，价格差不多是美国 5 到 7 倍。用统一的价格来衡量全球碳产品，特别是建立统一的全球碳市场时，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一些特别的技术，即使价格一样，由于自然条件不同，成本也不同。比如说在江苏做光伏发电和在青海做光伏发电，碳的减排成本也完全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一个全球的碳市场，使用全球统一的碳定价，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用比较学术式的方式做出一个价格时，它很难赢得市场的认同。它不像黄金、石油，不会因为地理变动而变动。由于碳产生的背景和环境不同，产品和性质都不一样。

第四，正确地评价碳市场作用。经合组织 (OECD) 讲到欧盟的减排到 23%，ETS 减了 23%，这个数字是不是全都是 ETS 的作用呢？如果没有 ETS 是不是这样子呢？各国的减排应该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减排八九年后的碳排放到了顶点，减排的效率几乎一样。碳市场出现在 2003 年，2004 年才有真正的碳市场，2009 年 -2016 年的时候碳减排的效率几乎一模一样。中国有四个省市三个省，总共 7 个地方做了碳市场减排机制安排。这七个省市和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呢？比如说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减排有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一定要仔细分析，是否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忽略了其他机制。中国在建立碳市场时，还要考虑能源的双控和环境的保护，不能强迫以气代煤、以电代煤，这种减排都不是通过碳交易造成的，但它的减排力度也很大。

大家争论碳定价和碳税有什么区别？我认为这两个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在原有的系统外，额外给企业增加了成本，形成了新收入。对这个收入大家都在想，钱一旦收上来怎么花？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稳定的经济系统，无论通过税收还是定价方式，将额外收益拿到政府面前来，政府怎么样花这一笔钱，是一定要小心的，更要关注那笔钱应不应再收。要考虑到这一部分，在中国没有碳价格的时候，制定能源价格的时候，能源是稀缺资源，要考虑到节能环保和碳排因素。比如说中国的油价，当全球的油价低于平均 40 美元一桶的时候，中国的油价就不会降低了，理由是为了促进节能减排，这价格里面就

首先要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然后才能用市场经济机制进行减排。

已考虑了节能减排的因素了。当在碳定价和碳税里面额外收一笔钱的时候，这些因素要不要剔除？怎么样剔除？在现有的系统里面，无论是碳税还是碳定价，涵盖各种各样的因素之后，用什么样的剔除法？会有广泛的争论。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尤其要把它放在全球的视角来看。

第五，2007 年欧盟帮助中国做碳市场的时候，欧盟在那个时候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到现在也依然如此。但又说中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减排，这个道理何在？首先要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然后才能用市场经济机制进行减排。如果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怎样用市场经济机制进行减排？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所以，希望欧洲朋友利用机会，尽快推动中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



■ 亚代尔·特纳 / 能源转型委员会 (ETC) 主席

英国碳市场简介

自 2005 年起，英国就参与了欧盟成员国组成的碳交易机制。2005 至 2008 年，碳交易的价格为每吨 25-30 欧元，但是由于 2008 至 2009 年的金融危机，价格跌至每吨 5-10 欧元，并且持续到了 2018 年。2019 年，碳交易价格回升至每吨 25-30 欧元。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相较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各国针对新冠肺炎采取了相应措施，避免碳交易价格大幅下降，目前依然是每吨 25-30 欧元。以上价格适用于能源行业以及工业。但需注意的是，工业可享受免费的碳排放配额，因此碳交易价格对工业的影响不大。

英国的碳定价有两个关键要素。除了加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ETS) 以外，英国还建立了一个价格支持系统。该系统是一种补充税收，自 2013 年起实施，价格为每吨 16 英镑或 18 欧元，涵盖了电力制造商，但不适用于工业。它的收取方式如下：如果欧盟 ETS 当时的价格为每吨 8 欧元，那么电力制造商还需支付另一项 10 欧元的税款，即总价为每吨 18 欧元，这是固定的下限。除了这两个系统之外，还有一些针对柴油和汽油的隐性碳价格，费用比较高。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实际的价格

会非常高，超过每吨 100 欧元。

目前，英国没有针对住房供暖天然气的使用来征税。这对于欧盟 ETS 还有碳支持体系针对电力的征税可能产生反效果的激励。住房供暖的电力消费者实际上支付了一定的碳价，而使用甲烷天然气的消费者并没有支付碳价，这也就是说有不正当动机的买家。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国、英国还是其他各国，农业领域对于甲烷、氮气等天然气的排放没有具体的规定，而这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就是目前的发展状态以及影响。欧盟 ETS 的碳价为每吨 5-10 欧元，可以说直到近期影响都非常有限，特别是工业还有免费的碳排放配额。我们要意识到，欧盟 ETS 并不是欧洲电力行业去碳化的主要推动力。真正的动力是对可再生能源的直接支持及其量化目标，首先是能源补助以及拍卖系统中固定价格。

但是在英国，定价机制的价格下限明显有更大的作用。价格下限不是太阳能或风能发展的动力，但是却极大地推动了煤电发电到天然气使用的转变。如果某一系统内有很大的载煤量或载气量，并且还有一些额外的容量，然后以每吨 18 英镑的价格（或 23 欧元、25 美元）引入碳定价，那么系统就会大规模地从煤炭发电转为天然气发电。

过去七年中英国煤炭发电逐年减少，在发电总量的比例中仅占个位数，英国最后的煤炭发电厂也将于 2023 年关停。发电行业的碳强度从 500 克减少到 200 克每千瓦时。有些电脑或手机应用可以实时显示英国的碳强度，比如本小时的数据显示，发电行业的碳强度是 127 克每千瓦时：39% 来自于风能，20% 来源于核能，19% 来源于天然气，8% 来源于生物发电，煤炭则为 0。这就是 ETS 和价格支持系统带来的影响。

从这些实践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首先，各体系的组合使用是有必要的，既能考虑到定量目标可能带来的波动，也能考虑到最低的价格以及碳税的实施。我们需要确保价格不会跌破某一水平，从而推动决策制定。如果企业认为在五年之内会因经济萧条等原因导致价格大幅下降，他们便不会强烈响应政策。

其次，价格的水平至关重要。碳排放每 25 美元的

价格可推动煤炭到天然气的转变，而如果价格在每吨 25 美元以下，工业领域就不会实施大规模去碳化。如果想要实现钢铁行业的去碳化，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要达到 17-18 美元。从技术上来讲，钢铁行业的去碳化已经有明确的实现路径，现在只需要合适的碳价推动企业做出去碳化的决定。

展望未来，英国计划于 2050 年实现零排放，2035 年实现电力行业大规模减排，工业减排，以及最重要的居民供暖减排，这将是实现去碳化道路上艰难的一步，同样也是成本高昂的一步。近期发布了一份相关报告，认为现在需要实施更高、更普适的碳价，并以碳税的形式来实施。2025 年，碳税的价格应为 50 磅，即 65-70 美元，2030 年再进一步提高至 75 或 100 美元，届时可

在各个经济领域内推广。报告还表示应取消工业领域的免费排放配额。但需注意的是，如果英国取消工业的免费配额，而其他国家不征收类似的碳税，那么欧盟需要考虑实施碳边境税调整，以避免碳泄漏的发生。

为了确保发出的信号强有力，并且能触及各个行业的各个方面，碳价这样的机制很有必要。注重碳价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政策工具。比如，英国计划 2030 年前建造 40 千兆瓦的海上风能体系，主要推动力并非是碳价，而是拍卖体系。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 20 倍，相当于在中国建立 800 千兆瓦的风能体系。同样，英国将在 2030 年前禁止内燃机的销售，其主要的推动力也不是柴油和汽油税。



中美合作与未来对话会

■ 时 间：2020年11月21日20:00-21:00
■ 主 持 人：
钮小鹏，国际金融论坛（IFF）理事、美国史带战略伙伴集团CEO
■ 对话嘉宾：
朱光耀，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
克雷格·艾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主持人：美国新一任总统就任前两个月的交接时期内，中美两国关系方面会发生什么？未来两年内，即新一任美国总统就任到中期选举的这段时间内，中美关系又会走向何方？

克雷格·艾伦：这两个月里相信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对美国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控制疫情。我接下来的一些思考和观点都是基于这个大背景，因为这次全球性事件对美国人民已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政治上，美国在疫情期间成功完成了总统大选。选民热情高涨，1.59亿人参加投票。约瑟夫·拜登当选为新一任美国总统，美国会开启一个新的发展篇章。然而，在他就任前的这段时间将会经历一些动荡和波折。比如，11月20日，美国国务院与中国台湾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对话。近期，美国与其在中国南海地区的盟友国共同宣布了关于该地区非法捕捞问题的决定；此外，还针对美国公民对中国各类机构的投资做出了一些声明，颁发了行政命令。预计未来两个月，美国政府将持续出台更多政策和倡议，政局会出现一些动荡。

此后，拜登总统任命的新一届政府官员陆续上任，审查梳理目前的政策体系，可能会经历一段风平浪静的时期。预计2021年春末或夏初，在战略、政治及经济领域，目前动荡的中美关系就会逐渐走向平稳。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双方政府相向而行，展现出政治意愿，才能扭转中美关系版的不利局面，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我对两国关系的短期发展持悲观的态度，但经过中期的努力和巩固，长期而言仍然是非常乐观的。谢谢！

主持人：谢谢。朱部长，您认为中国在未来两个月会如何应对美国政府的种种做法？未来两年，中国会如何与美国相处，会主动抛出橄榄枝吗？

朱光耀：未来两个月将会是美国政治的过渡期。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自身发展，这是我们的底线，也代表所有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该通过专业方式，构建对话和沟通的桥梁，尊重彼此，达成互利共赢的结果。

未来两个月将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应该恢复对话协商，尽最大的努力扩大共识，并在此过程中重建互信。

过去的几个月对于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而言就是一场灾难，两国的互信遭到破坏，不仅对于我们两个国家，乃至对全世界而言都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中美关系回到正轨非常重要。

但是我有信心，因为美国有艾伦大使这样的人和专业的团队，也表现出了积极合作的意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合作是中美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坚信，中美两国人民一定能够发挥各自的智慧，维持和提升两国关系，为两国利益以及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谢谢！

IFF 夜话 中美合作与未来对话会

朱光耀

克雷格·艾伦

钮小鹏



主持人：非常感谢朱部长。结合过去四年的发展来看，请问二位，在未来的两个月内，中美两国是否能建立足够的沟通渠道？

克雷格·艾伦：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中美关系在许多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拜登总统就任后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与特朗普总统就任时完全不同，地缘政治的因素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造成了非常现实的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在某些问题上对立的立场，都不容忽视，这种紧张局势会继续存在，必须妥善解决。

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美国国会经常会就中美关系发表一些声明和观点，目前国会内有至少 477 个法律草案，都是有关美国在华商业活动的。这些法律会牵制总统的行动，从而使中美之间的实质性对话难以为继。因此，中美会重回奥巴马、小布什或者克林顿时期的频繁对话的舆论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但这也不代表我很悲观，因为新一届政府非常务实，能做实事；他们不是理想派，也没有改变中国的想法。但是他们清晰地认识到，两国必须在国际关系的不同领域公平竞争，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实质在未来也将越发明显。

两国在全球共同关注的领域有合作的空间，包括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未来可能会出现其他大流行病。而且我也希望，两国能就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积极开展讨论及磋商，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都是非常好

的例子。但我认为，磋商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磋商，也要认识到其中的竞争性。美国非常乐意在尊重规则并且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与中国竞争。未来的对话肯定和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不一样，但这会带来更多的稳定性，采取更文明现代的方式，为两国营造更好的商业环境。谢谢！

朱光耀：是的。很多基本的问题需要中美两国之间的协作，包括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不扩散、数字经济等。目前中美两国以及其他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控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中国非常愿意和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此方面开展合作，也非常希望美国能够重回世卫组织。

在双边关系方面，中美急需重回正常的沟通渠道。我记得奥巴马总统于 2008 年末当选，彼时中美之间已经有了小布什政府所建立的战略经济对话。奥巴马总统表示，会充分尊重小布什政府的决定，但同时也要及时沟通，为加强未来的合作而努力。谢谢！

主持人：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也就是最近热议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全世界都会肯定，该贸易协议是过去四年中美关系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美国政府在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协议是否会实现平稳顺利的权力过渡转移？未来，我们是否可以期待第二阶段或者进一步协议的诞生？

克雷格·艾伦：在民主党以及拜登总统的团队中，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有一些政策的审查正在进行中。我同意朱部长的说法，中美关系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中，而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定可以成为一个建立信心和信任的基础。

这个协议的内涵非常丰富。美国农业经济方面，现在商品价格非常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协议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技术及农业方面做到了真正的经济市场开放。这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美国企业都很有帮助，是一个双赢协议。

该协议为期 2 年，持续到 2021 年末，希望双方政府能够充分落实协议内容。本协议到期后，双方将建立新框架或新协议；现在的时机很好，正好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个新的框架，解决关税问题。额外的关税不应成为两国贸易往来的阻碍，我们需要消除关税，和中国市场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扩大外资企业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谈判，但是我对有信心。谢谢！

主持人：朱部长，请您回应一下艾伦大使的最后一个观点，您认为在未来一年内，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协议实施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呢？



朱光耀：第一阶段的协议确实是双方互信的基础。尽管新冠病毒全球肆虐，中美两国仍然非常努力地落实这个协议。额外的关税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不符合多边协定的框架，损害了中美两国消费者的利益，希望双方团队共同合作，尽快取消关税。同时，双方也需要共同思考和探讨，中美两国如何在世贸组织的新框架下开展协作。谢谢！

主持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近期终于正式签署，主要覆盖亚太地区，该协定未来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以中国为首的国际贸易体系可谓是冉冉升起的后起之秀，这种“中国模式”是否会成为其他区域经济协定的范本，并最终替代当前的世贸组织？是否会有一个协定最终能够同时容纳中国和美国，比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又会对美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克雷格·艾伦：经济体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仅事关一个地区，同时也事关世界经济全局，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很多人并没有对该协定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不对的。RCEP 的签署具有深刻意义，是一个结构性的协定。未来的 20 年，该协议的影响也许还不能充分显现，但到了那时，亚太地区的联系必将更加紧密。

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曾为此努力了很多年。2020 年 5 月，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时，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对于加入 CPTPP，中方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这对于中国 and 全世界而言都是有益的。同时，如果新一届的拜登政府考虑这种可能性，这会是一个 2-3 年的长期计划，在政治上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关于世贸组织，我不赞成美国政府阻碍世贸组织总干事任命的做法；但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世贸组织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生物科技、网络、媒体及数据领域，这些都是世贸组织 25 年前成立时还未出现的问题。这也会激发中国国内的讨论，比如对国企的补贴，政府及执政党在经济当中发挥的作用，技术领域的政策等。

此外，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朱部长。中国提出

两国在全球共同关注的领域有合作的空间，包括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其他大流行病。

的“双循环”发展政策，与世贸组织原则的关系是怎样的？是否符合中国对世贸组织做出的承诺？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和世贸组织间存在着一些矛盾悬而未决，而中国必须履行承诺。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活跃时期，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未来转型的方向是什么？未来 10-15 年内可持续的框架是什么样的？是否可以让中美两国和平共处，实现共同繁荣？这些都是非常艰难的命题，但也是现在就要面对的问题。

主持人：朱部长，您亲历了 WTO、RCEP 和 TPP 的制定，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朱光耀：首先，我想更正一下，RCEP 最早是由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发起的。2012 年，东盟发起了这项倡议，并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加入，因此也叫 10+6 谈判。经过 8 年的艰苦谈判，RCEP 协定终于成功签署。这项协定的签署不仅是自由贸易政策的一次胜利，也是多边主义的一次胜利。虽然印度于 2019 年 11 月退出了本协定，但是我们十五个成员国仍然欢迎印度日后加入。

这是一份高层次、高质量的协定，涉及的领域很广。根据该协定，90% 的商品将达到零关税，这是一个重大进展。我们真诚地希望该协定能够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与 WTO 的规则相适应。

2020 年 11 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 CPTPP，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指示。中国团队将落实习主席的指示，立即开始政策咨询，与其他成员国开展讨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于各方面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要求，正如你刚才提到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治、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是建立创新型社会的重要方面，此类高标准协定将促进中国进行改革，

有利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双循环”发展理念，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方面，中国各省间仍存在商品及服务流通壁垒，因此中国应该深化结构性改革，形成一个巨大的国内统一市场，服务 14 亿中国人民。这将推动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形势接轨，有力促进经济发展。

近几个月来，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甚至利用政府力量对华为等中国民营企业发起攻击。很多人认为中美会因此“脱钩”；但是，经济界、学界及科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和美国应该紧密交流合作。假设某一方失控，在当今核技术普及的时代，后果将不堪设想。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都应该加强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增强互信。虽然任重道远，但这将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主持人：关于朱部长提到的双循环，美国商界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中国走向内循环，或者说中国经济选择“自立自强”的道路。艾伦大使，您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克雷格·艾伦：双循环是一个重要贡献。“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一个关键主题就是扩大内需，提高消费质量，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减少对出口或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扩大内需，使中国的消费者能够从国内消费中受益，那么中国国内消费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世贸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进口的产品和国内生产的产品，必须得到同等对待。在实施双循环及“自立自强”政策的背景下，中国是否还能遵守这一规则？刚才朱部长提到出口控制以及科技方面的问题，我想中美双方应该可以达成共识——世贸组织应该管控好商品和服务贸易，并尽自己所能管控数据贸易。

同时，两国政府也应该更加明确国家安全的定义。目前，双方都在不断扩大国家安全的范围，除了通信以外，还包括半导体、量子技术、生物科技等。国家安全领域占国内生产总值将从 5% 逐渐上升至 15%，甚至 20%。贸易和投资需要资本和数据流通，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可取，需要引起重视。

但是，我对于中国在保护用户隐私和网络安全的做法上还是有些担忧，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确保相关法规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既能允许数据自由流通，又能保护个人隐私和关键网络安全基础设施；要确保市场高效运转，而不能让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影响和干涉消费者的选

择。我们要谨慎使用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并且双方的国家安全范围应该对等。

朱光耀：关于艾伦大使提到的投资和贸易问题、数据自由流通的重要性，以及网络安全的问题，我都很赞同。我们要区分国家安全和保护主义，不能将国家安全作为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的借口。

具体来看，中美应尽快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我们为推进双边协定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目前，还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比如数据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受疫情影响，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远程服务发展突飞猛进，数据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核心问题就是数据自由流动、数据隐私以及数据安全。此外，还要推动数据相关国际标准的建设。

因此，中美两国的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如果两国同意重启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数据也将是必须要讨论的问题。我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和足够的智慧来解决相关问题。我希望艾伦大使带领美中贸易委员会在这些重要议题上开展工作，我作为中方也会同样尽力推动这方面的进展。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非常重要，中国希望在下一个五年规划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建立健全的数字经济体系将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中美贸易战前，两国合作非常融洽。我希望两国关系能重回正轨，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及相关法律法规做出贡献。谢谢！

主持人：感谢两位的精彩见解。艾伦大使，我们刚才提到了贸易战，美国的商界过去四年间一直担心中美两国贸易和科技战升级为金融、货币甚至资本战争。在拜登总统上任之后，您认为形势将如何变化？

克雷格·艾伦：双边的贸易差是客观存在的，投资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回顾历史，美国、欧洲、德国、英国、荷兰、日本、韩国等国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共同点：一旦有一方取得出口主导地位，就会造成巨大的贸易逆差。每当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就会扩大投资，雇佣更多美国人生产商品，以这种结构性的方法减少贸易赤字。中美关系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一过程，除非算上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鉴于美国没有采取这种做法，那么投资就显得很重要了。

双边外交关系上的紧张局势还未波及金融业。2020 年应该是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最多的一年；同样，美国企业也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大量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放缓，但是组合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股票和债券指数品种越来越丰富，外国投资者也越发关注中国，很多投资者在中国取得了丰厚的回报。但相比组合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更加重要，因为这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投资。

根据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在金融领域实施了结构性改革，很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企业都获得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将促进中国的市场竞争，对于中国市场而言大有裨益。

我对中国的金融业很有信心，但我很担心外商直接投资问题，以及通过自然市场机制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我希望看到更多中国企业在美国经济不发达地区投资，使用美国的劳动力和零部件，创造就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从政治的角度解决不可持续的贸易失衡问题。

新一届美国总统上任之后，希望中美经贸关系出现转机，经济市场能够战胜不理性和意识形态斗争；摒弃国家安全方面过多的担忧，采取开放、透明、法治的方法，进一步合作，博采众长，吸取好的企业和好的技术。谢谢！

主持人：朱部长，中国经济将为美国金融服务企业提供什么样的待遇？中国是否将继续大胆推进金融领域开放？

朱光耀：这一领域非常重要，需要双方加强沟通，多学习彼此的先进经验。双边直接投资非常有建设性，符合两国的根本和核心利益，能为企业家带来收益，也能增强两国企业的信心，因此，我们要对直接投资保持开放心态。

同时，我们也要谨慎解决企业家在投资中面临的问题。比如，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投资抱有不确定性担忧，但中国现在已经做出承诺，要做到开诚布公，并与国际标准接轨。

我也赞同外国直接投资比组合投资更为重要这一观点。外国直接投资是长期的合作和投资，能够产生税收，创造就业，改善市场及营商环境；而组合投资是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健康的市场框架和政策监管。比如，中国的十年债券收益率是 3.3%，跟美国同类债券相比高得多，相差了 250 个基点。

有舆论认为中国企业是一种威胁，对此我感到很遗



憾，这不是美国企业应该持有的态度。开放市场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则之一，希望美方能够转变思想，进一步发展国际金融市场。

主持人：在今天的对话结束前，我想谈谈我的观点。莫里斯·格林伯格曾经提到：“今天我们经常用‘战争’这个词来概括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但即使在二战时期，中美两国仍进行了合作。所以，现在我们讨论中美贸易战的同时，要记住中美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我想邀请两位嘉宾做最后的总结发言。请问大使，在拜登总统就任后，中美关系将有哪些变与不变？

克雷格·艾伦：拜登总统就任后，会继续执行特朗普时期的大多数政策。其中，地缘政治因素很复杂，不会在短时期之内产生重大的变化；中美两国在技术领域会继续对立。

但是，两国关系基调中的冲突会减少，将会在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上增强合作。拜登政府任命的官员大多都是实干派，他们会从现实角度考虑两国的

切实利益。因此，未来的中美关系也会更加稳定，更有预测性。

中国正在迅速发展，最近签署的 RCEP 也体现了中国的积极作为。习近平主席也提到加入 CPTPP，指明了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方向。未来十年，中美切实合作将会是双方关系中的重要一步，我真诚希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能够为此做出贡献。

主持人：朱部长，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会有哪些变化，哪些不变？

朱光耀：我想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避免冲突对抗；第二，避免互相攻击；第三，互相尊重；第四，共赢合作。“共赢”对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非常有利。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们都清楚对话的重要性，这也是国际金融论坛坚定的信念。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谢谢！

注：本次 IFF 对话于 2020 年 11 月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7 届全球年会期间举行，为美国新任总统约瑟夫·拜登当选前夕。

IFF 峰会 资本市场峰会 全球资本市场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李纪珠： 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112	宋敏： 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开放与发展	122
祝宪： 后疫情时期，危机中蕴含生机	114	张慎峰： 注册制改革善作善成，久久为功	124
马丁·谢克： 疫情催化的资本市场的转变	116	周诚君： 为全球的投资者进一步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提供便利	126
焦津洪： 健全完善中国特色证券执法体制， 营造良好资本市场生态	118	李鸣钟： 通过注册制改革建立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	128
李梅： 关于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新使命、新要求 的看法	120		

■ 李纪珠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

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一、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脱钩

不论 2008 年金融海啸或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各国政府都实行了大量货币宽松政策，但目前看来量化宽松政策 (QE) 主要都是流入资本市场 (如股票、债券、房地产市场等)，因此金融资产价格高涨，但实体经济却未有明显成长，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明显脱钩。以美国股市为例，美股目前的市值占美国 GDP 比重高达 140%，创历史新高。此外，美股的本溢比也高达 27.3 倍，这是自 2000 年科技泡沫以来的最高。

二、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愿承担更大的风险以获取报酬

由于 (1) 实体经济并没有显著复苏 (2) 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并没有出现股市泡沫 (3) 存款放在银行的利率偏低，所以大量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以赚取资本利润。同时更多的资金流向新兴市场或高收益债 (信用等级较差) 以赚取报酬。因此，高收益债与政府公债的信用利差大幅缩减。

三、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资本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2020 年 9 月，中国上海与深圳股票市场的总市值高



达 73.5 万亿人民币，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预计未来其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1. 中国对外股市、汇市、债市的持续开放，以及对内积极进行的股市、汇市、债市改革；
2. 中美经贸战使许多优质中国企业回归 A 股或港股，丰富了中国资本市场内的投资目标 (商品)；
3. 港股与 A 股的联结日益加深，由于沪港通、深港通的开通，作为吸纳大量海外资金的港股，有更多的资金与 A 股进行联结；
4.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 (MSCI) 正式将 A 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目前 A 股与港股的总和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权重已高达 41%，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外资资金流入 A 股和港股。

四、全球资本市场 (股票) 商品结构有明显改变

1.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被动型基金快速崛起，2019 年底全球 ETF 资产规模已突破 6 万亿美元，2020 年可望达到 7 万亿美元，而根据美国银行估计，2030 年 ETF 或将达到 50 万亿美元。
2. 资本市场股价指数呈 K 型成长，即科技股的涨势与一般景气循环股 (例如能源、金融股) 成长趋势不一致。近几年科技股的股价涨势非常快，但是景气循环股因受到低经济成长、低利率、低油价的影响，则没有太多的成长。

3. 重视 ESG 的公司，其股价日益受到重视。随着全球越来越关注公司治理、环境保护与永续经营，2019 年美国以 ESG 为投资主轴的基金与 ETF 共吸引 206 亿美元资金，是 2018 年的四倍。此外，高 ESG 评分的公司，通常受大环境负面影响程度较小，有助于股市的稳定及良性循环。
4. 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股市及债市去赚取资本利润，金融股市及债市商品零碎化趋势愈加明显。

五、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增加

货币宽松 (QE) 带来资本市场价格上涨，但实体经济并未随之成长，因此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泡沫化的疑虑一直存在，造成投资者信心不足的局面。大量被动式的电子设定交易，也使不利信息一旦出现就会形成股市的大幅波动。

六、资本市场中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上扬，但实体经济却未同步成长，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不但破坏社会稳定，也不利于未来实体经济的发展

目前全球财富排名前 1% 的富人掌控着超过 50% 的股票及共同基金，因此当金融市场价格大幅上扬时，实体经济成长缓慢，失业率仍处于相对高点，长此以往将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



■ 祝宪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新开发银行 (NDB) 副行长

后疫情时期，危机中蕴含生机

当前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应该和十多年前金融危机遇到的情况有所不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国际经济面临新的挑战，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遇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应对不确定性的同时，政府、企业 and 市场都在积极寻求新的机会，使资本市场不至于走向崩溃；并寻找更多的可能，在中长期阶段恢复到过去的有序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在各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恐怕大概率的不确定性就是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可能面临“两低一高”的趋势。两低就是低增长、低利率，一高就是高债务杠杆。

面对疫情的冲击，各国政府大多是通过大规模财政赤字维系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行。一方面经济活动的收缩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另一方面为了维系就业和社会稳定，财政开支大幅度增加，各国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0 年全球公共债务可能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全球 GDP 的近 100%。

与应对 10 年前金融危机开出的药方不同，多边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并不认为，主要经济体应该马上执行严格的财经纪律控制债务率的上升。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大幅度降低了政府的融资成本，经济增速反弹后也有助于债务率的下

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2025 年后全球债务率会稳步下降。

各个主要经济体在债务上升的情况下，保持宽松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水平成为必然选择，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经济体在如此之高的公共债务之下，还得以生存下去的重要原因。目前全球市场较大规模的国债交易是零利率或者是负利率。其结果是：一方面极低的利率使公共债务付息率下降，降低了财政开支中的付息开支；另一方面极低利率也降低了政府为赤字进行新融资的成本。

就主要经济体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仍然是主旋律，目前全球经济恢复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此情况下，全球利率水平在今后一段时间恐怕仍将维持低位。全球经济潜在增长下降、增长动力不足、收入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以及产业结构等长期结构性因素也成为全球低利率的重要原因。

就企业而言，在需求方面盈利下降、应急需求增加，使企业对信贷的需求增多，企业急需贷款维持经营；在供给方面，美联储和主要经济体央行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成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具体表现在：一是兼并收购、回购与鼓励支付等需求让位于流动性需求；二是投资级和非投资级债券发行均有上升；三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比如能源、耐用消

费品及餐饮、住宿等服务业获得较高比例的融资；四是中小型企业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救助。虽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缓解了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帮助企业筹集资金和降低借贷成本，但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平等获益，大公司在公开市场上较容易获得资金，中小企业则缺乏同样的渠道。

虽然目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资本市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但也应该看到，在危机中仍然有发展的机遇。因为疫情必将逐步得到控制，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将为新兴经济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为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机会。

抗击疫情为疫情后实行更加绿色、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首先，从资金来源方面看，虽然应对疫情导致债务负担增加，但低利率在相当程度上也缓解了企业和政府的付息压力。其次，最近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透露，国际社会包括各类主要债权人都积极探讨如何面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还债计划。因此，只要谋划得当，在妥善安排抗击疫情和人们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前提下，适当超前投资于未来的一些可持续发展项目，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智能复苏、绿色复苏起到事半功倍、化危为机的作用。

现在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紧密相连。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交通、通讯领域外，新基建成为

现在遇到的是历史罕见的新情况，但危机是危险与机遇共存，如果疫情得到基本的控制，资本市场向好的局面一定会出现。

投资的重点。例如数字基础设施，疫情期间数字化使居家办公学习成为全球新模式，保证了很多企业实现持续正常运转，也保证了学生在网上继续学业，数字化手段协助公共部门提供关键服务，这些情况在疫情之后可能成为常态。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绿色发展，在全球对气候变化热切关注的背景下，绿色发展将是今后各方逐渐形成的共识。核心部门、核心利益催生新的投资和进行债券、股权投资的新机会，绿色经济在今后的数年内将助力改善环境，同时起到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率的作用。

总之，现在遇到的是历史罕见的新情况，但危机是危险与机遇共存，如果疫情得到基本的控制，资本市场向好的局面一定会出现。



■ 马丁·谢克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CEO

疫情催化的 资本市场的转变



对当前债务资本市场的观察及从中得到的教训

流动性和市场准入是重中之重。2020 年 3-4 月初，全球资本市场经受巨大压力，风险资产价格骤跌，一级市场受到极大冲击，二级市场也遭受挑战，以低级投资为代表的数个领域出现流动性问题。此外，不寻常的一点是，美国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也出现了流动性短缺的问题。

在本次疫情最严重的时刻，公司债券市场的电子交易停摆，交易者不得不通过电话进行交易操作，然而市场价格波动大，流动性差，交易商难以提供所有电子平台上的价格。对于银行和企业而言，流动性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疫情期间，衍生产品市场的边际成本进一步恶化了这些机构的流动性状况，致使出现大量套现的现象。同样，在循环信用贷款、对冲基金、商业票据等市场也遇到了挑战。

欧盟的回购市场在疫情期间表现良好，对缓解当下

的局势以及抵押评估等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如交易失败增加了 5 倍，日内流动性问题。这些现象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警醒，必须清晰地认识公司债券市场的架构和运作方式，以及流动性的真正来源。尤其是现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也应更好地发挥资本的作用，利用资本实现市场平衡。

疫情期间，各国央行采取了很多干预措施，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购买了大量债券，助力恢复企业信心、维持市场运作。央行还采取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并且首次协调了财政和货币两方面的政策，这是比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进步的地方。从长期来看，低利率和充足的流动性会造成市场过于依赖央行的干预政策，进而造成市场泡沫等问题。

央行干预之后，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逐步恢复有序运行，一级市场开始出现一些高等级的信用产品，银行的资本结构、新兴市场等领域也慢慢开始恢复，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资本市场可以继续承担起资本中介功能，把资本导入实体经济。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切都得益于央行的干预，而非银行的金融措施，银行的韧性到底如何，还有待观察和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世界范围内迅速发生的三大转变

第一大转变就是工作方式。自 3 月起，疫情使很多人在家工作，使用 ZOOM 这类新技术和网络平台办公，很多活动也转移至线上，这一点在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实际上，线上办公的效果比想象中好得多，资本市场的交易等功能都能够正常运作，这在一年前难以想象。

即便结束了防疫封锁，回归正常生活后，我们的工作模式可能仍会发生永久性的变化。员工将被允许一定比例的时间在家办公，形成新的线上线下工作的混合模式。对实体经济而言，需要妥善解决合规性等方面出现

的新问题；未来数年，也应该考虑金融枢纽以及交通系统等与房地产相关的实体建设问题。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减持房地产，对于银行等机构而言可以降低成本，欧洲的银行还因此提高了利润。这种新型工作模式也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例如员工长期独处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关注。

第二个大转变是可持续性。债券市场为实体经济吸引了大量资金，而疫情的爆发也让更多投资者注意到可持续领域的债券。2019 年，社会债券仅有 170 亿美元的发行量，而 2020 年发行量已经超过 1000 亿美元。目前，疫情主题债券发展迅速，因为市场有融资需求——经济停滞、失业、医疗资源短缺、医疗研发资金短缺，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此类债券的增长。这些社会债券的发行解决了部分资金问题，未来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比如欧盟委员会在其就业恢复计划中，已经发行了 310 亿的欧元债券。

另外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就是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在疫情高峰时出现了一些波动，当时有观点认为绿色债券市场会因此受到阻碍。但现在来看，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疫情之下，很多计划和项目包括政府重建经济计划，都在探讨和实践中纳入了环保和绿色金融，绿色债券在发行和销售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

以前 ESG 倾向于关注环境问题，现在涵盖的议题更广泛，因而总体的议题更加均衡，由政府主导推动的 ESG 议题不断涌现，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在此过

程中，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将得以进一步完善。

在可持续债券发展过程中激发出许多创新。企业不仅开始关注绿色领域，推出绿色项目并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而且开始向这个方向转型，使整体业务和活动都向碳中和这个目标转型。

绿色债券在疫情高峰时出现了一些波动，当时有观点认为绿色债券市场会因此受到阻碍。

此外，未来我们也许会看到债券市场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挂钩，比如为债券背后的企业活动设置可持续发展相关指标，如果没有完成指标，则进行处罚。提高企业进行业务转型的能力，让更多的公司参与到转型中来，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个转变是金融科技的应用。监管科技、绿色科技等技术在一二级市场、二级市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本次疫情中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种转变同样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未来或将简化资本市场的运作流程，甚至整体颠覆资本市场原有的运作模式，不再需要中介参与。



■ 焦津洪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

健全完善中国特色证券执法体制，营造良好资本市场生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已经突破了 4000 家，总市值约 76.3 万亿，中国的股票债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位，投资者人数超过 1.7 亿，拥有全世界最活跃的自然人投资群体。

2020 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等重大考验，中国证监会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领导下，着力加强疫情防控，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效发挥了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以注册制为龙头，全面深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和关键制度创新。按照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项原则，推动形成了从科创板到创业板再到全市场的“三步走”改革布局，一揽子推动板块改革、基础制度改革和证监会自身的改革，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二是持续扩大、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2020 年上半年提前开放行业机构外资股比的限制，目前已经有一家外商独资证券公司，八家外商独资的期货公司，和一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相继在华获批设立。完善创新试点境内红筹企业上市安排，推动 A 股在明晟、富时和标普道琼斯等国际知名指数的纳入比例稳步提升，沪深港通机制持续优化，沪伦通、中日 ETF 互通运行顺利，增强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兴趣和信心，外资持股比重不断提高。原油期货、铁矿石、PTA 等期货相继引入境外投资者，纸浆期货成为中国首个通过结算价授权“走出去”的期货品种，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和全球定价的影响力稳步上升。

三是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新《证券法》于 2020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完成了第二次审议，目前正在准备提请第三次审议（注《刑



法修正案（十一）》已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期货法立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望进行第一次审议，推动最高法院出台证券集体诉讼司法解释，加快修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司法解释。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并将持续对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格局产生复杂深刻的影响。中国证监会将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坚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不断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国证监会将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力争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推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执法体制，显著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进一步畅通投资者权利救济渠道，明显改善资本市场秩序。在中长期，推动建成更加科学完

备的法律体系，更加健全的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执法体制，促进证券执法司法透明度、规范性和公信力显著提升，形成崇法守信、规范透明、开放包容的良好资本市场的生态。

一是完善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责任制度体系，继续配合立法机关加快《刑法》修改和《期货法》的立法工作。贯彻实施新《证券法》，抓紧推动制定《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等配套制度，加快推动以“声明退出”为主要特征的证券集体诉讼落地实施，畅通投资者民事救济渠道。

二是构建有利于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体制机制。落实金融委第 36 次会议的要求，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形成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的合力。同时，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共同研究加强协调配合，提升证券执法司法的专门化和专业化水平。

三是强化重大证券违法犯罪案件的惩治和重点领域的执法。对证券违法活动持续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施策，综合运用行政处罚、市场禁入、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等行政手段，与刑事追责、民事赔偿等共同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追责机制。

四是深入开展跨境监管和执法合作，中国证监会对于财务造假等严重破坏市场诚信的违法违规行为，一直坚持“零容忍”的原则，对于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始终强调不管在何地上市，都应当严格遵守相关市场的法律和规则，

真实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监会目前已与 65 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于 2007 年签署了《国际证监会组织多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在双边、多边框架下认真履行跨境执法合作义务，2020 年以来共办理境外协查请求 149 件（含香港），为境外监管机构执法提供了有效协助。中国证监会将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探索更有效的合作方式，研究建立打击跨境证券违法犯罪的执法联盟，以实现更加紧密、更为有效的跨境执法合作。

五是加强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增设诚信建设的专门条款，并通过建立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记录，实施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等方式，完善参与资本市场的诚信条件、义务和责任，发挥协同监管“组合拳”的威力，形成各方共建、共享、共治的资本市场诚信格局。

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巨大影响，需要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国际合作，特别是证券监管合作。当前，中国证监会正在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境外资本市场拥有成熟、丰富的经验，在许多方面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证监会将不断加强与境外监管机构、国际金融组织的广泛合作，携手共进，共同努力，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 李梅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于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新使命、新要求看法

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共同关注和探讨的话题。党中央确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我根据会议的安排谈三点想法：

一、固本培元，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建设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重视，加快金融改革、完善市场制度、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随着这些政策逐步落地，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以及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将不断得到提升。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明确提出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制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全面加强市场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主要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把好入口，稳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2020 年中国 A 股市场克服疫情的影响，在注册制政策的带动下，A 股上市公司发行数量和募资规模大幅增长，总市值稳居全球第二。市场快速扩容的同时也出现了个别上市公司治理失效、内控缺失、大股东违规担保等问题。注册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建立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是保证注册制顺利实行和持续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根本保障。

二是管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前资本市场运行整体稳定，但部分上市公司股票质押还存在风险，如偿付能力下降、债务暴雷时有发生。受国际疫情持续蔓延的冲击，全球各类资产剧烈波动的风险不容忽视，这也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需要考量的一个要素。增加市场包容性、融资便利性的同时，必须不断建立、健全资本市场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制度和机制，形成有效资本市场风险管理的联防、联控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三是畅通出口，加大困境公司重整处治力度。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常态化退市机制。优者上、劣者退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应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优势，加大困境公司纾困力度。通过



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增量化解存量风险，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支持退市公司通过破产重组、重新上市，以低效资产转化为高效资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双向发动、推动金融业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指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应着重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稳定预期，推进金融业稳步扩大对外开放。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从未停止过努力提升中国金融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应用的范围。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化受阻，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动，对此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稳步推进中国金融业在更高水平上对外开放。在市场准入、经营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提供开放、包容、充分竞争的金融环境，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

二是相互促进，推动金融业的双向开放。坚持引进来、走出去，一方面我们要持续吸引更多的境外企业参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积极主动地为其提供多种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要大力支持国内金融企业走出去，通过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服务走出去的中国实体企业，不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加强监管，维护好对外开放的金融安全。推动金融业开放的过程中，可能遇到金融资产受到跨境冲击大幅度波动的风险。这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国际金融治理能力，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不断创新金融科技手段，严格防范跨境监管套利和跨境资金流动导致的交叉传染风险。中国现在实行的双循环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是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有力措施和基础，也是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和证监会努力推动的方向。

三、结合银河金控实际、发挥银河金控作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5 年前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出资共同成立了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自成立之日就肩负起积极探索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的历史使命，目前银河金控合并总资产超过 4000 多亿，净资

中国现在实行的双循环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是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有力措施和基础，也是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和证监会努力推动的方向。

产达到 1000 亿，从业人员近万人。旗下主要公司有：中国银河证券、中国银河资产、中国银河基金、银河投资等金融平台，服务网络覆盖全国、延伸海外。2020 年 11 月 1 日《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办法》的施行，对金控公司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银河金控作为有担当的中央金融企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其能够做实、做大、做强主要依靠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银河金控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要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充分发挥牌照优势，利用各类金融工具为实体企业提供“募投管退”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积极服务于民营企业、产业整合和降杠杆，努力提高其专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积极为受到疫情短期影响或经营面临困难的企业恢复经营提供服务。

二是进一步支持资本市场发展。银河金控着力打造投资 + 投行的经营模式，在为企业提供优质投行服务的同时，重点通过股权投资、上市公司纾困、违约债券处置、上市公司破产重组等方式解决市场短板问题，助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三是进一步化解金融风险。银河金控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公司和金融风险缓释功能，通过参与金融不良资产收购处置，积极服务于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积极服务于大中型企业的风险化解，落实好中央关于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战略部署。

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中国银河金控将进一步加强与广州的合作，为支持广东金融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 宋敏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新发展格局下的 金融开放与发展

中央反复提到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到底是什么？我理解的新发展格局是指一系列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其中促进消费、内需驱动等理念已经提了很多年。近些年来我们强调供给侧改革，是因为国内供给无法满足内需，特别是一些高端、高质量的需求。2020 年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为了促进生产和消费在中国经济中能够更好地循环，就是把内需驱动战略和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迫使我们对于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产业链和供应链经常发生断链、缺链，需要补链。这是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一个新课题。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区域协调。中央提出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其本质就是区域协调政策，也是从区域的角度形成国内的大循环。

再谈一谈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2020 年 10 月 25 日，王岐山副主席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式发表致辞，指出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并提出了新发展格局。按传统的说法外循环就是贸易和投资，现在所谓新外循环还包括了生产要素的外循环，即资本的外循环。另外就是劳动力的循环，在全球市场特别是中国和外国经济交往中，劳动力的循环还比较薄弱。虽然在海外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但把国际顶尖人才吸引到中国来的人才大循环尚未形成。

数据的双循环，也是当前重大的问题之一。数据的主权问题、国家之间数据流动还是一个新课题。现在中美从贸易摩擦变为科技战，这给金融技术创新交流带来了一些阻碍。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情况下拓宽和其他国家，比如中欧、东盟、日本、韩国的技术交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课题。

制度和规则在双循环中非常重要。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制度和规则方面，特别是在国际范畴的制度和规则方面，需要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些就是我所理解的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是大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并且只有在在大国才可以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小国是做不到的。在当前国际和社会背景下提出新发展格局，是要寻找我们发展的内生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外部环境和时局的变化也是这次提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原因。中美战略冲突带来了国家安全问题，以往金融界主要从效率、开放或金融风险的角度探讨发展，很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谈。国家安全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和差别是什么？金融开放会有风险，普通风险是有概率的，可以通过概率进行风险管控。而国家安全具有不确定性，无法被量化，其概率很难估算。有国家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是否要重新思考金融开放，是否要谨慎地开放？国家之间冲突激化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有战争的风险。那么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安全，放弃金融开放吗？开放

就会遭受更大的外部冲击吗？我认为恰恰相反。在有国家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应该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而且是双向、深层次、大领域的开放。因为金融开放可以帮助我们吸引国际资本，吸引全球投资者来投资，这实际上减小了我们与这些投资国家发生战争的风险或者说国家安全风险。换言之就是金融开放的风险对冲了国家安全的风险。

以往我们提及开放的风险，特别是引进国外资本的风险，通常是担心所谓的热钱流入会冲击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我认为其实可以有很多方案应对这些热钱的风险，比如增强汇率的灵活性、发展风险管理的工具，很多衍生产品也可以帮助我们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对付热钱的手段还有通过资本增值税或加大交易税，减少热钱流入；通过加大对短期离境的离境税，阻止热钱的流出。房地产泡沫或者其他产业泡沫的风险，可以在非常时刻，采用非常手段，比如行政干预。亚洲金融危机时，马来西亚就曾使用行政干预手段阻断热钱流出，大大减轻了其遭受的打击。综上所述，从经济的角度我们有办法对付热钱风险，但是却比较难以对付国家安全的的不确定性。

金融格局的开放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比如公司在全球上市，还有货币国际化。我个人认为，在全球安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少提人民币的国际化，多提货币数字化。FACEBOOK 也在做数字货币，想排斥人民币，我们正好相反，我们不排除美元，把美元也囊括在数字货币中，我们拥抱所有主要货币。

刚才我讲了对外开放的金融，但其实更大的一块是国内大循环，因为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目前，我们的金融体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特别是在国内大循环方面。

一方面是发展促进消费的金融服务。当前的金融体系主要是为生产、流通服务的，可以加大消费的贷款，发展为消费者服务的金融，从而增加非劳动收入。同时还可以发展保险，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此外，就是普惠金融或者是共享金融，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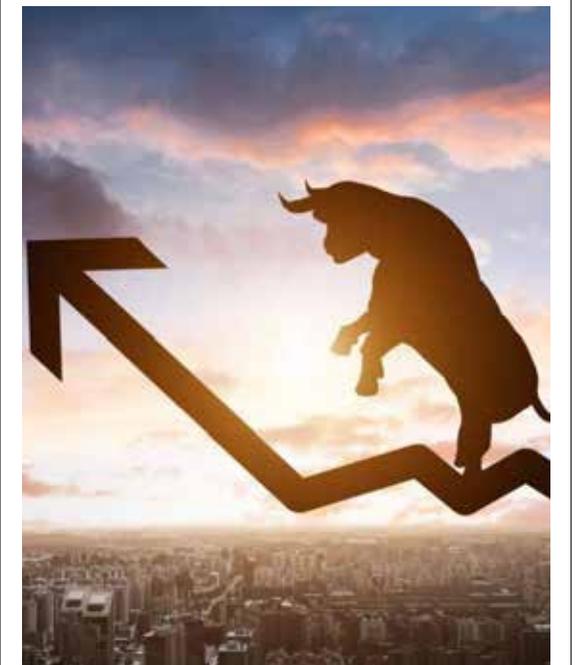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就是推动供给侧的金融服务，这也是国内大循环的要求。为了发展创新金融，金融体系需要有更好的创新服务，以间接融资、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系对创新的推动是不够的，资本市场正好是推动创新的一个服务体系。

中美战略冲突中，很多问题就出现在产业链和供应链断链、缺链的情况下，怎样通过金融手段补链，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大力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可以让我们的国内大循环做得更好。

最后就是协调发展，我讲了国内大循环区域之间的大协调，现在的金融服务，包括城市群的建设、各个区域一体化等等做的还不够，这需要政府发挥推动作用。例如，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可以由地方政府引领和支持发展基金，以及地方性、政策性银行等。

以上就是我对新发展格局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的一些想法。

因为金融开放可以帮助我们吸引国际资本，吸引全球投资者来投资，这实际上减小了我们与这些投资国家发生战争的风险或者说国家安全风险。



■ 张慎峰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注册制改革 善作善成、久久为功



30 年前我国证券交易所横空出世，在资本市场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5-2007 年股权分置改革成为第二个里程碑，最近一年注册制改革和推广当之无愧成为第三个里程碑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得到证明。

注册制改革抓住了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在资本市场制度体系中，发行制度无疑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与交易制度、再融资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持续监管制度、退市制度相比，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注册制改革实施一年多来成效巨大，注册制改革进一步提升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包容性以及竞争力。股东超 200 人、同股不同权等情况不被旧的制度所包容，出走海外的上市公司市值达到十几万亿，现在这些问题在注册制下得到妥善解决。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 14 家微盈利企业、一家特殊股权结构企业以及两家红筹企业成功上市，制度包容性的增强决定了制度竞争力的提升，长远来看注册制将会大大提升资本市场作为经济发展晴雨表功能的准确性。

注册制改革使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更加完备。注册

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审核注册公开透明，企业从受理申请到完成注册平均用时五个多月，效率大幅度提高。实施注册制以来，科创板和创业板新增上市公司 200 多家，合计募集资金 3300 多亿，占同期 A 股市场一半以上，新增市值约 4 万亿元。不久的将来，注册制的实施与推广将大大改善我国直接融资比例长期偏低的状态。

注册制改革大大提升了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伴随着一批标杆性企业越来越多地上市，加速形成了品牌示范效应，极大激励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科技领域的创业创新精神，生动诠释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便捷的发行上市机制使企业发展的行政性成本大大降低，也逐步使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失去原来的价值。从制度的协同性上来讲，与并购重组、退市等制度的配套实施，必将大大促进市场的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

认真总结注册制改革善作善成的经验，保障改革行稳致远。注册制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一项重大的改革探索，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其中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继续坚持和发扬光大。

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目标和纲领，这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在注册制改革中要始终坚持党中央确定的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目标，努力按照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原则推进市场建设，认真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要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二是坚持“四个敬畏”，科学把握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的三原则。在具体工作中坚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科学借鉴国际经验，从国情、市情实际出发设计一系列既遵循国际市场惯例、又体现中国特色的市场规则，经受住了市场实践的检验。

三是正确处理发行制度改革和其他基础制度改革间的协同关系。注册制改革不是单纯的股票发行制度改革，还涉及到承销、定价、信息披露、交易、退市、投资者

保护等一系列基础制度的优化调整，上述各环节关键制度的创新都较好地实现了协调配套。

四是辩证处理股票短期供应与上市公司长期质量的关系。既解决众多企业急于发行上市的问题，又有效防止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象，重在推动更多有发展前景的硬科技企业、创新创业企业成为市场的源头活水。注册制也更加畅通了退出渠道，逐步实现了市场出清和高水平的结构调整。

五是尊重市场运行规律，悉心把握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平衡。投融资两端协调发展，是注册制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注册制下格外重视发展资产管理业务，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程度。修订监管规则，不断优化沪深港通机制，推动国际主要指数提高 A 股纳入的比例。多方面积极引导境内外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确保在一级市场融资功能得到巨大发挥的同时，二级市场也有一个健康平稳的发展环境。

六是立足监管本位，促进市场各参与主体归位尽责。注册制使企业上市便利程度大幅度提高，中介机构承担的把优秀健康的主体推向市场的职责愈加重要，必须坚持职业操守、提升业务独立性与合规性。发行人更要从源头上规范治理，聚焦主业，在日常经营、重大投资、对外担保、再融资等方面合规运作，增强回报投资者、履行公众公司义务的意识。只有每个环节都压实责任、

注册制改革使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更加完备。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审核注册公开透明，企业从受理申请到完成注册平均用时五个多月，效率大幅度提高。

履职尽责，注册制才能形神兼备、行稳致远。

我国资本市场历经 30 年发展才推出注册制，改革成果来之不易，市场各方应该倍加珍惜，同时改革的过程也不会一蹴而就，充满着矛盾与风险。应当认真总结经验、循序渐进、善作善成，不失时机地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共同推动资本市场行稳致远，使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周诚君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为全球的投资者进一步投资 持有人民币资产提供便利

2020 年 9 月 25 日，富时罗素宣布从 2021 年 10 月起将中国债券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 (WGBI)，至此，中国债券已被国际主流三大指数全部收录。

根据最新的行情，美国政府最新发行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0.8% 左右，英国 0.24% 左右，德国 -0.6%，法国 -0.3%，而中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最近已突破 3.3%。一个国际投资者持有同样作为投资品定价基准的 10 年期国债产品，如果投资的是中国产品，收益率将是投资美国产品收益率的 4 倍，差 250 BP。所以，只要我们沿着开放的道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中国债券产品将会非常有吸引力。

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才刚刚开始，国际投资者配置还相对较低。现在 80 万亿的中国股票市场，境外投资者持有 3.8%；超过 100 万亿的债券资本市场，境外居

民投资者持有 2.4%；全球 11 万亿美金的储备投资市场，人民币产品只占 2.02%。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大国，比例应该在 20% 至 30% 之间。设想一下，假如短时间内近 200 万亿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有 20%-30% 被境外投资者持有，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全球 11 万亿美金的储备和主权财富投资市场，有 11% 的比例被境外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者持有，将会是多大的市场规模？（现在的比例是 2.02%，中国在 SDR 份额是 10.92%。）

人民币资产回报率很高、很安全，其汇率还在快速升值。中国在所有大型经济体中率先从疫情中复苏，而且复苏之力非常强劲，同时还是所有大型经济体中唯一一个保持常态化货币政策的国家，没有理由不让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感兴趣。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者，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更是一马当先。2016 年 10 月，人民币正式被纳入 IMF 特别提款权 (SDR) 中，中国所占权重为 10.92%。大量境外非居民投资者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产、率先复苏和相对稳定安全的好处。另外，大量资金从世界各地涌入中国市场，将加快中国资本市场建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实现高端跃迁。

坚定扩大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不仅关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本身，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而且将非常有力地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境外非居民投资者的构成大多是境外合格机构，当然也包括一部分高净值人群。最常用的投资方式是到中国大陆开户，如在中证、上清所交易和结算，也在这里清算，遵守中国大陆资本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接受中国证监会的监管。然而，通常只有大型机构投资者、主权财富基金类机构有意愿和兴趣，也有能力到中国大陆开户、投资和交易人民币资产。而且他们要了解中国大陆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文化和法律法规，要熟悉中国的制度，甚至必须派团队在中国处理合规、风控、交易事务，当然他们也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当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到一定程度，当中国经济增长给世界描绘的图景足够美好，当全球越来越多的非居民投资者愿意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央行、主权财富类投资者和大型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感兴趣，而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机构投资者、高净值人群，甚至个人投资者愿意投资人民币资产。当然，让中小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到中国来，在中证、上清所及各种期货交易交易所开户并不容易，因为大部分国际投资者不熟悉中国的文化和法律，也不认识中文，而且还有不小的时差。

为了更好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应想办法满足对人民币感兴趣的世界各地投资者的需求，让他们在自己所在国按照所在地的法律法规、交易结算规则、监督管理规定，放心便利地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投资者的账户可以开在当地，投资结算、清算、都遵守当地的相关法律法规，不用亲自到中国大陆来。虽然欧洲、美国与中国有很大的时差，但不用担心，因为在当地的伦交所、德交所，以及纽约、芝加哥交易所开户，就可买到人民币资产。当然这只是美好愿望，目前还不能做到。

现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更多还是让境外机构投资者到中国境内开户，相对进步一点的方法就是到香港，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委托香港的托管机构投资人民币资产。但这远远不够，就像我在很多场合一直呼吁的那样，要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推动多级托管，要让所有的合作者，不管身处何地都可以在当地的市场投资、持有、交易人民币资产。

要架构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多级人民币资产托管体系，只要每一级托管体系都有完整、明晰的财产权利法律框架，投资者就可以在当地托管，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不用考虑时差、不用考虑文化、不用考虑语言。投资者不仅能够方便在当地持有这些资产，而且能够保证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资产在当地拥有完整的法律属性，也就是说人民币资产的权利、义务、责任框架都在当地。这部分人民币资产经过托管、质押、再融资，就可以在当地形成更为广泛、更具流动性、更具市场深度的人民币市场。

人民币境外非居民投资者在其所在国，通过当地的人民币持有系统进行交易、结算、清算，至少有两个基本的需求：一是流动性管理需求。持有人民币除了用来保值增值，还要考虑从中国进口要偿付债务、还本付息。因此，需要对投资者的人民币资产进行流动性管理。二是应对汇率风险的需求。对于跟主权货币不一致的货物，人民币资产需要管理好货币错配风险，也就是所谓的汇率风险。要进行人民币外汇对冲交易，也要套期保值。

要架构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多级人民币资产托管体系，只要每一级托管体系都有完整、明晰的财产权利法律框架，投资者就可以在当地托管，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不用考虑时差、不用考虑文化、不用考虑语言。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按照当地法律在当地投资托管人民币资产之外，中央银行、监管部门都要考虑怎样为遍布全球的人民币市场提供人民币的流动性。

协助投资持有人民币的全球投资者在当地开展人民币外汇交易，对冲其持有人民币的汇率风险。仅仅靠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多级托管是无法解决的，还要广泛地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尤其是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其交易活跃能够形成均衡的人民币汇率。外汇市场是 7×24 小时不间断持续交易的。投资持有人民币，非本币资产就有对冲风险的需要，这时需要考虑为不同时区的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资产提供 7×24 小时不间断的外汇交易所需要的流动性，以及所需要的人民币平盘结算、清算等方面的基础服务。既要保证 7×24 小时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得到非常好的流动性保障，又要有效地规避外汇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出现的本金风险，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交收。进一步支持全球非居民投资者在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时能够做到欠款兑付，这需要中央银行和所有监管部门共同思考、努力和推动。

中国证监会几年前就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联合交易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国内正在跟国际上相关的对手方进行谈判，以促进我们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多级托管。但作为一名中央银行的经济学者，我还是要大声呼吁，在这方面现在要尽快做到有所行动、有所突破，尽快为全球的投资者进一步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提供更好的便利性。



■ 李鸣钟 / 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通过注册制改革建立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

2020 年是我国资本市场建立 30 周年，30 年间我国资本市场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主要指标位居世界前列，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本市场寄予厚望，要求建立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枢纽作用，为育新机、开新机夯实基础。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全面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进一步明确了“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和责任，也为深交所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结合前期市场广为关注的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工作谈三点想法。

一是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一项全面系统性的改革。

股票发行制度是资本市场最根本、最基础的制度，注册制改革是涉及监管理念、机制方式的一场深刻变化，全面性、系统性、协同性大大超过以往。在中国证监会坚强领导下，在市场各方关心支持下，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整体平稳、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形成了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注册制框架。注册制是成熟市场普遍实行的股票发行制度，但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和标准。通过创业板改革的积极探索，初步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个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一个核心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两个环节就是交易审核和证监会注册；三个市场化安排是指设立了多元发行上市条件，增强了市场的包容度和覆盖面，建立了市场化的询价、定价和配售机制，提升了定价的效率，构建了公开透明的审核机制、审核标准，进展、结果、监管措施向市场公开，审核进度、审核结果基本稳定可预期。



一个中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的安排都集中体现了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体现了国际惯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改革原则，体现了公开、透明、向民而治的工作思路。

2. 服务了一批创新、创业企业。改革后的创业板覆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业的大趋势，定位主要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深度融合。改革带来了更多的源头活水，加速推动科技与资本的融合，促进了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直接融资支持，夯实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力量。目前创业板注册制已经有 47 家企业上市，这些企业行业分布多元，既有高新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也有传统产业的行业龙头，这 47 家企业上半年平均净利润同比增长 78%，平均研发强度 4.3%，成长性、创新性特点突出。

3. 带动了一系列的关键制度创新。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不是简单的改革，而是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改革，带动了发行、承销、并购重组、退市交易、投

保人保护等一系列的改革创新，成为加快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基础制度体系的重要抓手。比如在持续监管方面，创业板在融资并购重组同步推行了注册制，优化了小额快速再融资机制，放开了重组上市的限制，提升了股权激励的灵活性。再比如退市制度方面，完善了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取消了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的环节，退市效率进一步提升。

二是注册制改革是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抓手。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对于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和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以及健全退市机制等做出了全面的部署。注册制改革带动了资本市场一系列的关键制度的创新，重构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升体系，促进了整个资本市场的机制、规则、生态持续优化完善，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推动形成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体，促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循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深交所有三个考虑：1. 把好入口关。把支持科技创新，以创新引领发展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优化发行上市的标准，增强制度包容性和覆盖面，引导各类创新资源聚集。深刻理解并把握注册制改革的三项原则，尊重注册制的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2. 严把发行上市审核关。以信息披露监管为核心，持续优化相关审核标准流程，提高审核为民的质量和针对性，从源头上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3. 畅通出口关。我们将认真抓好退市制度改革落地实施，优化、简化退市标准，严格退市监管，健全市场化的常态化退市机制，履行退市实施主体责任。同时我们也将拓宽多元化的退出渠道，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破产重整、主动退市等多种渠道实现有序退出，促进存量上市公司风险有限的出清。2020 年上市公司退市达到 11 家，这是前所未有的。

三是在提高监管质效方面聚焦建立制度的主线，不断完善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制度规则体系。全面落实公司治理专项行动，坚持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监管双轮驱动，紧盯少数关键和突出问题，推进科学监管、深耕分类监管，强化科技监管。另一方面也将深化与地方的合作，齐抓共管，持续推动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建立依法治市，对违法违规行零容忍，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深交所将以注册制改革为契机，全力建立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求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2020 年 8 月 24 日，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上，刘鹤副总理发表致辞，对深交所提出要成为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的要求，并为深交所改革发展明确了新的目标、规划了新的定位。我们将在深入总结创业板改革经验、全力保障创业板注册制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围绕着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各项部署，从构建更加适应创新资本形成的制度体系、促进资本高

按照开明、透明、廉明、严明的工作思路，加快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建设，服务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的建设。

效循环的市场体系、有利于吸引中长期资金的多元化产品体系等方面入手，按照开明、透明、廉明、严明的工作思路，加快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建设，服务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的建设。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落地运行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制度规则还需要不断地完善与优化。市场建设需要久久为功，比如说如何更好地平衡改革发展与风险的防范；如何更好地将成熟市场的经验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有机结合，深入践行注册制三项原则；如何更好地体现市场化的精神，让发行定价机制充分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如何更好地体现法治化的要求，加大违法违规的处罚力度，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等，都需要深入地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总结和完善的。

IFF 峰会 2020 丝路国际联盟 (SRIA) 大会 疫情后的“一带一路”及其绿色发展

赵晓宇： 丝路国际联盟——多边共赢的非政治平台	131	吕泽翔： 可再生能源即将迎来大爆发大发展的态势	141
珍妮·希普利： 新西兰的疫情控制和绿色发展经验分享	132	王元丰： 应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打造“一带一路”绿色标杆项目	142
马丁·阿尔维斯： 坚持多边主义，开展合作对话	134	韩升洙： 把丝绸之路变成全球绿色动力公路	144
张健： 携手推进绿色复苏和全球气候治理	136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建设绿色丝绸之路	146
王燕之： 丝路基金参与共建高质量发展的“一带一路”	138	庄巨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向绿色复苏之路	148
夏乐： 应用 AI 工具和 ESG 披露，研究“一带一路” 上市公司	140		

■ 赵晓宇 /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亚洲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副行长

丝路国际联盟—— 多边共赢的非政治平台

丝路国际联盟 (SRIA)，丝路这个概念，不是一个道路形态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合作理念的标签，是一个互通有无的形态。丝路国际联盟正在准备发起丝路联合基金，丝路国际联盟是一个多边机构，但它属于纯市场化的、私营部门的多边平台、多边金融机构。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带有很强的主权色彩，很难摆脱决策的政治色彩。丝路国际联盟没有政治色彩。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项目，单向输出的情况比较突出。过去在与世界银行打交道的时候，感觉其有些强加于人。现在来看，世界银行和多边机构强加的一些东西，也不都是坏的，有很多也让中国受益，但还是应该避免强加于人。中国的企业家“走

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和当地的未来受益群体，和当地的合作伙伴深入合作。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能够把所拥有的一些成功发展经验、投资的方式、理念，进行分享和落地。这些理念能不能落地，当然还要取决于当地的社会土壤和生态环境，不能强加于人。

未来，丝路国际联盟也会本着这样的原则，多边、共赢，以合作方利益最大化为合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一个非政府、非主权的多边平台，丝路联合基金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包括绿色和未来发展的跨境贸易、电商贸易、数字金融、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等。也期待着各方主权基金和非主权基金一起参与进来，与丝路国际联盟携手共赢。



■ 珍妮·希普利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新西兰前总理

新西兰的疫情控制和绿色发展经验分享

在疫情面前，新西兰和其他许多的经济体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但程度各不相同。各国必须停下脚步、保障民生、管控疫情，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粮食及供应链问题，新西兰农业表现良好，但由于海运及空运的问题供应链也受到了影响。目前看来，发达国家即便能够很好地应对这一场疫情，也在不同方面受到了冲击。

另一方面，新西兰旅游行业受到重创，这一点和“一带一路”周边经济体的情况类似。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旅游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方式，通过时间、文化或者是金融工具抵达彼此的身边。现在这种交流暂时中断，必须对此保持谨慎。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通过“一带一路”本倡议建立起的联系和信心，或将比预想的更加牢固和坚定。

纵观世界动态

在未来的经济复苏中，各国都应该正视多边合作的重要性。最近一段时间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积极信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签署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发挥自身领导力走到一起，共商合作与经济复苏。在全球历史中，当下时刻能够签署这样的协定，证明人们对多边主义仍有信心，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探索未来的解决方案，而非固步自封。

金融也是如此，只有各参与方建立良好的联系，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一带一路”各国需要建立双边和多边联系，强化彼此之间的纽带，同时要从政府、工业和金融等层面拓展联系的深度。

另外，2020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将继续寻找多边主义合作的机会，并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当下世界各国都踌躇不前，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履行职责方面也遇到了困难，中国所发出的信号，所体现出的领导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在后疫情时代，出于谨慎，国内经济将停滞一段时间，



先对新冠病毒带来的中期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影响做整体评估。目前，许多政府已经实施了大量刺激政策，对于国内的影响有待观察，同时经济体间是否会促成投资方面的合作也尚不明朗。各国都需要时间来评估疫情对自身的影响，并且规划短期内的未来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将来一段时间形势比较严峻，国际及双边机制都应该思考如何支持这些国家。尽管已经有部分国际机构愿意提供资金，但部分国家还是比较谨慎，没有马上接受此类援助。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当前债务水平的考虑，而且还有潜在的债务陷阱，这是一个在本次危机中可预见的问题。

区域及国际机制方面，无论是 20 国集团 (G20)、APEC 还是 RCEP，当下的重中之重不是马上行动，而是开诚布公地共同协商。在未来的重建中，各国都会需要大

量投资，就需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亚洲开发银行 (ADB) 等机构提供帮助。

绿色金融战略

投资不应该成为未来 3-5 年内的一个负担，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绿色金融。目前，无论是通过 AIIB 融资，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等双边或区域性机制，各国在此方面都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如果通过融资能创造收益，那么融资的条件不仅会考虑利润，也会和社会及全球效益挂钩。在过去 20 年里，金融行业最为看重的就是投资的金钱收益；而现在，整个行业需要确定的是各方面效益优先级的顺序。要想实现减排和碳中和的中期目标，显然需要对优先级做出调整，考虑如何将绿色金融战略加入其中。

此外，丝路国际联盟 (SRIA) 参与举办的“全球绿色金融创新奖”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获奖项目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创新不仅和“一带一路”相

目前，新西兰已经实现全国 85% 的清洁能源发电，并朝着最后的 15% 努力。在兼顾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同时，政府也在思考如何从中期收益的角度决策，否则就会落后于其他国家。

关，更应该在全世界推广，从而推动政策、融资等各方面的转变。同样，社会应该敦促企业高层履行职责，响应时代号召和国家战略，为经济发展和实现目标做出更多贡献。

这些工作无疑是艰巨的。更多人应该采取行动，而非流于纸上谈兵，从政策层面进而实现全球的转变。

目前，新西兰已经实现全国 85% 的清洁能源发电，并朝着最后的 15% 努力。在兼顾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同时，政府也在思考如何从中期收益的角度决策，否则就会落后于其他国家。这对于新西兰和新西兰所在的区域，都有所裨益，同时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 马丁·阿尔维斯 / 乌拉圭驻广州总领事

坚持多边主义， 开展合作对话



乌拉圭是拉美地区抗疫表现最好的一个国家，这并非偶然。相较而言，乌拉圭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政府实施了医疗相关政策，因此控制疫情难度不大。然而，由于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差异，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此次疫情期间，国家民主制度以及各方面的体系都面临了一些压力，而且拉美地区在过去的历史中向来是一个动荡不断的地区。2021 年，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会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洲开发银行都对此持乐观态度。尽管各国恢复的速度和程度各不相同，总体而言，各国都会扭转目前 GDP 负增长的局面。2020 年，乌拉圭的 GDP 增长 0.24%，预计在 2021 年增速将回升至 3%。

多边主义是 21 世纪的基石。各国要坚定支持世卫组

织所扮演的角色，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包括做好面临第二波疫情的准备，以及未来可能爆发的其他流行病。

每一个世纪都会有大流行疾病，新冠肺炎疫情绝不是人类最后一次健康卫生危机。过去的大流行疾病往往只会在一个区域蔓延，因为地区间缺乏交通联络的渠道；然而，本次疫情的爆发见证了史上第一次人类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增强了各国互联互通，致使病毒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我们需要齐心协力，通过多边合作，发挥世卫组织、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作用，帮助各个经济体重建和恢复，其中也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中国对于“全球化”这一理念的理解。乌拉圭于 2018 年加入该倡议，拉美地区的其他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这些多边机制可以加强各个不同地区的合作，团结力量、解决危机、重振经济。

2021 年，乌拉圭要加强自身政治及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增强金融市场的韧性，更好地应对变化和适应现在的新形势。同样，多边机构也是如此，但是由于这些组织自身的体量，转变和适应或许没有那么快。乌拉圭和其他拉美国家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成员国，这些机构成立时间较短，架构相对比较简单，相信能在此次危机过程中更快适应。此外，乌拉圭还要进一步完善贸易、投资健康、卫生等领域的政策，通过世贸组织、经合组织、金融机构以及最近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加强与国际接轨。

在本次危机的背景下，我们不时听到逆全球化的声音，但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不可阻挡的。目前的全球化没能让每一个人从中受益，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打造更加民主包容的全球化体系。同样，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多边合作和国际协商，各国通过多边平台表达自己的诉求、促进合作，让生活变得更好、贸易更加地顺畅。推进全球深度的融合，也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其他重要议程。

这次疫情已经展示了人类脆弱的一面，并且抹消了此前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对人类而言，开展对话、扭转局面才是明智之举。各国政府不仅要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向区域内邻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乃至帮助世界各地。

所有国家都应该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应当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本次疫情，不能够固步自封，把自己孤立起来，必须通力合作。

现在疫苗正在研发阶段，实现全民接种尚需时日。对现在而言，最好的疫苗就是戴好口罩。乌拉圭也在严格实施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尽可能恢复正常生活、重启经济、降低失业率、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疫苗上市，应该主动采取行动去控制病毒，并且适应这种新常态。

因此，所有国家都应该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应当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本次疫情，不能够固步自封，把自己孤立起来，必须通力合作。



■ 张健 /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携手推进 绿色复苏和全球气候治理



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就“一带一路”和绿色复苏这两个主题，交流一下我的观点和想法。

第一，携手实现更高质量的复苏

2020 年疫情，给全球公共健康带来了威胁，重创了社会经济，目前很多国家都把近期的防范疫情、恢复经济和长期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协同起来。2020 年 4 月 22 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世界地球日”提出绿色、高质量复苏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2020 年 7 月 23 日，清华大学邀请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在气候变化大讲堂和青年学生论坛上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再次呼吁各国利用疫情后实现复苏的机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古特雷斯秘书长有一句话需要在此强调：应该在重启经济的同时，采取积极、坚定的气候行动，构建一个清洁、安全的世界。

第二，气候行动要处于经济复苏举措的核心地位

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非常急迫的危机，气候变化则是人类面对的长期的、深层次危机。疫情爆发以来，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在解振华院长的带

领下，与欧盟、美国、英国、“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开展了一系列视频对话。讨论疫情后经济社会的走向，主要围绕各国在刺激经济过程中如何能够避免过多的环境污染以及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反弹，防止高碳锁定的效应。通过对话发现，虽然疫情打乱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常规节奏，但是《巴黎协定》所确定的绿色低碳发展趋势是不可扭转的，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治理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第三，中国展现了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率先响应绿色复苏的倡议，并且采取了积极行动。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将引领疫情后经济复苏和低碳转型的大趋势，这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提振了疫情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实现这一目标是非常不容易的，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近一年来，中国在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同时，计划向联合国提交更新的自主贡献目标和长期的低碳发展战略。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近期、中长期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相融合，建立倒逼机制，在各个领域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

中国的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将引领疫情后经济复苏和低碳转型的大趋势，这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提振了疫情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发展研究院也开展了面向 2050 年中国低碳转型的战略研究，并于 2020 年 10 月份发布了研究报告。这个报告虽然是针对国内的情况，但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绿色发展及疫情后的绿色复苏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此简要地分享其中的一些条目。

第一，优化能源结构，特别是建立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

第二，建设低碳基础设施，避免高碳锁定。

第三，建设绿色低碳的交通体系。

第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五，推动技术创新，研究成本低、效益高、减排效果明显、具有推广前景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

第六，发展绿色金融。初步估算，实现 2030 年碳达峰目标和 2060 年碳中和愿景，预计需要 92 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而中国的市场前景非常好。

第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通过造林和农田的利用，保护湿地以及其他生态保护的路径，来提高应对气候风险和适应气候的能力。

中国和新西兰两国政府提出了非常完整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也搭建了一个合作平台，希望能够推动自然在实现碳中和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八，继续在“一带一路”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跟“一带一路”国家面临着很多相似的挑战，有很多相同之处，合作潜力也非常巨大。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低碳示范项目、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培训合作项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发挥高校在教育培训和人才培养上的优势，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能力建设。

清华大学还倡议发起了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目前有 9 个国家 14 所学校参与，包括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以及巴西、印度、南美的一些顶尖高校，共同在人才培养、联合研究等方面做出大学的贡献。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未来 20-30 年是关键时期，到那时正是目前在校学生担当重任的时期。因此，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青年人在该领域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 王燕之 / 丝路基金总经理

丝路基金参与 共建高质量发展的“一带一路”



丝路基金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是很丰富的，丝路基金的成立就是为了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基金成立六年以来，始终坚持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模式，坚持中长期股权投资为主，以多元化的投资模式，支持了一大批重点项目的顺利落地。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累计签约项目 48 个，投资金额已达 117 亿美元，438 亿元人民币。投资的领域已经遍布全球各个区域，覆盖到机场、港口、公路、电力、新能源、食品等多个行业。投资形式上，主要以直接投资、股权投资为主。同时，通过基金和联合投资平台等多种投资方式，布局了医疗、生命科学、高新技术全产业链的金融产品，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进行支持。所投的这些项目，都为当地和合作伙伴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也

支持了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构建。同时，也使丝路基金实现了战略投资和财务可持续的双重目标。

如何实现“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融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丝路基金下一步主要从五个方面关注投资的布局。

第一，关注民生的复苏、经济的改善。丝路基金在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均有投资，在欧洲、亚洲、非洲、拉美均有投资。不同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制度、治理结构都有非常巨大的差异。由于疫情的出现，以及近几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产业链的调整，区域贸易投融资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可以判断，疫情之后各地区、各国的差异会进一步加剧。这就给丝路基金的投资

能力、投资理念和投资伙伴的选择，提出了一些新挑战。下一步还要更多地关注各地区和各国具体的问题和特点，来制定投资策略和投资布局。要把投资和当地的需要以及民生经济的改善结合起来。

第二，加大对新基建和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布局。新冠疫情对于全球各地的影响显而易见。疫情促进数字经济行业飞速发展，这也带来了许多启发。下一步要在“一带一路”国家，关注新基建和数字经济领域里面的投资机会。传统基建和传统经济领域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信息化的赋能和提升，未来仍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以前丝路基金对新经济、数字经济涉及的不多，知识储备、人才储备、投资理念都面临着一些新挑战，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些领域寻找合作伙伴，希望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通过新基建和数字领域，为互联互通的建设拓展空间、提升质量。

第三，丝路基金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一是在中国双循环格局下的投资机会，二是关于气候变化、绿色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机会。丝路基金成立以来，致力于优化产业链，让国内优质产能走向世界，也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国内，已经拥有了很多成功的投资项目案例。随着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对接，气候变化对于可再生能源投资需求的发展，这两个领域拥有很大的投资机会。

发达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新能源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发达国家的财政都出现了很大的压力，一些国家对新能源的应用安排可能会有一些调整。这也给国际的投资资本、国际新能源制造企业带来了投资机会，而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优势，国际金融论坛 (IFF) 的平台作用能在此发挥出来。国际前政要成员知道本国的需求和财政政策的变化，而中国在资本、产能和技术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可以与这些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方面开展合作。

第四，应该更加关注人民币境外投资。要重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近几年逆全球化的发展。不论短期还是长期，逆全球化的势头还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在持续地调整。随之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国际监管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发达国家国际监管环境出现了变化。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实施的制裁，无论是金融制裁、经济制裁还是威胁制裁，近年来频频发生。这是境外投资面临的非传统风险。以前我们投资关注汇兑、汇率，现在应该选择远离高风险币种投资，这是跨境投资需要面对的很现实的问题。

二是人民币开展境外投资的优势在不断地提升。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经济持续向好，中国已经

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累计签约项目 48 个，覆盖到机场、港口、公路、电力、新能源、食品等多个行业。

成为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国和投资来源国。所以使用人民币做跨境交易的经济基础已经非常牢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坚持全面改革开放，坚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人民币做跨境投资，不仅可以减少传统风险，也有利于应对非传统风险。丝路基金一直在做积极的探索和创新，目前已经实现了 7 个项目人民币境外投资落地，累计承诺的投资额是 438 亿元人民币，涵盖股权、贷款、可转债等方式。

第五，建设高质量的“一带一路”，企业层面的努力和能力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框架安排、与国际对接也非常重要。高水平的制度供给，应该成为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实践的共识，成为国际政策衔接的交流平台和载体，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和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习近平主席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和要求，使中国能够真正参与到全球治理过程中，并做出重要的贡献。



■ 夏乐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原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应用AI工具和ESG披露，研究“一带一路”上市公司

笔者和两位来自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做过一项研究，通过 AI 和自然语言分析的方法，分析上市公司报表对于 ESG 主题的披露。国际上对 ESG 披露存在一些标准，其他学者也做过不同的研究，分析上市公司的报表是否能够满足国际标准，并且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比较。这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主要是运用 AI 工具来完成这一分析过程。

简单来讲，就是把一家公司的报表放到算法工具中，由 AI 自动识别报表包括哪些有关绿色投资和 ESG 的信息披露，然后进行评分。研究目的是了解各个公司对于 ESG 不同方面的披露状况。研究样本目前仅限于中国和美国的上市公司。

研究发现，绝大部分中国的上市公司，对于 ESG 主题的披露是关于排放的，包括碳排放、污染排放等，同时能源使用和能源节约主题披露也比较多。但是关于水和土壤污染等方面，中国上市公司报表的披露不足。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利用 AI 工具，探究企业是否存在粉饰报表和披露不足的行为。事实上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尽管这些企业在报表中有很多 ESG 的披露，但 ESG 披露并不全面充足。通过 AI 工具进行评分，然后从一些具体的维度进行评分比较——尤其是行业维度，发现有些企业属于重污染，但是对于 ESG 披露存在粉饰报表和披露不足的情况。此项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进行 ESG 披露，也可以在未来帮助监管部门监控企业行为，使它们 ESG 披露更加全面真实。

这项研究还得到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研究结论，即那



些重视 ESG 披露的企业，其投资回报也相对较好。这意味着未来在国内、国际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可以从 ESG 披露维度审核相关公司，如果一家公司对 ESG 披露足够重视，从长期来看，该公司投资回报也会相对丰厚。下一步，研究样本将进一步扩大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市公司，同时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司 ESG 披露指数。在 ESG 披露方面更为全面、更为精准的公司，将是未来良好的投资标的。以此为基础，还会做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ESG 主题的资金指数，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发现相关的投资机会。

■ 吕泽翔 /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可再生能源即将迎来大爆发大发展的态势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是一家能源电力投资和建设企业，因建设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而得名，因建设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而扬名。经过 50 年的发展，已逐步拓展至化石能源和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加快推动能源结构清洁化转型，大力开拓以新能源为主的可再生能源业务。截至目前，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在海外设立 99 个分支机构，业务覆盖 142 个国家。目前每年在境外的投资及施工业务，年签约额超过人民币 800 亿元、海外资产超过人民币 360 亿元。

结合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国际经营的情况，就“一带一路”建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我有以下五个观点：

一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未来在全球将面临着大爆发、大发展的态势。全球各国对绿色可持续发展已形成共识。中国及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具备了大发展的基础。我国倡导的特高压输电技术日趋成熟，全球能源互联网逐步形成，能够实现清洁能源的远距离传输，将为可再生能源大规模输送提供保障。

二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可再生能源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成本持续下降。2019 年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在中东中标的地面光伏电站（不含储能），未来发电成本可以降低至 0.12 元/kWh，随着储能技术的发展，预计包括储能的发电成本将维持在 0.3—0.4 元/kWh，且造价成本还会随着技术的进步持续下降。随着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创新突破和大规模运用，可以预见未来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将能够降至 5—6 美分/kWh，将为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提供现实基础。

三是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综合开发模式将快速发展，推动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所属成员企业涵盖投资、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将以产业链竞争的模式参与大型综合类项目的开发，提供能源一站式解决方案。如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在沙特某岛上的综合开发项目，有效统筹能源、建筑、交通、



海水淡化等各个分项工程。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创新电能替代方案，在本项目上实现了“碳中和”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整合行业领先企业以“抱团出海”的形式“走出去”。同时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打造“命运共同体”构建了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四是中国宣布“3060”目标，对能源电力类企业转型升级既是一个挑战，也是巨大的发展机遇。截至 2020 年末，中国的发电装机总量在 22 亿 kW 左右；到 2040 年将实现翻一番目标，达到 40 亿 kW 以上。发展规模将快速扩大，其中煤电装机占总装机比重将从 2020 年末的 49.1% 快速下降至 2040 年的 20% 左右。随着能源结构的加速调整，将对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创造广泛的应用场景，从而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

五是从 2018—2020 年中资企业在境外签约的电力能源类项目来看，龙头企业基本已完成以新能源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布局。2018 年末新能源的签约装机总量就已与化石能源和水电签约装机总量基本持平，而 2018 年以前新能源的签约占比非常小。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以新能源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将会迎来一个快速爆发的时点。（此文为作者发言节选）

■ 王元丰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应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打造“一带一路”绿色标杆项目

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非常重要

现在对于碳排放的讨论，都集中在一些碳排放大国，像中国、美国、印度等。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目前的碳排放也已占到全球的 28%，跟中国几乎相当。未来这些国家的碳排放潜力非常大，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与气候工作基金会 (Climate works Foundation) 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投资和碳排放路径量化研究报告》，按照目前的碳排放模式发展，到 2050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可能会达到全球碳排放的 66%-76%。

如果不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未来《巴黎协定》的气候变化控制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按照相关

估计，不但“温控 2℃ 目标”实现不了，甚至会达到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果继续现有的碳排放模式，搞高污染建设，走原来的老路是行不通的。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国，不仅亲自承诺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而且积极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低碳发展。要着眼于未来而不仅仅关注眼前，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

以更高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更高质量、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发展

2020 年“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提出，要以更高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更高质量、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发展。现在高质量提得比较多，怎样

真正做到更高标准和更高水平是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议题。当前正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很多新兴科技应运而生，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实现更低的碳排放，甚至零排放。

2019 年 9 月，“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咨询委员会与博鳌亚洲论坛联合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案例研究报告》，该报告以富有成效、获得认可、可推广复制为原则，选择不同地域、不同行业、10 个国家的 13 个绿色发展案例进行了分享。

未来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要下更大的决心，要有更宽的思路，要像中国承诺实现碳中和一样，让全球看到中国的诚意、决心和魄力，要打造一批高水平的绿色标杆项目展示给世界。现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项目的情况并不乐观，在未来应当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打造在全球、在中国都立得起来的绿色标杆。

具体应该怎样做？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授，我以桥梁的设计为例做说明。常规的一个中小桥梁，设计师可能会选择几个可行性方案进行设计。但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可以从上万个可行性方案中筛选出最可持续、成本最优的方案进行设计。在招标采购阶段，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采购的是绿色建材；在建设阶段，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VR 等技术的辅助，可以保证建设过程是绿色、安全、可持续的，通过人工智能、无人机、机器人等技术，还可以保证施工的安全、工人的健康；最后，在运行阶段，通过人工智能模拟、大数据分析，可以将运行阶段的碳排放降到最低。

应该把现在已有的上述新兴技术集中运用起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一批绿色标杆项目，并通过案例的形式向世界展示。当然运用高科技，会增加成本，但全生命周期成本可能不比同类项目高，而且推动绿色标杆项目，应当有绿色金融的支持。另外，在标准上，应该看齐欧美甚至要超越欧美的标准，确保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高标准。

有必要开展第三方国际合作实施绿色标杆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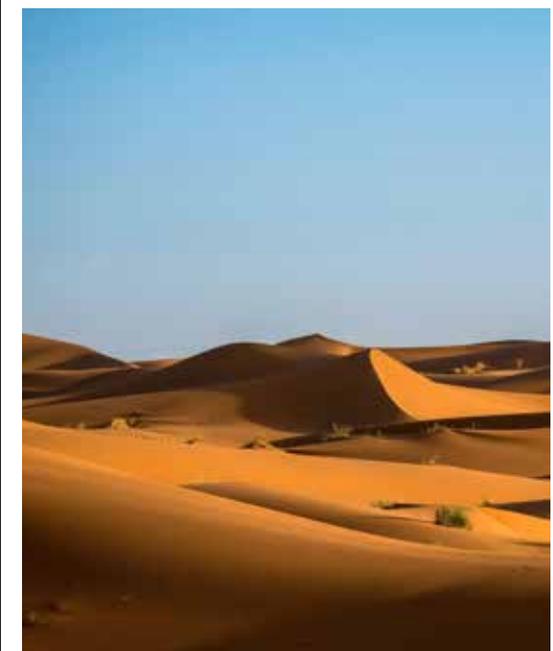
李克强总理访问法国的时候，提出“一带一路”项目的第三方合作，不只是中国和东道国的双边合作，还包括联合欧洲甚至美国的企业、政府一起进行多边合作。因为绿色标杆项目是全球性的，应该利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由各国可以一起来做。

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要下更大的决心，要有更宽的思路，要像中国承诺实现碳中和一样，让全球看到中国的诚意、决心和魄力，要打造一批高水平的绿色标杆项目展示给世界。

应当采用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和环境影响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绿色评估

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应当采用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和环境影响评价，让国际机构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绿色评估。目前基础设施的碳排放和环境影响量化评估还不够，中国可以跟国际机构共同开发，通过第三方的国际评估，使项目标杆树立起来。让世界看看，中国下一代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不再是写意画，而是真正的工笔画，是用新兴科技打造的高质量、高水平绿色标杆项目。这些技术可以输入到国内，推动国内项目的碳中和，也可以复制到欧美先进国家。

总之，要高度重视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碳排放、绿色发展，通过 AI 等新兴科技，打造高水平绿色标杆项目，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都会起到非常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



■ 韩升洙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把丝绸之路变成 全球绿色动力公路

2016年9月，历史性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1次峰会在杭州举行，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互联、包容的世界经济”。9个月后，2017年6月，同样在杭州，丝路国际联盟（SRIA）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成立。

距离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已过去7年。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丝绸之路，是全球化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典范。丝绸之路上人员和货物的流动，为沿线国家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带来了发展和繁荣。同时，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推进了思想创新，共同应对外部的挑战。

互联互通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象征，也成为了当今世界数字化转型的标志。比如，智能手机的普及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天涯若比邻。

目前人类正在经历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谓过去100年最严重的健康危害之一。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灾难，人类社会还面临着一个长期的巨大灾难，就是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

电力之路

SRIA的使命需要重新调整，调动必要的投资来应对本次疫情后的“新常态”。本次疫情是一个警示：人类社会不能再忽视生态危机。疫情结束之后，过去的生活也一去不复返。而且，病毒虽小却威力巨大，将导致经济、金融及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瞬间化为乌有。

因此，SRIA必须拓宽视野，把提升生态竞争力作为一个总体目标，包括生态可持续性和产业竞争力两方面。

在疫情后的新常态下，生态竞争力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生态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的国家将在社会和经济上受到很大影响。在这一点上，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处理及控制疫情比较成功，在工业和经济上也最具竞争力。

新冠病毒只是气候变化将引发的生态危机的先兆。SRIA应该发挥带头作用，成为后疫情时代新常态下生态竞争力的推动者，致力于丝绸之路新型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以绿色理念建设丝绸之路国家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高瞻远瞩的承诺——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令人钦佩。2050年前实现联合国碳中和的愿景，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SRIA应该利用这一雄心勃勃的全球浪潮，支持成员国抓住这个目标带来的机遇。

为了实现2050年零碳排放的愿景，必须大力发展清洁电力生产，实现指数级增长。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域辽阔，可以作为清洁电力的生产中心，大量生产太阳能和风能，并将由此产生的清洁电力输送到位于东方的消费主力中心。SRIA应当肩负起这个重任，成为这个领域的推动者，并将其作为将来工作的宏伟愿景和努力方向。

众所周知，中国在超级电网技术领域处于领导地位，

可以跨越数千公里的距离实现“西电东输”。如果能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发展全球绿色电力公路，不仅有利于可再生清洁能源生产量级的跃升，还可以促进沿线电力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共享，必然会对实现碳中和愿景做出巨大贡献。

例如，来自阿联酋沙漠的太阳能发电成本甚至低于煤炭发电。这样一来，丝绸之路沿线的大片荒地就能发挥价值，为周边居民带来普遍的经济效益，而丝绸之路沿线和最终目的地的城市和城镇中心的消费者，则可以享受到更便宜的清洁电力。

丝路焕新

同时，丝绸之路应该继续向东延伸。古代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向西延伸，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出发，也是向西延伸。然而，现在的中国与汉唐时期已完全不同，世界也再无罗马或拜占庭帝国这两个伟大文明。

现代丝绸之路，特别是全球绿色动力公路，可以向

东延伸至韩国和日本——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国家。中国、韩国和日本也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国。2017年，三国合计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其中中国占27.2%，日本占3.2%，韩国占1.7%。

海上丝绸之路还可以从广州、上海、青岛等中国主要港口向东拓展。如今，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海航线有3-4个月的不冻期。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北极进入东亚和欧洲，与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南海航线相比，距离减少四分之一，航运时间缩短13天。

当下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区别在于，前者是短期的，后者是长期的。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将有助于解决这个短期问题；但是，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策略和耐心来应对。当然，丝路国际联盟也会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多贡献。



■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菲律宾前总统、菲律宾众议院前议长

建设绿色丝绸之路

丝路国际联盟 (SRIA) 于 2016 年 9 月由国际金融论坛发起, 获得了联合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大力支持和参与。联盟通过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构建丝路民间合作与对话机制。过去四年里, 丝路国际联盟构建的民间合作与对话机制, 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2016 年, 习近平主席呼吁绿色发展, 努力打造“绿色丝绸之路”, 丝路国际联盟应运而生。在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习主席提出: “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 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加强生态环保合作, 建设生态文明, 共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8 年,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指出, 绿色“一带一路”的本质在于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纳入“一带一路”发展的各个层面。2019 年,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正式成立, 旨在汇集来自各个合作伙伴的环境专家, 确保“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促进相关国家长期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的一大重要贡献, 就是有利于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19 年,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指出, “一带一路”的五大支柱本质上与 17 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联合国大会主席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表示, “一带一路”是通过有效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2020 年, 据《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杂志》统计, 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共计有 36 个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以及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合作持续增加, 对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绿色革命

2020 年是不寻常的一年, 全球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但我们互相扶持、共同抗疫。中国是首个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重启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复苏。但后疫情时代的合作也需要适应“新常态”, 这是公民集体行为的一部分, 有助于防止疫情再度爆发。

习近平主席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指出: “这场疫情启示我们, 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 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



习主席在联合国的讲话总结了后疫情时代绿色发展的总体思路。《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高 2°C 以内, 并力争将升幅控制在 1.5°C 之内。根据《巴黎气候协定》, 每个国家都要确定在缓解全球变暖中可做出的贡献, 即“国家自主贡献”。习主席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承诺, 中国将提高其国家自主贡献的力度, 并努力争取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外, 习主席呼吁各国追求绿色发展, 实现后

划署指出, 投资绿色复苏可产生高回报。投资可再生能源比投资化石燃料创造的就业岗位多 2.5 倍。清新的空气可减少空气污染引发疾病的风险, 在一些国家中, 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7%。在修复生态系统上每投入 1 美元, 就能够在生态服务和民生领域产生 9 美元的回报。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中心指出, 2020 年, “一带一路”能源投资中非化石燃料占比相对增加。2019 年上半年, 与化石燃料有关的投资占“一带一路”能源投资的 56%, 2020 年上半年该比例下降到了 42%, 非化石燃料投资占“一带一路”能源投资的比例上升到 58%。

2020 年 9 月,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宣布, 《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2020)》正式发布, 该报告由中国科学院撰写, 介绍了如何使用前沿数字科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中心指出, 2020 年, “一带一路”能源投资中非化石燃料占比相对增加。

技革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展示了中国坚定不移地弥补数字鸿沟, 以及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决心。

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绿色复苏。习主席的讲话预示着后疫情时代绿色“一带一路”的蓬勃发展。因此, IFF 的会议并非只关注后疫情时代的金融合作, 还包括绿色发展, 这是切合时宜的。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联合国环境规

■ 庄巨忠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席首席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原副首席经济学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走向绿色复苏之路



新冠肺炎疫情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预测, 66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20 年 GDP 平均将萎缩 2.5%。但是 IMF 预测 2021 年沿线国家将增长 6.5% (其中中国增长 8.1%), 2022 年增长 5.5% (中国增长 5.8%)。这些预测假设 2021 年大多数国家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随着疫苗接种面的扩大和治疗手段的改善, 保持社交距离的力度将逐步下降, 到 2022 年底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全面控制。从目前情形看, 这些假设是合理的, 谨慎又不失乐观。

但是, 要使经济增长实现“V 型”复苏, 各国必须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支持企业恢复生产和创造就业,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并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必需的社会保障。同样重要的是, 经济复苏计划必须考虑和满足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推动绿色转型。

66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63%,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 GDP 的 47%, 全球年二氧化碳排放的 55%, 全球遭受 PM2.5 空气污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人口 的 68%。这些数字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对自身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 没有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 就没有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减排转型

近年来, 沿线国家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包括提高能效, 发展可再生能源,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 控制污染, 保护森林和生物多样性。比如说, 在过去 15-20 年间, 沿线国家单位 GDP 的能耗和单位 GDP 二氧化碳的排放平均累计均减少了 20% (中国减少了 40%)。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把绿色转型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地位。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在 2000 至 2019 年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从 17% 提高到了 28%。中国政府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并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其他有碳中和目标的沿线国家包括匈牙利 (2050)、斯洛伐克 (2050 年) 和新加坡 (本世纪后半叶)。

尽管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沿线国家单位 GDP 能耗比经合组织国家仍然要高 40%-50%,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经合组织国家要高 80%。据估计, 2019 年沿线国家一次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的占比为 89%, 化石能源发电占比为 70% 以上。而在国际能源署“可持续发展的情景”下, 全球的化石能源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的占比到 2040 年要下降至 56%, 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要下降至 24%。

2019 年在全球 PM2.5 空气污染最严重的 60 个国家中, 将近一半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虑到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 如不改变增长模式, 沿线国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的排放还将快速上升。

政策发力

为了进一步推进绿色转型和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一是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增长的质量。最重要的是要使增长方式实现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同时要积极倡导循环经济,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根据 IPCC 最近的一份报告, 为了达到在本世纪内将全球平均气温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的增幅保持在 1.5 摄氏度以下的目标, 到 2030 年,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0 年要减少 40%, 到 2050 年所有国家必须实现碳中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定合适的碳中和目标。

第二是要加强环保立法, 控制污染物的排放, 不走“先污染, 后治理”的老路。大多数沿线国家都有环保立法, 关键是要确保立法的严格执行。

第三, 利用市场机制不但能减少碳排放, 还能降低减排成本。一个途径是取消化石能源价格补贴。2019 年在全球化石能源补贴额最高的 25 个国家中, 18 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减少化石能源补贴省下的财政资源可以用来补贴可再生能源。尽管近十年来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 (如太阳能光伏发电的长期单位成本下降了 80%, 风电下降了 30%-40%), 但这些新能源需要很高的初始投资, 需要政府支持。

另一个途径是征收碳税和实行排放总量管制和排放权交易。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发展碳交易市场, 包括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如中国、印度、泰国和哈萨克斯坦。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在计划发展碳交易市场。但

是在大多数沿线国家, 碳交易市场尚处于初创阶段。

第四是要加强绿色投资。根据对亚洲开发银行研究的简单推算, 66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今后十年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 2.3 万亿美元。如何保证这些投资促进绿色转型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农业以及绿色科技的投资。

第五是要发展绿色金融。公共投资远远不能满足绿色发展的投资需要。发展绿色金融是吸引私营部门对绿色发展投资的重要途径。绿色金融近年来在中国快速发展, 如中国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二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国。但在许多沿线国家, 绿色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

第六是要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对全球碳排放的累计“贡献”不是很大, 但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却很大。发达国家有义务对他们的绿色转型和发展提供援助。《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预期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每年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援助在 2020 年达到 1000 亿美元, 2025 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 发达国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相互合作推动绿色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通过政策对话, 知识共享,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资金流通, 贸易发展和科技合作, 对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和发展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IFF 峰会 金融科技峰会 金融科技主流化——金融科技创新产品和服务

黄健： 金融科技在信用建模上的应用	151	李东荣：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趋势	160
陈文辉： 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	152	韦青： “系统三论”仍是当前金融科技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162
谢孟哲： 金融机构数字化、可持续性发展和有效治理	154	唐人虎： 金融科技在碳排放的应用探讨	164
安雅山： 疫情下中东金融科技发展现状	156	陈晖： 金融科技助力地方绿色金融	166
吴秋凤： 金融科技创新及平台研究分享	158	涂鉴彧： 以科技推动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	168
郝杰森： 摩根大通的金融科技发展实践	159		

■ 黄健 /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高级副总裁

金融科技在信用建模上的应用



传统的量化模型在全球已经广泛应用，而且为业界所熟知，就是量化模型。其存在数据碎片化、更新频率低的问题，而且由于其滞后性，所以传统模型拿来作信用预测的质量相对较低。

近年流行的另类数据、大数据，给大家带来更高的覆盖率和更高的

时效性，提高了相关模型的预测能力，也实现了更高的时效性。另类数据以大数据方式实现，需要相应的科技手段进行截取和清洗，而且需要新的模型。同时，由于近年来一系列违规事件的爆发，引发了社会和监管对于数据、新数据、新型数据隐私的关注，所以在合规方面也需要有所加强。相应的另类数据和大数据模型，也需要进一步得到监管的认可，并提高它的透明度。信用模型的开发，是由新数据的模型发展出来的。2020年疫情期间，这些模型经受了考验，对于将来更好地应对经济下行，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典型的情绪分析算法，主要包括两个模型。

第一，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是学习了输入序列和局部模式，但没有记忆，每个输入都是独立的，输入与输入之间没有联系。加快了计算，使用大数据然后生成一个信息。

第二，长短时记忆的网络。属于循环神经网络，区别是它有记忆，能够记忆处理过的数据。

两个模型有效结合，可处理复杂的信息，比如有语境、语义的中文文本。对文本进行分类和给出所谓情绪评分，包括正面、中立、负面。应用场景再把情绪和信用建模连接起来，尝试把基于财务健康的评分与公司的违约率连接起来，来看数据评分对公司的违约率有没有预测的作用。

有一项研究使用中国新三板上市指数，情绪指数来自上市公司的公告。研究显示违约公司从违约前24个月到前一个月的平均的情绪熟悉指数的趋势，趋势是逐步下降的，在大概12个月前已经接近负值，代表了是负面的情绪指数。

在信用建模中怎么样引入气候变化的风险？毋庸置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金融风险。按照国际标准，与气候相关的风险主要分为两个：实体风险、极端风险。

实体风险与气候变化和实体经济相关，包括水源、水质变化以及食品安全和温度变化等，这些因素对运营、供应链、运输的需求和员工安全产生影响。还可能包括自然灾害而造成的风险，比如洪水或者暴风雨引起的土地使用规则的变化。

所谓极端风险，是指企业向低碳经济过渡的时候，对其造成的风险或者对其财务状况造成的风险。解决气候变化引起的问题需要进行政策、法律、技术市场的变革。

有两种模型可以协助衡量极端风险。

第一，基本面驱动模型。这个方法主要是基于其中相关过渡场景进行的经营建模。从现在的碳含量到低碳排放的长达10年、20年、25年的过渡的场景，对公司的财务进行预测，通过量化或者打分的模型来评估。该方法对上游的石油或者天然气企业比较适用。

第二，市场违约模型即市场驱动模型。上市公司主要使用公司层面碳排放数据，不仅仅限于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所有公司都有碳排放的数据，该模型能够捕捉到这些碳排放，降低其对于公司盈利模式的影响。这个模型除了能够算出相应的风险和机遇，也能够用来进行压力测试。

总而言之，研究目的就是把实际的技术应用到实际的场景，能够通过气候极端风险的量化，在气候模型中进行建模。从而计算出企业在气候变化中的风险、机遇所在，更好地调度其资源来满足既向低碳过渡，又对公司盈利造成最小的影响的要求。

■ 陈文辉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数字经济如今已经被提到了很高的高度。有人说数字经济上半场是数字的产业化，下半场就是产业的数字化；也有人说数字经济、互联网会把所有产业都改造一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改造正在进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数字化进程，数字化在中国必将有很大发展。

2020 年 11 月，首届中国 5G+ 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湖北武汉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发去贺信，说明党中央对这一领域的关注。金融产业中的金融机构也有一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现在各家都在做尝试和探索。金融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对金融产业、金融机构效率的提升和服务范围的拓宽是非常重要的，将会提升整个国家经济的效率，促使中国的经济再迈上一个新台阶，真正助力“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实现。

金融产业有良好的数据基础，但是它的转型才刚刚开始，未来任重道远。当前，传统的金融机构数字化，只是信息化的一个延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局部的

一些优化。现在各家金融机构都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尝试和创新，而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整体的数字化转型，即业务的重构，而不是在局部、在某个点、在某条线上的转型。

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资本始终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了主要的生产要素，与之相应，经济发展的一些逻辑在改变。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一些业务逻辑也在改变。过去资本稀缺，客户去找钱；现在全球资本过剩，钱要主动找客户，当然是去找那些真正需要钱的优质客户。只有依靠海量的数据和完善的风控体系，资本才能够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客户。适应了这种业务逻辑的改变、重构，才能完成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鉴于此，虽然金融机构的数据基础良好，但是数字化转型应该说才刚刚开始，任重道远。

完成数字化转型，是非常困难的。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撰写的《创新者的窘境》一书，研究分析了计算机、汽车、手机等产业中很多知名企业，



发现这些知名大企业在延续性技术创新（在原有技术轨迹延长线上的改良型创新）方面是占有优势的，但是在破坏性技术创新（打破原有技术发展方向的颠覆性创新）上，却表现糟糕，虽然一些破坏性技术创新往往是先被大企业研发和掌握的，但他们却弃之不用，反而被积极运用破坏性技术创新成果的一些小企业弯道超车，淘汰出局了。

现在的一些大金融机构就如同书中讲的那些知名大企业，在延续性技术创新方面有优势，但是面对业务逻辑完全改变的破坏性技术创新呢？怎么适应？

现在传统汽车产业与造车新势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新势力汽车包括特斯拉和中国的蔚来、小鹏、理想，它们迅速崛起，在资本市场表现非常亮眼。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三一重工投资的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就成长良好。树根互联不是在三一重工母体里，而是独立创立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企业，它不仅服务三一重工，还助力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企业数字化转型。

从上述实例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从两方面把握：

第一，企业的最高领导一定要有数

字化、互联网的思维，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没有这样的思维，数字化转型工作是很难推进下去的。

第二，要解决大型、成熟企业组织上的一些障碍。大型企业通常有庞大的传统业务，一个新兴的势力因其话语权小，短期难以产出很多收益，又占用不少资源，往往被排挤，很难成长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型传统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以借鉴树根互联的例子，运用互联网思维把数字化转型机构独立创建起来，不断服务于母体，这样助力它逐渐长大，不失为一种思路。

总而言之，金融数字化转型是发展方向，但能看到不一定能做到，更不一定能做好，怎样真正做好数字化转型可能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金融行业需要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任务，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从两方面把握：企业的最高领导一定要有数字化、互联网的思维；要解决大型、成熟企业组织上的一些障碍。



■ 谢孟哲 / 联合国秘书长数字金融工作组秘书处前负责人

金融机构数字化、 可持续性发展和有效治理



绿色债权。不仅在比较大的机构层面，在个人的层面，甚至是在低收入个体层面，我们都看到了金融创新和产品创新确实在推动教育和卫生融资的新方式。所以不论是私人还是公共领域的数字化金融，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特征，也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特征。

催化转型

联合国数字合作特别工作组的数字化建议的第一部分，是催化性的创新或者是催化性的一些机会。

数字合作特别工作组确定了五个主要的催化机会，这些催化机会规模达每年数万亿美元，如果予以积极推动，就能带动其他金融系统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同步发展。

第一，转移日益增长的国内储蓄池机会。近几年中国人储蓄大概每年能达到 13 万亿美元，即使是不发达地区，在过去 20 年，储蓄率也平均增长了 5 倍。国内的储蓄更多会变成长期发展资金，例如孟加拉国预计有 6% 的国内储蓄都流向了长期发展资金。数字金融工作组的建议是使用移动设备和新的金融产品创造可投资资源、区块链以及其他机制来改善资金的部署，进而把国内的储蓄变成长期发展资金。

第二，关注对于中小企业以及小微企业的融资。中小企业是世界上主要的就业提供者，其每年大概会有 5 万亿美元的借出和借入。银行有时无法对小微企业提供借贷，即使贷款，数量也比较少。针对小微企业融资低效问题，现在已有很多银行采取了改进措施，例如通过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融资，这同时降低银行的运营成本。

全球资本市场的金融资产达到了 85 万亿美元，但是

其中 30 万亿美元要用于环境的社会治理。很显然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创新技术能够让金融服务更快、更便宜，能够使资本市场得到快速和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必须把可持续发展考虑其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融资应该相互融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进行不同融资效果的评估。

第四，必须要提高纳税的透明度和纳税者的责任感。这也对利用好税款提出了要求。

第五，每年全球的融资额达 47 万亿美元，大量的线上购物和线上机会正在不断涌现，必须关注网民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

以上就是五个催化性的机遇。要抓住机遇，就必须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金融或融资等方面做出改变。另外，要看到和了解数字化变革存在的障碍、困难及风险。现在的挑战不仅仅是如何克服困难、跨越障碍和降低风险，更要关注数字化本身是否会直接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崛起之星

数字化建议的第二部分，是通过与国家层面进行协调，把金融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国家的优先事项结合起来。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利润丰厚的金融科技创新方式很关注也有尝试的意愿，但是可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去支持这些金融科技创新。这就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数字金融响应系统，从基础设施到治理

规则再到法律法规，根据具体需要去协调。

第三部分，国际治理层面，建议不仅要关注创新领域，还要关注金融科技、金融数字化推动过程中产生的本地金融部门、社交媒体以及电子商务等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平台及它们的衍生品或多元化产品。

平台治理对于政府至关重要，其关键是金钱的流动。要使上述这些平台得到有效治理，不仅要确保金融稳定和防止洗钱这些基础性问题，还要确保与其相关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治理。这些大型金融科技平台有非常重要的跨境溢出效应，会影响到可持续发展目标成果的方方面面，所以一定要确保这些平台能够得到有效治理。

要利用好催化性机会，通过相关政策、恰当的市场创新以及公共和私人领域伙伴的合作关系推进数字化进程，当然政府的力量在这一进程中必不可少。

我们现在面临很多挑战，必须通过对融资和金融领域的有效治理，才能够使全球的融资更好地运转起来，也才能够给私人 and 公共领域带来更多的益处。

现在市场的集中在金融科技领域逐渐变成了现实，跨境金融全球性治理不可或缺。希望联合国数字金融工作组的工作能有更多的机遇和创新，也希望联合国数字金融工作组的领导力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工作组未来工作的一个领域和前进方向。



■ 安雅山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埃及投资部前常务副部长、EN投资公司CEO

疫情下 中东金融科技发展现状

中东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影响了其卫生、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还有未来的一些未知层面。中东需要更多的解决方案应对当前的问题，全球也需要有更高的一致性和文明性。

虽然第二波疫情仍在肆虐，但一些中东国家的经济已开始复苏。埃及是新兴市场中少数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实施的一些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主要有使企业能更好进入市场的税收和金融政策，以及很多科技创新和初创企业的刺激政策。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或疫情没有蔓延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也不会如此迅猛，可以说疫情对金融科技起到了强力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东、北非的人口银行拥有率只有 67%，比起欧洲相对较低。同时，现今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云社会，中国、北美人口手机使用覆盖率约达 70% 甚至更高，中东、北非手机使用也非常广泛。所以，科技已成为抗疫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而金融科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元素，在这个领域有很多中国经验被学习、借鉴。中东、北非积极使用电商包括电子支付系统及其他金融科技，精通这方面技术的年轻人大约有 4.5 亿，其中超过一半不到 25 岁。所以可预测在未来 5-10 年，中东、北非的金融科技环境是非常活跃的，创业群体也是生机勃勃的。这也给女性等弱势群体带来了非常大的机遇，因为她们要进入传统劳动力市场，尤其是疫情冲击下的传统就业市场十分困难。

中东发展金融科技及电子支付系统，首先要完善其

监管架构。监管者需要构建起立法架构，比如银行如何使用金融科技运转业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基础设施。

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的央行都非常重视金融科技的发展：埃及制定了很多相关政策，其央行的愿景是实现金融科技战略，满足人们的需求；阿联酋央行建立金融科技办公室，制定金融科技公司管理法律、法规来促进国家金融科技的发展；沙特阿拉伯于 2008 年成立货币局，同时启动了一个监管机构对当地及国际金融科技公司进行管理。自从这个监管机构启动以来，已经收到 250 个申请，接纳并且审批通过了 14 个公司的数字产品申请。因此，像 P2P 借贷和直接国际转账等类相关金融活动在沙特阿拉伯开展已成为可能。

中东正在积极投资金融科技产业，推动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目前各国在不断设置 5G 基站，希望在 2025 年中东地区能实现“5G”8000 万的使用量。现在中东地区占金融科技投资全球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一，2022 年



之前，希望在金融科技领域，中东能成为年复合增长率 30% 的市场。

2017 年，中东金融科技风险投资资金只有 8000 万美元，如今已达到 20 亿美元。中东现在有很多金融科技基金，其中有一些是主权基金，也有一些是金融机构提供的自有资金。比如埃及央行成立了一个 5700 万美元的基金；阿联酋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也有相关的基金。

目前，埃及已有自己的电子支付系统，首次公开募股使其业务量增长了 30 倍。电子支付系统不仅仅是支付体系，它对创业公司来说也是极大的鼓舞，激励它们去吸纳更多金融科技元素。

疫情加速了网上服务的发展，政府已着手进行一系列数字化服务，包括汇款、账单支付、贷款等等，这些会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结束之后被快速推进。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公司之间带来合作的机会，也给中国与外商以及全世界带来合作的机会。中国

正在快速发展核心、高端科技，很多国家也依赖这些技术。因此会有一些潜在合作领域，包括移动钱包、在线保险、电子商务、医疗服务等。一些电子支付系统的使用可以促进金融科技应用的可持续性，中东在此领域也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或疫情没有蔓延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也不会如此迅猛，可以说疫情对金融科技起到了强力推动作用。尽管金融科技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但不能因此转移焦点或对未来丧失希望。

中东国家的政府和央行都别无选择，且央行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措施，让银行加强现金管控以调节其社会流动性。如埃及出台新的《银行和中央银行法》，为数字支付、银行和货币的运营搭建监管框架，随后埃及及首家独立电子钱包提供商面市。即使人口可支配收入有限，中东国家也积极为金融科技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它们能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 吴秋凤 / 世界银行集团前首席技术官

金融科技创新及平台研究分享

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人们以不同方式使用科技。新冠肺炎疫情令世界数字化加速发展，很多金融机构也开始关注机构创新，在数字领域开展业务，满足金融发展需求的同时创造新的增长机会。另外一些潜在的领域，如金融科技和农业科技的结合，金融科技和健康科技的结合，都可以为金融行业创造新的增长机会。

科技推动金融机构深化服务用户，疫情则从客观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建立的战略性关系，在业务自动化方面带来高效率、低成本，同时带来更多的数据和创新。菲律宾联合银行和新加坡银行是很好的例子。它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采取了创新金融科技。但是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在融合时会面临很多问题，所以在开展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有共同成长的心态，还要进行一些培训，才能够让机构走到一起，从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018 年的一个数字实验室项目，在拉美有一些以结果为导向的培训，在撒哈拉以南沙漠地区、非洲地区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IFC 致力于这个项目，与阿富汗的银行联盟以及东盟、新加坡进行了合作。

这个项目把银行和金融科技相结合，建立一个能够创新的沙盒模式，最终演化成 APIX 平台。该平台会有不同层级的能力，例如 API 的应用、各种数据集等。金融科技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形成银行和金融科技之间的合力，互相促进得到更好的金融方案。

APIX 平台开始于 2017 年，效果非常好，现在已得到进一步升级。其优势是带来更深、更广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减少应用科技的成本，带来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操作性与互动性，进而加强整个生态系统的建设。

在金融科技创新的前沿还有 RegTech 和 SupTech 平台，主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监管报告；第二，监测和监督；第三，动态的信息分享。创新可以在这个空间中发挥很多作用，也期望能够更进一步地扩展它的能力。同时应关注数据的架构和 AI，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进行科技监管。

对网络安全进行风险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很多金融机构包括央行都越来越关注网络攻击和网络安全问题。加拿大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把网络安全作为一个潜在的巨大风险。报告认为，要充分了解网络安全、更好地进行网络的保护、监测、响应以及复原，才能确保在关注创新的同时，也可以平衡一些潜在风险。

2020 年 10 月，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专题报告，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金融监管动态进行了一次快速测评研究，收集了全球 114 个司法管辖区的央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回应。该报告指出，大多数受访者加快了现有监管创新举措或推出了新举措。

世行不久后还将发布另一份报告，主要是关于金融科技市场快速评估研究，其中包括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包括：市场表现、对消费者提供的服务、运行和风险控制以及监管政策等问题，这项研究将提供给世界经济论坛做参考资料。



■ 郝杰森 / 摩根大通中国区技术总裁

摩根大通的金融科技发展实践

近些年，金融科技日益成为金融行业颠覆性的力量，其发展和应用之快堪称现象级。金融科技改变了很多现存的金融产品，尤其是在用户和数字化利用方面。摩根大通在中国已有 100 多年历史，作为一个大规模的科技公司，摩根大通可以说是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在产业、新兴科技以及金融科技领域。

摩根大通在中国应用金融科技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截至目前，摩根大通在区块链方面构建的开放、准入机制，以及在数字资产控股和数字货币方面的一些做法已卓见成效。

摩根大通一直在努力尝试，争做中国市场新兴技术的领先者。目前，摩根大通在科技方面总投资达 110 亿美元，总员工的 20% 即 5 万人都是技术专家，他们每天都在开发创新技术，为用户提供技术支持。

我们希望摩根大通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实践，可以为尝试模式创新的其他金融机构提供一些借鉴。

第一，技术战略和伙伴关系。摩根大通有专业的技术团队把金融科技融入专门的产品，不管是对公还是对私业务，抑或是资产管理业务。摩根大通会检测和评估潜在的

产品和公司，其在全球每年约有 1000 个新的投资项目。

第二，金融科技入驻。为了让科技满足企业的需求，摩根大通开设一些导师项目，为项目公司提供内部评估，帮助评价和部署其业务中技术的应用。

第三，战略性的投资。在这方面，摩根大通重点关注的是初创企业，帮助它们评估投资是否能让其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第四，设立卓越中心。摩根大通时刻关注战略性的重点、新兴技术，比如：区块链、机器人、数据分析等等。这些团队的主要落脚点是产品，摩根大通希望通过卓越中心的教育促进产业的变化和进步。

摩根大通关注的领域诞生了关键新兴技术并得到了应用。例如，在数据科学中，利用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等，可改善客户体验，使其能够更好地使用金融产品。摩根大通还与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开展云平台、UX 等合作，提供针对交易相关方面的平台化操作，增强用户体验。另外摩根大通还推广了分布式账单的商用，与很多相关公司进行了合作。对于 API 和信息沟通这一块，摩根大通也提供一些独立的技术支持。



■ 李东荣 /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趋势

金融科技是近些年来全世界讨论比较多的热点，各国、各地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金融科技的内容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整体来讲，金融科技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科技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就没有中国金融业成长壮大的今天。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金融业就像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在这个时期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中国在前些年已经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比如在金融业务的联网、在银行卡的芯片迁移，在移动金融创新等领域所积累的发展经验和基础，最终让中国金融业在基础式的创新发展当中实现厚积薄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顶层设计

中国对金融科技一直非常重视，但是对它的认识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始终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并将其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人民银行等政府部门而言，最头疼的问题是财政拨款很有限，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怎么把最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人民银行的支付清算、支付、金融调查等系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去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包括硬件、软件、灾备、全球各地的互联互通，是整个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管理部门是在做未雨绸缪、提前布局、扎实推进的工作。2017 年 5 月，人民银行还专门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员会，发布了金融科技的发展规划，明确了中国金融科技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另外在一些重点地区，还出台了金融科技区域性的扶持政策，包括粤港澳大湾区。

完善监管

监管和创新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促进、不断完善的。中国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持有包容和积极探索的态度。

2019 年人民银行确定了金融科技的创新监管工具，这是借鉴英国、新加坡等国所做的“监管沙盒”经验。

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上海、深圳、雄安、杭州、广州等地方都开展了“监管沙盒”的试点，试点内容范围比较广，具有金融创新属性和普惠导向创新是重点，现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商业银行的 API、移动金融的 APP、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等一系列的金融科技的标准规则正在加速出台，行政监管和行业治理有机协调配合的金融机制、治理机制也在逐步形成。

蓬勃发展

回顾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科技在其中起到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它不是一个狭窄的体系，而是一个范围比较广的、既有传统金融机构运用互联网和科技技术改造其原来的金融服务体系，也有很多新兴的业态，还有很多科技企业，他们都参与其中。总而言之，这个生态包含内容比较多，目前金融机构新兴的业态主体以及科技公司，这几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竞争的生态圈在不断完善。还有产业园区、孵化器、特色小镇、众创空间等金融科技在蓬勃发展，这是中国很明显的特色。

产学研协同的金融科技人才培养认证体系，也正在加快建设。现已成立金融策划师、金融投资师和金融科技人才等的认证体系，还有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推动其认证体系的形成。另外，中国也非常重视金融科技的教育，目前全国有 20 多所高校开设了金融科技的本科专业。

成效显著

金融科技的作用最终还是要靠应用的成效来体现。安永 2019 年全球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消费者和中小企业金融科技的采纳率分别为 87% 和 61%，1 这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受到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期间，为避免接触式感染，很多商业银行的储蓄所、营业所在疫情期间暂停了业务；但是线上业务，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移动支付、线上理财、网上借贷还有保险等等，所以在疫情期间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这种非接触式、不间断而且高效率的中国式金融服务，也可以说是全球成效最为显著的普惠金融服务。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中国网络支付用户已经超过 8 亿。疫情期间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原来年纪比较大的同志都是到现场购物；疫情期间，由于小区封闭，老年人去市场购物不方便，他们在这段时间也迅速地掌握了手机支付、手机购物这些技能。截至 2020 年 12 月，网络理财、网上外卖、网络购物的网民使用率分别达到 17.2%、42.3% 和 79.1%；网络理财比率相对较低，因为有些老年人还是不放心，但相信年轻人基本都在线上完成了。目前网络移动支付用户占中国网民总人数的 85.7%，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没有网络就无法实施金融活动，形成了无网络不支付、无网络不金融的状态。

不断进取

中国在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方面，已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中国先行探索、尝试的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金融科技的基本规律是客观的，应该正确地认识，并在未来发展中认真遵循。

一，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在开展金融科技活动中，首先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由此也引出了责任底线的概念。金融业作为一个与财富打交道的特殊行业，具有很强烈的高风险性、强侧重性及其内在脆弱性，历史上金融行业的风险事件不断发生。科技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金融风险的消失，而是提高了防范风险、解决风险的能力，不能根除金融风险。

科技是一个工具和手段，掌握在一些动机不良的人手里，就可能成为开展非法活动的帮凶；如果缺乏正确的价值导向、缺乏必要的责任制约，就可能滑向自我循环、过度膨胀和非理性繁荣——只有根植于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客观需求的金融科技才有生命力。

二，遵循金融客观规律。每个行业都有其内在活动规律，金融业也不例外。很多规律有内在必然性，应该认真执行、遵循，确保金融科技活动不会走偏。在发展金融科技过程中，监管部门应根据实践掌握好这些规律。对所有的从业机构而言，应该充分地认识到，监管合规不是创新道路上的拦路石，而是在前进道路上的指示灯和防护栏。只有守政创新，始终坚持金融为民、科技向上，方能行稳致远。

三，发挥创新驱动优势。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数字技术是研发最集中、创新最活跃、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回顾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一条很基本的经验就是创新、改革是驱动中国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在数字时代，一定要掌握好数字技术，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如果金融机构，不管传统还是新兴主体，对数字技术视而不见或者对它存有惧意，最终会被数字化时代所淘汰。谁能够更早、更安全、更科学地运用数字技术，注意解决当前金融体系中的短板和痛点，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主动，更多赢得数字红利。发展金融科技，应该注重在政策和机构两个层面建立包容和审慎的创新、容错、试错、纠错的机制，推动数字技术从原来的营销获客，向风险管理、流程管理、生态运营等关键核心环节渗透，最终达到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精准性、直达性、普惠性的目的。

四，夯实基础设施支撑。金融科技发展行稳致远最终取决于基础设施建设。2020 年 10 月，世界银行针对全球 114 个国家和地区金融管理部门，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72% 的受访机构已经加快推出或准备推出数字基础设施相关计划 3——加强基础设施的支撑是全球金融机构发展普遍而迫切的需求，否则，未来在很多方面都会陷入被动。当然基础设施不仅仅是金融方面，还包括整个国家工业基础、信息化基础等。

从金融业来讲，要注意利用最好、最先进的、最实用的技术去加强支付、征信、借贷、证券、保险等一系列领域的改造，运用区块链、多方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去推动金融业和产业政务等领域的数据要素融合应用。数据使用要做到不浪费，充分彰显其价值，又能很好地保护个人隐私，需要综合平衡和把握好。

五，建立多元的治理机制。要把金融科技运用好、发展好，推动国家的金融业再上新的水平，推动金融服务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传统的金融治理机制主要以机构来划分，按机构或者分段监管；现在随着形势发展、技术的应用，监管要与时俱进，要建立包括法律约束、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机构自制、社会监督在内的多层次的金融科技治理体系，多维度来共同监督，相互提醒。

■ 韦青 / 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

“系统三论”仍是当前 金融科技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谈到发展与创新，有一个争议非常大的说法就是“尽量不要重复造轮子”——即，寻求本质性的原理创新时，这不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在金融科技行业，现在有很多看似创新的理念和模式，如果以“第一性原理”的方式来衡量，目前机器实现计算的方式还是以图灵和冯·诺依曼的创新为基础。现在流行的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区块链等，实际上做的还是早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科学家们就已经建立起的科学发展观，即通常说的老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系统论 (GST) 中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个体与个体、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突变与涌现和混沌效应，还有对系统变化产生强化或者约束的正反馈与负反馈。

现在人工智能在金融行业的应用有很多，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跟人们所设想的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与决策的

“人工智能”还有很大距离——精确来讲，是机器通过对数据的计算而产生的模式识别能力，也就是机器学习能力。

现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进步依靠的是什么技术发展范式呢？它依靠的是利用系统论来谋划全局；利用控制论的范式来实现机器的进一步自动化；利用信息论的知识，提高人类理解和应用信息的能力，这三者的结合为机器具备越来越多的学习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新型的机器学习能力，再加上有关信息存储、通讯和安全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应用到金融领域，就成为了金融科技。

可喜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科技界人士开始反思技术发展路径，开始不那么追求概念，而是寻求根本性的



创新。

而方法论的进步，本质是科学的方法论。互联网企业在这几年的优秀表现，实际上是以“成长性思维”为代表的勇于探索的精神：以快速试错和迭代的方式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突破现有思维的桎梏，永不停歇地重复快速优化与重构，用科学的方法论实现数字化的韧性。也就是说，未来大概率将进入一个实时变化的时代。

控制论的观点是现在机器学习领域的基本范式，也是目前所有以机器为代表的自动化的基本范式。金融科技不管要实现什么，无非是基于业务目标产生出一串命令，经过一个负反馈的循环，告诉用户系统的输出是否符合当初制定的业务目标，在数字化的时代称之为建立

起衔接一切动作与流程的数字化智能反馈链。

“智能化”的目的是利用这种新兴的机器能力改造、完善、优化和强化每一个行动与业务步骤——即最基础的数据治理和流程再造，而人们往往认为流程再造是过时的概念。

最近国外有一篇文章专门分析“字节跳动”的业务模式，有一些启发性。很多人认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智能算法和智能推荐，但在作者看来，这家公司的智能算法优势只是个结果，通过把数字化反馈能力嵌入到公司业务发展的每一个流程，实现及时与精确的商业执行能力。这才是数字化的本质，是数字化的核心竞争力。有了这种能力之后，企业就能随时随地实现数字化的反馈流程，算法就能告诉和帮助企业在每个步骤纠偏、预警。

控制论的基本框架，类似于人体的神经流通，没什

么本质不同。世界的本质就是随时产生数据、传输、存储、计算、使用、展现，然后再利用对执行结果的反馈机制。金融科技亦然，这里每个环节都要加数字化的反馈能力，就能产生智能化的能力。

金融科技要实现的目标，是在数字时代原住民即将到来的时代，用技术的手段解决实际问题，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使用金融服务。在此基础上，把所有的监管、管理、注册、服务、审查放在里面。这是金融科技在帮助银行、金融机构做数字化转型时所走的道路。

(本文为作者发言节选)



■ 唐人虎 /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融科技 在碳排放的应用探讨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做出庄严承诺，中国 2030 年前要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要实现碳中和。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次定义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是绝对量，跟金融领域常提出的绝对目标的量化属性一致。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

第一，中国碳排放量全世界第一，是美国、欧盟、日本碳排放量的总和；第二，每年全球新增的排放量，中国占百分之六十多。

数据方面，谈得最多的是数字化；能源方面，谈得最多的是能源转型。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其实是化石能源过度使用带来的对整个地球生态的重构。

能源转型更好地发展，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能效；

第二，调整能源结构，减少化石能源，增加可再生能源；

第三，发挥光合作用，种树、种草。

要在能源消费侧和能源供给侧减少碳排放。能源项目能产生 25 年到 30 年的作用，在后面的系统过程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需要用科技的手段进行分析和再平衡。

一个火电厂需投资五六百亿，资本金 20%，剩下的都是贷款，需要金融给予大量的支持。在信贷审批阶段，如果只考虑初期情况，不考虑未来连续运行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于金融来说，信贷风险是非常大的。比如 10 年、15 年后，由于政策的转变，或者整体外部环境的变化，项目停止，这将给金融造成巨大的损失。

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金融科技大有可为。

以下讨论三个例子，其实是一个比较细化的场景分析。第一是多层次的生态权益市场；第二是通过能源区块链技术解决节能服务的问题；第三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给企业进行气候信用画像。

第一个例子，多层次的生态权益市场即碳市场。坚持需求导向原则，比如国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不同地方的绿，比如广州南沙的绿和西北兰州的绿不一样。建立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多层次生态环境交易市场，要通过数字化技术支撑信息流和资金流，这样才能把生态环境权益市场激活。

第二个例子，通过能源区块链技术解决节能服务的问题。实践性的研究揭示以下一些问题。第一，互信难。节能服务公司和用能公司需要互信但又困难重重。第二，融资难。第三，数据隐私。企业有数据隐私，数据的扩展和使用有很多困难。

利用能源区块链的方式为企业进行重构，可以解决数据隐私和互信难的问题。第一，把企业的能源、能耗数据，通过分布式区块链平台进行整合，解决数据隐私

的问题。第二，用高频数据解决企业与金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原来一年一结算的合同，改为月结算或日结算，就不需要资产抵押。以每日实时数据做支撑，可以做到日结算，就能解决互信难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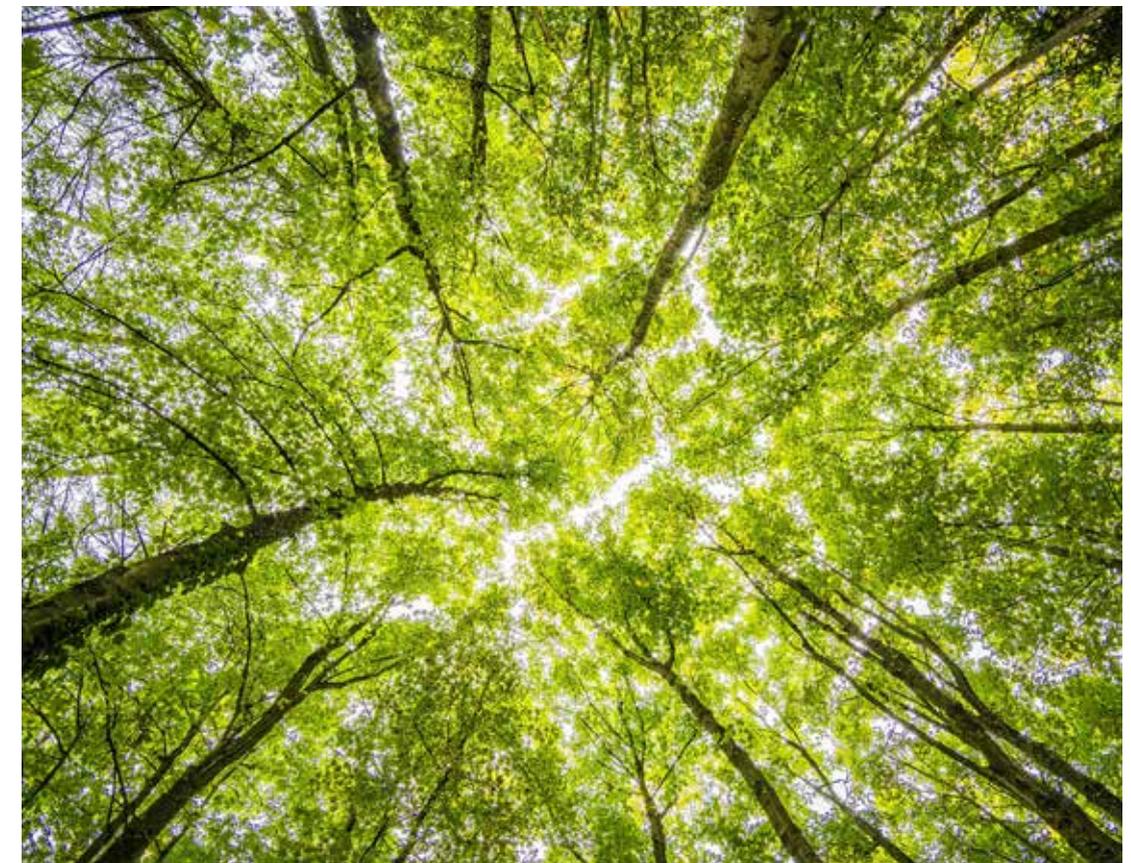
用好能源区块链平台，能为国家节能减排提供支撑。投资融资方面，因为有每日数据，又是点对点的共享，其他人看不到，单独开窗口同时解决隐私的问题，为几方合作提供解决深度信任问题的方案。履约也是靠机器而非原有的合同履行。

用能源区块链的方式重构企业带来的好处有很多，如基础信用和内容合约、数据模型等。同时因数据不可篡改，又能点对点保护隐私，对政府和行业做评估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特别是能够为政府做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最后一个案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给企业进行气候信用的画像。既然气候变化会影响到多个行业，而且碳排放会成为未来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可以通过大数据和知识图谱，去绘制企业气候信用画像，并运用气候信用画像进行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

用能源区块链的方式重构企业带来的好处有很多，如基础信用和内容合约、数据模型等。同时因数据不可篡改，又能点对点保护隐私，对政府和行业做评估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特别是能够为政府做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通过实时的大数据分析建模，跟一个数据公司合作，通过 AI 从各种文本中把关键性要素提出来。只需要提供哪些是关键性要素，由 AI 去识别。文本包括行业报告、新闻报告、财务报告等，关键性要素抓取出来以后，方便金融机构判断企业能效状况，再进行横向对比，形成对企业的气候信用画像。



■ 陈晖 / 北京寰宇普惠科技有限公司CEO

金融科技助力地方绿色金融

回顾我们国家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2015 年被称为中国绿色金融的元年，在这一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明确提出构建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

2016 年 8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同年，在杭州的 G20 峰会上，作为轮值主席国，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把绿色作为一个议题纳入到了 G20 的讨论中，贡献了我们中国绿色金融的智慧。

2017 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发布了关于指导意见的分工方案，同时在全国五省八地，包括广东、浙江、江西、贵州以及新疆等五省（自治区）下辖的八个地市成立了国家级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由这八个地市结合本身的产业特点进行相关的实验创新。特别是 2020 年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注入了更强的动力。

在中国绿色金融改革过程中，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由国家推动、自上而下的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顶层推动力，如何开展绿色金融的改革试验？如何推动地方绿色经济的转型？我们作为一个金融科技公司，最近三年来在中国金融创新领域，也就是绿色金融领域有一些实践。

下面就以我们改革试验区里的一个代表——浙江省湖州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发源地）——作为一个案例，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地方如何建设绿色金融体系？如何创建其绿色金融的生态？从 2017 年开始，在绿色金融领域我们经过三年的努力，逐步在湖州打造构建了良好的绿色生态，形成了“三个圈子”。

第一个圈子，我们称之为市场主体的圈子，也就是产业和金融的圈子。包括地方企业、商业机构以及和绿色金融、绿色技术相关的第三方公司。

第二个圈子，是监管主体的圈子，以地方金融办、金融监管局与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银保监会以及地方派驻机构为代表的三驾马车，共同推动和指导地方绿色金融的发展。湖州之所以能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这个圈子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三个圈子，除了地方的监管主体和市场主体之外，湖州还充分地连接国内外的资源，从院校、研究机构、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共同助力湖州的绿色金融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特色化的绿色金融生态。

因为时间有限，用一张 PPT，来看一看金融科技是如何支持湖州地方性绿色生态里的各个主体，如何建设绿色金融科技的基础，又如何最终形成了一个绿色金融的数字生态。

各个主体的建设基本上是同步的。在 2017 年、2018 年，从商业银行、从银保监会、从人民银行，包括到地方政府、金融办等同步推进三系统一平台的建设。

我们讲一讲商业银行。以湖州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构建了绿色信贷的管理系统，该系统的构建充分运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我们知道 2018 年初，在我国绿色金融落地时，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识别绿色项目、绿色信贷的专业能力比较薄弱，造成各家银行在绿色项目、绿色信贷方面的识别准确率很低，识别的时效比较漫长，同时所要付出的成本也相当高。但是，在绿色信贷管理系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方式，把多套标准，比如银保监绿色信贷的统计制度、人民银行专项统计制度甚至包括人民银行绿债的目录等等，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的地方标准都纳入绿色

项目、绿色信贷的识别标准中。不仅如此，2020 年一些商业银行国际合作，比如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引入美元绿色转贷基金，因此，除了要符合我们中国的绿色金融标准之外，还要再兼顾海外的标准。包括 2020 年三月份欧盟发布的可持续金融的分类法，可通过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的方式引入。

第一，该系统可以快速认定一个项目是否是绿色信贷、绿色项目，包括它是否能够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的统计制度分类，甚至能详细到它的三级或者四级分类的具体结果。第二，该系统可以按照银保监会的要求实现项目的环境效益测算。第三，该系统还可以实现项目在对公客户、信贷客户的环境和社会责任风险的分类，并帮助商业银行进行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整体的披露。这相当于构建了从贷款企业到金融机构统一的绿色信贷数字化系统，这个系统也可以跟原有的信贷业务系统高效、无缝地对接，实现为信贷在贷前、贷中和贷后的全流程中绿色金融的专业赋能。这是在商业金融机构方面的创新。

另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的两大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

在监管机构里，是通过一个实时的平台，我们从技术上称作 T+1，对商业银行进行绿色金融业务数据的采集。它不仅满足了对业务进行监管，而且符合细密度、高频率的监管要求。通过这样的业务监管，能够帮助地方的监管机构对地方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务的开展有一个全面的数字化的了解。

在这样明确的业务监管基础之上，相关的政策制定就有了科学的依据，同时这些政策的落地，尤其是像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落地，能够实现精准的对接。

在业务监管、政策对接这两步的价值基础之上，未来也可以针对每家金融机构，测算它在金融活动里面给企业、社会所创造的环境效益的贡献值，最终实现环境效益贡献值的一种交易，这有助于从监管体系角度实现整个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接着，再来看看由地方政府牵头建设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第一，这个平台实现了银行和企业之间的银企对接。银企对接虽然并不是绿色金融的范畴，各地也都做了非常多的银企对接的落地工作。在这个平台里运用了科技手段，把原来线下的绿色项目、绿色企业的认定进行线上化、前置化以及智能化。举个例子，湖州的一家企业在平台上注册以后，第一步就可以实现对这个企业的绿色认定。怎么认定呢？因为湖州的地方大数据做得还是相对比较领先的，地方的大数据局已经汇集了涉及企业有关的政务数据，大概有近 600 个数据项，我们可以从中抽取主要的 58 项

数据，这样就有了针对该企业的精准的企业经营行为指标，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负向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再结合 116 个技术指标构建它的 ESG 评级和企业画像，通过 ESG 评级能判断这个企业是否是绿色企业。如果是绿色，还可以看出它是深绿、中绿还是浅绿。企业提出融资需求的时候，可以结合它的资金用途，利用人工智能的智能识别方式，对它进行是否符合监管机构的绿色标准的智能认定。所以在这个平台上，相当于实现了传统的银企平台的绿色赋能。

第二，在企业信贷全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利用大数据的方式实现对企业环境表现全程的监控。从 2018 年到现在，尤其是 2018 年 1 月 1 日我们国家实行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案例在提醒商业银行，在评估放贷企业时不仅仅要从财务风险去考虑，而且还要从环境风险、从 ESG 角度去考虑它可能会造成的超越传统风险考量的损失可能性。

通过多个系统的建设，最终在 2020 年将这些系统整合，打造了湖州的数字整体生态。我们仍以平台为例，讲一讲它如何能够实现产业和金融的协同发展。一家企业提出了融资需求，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先判断这家企业是否是绿色的，以及它的融资是否是绿色的。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之上，地方政府继而通过该平台也能够实时地了解相关信息，为地方政府的奖补政策落地实现精准的对接。接着，商业银行在接到了这样的融资需求以后需要进行信贷的处理，信贷业务的处理过程通过实时的 T+1 对接，让监管机构第二天就能看到商业银行所做的这笔信贷业务的数据，监管机构可以对其绿色信贷行为进行再认定和再预算。后续，再贷款政策可以精准对接到金融机构，尤其是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为了让再贷款政策直达到企业，并且让监管机构实时了解到再贷款政策的应用，湖州创新性地把再贷款政策落地到了地方的综合服务平台之上，也就是说要求所有商业银行根据再贷款政策在平台上创新绿色金融的产品，企业就可以在平台上直接选择这些再贷款支持的绿色金融产品。

通过整体的数字生态建设，湖州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2019 年 6 月底人民银行绿色信贷信息管理系统在湖州上线的时候，湖州全辖区绿色信贷的余额，其量级是不超过 500 亿的。到目前为止，整个湖州的绿色信贷的余额在 2019 年 6 月底的基础之上增长了一倍。这也说明了，金融科技在助力地方的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方面大有作为，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大大帮助了地方的绿色金融更好地落地和发展。

■ 涂鉴或 / 妙盈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EO

以科技推动 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

2019 年《时代》杂志的封面并不是特朗普而是一位小女孩，她从 14 岁就开始辍学去抗议气候变化。中国网红李子柒在抖音上有 3900 多万粉丝，在微博上有 2300 多万粉丝，在 B 站上有 400 多万粉丝，海外平台上还有 900 多万粉丝，如果不除去重复叠加，她的粉丝已经超过了 7600 万。李子柒分享的内容主要是一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

从另一个角度分享 C 端或者大众端的案例，比如抖音环保类话题。截至 2020 年 7 月份，绿色生活有 39.9 亿的播放量、垃圾分类 35.3 亿、环保 17.4 亿，就连保护地球这样很窄的话题也有 6039 万的播放量。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有一篇文章的主题叫作“新冠病毒：大自然正在给我们警告”，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任讲的一句话。年轻人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更注重环保和社会责任。年轻人将长大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从而带动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会映射在金融价值观上。

有这样一句话：“长期价值回报的三要素包括可持续发展、有秩序的金融市场以及有效的公司治理。”任何一个有规模的、高流动性的市场，其流动性都是和市场秩序以及市场的数据量成正比的。

利用技术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三个解决方案。

第一，利用文本的数据。第二，利用技术角度的知识赋能。第三，利用物联网或者卫星，从实际场景中直接拿到数据监测宏观经济数据。

高盛发布的报告中提到，过去九年以来中国是怎样利用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数据看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也是运用了另类数据。

利用卫星数据可以衡量深圳的复工情况。2020 年 2 月和 4 月利用卫星的热力图，可以明显侦测出 4 月开始已经大量复工，当然这也需要用很多 AI 和图像识别手段



进行侦测。2020 年夏天对中国长江流域洪水的监测，可以看到洪水对种植业和环境的影响。香港大学利用数据研究出员工满意度与公司股价的关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员工满意度越高的公司股价波动就越小。

最后分享一个利用可持续发展或者 ESG 跟世界接轨的案例。欧美政府规定，主权基金需要对社会环境治理有很高的标准，一家主权基金的客户要考虑基金的声誉。

2020 年 4 月 1 日，中国市场允许外资直接设立全资子公司。对于很多外资机构来说，将资金投入中国市场是非常好的，但遇到一个问题，即在欧美适用的基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数据以及评价标准在中国不适用了，造成无法得到足够的技术支持投资。一个客户有 600 亿美金计划投资中国，结果只投了 200 亿美金，因为剩下

的钱没有数据支持。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注重可持续发展将帮助中国与国际接轨。

我们需要提供更高频、客观、准确而且全面的数据，也意味着整个方法论里面，数据和信息、信息和知识、知识和智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如数据可以从网站、文档里面提取，但并不是一个简单信息，而是需要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做特征的工程。一个单一信息也不是知识体系，不同信息之间往往有关联性，所以需要建立知识图谱。把代码给客户看也不行，所以要服务决策系统让客户很好地看到。比如，江淮汽车排放造假，被北京市罚款 1.7 亿元。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能提取出涉事主体或者涉事主题，以超过 400 多个主题模型进行实时监测。知识图谱也起着重要作用。比如有两个都叫 Jason 的人，一个是在现有知识图谱里，另外一个 Jason 是新闻里提到的，都有不同的特点。新的信息无法知道他和旧的信息能否整合，通过验证可以知道他们是否属于一个社群。基于知识图谱的很多高阶的 AI、人工智能方法能帮我们



香港大学利用数据研究出员工满意度与公司股价的关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员工满意度越高的公司股价波动就越小。

在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金融领域，从数据、评级、指数以及舆情，或者事件的监控等方面，都有很多可以去发展的方向。

数据是基础，有各个方面的人和机构在制定评级的标准，积极地和监管部门一起合作，从监管的角度推动行业标准和数据的发展。

IFF 峰会 绿色金融峰会 全球绿色金融——实践与创新

宾度·罗哈尼： 绿色金融峰会开场主持稿	171	唐丁丁： 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的绿色发展	184
英格·安德森： 金融机构在绿色经济复苏中的机遇与潜力	172	刘振民： 积极实践与创新绿色金融，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	185
维多利亚·克瓦： 绿色金融促进金融复苏	173	吴晓青：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和气候金融 力争实现 2060 碳中和的国际承诺	186
张文才： 政策性银行的绿色金融实践与创新	174	埃里克·索尔海姆： 绿色金融的“一带一路”	188
艾哈迈德·赛义德： 绿色金融，机构合作与政府支持	176	叶燕斐： 气候变化与公司治理	189
朱庆锋： 国有企业践行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	178	安周奇： 多边机制体系下的绿色金融标准	190
弗兰克·莱博曼： 全球绿色金融实践的挑战与机遇	179	马可·兰博蒂尼： 创新性应用绿色金融工具应对生态环境挑战	192
武内和彦： 日本绿色金融的实践与创新	180	邹骥： 碳市场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194
张勇森： 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实践	182	英格丽德·加布里埃拉·霍芬： 德国绿色金融的创新与实践	196

■ 宾度·罗哈尼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绿色增长中心首席顾问、亚洲开发银行前资深副行长

绿色金融峰会开场主持稿



现在全球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经济在 2020 年遭受重创，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严峻挑战。同时，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仍然是全社会面临的严峻且长期的危机。当下，需要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危机，一些国家颁布了绿色复苏计划，以振兴国家经济；一些国家和世界经济体有较大合作潜力和空间。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先后承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很多国家和政府积极参与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韩国、日本、欧盟各国和南非等国家都制定了碳中和目标，中国承诺在 2030 年碳排放达峰，努力争取 2060 年实现碳中和。这些发展目标都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

绿色金融是全球实现绿色增长的重要机制和支撑，IFF 希望通过集结国际和国内的金融机构、智库、行业发展协会，共同探讨绿色金融有效应对机制，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IFF 举办全球绿色金融峰会，是希望通过建立专门的绿色金融机制和平台，提供更好的融资渠道，让大家能共同分享绿色金融实践方法和最佳经验，支持、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本次峰会是首届全球绿色金融峰会，IFF 有幸邀请到了非常专业的人士，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机构，有国际银行、

国际组织、行业协会以及学界名家、学者，也有世界银行的代表、中国银行机构的代表、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还有不少专家和行业的翘楚，大家一起分享并探讨绿色金融的发展。

绿色复苏是应对危机与挑战的关键，绿色金融则是一个关键的工具；金融机构应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和机构变革，即应适当盘活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属性。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还远远不够。金融机构的职能转换到绿色金融和支持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的重要资产。

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动员起私募基金，公共部门需要进一步跟私营部门合作，让其加大对绿色金融、绿色经济的投资力度。同时也需要建立一些创新项目，比如绿色债券和水债券等债券。

危机也是机遇。在当前一些国家实行的举措中，有些刺激经济的措施包含了绿色的成份，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把它做得更好。比如绿色基建投资仅仅在亚洲就已经达到了 1.7 万亿美元。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绿色基建方面的投资，希望这些投资进入到证券行业和证券公司，实现一个绿色友好的经济体。

与此同时，金融风险的筛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私营部门和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有很多正面、很鼓舞人心的优秀实践与范例。

技术的革新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思考怎么充分利用现有的先进技术，怎么将先进的技术推广并应用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一点更加重要。还有就是怎样用新的低碳技术推进项目、落实节能减排的目标。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它需要大家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我们需要找到共赢的方式加速低碳经济和可持续经济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区域和国际合作，合作在实现该目标的进程当中至关重要。国际金融论坛让我们有机会共同聚焦绿色金融，希望国际金融论坛能够越办越好，也希望未来在这样的平台上，有更多的知识分享和经验互鉴。

■ 英格·安德森 /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金融机构在绿色经济复苏中的机遇与潜力



当前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类社会更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和垃圾污染危机。数十年来不可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方式造成了这三大地球危机，它们正在日益摧毁我们赖以维持健康和繁荣的自然环境系统。

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必须加快行动，履行对地球环境的承诺。目前，各项应对气候危机的措施正在稳步推进。2020 年 9 月，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要实现碳中和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必须获得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的大力支持。公共资金可以通过出台疫情复苏刺激计划获得，但要确保其必须用于鼓励零碳、对自然环境友好和无污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

同时还应促进能源转型、保持地球健康和创造绿色就业。私营部门的资金也需要肩负起重担。部分金融行业的头部企业已经看到了这个趋势，正在缔结联盟，引导资金流动，但动作还需要再快一点。全球经济重启需要数万亿美元的资金。为了加快这一进程，充分利用投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在积极推进四项主要行动。

第一，金融行业要更加有效地衡量和公布其行动产生的影响，不仅应包括融资带来的积极成果，如减少排放等，还应公布其负面影响，如丧失生物多样性或侵犯人权等。

第二，金融业要制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和其他国际协议相一致的综合性可持续目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愿意参与其中两个目标框架，即“净零资产所有者联盟”和“负责任银行原则”。四家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九江银行已签署了这一原则，希望更多的银行加入他们的行列。

第三，金融机构要科学设计其投资组合净零排放的时间表。例如，“净零资产所有者联盟”就与杰出的科学家合作，制定了适当的中期目标，在实现 2050 年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规范目标的方向，重新调整投资组合。

第四，各金融机构需要公开透明，证明其能够履行所做出的承诺。例如“负责任银行原则”要求通过第三方来审核签约方的年度报告。这样的透明度才能够保证其可信度。

地球离不开金融行业，但金融行业必须明白，它们更不可能离开地球而长期健康地存在，投资于低碳社会和健康的自然系统是保证其长期盈利的唯一途径。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正在加速推进碳中和计划；希望银行和投资者也能筹措调度资金，共同投资建设一个更加绿色、更加健康、更加繁荣的未来。

■ 维多利亚·克瓦 /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

绿色金融促进金融复苏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对金融界影响都非常大，而受影响最大的是世界上那些最脆弱的人群。对于金融界来说疫情是危机也是一次警示，提醒各国经济需要韧性。

温室效应产生的危害越来越严重，气温在不断升高，气候反常变化把很多人赶出了他们的家园。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如果不能很好应对的话，到 2030 年，将会有更多人被迫离开家园。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到 2030 年，气候变化可能使另外 1 亿人陷入贫困。疫情是危机，但危险中也蕴含着契机，如果现在抓住机会，在经济上做出正确恰当的应对，让经济更具韧性，就可以应对各种变化。

金融助力绿色复苏

世界银行的总裁以前做过研究，如果在金融方面做出很好的应对，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可以使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刺激方案效果更好。这项研究对于世界金融组织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激励。从短期来讲，需要很多金融刺激计划，同时利用一些新的机会，支持各国建立起可持续、有韧性的未来。

绿色复苏包括很多方面，有金融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措施，也有支持碳排放定价等金融举措——主旨就是要让经济更加具有韧性，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绿色复苏。

世界银行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推动绿色复苏。例如，世界银行正在融资一些水项目，可以让不同国家的用水安全得到改善，使 95000 公顷面积的土地得到重新规划。在突尼斯有一些项目，是用金融政策的方式增强经济的抗逆韧性，用以对抗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和应对社会安全事件。实现社会经济绿色复苏，还需要私营部门去推动部分低碳投资。在孟加拉国，已经有部分企业投资数字化项目，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让私营部门参与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措施，世界银行与孟加拉国政府一直在这方面进行着合作。

世界银行在中国准备启动的项目，动用了许多国内私人投资基金和国外私人投资基金，这些基金将投入到绿色复苏相关行业，包括创新、可持续能源和一些电子

商业等。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现在需要把一些注意力投入到绿色复苏和“十四五”规划中，在这方面中国已经脚踏实地开始实践，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习近平主席也承诺到 2060 年要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的一个目标。

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合作始于 40 年前。在这 40 年里，双方一起努力做出了一些成绩，例如减少海上塑料污染、加强食品安全以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等等。在低碳经济方面，双方也有很多合作，世界银行参与投资了大量污染控制项目。中国的合作伙伴在此方面成绩卓越，他们做出了利用金融来改变能源和环境的范例。

全球疫情暴露了很多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个推动绿色经济复苏的重要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正确恰当的应对措施，就能让经济更加具有抗逆性、更加绿色。中国站如今这样一个位置，可以帮助世界银行实现这个目标，而世界银行要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努力做得更好。



■ 张文才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

政策性银行的绿色金融实践与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 5 年和 15 年的发展蓝图，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是其中的两大亮点。而绿色发展无疑是畅通“双循环”发展、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主席总结深圳 40 年改革创新成功经验中，专门提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了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广东是最早获批的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2020 年 10 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深圳成功定价发行全球首笔“粤港澳大湾区”主题政策性境外绿色金融债券。

绿色发展，金融助力。特别是“十三五”以来，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充分践行“两山”理念的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释放出蓬勃向上的活力，这源于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驱动，源于国家审时度势的政策驱动，源于人们追求环保

绿色健康生活的共识驱动，源于绿色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源投入的需求驱动。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指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启示我们，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需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

面对当前的困难与挑战，各国在投入大量资金刺激经济增长时，普遍强调要实行绿色发展、促进绿色增长、推动绿色复苏；各金融机构在支持经济复苏中，也普遍重视绿色金融安排、加强绿色金融合作。比如，2020 年 11 月，在全球首届公共开发性银行峰会上，各重要政策性金融机构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更加至关重要的作用，农发行也作了经验交流。

农发行积极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支持“三农”事业发展。多年来，农发行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绿色发展理念引入“三农”领域，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农业绿色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有力促进了绿色产品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综合实现。

一是完善绿色治理体系。总行专门成立了绿色信贷委员会，有条件的分支行建立了绿色金融事业部，制定了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等管

理办法，建立了国际权威认证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框架，明确绿色金融产品标准、完善绿色项目认定、开发绿色信贷系统、加强气候和环境风险管控、健全绿色激励约束机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将绿色贯穿业务发展管理全流程，形成了全行助绿的体系与机制。

二是积极推动资产绿色化。服从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求，统筹支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和生物多样性治理，从支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从支持三江源国家公园到国家储备林建设，从支持自然环境治理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实现了全区域、全形态、全链条覆盖的“三农”绿色金融服务网络。

到 2020 年 9 月末，农发行绿色项目贷款达到 8109 亿元，占全行中长期贷款规模的 19.3%，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投向主要集中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节能环保领域。此外，农发行还积极发展绿色投资，聚焦城乡融合发展。

三是加快发展绿色筹资业务。农发行依托国家信用优势，在债券市场推广绿色发展理念，创新发行各类绿色债券产品，覆盖境内外、多场所、多品种、多主题等，构建了引导全球资金投入境内绿色农业的模式。发行绿色贴标债券，创造了多个第一，包括首单公开招标发行的全市场单笔规模最大绿色金融债券、首单“债券通”绿色金融债券、首单“粤港澳大湾区”主题政策性境外绿色金融债券和“三农”欧元政策性绿色金融债券，以及首单存量债券三方绿色认证等。此外，农发行还持续面向全球投资者创新发行绿色主题债券，包括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主题，并在上海清算所常规发行 7 年期生态环保主题金融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达 882 亿元。农发行还主动组织绿色债券项目实地考察和投资者座谈，搭建信息沟通平台，提高绿色债券投资透明度。

四是推动绿色金融多层次合作。农发行将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的实践得到了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认可，也创造了诸多合作机遇。成为“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首批签署机构，并加入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小组；与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积极参与我国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机制建设，与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CICERO）、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IISD）、香港品质保证局（HKQAA）和我国中节能公司等合作开展绿色债券第二方和第三方评估认证合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发展绿色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农发行也正在加大力度推进绿色农业。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承诺，农发行将牢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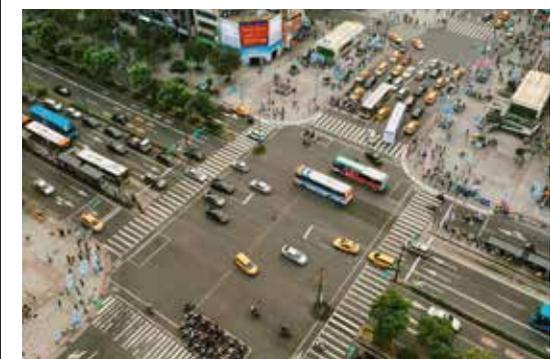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的作用。

一是增加绿色发展的资源投入。农发行将秉承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增强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吸引和汇聚更多资金，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变革。

二是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农发行愿与各方一道，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市场建设，推动完善绿色金融制度和支持政策，构建正向激励和失信约束环境；强化信息披露与共享，强化风险意识，健全气候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体系；推动建立互通融合的绿色金融标准，提高其实际可操作性。农发行希望在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标准的课题应用中，与各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三是加强绿色金融国内外合作。发挥好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潜力巨大的优势和政策支持绿色发展的优势，加强境内外绿色金融实践与知识交流，分享经验，携手开展研究和培训。农发行将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机构，国内政策性、开发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加大农业绿色投入，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的绿色复苏与可持续发展。

农业，这个古老而又朝阳的产业，一方面关系着地球上每个人的生存和命运，一方面又前所未有地在世界范围内高度关联。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领域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一场深刻变革。农发行愿意同各有关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互学互鉴，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 艾哈迈德·赛义德 /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绿色金融，机构合作 与政府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进一步彰显了绿色金融的重要性。亚洲开发银行能够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中，充分利用技术和绿色项目实现绿色金融复苏。当今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都在积极推进绿色金融，比如欧盟委员会在推动一个专项绿色经济复苏基金，用以促进区域之间的绿色经济发展。另外，许多国家政府，比如菲律宾政府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放在凸显和优先位置，尤其是绿色基础设施的项目。中国政府正朝着碳排放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稳步迈进，并将可持续发展与绿色金融定位为非常高的战略层面。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绿色项目和绿色经济复苏的资金缺口很大，需要筹措更多的资金。

很多区域层面的国际机构，都发现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复苏是相辅相成、彼此依赖和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绿色实践，因此探索与创新绿色实践势在必行。

比如亚洲开发银行 2030 年发展战略中就有一项重要支出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并且在亚洲开发银行未来发展战略中，绿色金融也占据着重要位置。要实现 2030 年碳排放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绿色金融的作用至关重要。探索绿色金融实践以及设定绿色发展目标，不仅是中国和中国政府也是很多其他国家和政府一致的举措，所以大家不仅有共同承担和肩负的责任，也有很多合作的可能。

2016-2030 年，全球在绿色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将有约 26 万亿美元，每年大约 1.7 万亿美元，这样庞大的资金需求离不开金融的发展，以及大力度的资金筹措。如何达到每年 1.7 万亿，总计 26 万亿美元的资金需求？首先是创新的方法，比如以风险为基础的监控和评分模式，有助于进一步推进 ESG 的发展与实践。第二是环境和社会指数，通过制定 ESG 相关重要参数，引导资本市场的绿色发展。



第三是创新型项目，如在中国深圳的水资源绿色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可以进行绿色资金的筹措。在中国，还开启了一个联合基金资助的项目。

亚洲开发银行的创新实践，暂时还没有进行商业化和规模化量产，所以我们呼吁多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方面的支持，以便亚开行的创新实践项目能够进入商业化和规模化。另外，我们还需要把 ESG 的要素囊括在内，找到更加切实可行和有效的商业模式推进绿色项目。投资机构也需要充分认识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义务性，很多指数其实可以用来引导投资机构承担起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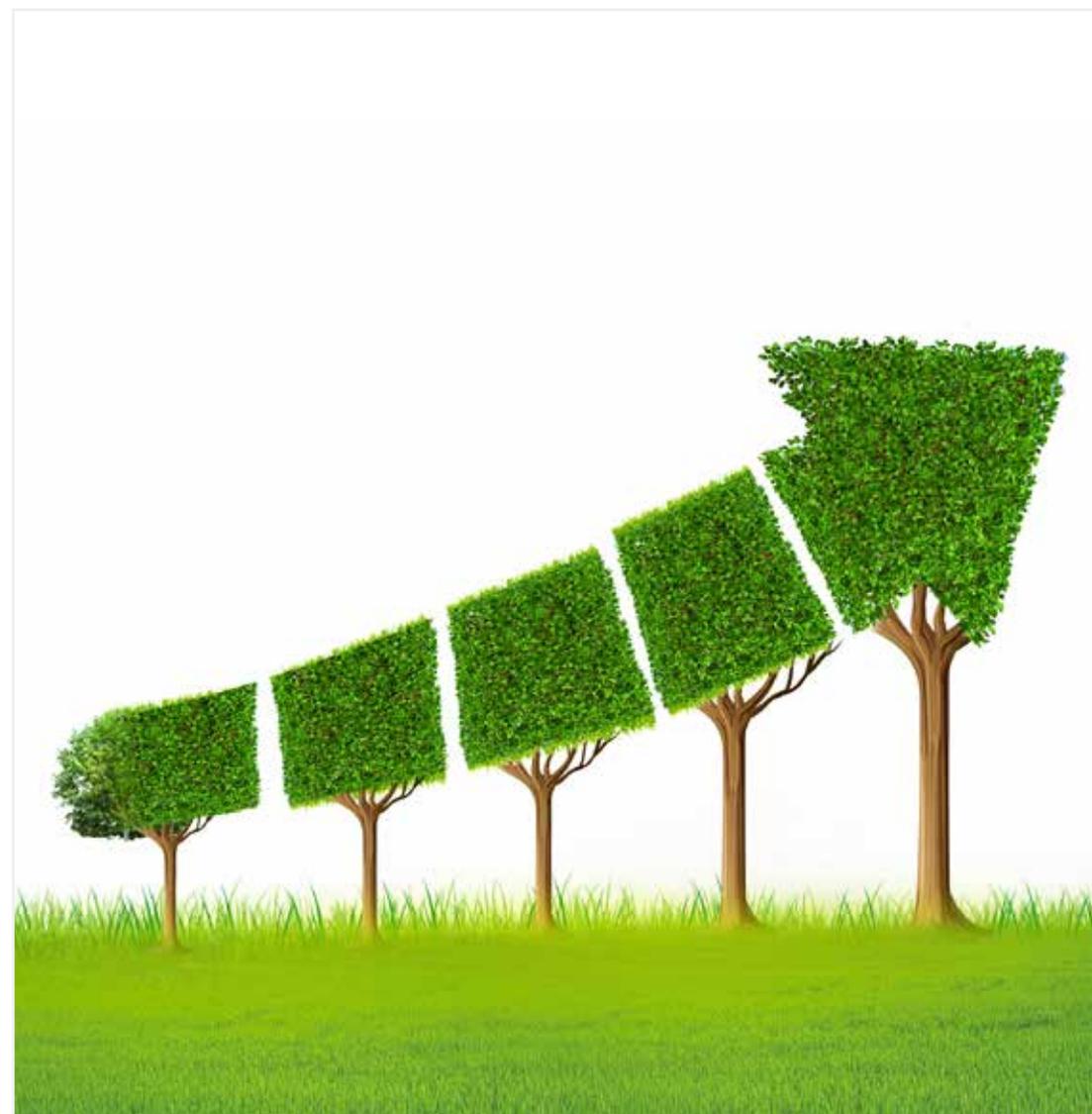
投资机构的参与丰富了商业的多样性，让市场可以朝更适于分享且可持续的方向蓬勃发展。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国深圳水务集团合作，通过新型技术实现水资源的更可持续性供给，以此来更好地保护环境，这是我们第一次与中

国此类机构合作。亚开行在太平洋地区也提供了一些信用风险的担保，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方面提供了此类金融服务。以上举措都可以让绿色金融有更加良好的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力度推广绿色金融最佳实践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标准的制定。因为标准可以更好地支撑绿色金融的发展，并且促进可循环经济。亚洲开发银行 (ADB) 亚洲证券机构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对一些绿色金融领域的认证，具体来说是对绿色债券进行认证，即要求债券的发行和相关实践须符合绿色标准。这样的框架和合作可以提供很多价值，跨国银行可以提供相关方面的引导与支持。亚洲开发银行发现银行在投资中会面临一些政策上的挑战，特别是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而亚洲开发银行可以对相关

工作予以引导和支持。

气候变化对很多国家都有主权方面的影响，绿色经济在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认可。疫情之后，世界要实现快速复苏，离不开绿色金融。疫情总会过去，当前的危机肯定会结束，转危机为机遇，可以实现绿色经济发展。要加强环境保护，并要为此制定相关的管理规则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政府机构、私营部门等都积极参与，才能在全社会实现更有效的低碳发展。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面临的机遇也是非常大的。我希望在未来与各位进一步合作，在各行各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地促进绿色金融发展。



■ 朱庆锋 /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总会计师

国有企业践行 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金融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重要支撑，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增加绿色金融供给，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是中央企业中唯一一家以节能环保为主业的产业集团。截至目前，中国节能的资产总额已经接近 2000 亿元，每年贡献的营业收入达到 500 亿左右，在全国范围已完成 300 多个节能环保项目，绿色装机容量达到 12.8 亿 GW。中国节能灵活运用绿色资产证券化工具，累积发行各类债券超过 1100 亿元，全部用于旗下的清洁能源、节能服务、固废处理、新材料等绿色产业板块。

2020 年 7 月，中国节能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其他央企共同合作发起并设立了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国家绿色基金的设立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投向面向市场需求的重点领域，实施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扶持相关绿色产业发展，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系统性的产业支撑，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三点经验

中国节能在绿色金融领域积累了诸多经验。较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1. 完善体系，积极搭建绿色金融、服务绿色产业的新桥梁。在实践中，中国节能坚持产融结合，完善了以绿色金融政策研究体系、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和绿色技术研发及项目建设运维体系为核心的中国节能绿色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构建了绿色金融服务绿色产业的桥梁。中节能旗下的中节能咨询公司，广泛开展一系列绿色金融制度研究，作为主要编制单位完成了中国第一个关于绿色债券界定与分类的文件。

2. 创新驱动，积极探索绿色金融支撑绿色产业的新途径。中国节能创造性地以基金方式使用国际金融组织



主权贷款，改变传统分散、单一的项目模式，有力撬动了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京津冀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经过近两年运营，中节能亚行基金已推进实施了工业余热利用、电代煤、产区节能环保工程等多个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12 亿元，预计每年将减少燃煤消耗近 37 万吨。一方面帮助当地居民实现清洁采暖，另一方面推动企业加强节能环保措施。

3. 广泛合作，积极推动国内外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发展。目前中国节能已与 30 多个省市开展合作，通过编制《绿色金融发展规划》，设立绿色产业基金、绿色项目识别与评价等参与方式，促进地方绿色金融发展。

中国节能在长江大保护、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中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目前中国节能正在积极参与黄河流域治理，也必将成为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推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需要聚集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与资源，需要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民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需要从政策机制、标准体系、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提升和完善。应统筹推进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中国节能愿与大家一起来，共同推动绿色金融事业更上新台阶，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注：文中出现数据为 2020 年 10 月数据。

■ 弗兰克·莱博曼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全球绿色发展署 (GGGI) 总干事

全球绿色金融实践的 挑战与机遇



在绿色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疫情之后的绿色经济复苏至关重要，而共同探讨全球绿色金融的实践、挑战和机遇又是关键所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全球绿色发展署 (GGGI) 坚持以可持续性且环境友好的方式支持与带动经济增长。GGGI 现在有 38 个会员组织，希望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的四年里，GGGI 积极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帮助绿色金融克服政策方面的阻碍。创建各种结构性的融资机制，通过建立以政府支持或者以社会私人经济体、金融机构为主导的一些多结构化的融资体制，支持绿色发展，包括绿色基础设施项目以及 PPP、政企合作、公私合营项目。GGGI 还积极协调全球投资机构和投资者投资绿色项目。

GGGI 本身并不是一个资金提供方，也不是一个金融机构，不能靠自己提供融资，但是 GGGI 希望能够帮助各个国家和各级政府克服政策方面、机制方面的困难，打造多元化、多结构化的融资平台，协调、统筹资本，号召、引导资本更多地投入到绿色项目之中。

2020 年，GGGI 与一些国家的政府，以 PPP、政企合作为主要方式筹措资金，共同推动由政府主导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在印度的 700 公里高速公路。

通过太阳能进行发电这类绿色项目是 GGGI 非常愿意参与并且积极推进支持的。除此以外，GGGI 也参与其他类型的项目，比如固废处理，由垃圾生成能源，变废为宝类项目。GGGI 在越南支持的固废发电项目，现在的投资额已经高达 6400 万美元。GGGI 参与的项目有的规模非常大，比如在越南的绿色债券筹备项目，通过催化的方式促进越南的绿色金融发展，提升越南在绿色金融方面的转变程度。

上述项目很好地佐证了绿色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潜力巨大，其不仅在中国方兴未艾，在世界其他市场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可以很好地与绿色经济复苏相结合，所以绿色金融市场潜力会更加巨大，GGGI 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后疫情时代的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复苏类项目。从推动、宣传绿色项目，在政策方面建言献策；到为政府提供绿色交易方面的支持、编写建议书，都可以推动并实现更加持久的绿色发展。

GGGI 积极参与、促进、协调绿色项目，比如以自然为基础的绿色解决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还有一些提高能效的创新实践项目等。这些绿色项目不仅能促进经济绿色复苏，而且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以提升能效的项目为例，其带来的就业机会预计有 11400 个，所以 GGGI 积极与金融机构合作，促进绿色项目的孵化，从而催化可持续增长的项目。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绿色经济复苏、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且能够在疫情之后让我们的环境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发展。

■ 武内和彦 / 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所长, 日本政府中央环境委员会主席, 联合国大学原副校长

日本绿色金融的实践与创新

能为大家介绍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 (IGES) 的“三 R 框架”, 我非常荣幸。希望能够借此引导投资, 最终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帮助我们实现绿色响应、绿色恢复和绿色再规划。

新冠肺炎的迅速传播归结于两大问题: 首先, 人类在某些时候过于接近自然系统, 由此增加了新冠肺炎等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风险。其次, 快速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了经济发展, 同时也加速了新冠肺炎的传播。

谈到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新冠肺炎加深了社会不平等。相对贫穷或边缘化的社会阶层更容易遭受新冠肺炎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 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使疫情后社会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弹性和包容性。我们面临的挑战并非“恢复常态化”, 而是要“更好地重建”。

为了帮助人类社会“更进一步”, IGES 开发了“三 R 框架”。该框架由三部分组成: 响应、恢复和再规划。“响应”指针对具体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干预, 以应对疫情造成的直接的健康和环境影响。“恢复”包括推进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 特别是刺激计划中的内容, 以保证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资源能够优先分配到最重要的可持续项目中。“再规划”包括改变那些妨碍能源、城市和其他核心支持体系长期变革的机构和基础设施。在项目响应和恢复阶段, 由于再规划会决定疫情期间和之后的发展路径, 因此也尤为关键。

“再规划”要求我们做什么? 我们需要有长远的眼光, 实现长久的繁荣。

第一, “健康的地球、健康的人类”, 这是 2019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六期全球环境展望》的主题, 而在 2020 年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 我们的星球的确存在边界; 如果边界被打破, 人类的安全生存空间和自然空间都会缩小。

第三, 我们需要采取综合协同的方法, 应对多种全球挑战, 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灾害风险降低和新冠肺炎疫情。

最后, 采取协同措施的同时, 我们必须整合各种全



球体系, 比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各种社会体系, 比如城市和农村结合; 以及人类体系, 例如福利和福祉。

尽管当前挑战重重, 世界各国都在制定绿色复苏计划。日本环境省的 2020 再设计平台旨在展示各国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危机的响应、恢复和再设计工作。IGES 在管理平台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有这些政策和行动中最核心的是金融。刺激计划和投资对于推进可持续恢复非常必要, 例如鼓励可再生能源、可持续性的运输、循环经济和绿色就业等方面。

我重点介绍几个亚太地区使用绿色投资重新设计美好未来的案例。

中国承诺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目前已经投资至少 270 亿美元用于发展清洁能源。新西兰至少已经投资 13 亿美元用于恢复经济, 如创造绿色就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巴基斯坦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 他们的目标是



通过绿色刺激计划把自然保护和就业结合起来。除了国家资金以外, 包括世行在内的多边参与方也投入额外的资金支持上述倡议。

日本首相近期在政策演说中宣布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日本着重通过技术开发实现制造业、运输业和建筑行业的去碳化。同时, 日本还会通过项目的形式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如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海上风能和绿色氢能等。日本还将通过先进技术推进社会发展, 转向绿色就业。考虑到 2050 年的碳中和承诺, 日本将会进一步深入挖掘, 推出更多的项目。

前面我提到的再规划政策和正在制

定过程中的政策将真正投资于可持续发展。除了公共资金以外, 私营部门的投资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 本次“全球绿色金融峰会”恰逢其时, 必将促进切实行动。

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 我们期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绿色复苏将会带来新的发展动能。现在是时候投资于一个更可持续、更具弹性和更加包容的未来了。

我们的星球的确存在边界; 如果边界被打破, 人类的安全生存空间和自然空间都会缩小。

■ 张勇森 /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中心主任

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实践



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是中国首个采用 PFR 理念的项目，而且是全球首个在能源领域采用 PFR 机制的项目。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首个承担以结果为导向的 PFR 机制项目的商业机构，华夏银行仅用九个月就完成了这个复杂项目的筹备工作。

2019 年我们跟世行合作落地了全球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这个项目的准备我们只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真是创造了很多的不可能，所以在此向我们的伙伴——世行表示由衷的感谢。

下面我分三个部分对华夏银行的合作推进绿色金融实践进行相关的阐述。

第一，简单介绍一下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成立于 1992 年，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时任总理李鹏参加了开幕仪式并剪彩。1995 年，新的《公司法》颁布以后，华夏银行是所有商业银行中第一个完成股份制改造的机构。2003 年，华夏银行成为全国第五家上市的公共机构、公众银行。2020 年 6 月，华夏银行的总资产达到 3.3 万亿，一级资本在全球排名位列第 51 位。关键是华夏银行进步非常快，每年的排名都在往前走。华夏银行网点众多，机构设置比较完备，其绿色金融中心的发展也非常快，三年多的时间内复合增速超过 40%，占比提升翻一番。综合来看，最近几年华夏银行的绿色信贷、绿色金融领域正在飞速发展。

第二，华夏银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情况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方面的国际合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起步早。早在 2000 年华夏银行就开始与 KFW 合作，那时候 KFW 对华夏银行在环境社会方面的表现有非常多的要求。

2. 项目多。截至目前，华夏银行跟世界银行已经有 3 个项目落地，分别在能效领域、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和工业、农业可再生领域。现在跟 ADB 跟 AFD 的合作也正在洽谈当中。

3. 效果好。特别值得说的是两个项目：一是 chief 项目，准备期间预算仅有一亿美元，现在已是三个多亿美元的项目，经济效益有目共睹。二是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项目，现在全部完成了。

4. 创新强。每一个项目都有非常强的创新点，chief 项目是为了支持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合同能源管理的引入是非常核心的。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是综合性的，全球绿色金融创新奖就是以这个项目为基准来申报的。中国储能项目是全球最大的储能项目，其中领域创新的努力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我们的一点体会

一是绿色金融是开展国际合作的一个核心领域，因

为绿色金融支持的是绿色、可持续发展，它更能够提供全球化的公共产品。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环境，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地球，所以保护环境、支持低碳发展是国际合作的最佳领域之一。

二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绿色金融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讲有几方面的推动作用：首先，可以推动一些新领域、新产业的发展，这点华夏银行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其次，可以推动国际国内双向交流。国际合作中的重要部分是获取相关的赠款，利用赠款进行创新，并发放贷款进行实践，所以这种结合对社会、对国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当然，推动 ESG 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是对社会的重大贡献。

华夏绿色金融中心的成立、包括管理委员会的成立，都源自于国际合作和世行项目的推动。华夏银行也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形象的建立，华夏银行是国内第一批加入 PRI、PRB 的银行，它的资管也是第一个成为 PRI 的机构，这使华夏银行的整体社会形象得到了提高。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肯定能够增加信用，获取经济效益。华夏银行将发挥种子作用，把其在国际合作中的实践和成果进行分享、交流和推广。

绿色金融是开展国际合作的一个核心领域，因为绿色金融支持的是绿色、可持续发展，它更能够提供全球化的公共产品。

最后，是对于未来国际合作领域的一些讨论和建议。国际合作项目一定要紧跟热点、走进市场、找准痛点、结果导向，而且要有创新性、引领性、全球性，还要讲求可复制、可推广，这是国际合作必然结果。一定要充分理解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合作的必要性以及想获得什么。华夏银行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注重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积累、总结经验。



■ 唐丁丁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合规监管委员会原主席

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的绿色发展

大家知道刚签署的 RCEP，以及中国可能参与的 CPTTP，这是两个重要的区域贸易合作协定。将来这两个贸易协定与绿色金融特别是气候金融存在什么样的衔接问题，可能是各个方面，特别是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需要考虑和关注的问题。

RCEP 的签署时间表明 15 国希望 RCEP 的签署能够在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中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在 15 国当中，东亚三国，也就是中日韩，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欧洲在 2019 年 12 月 29 日推出“欧洲绿色新政”，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完全爆发，“欧洲绿色新政”的核心主题是“全球气候治理”。欧洲国家早在 1990 年就完成了碳排放达峰，承诺净零排放的时间是 2050 年。美国在 2005 年也实现了碳排放达峰，拜登承诺其净零排放的目标也是 2050 年，也就是说美国有 45 年时间解决他们的碳净零排放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将于 2030 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力争 2060 年实现碳中和，也就是说中国只有 30 年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净零排放。中国承诺之后，日、韩相继在 10 月 26 日和 28 日承诺，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他们都是在 2005 年左右实现碳达峰的。相对中国，这些发达国家有更多的时间完成碳中和目标。

将来 RCEP 推动过程当中，碳达峰问题会成为东亚以及东南亚不得不关注的问题。《巴黎协定》第六条谈判的主要核心内容就是讨论碳排放市场机制问题，且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其中一个最关键的核心问题就是欧洲国家提出要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简单来说就是收取贸易货物进出口的碳税。这一机制在下一个阶段的《巴黎协定》谈判当中如果取得一致并生效，将对 RCEP 以及疫情应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欧洲毕竟是全球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也是将来 RCEP 签署国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市场，其碳边境调节机制很可能会影响到中日韩贸易政策，而中日韩政策又会延伸到将来 RCEP 的执行当中。由此可以预见，如何履行国际谈判并实现一个可能达成共识的碳边境调节机

制，将是 RCEP 以及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中国现在提出来实现双循环高质量发展，虽然是以内循环为主体，辅之以外循环，但是内外循环相辅相成。因此，在中国推动内循环总体发展战略的同时，外部循环的政策环境不得不纳入到整体规划和考虑范围。所以，RCEP 下一步实施过程当中，金融界、经济界、贸易界应当综合考虑碳达峰和碳中和国际承诺所引发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

2020 年 10 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个报告，有关东南亚国家利用绿色金融工具推进疫情后经济恢复的问题。不仅是国际金融机构，很多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会积极思考在未来的经济复苏中，怎么解决好经济可持续和绿色发展的课题。下一个阶段，我们可能需要讨论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绿色金融话题就是气候金融。



■ 刘振民 / 联合国副秘书长

积极实践与创新绿色金融，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

新冠肺炎大流行颠覆了人们的生活，并使经济陷入衰退，且目前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各国仍在继续遭受其害。

现在，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即根据可持续发展要求调整经济发展方向。近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所提出的向净零排放转型的承诺，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在我们即将迎来《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和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之际，各国应展示其在全国层面减排的努力。至关重要，各国要制定新的、更有力的、更雄心勃勃的国家自主贡献 (NDCs) 目标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市场主体要根据政策信号调整其各自实践——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并在未来的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在作出承诺的同时，还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和监管框架。一揽子刺激计划应优先考虑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部门的公共投资，如绿色、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部门等。

监管部门还需制定更严格的规范和法规、有效的碳定价，激励企业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商业模式。

满足这些条件后，金融系统才能够发挥其推动作用，将资金引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绿色经济要求相一致的企业和项目。当然，我们仍需为投资者提供适当的工具。

为此，请允许我强调以下四点重要内容：

第一，需要提高企业对社会及环境影响方面数据的质量和可比性。如果缺乏可比数据，投资者将无法把可持续性适当纳入其投资决定，也无法将其资金分配给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为了提高数据的可获得性，现在是时候要求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从自愿披露转向强制披露了，至少在核心指标上应当如此。

第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哪些经济活动对可持续发展有积极贡献。《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朝这一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我们更应制定全球通用的分类标准。

有必要就“绿色可持续”活动提出一套通用的语言。

第三，需要防范所谓的“漂绿”和伪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太多的投资产品宣称自身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但却未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例如，一些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基金却包括了烟草或化石能源企业——仅仅因为这些企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 表现优于产业同行，便声称其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由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投资者联盟 (GISD) 已经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投资的共同定义。如果能被市场和决策者广泛采纳，此定义将为市场提供有效的规范。

第四，需要开发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融资的平台和工具，包括绿色金融。全球可持续发展投资者联盟 (GISD) 将着力开发协调各方的可持续发展投资平台。通过与多边伙伴合作，旨在扩大可持续融资和投资规模，尤其是向最需要帮助的行业和国家提供资金。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让我们一同回顾联合国的核心宗旨——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为此，也让我们共同回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本原则：消除贫困，不让任何人掉队。

让我们本着互信、团结和伙伴精神，加强多边主义，为打造更加可持续、更有韧性的未来共同努力。





■ 吴晓青 / 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和气候金融 力争实现2060碳中和 的国际承诺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均将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置于首位，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但疫情的影响终究是短期的，而气候变化的风险和挑战却长期存在。目前，各国已相继表示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绿色低碳复苏与发展，避免疫后恢复经济的举措偏离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绿色金融特别是气候金融将有望成为我国继续深化金融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国内国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十三五”以来，中国在绿色金融标准、激励机制、环境信息披露、产品创新、地方试点等领域均取得了全面进展，初步建立了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综合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以及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 2020 年上半年，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已经超过 11 万亿元，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的存量规模 1.2 万亿元，

居世界第二位。2017 年以来，国务院批准的“六省九地”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经验，有力支持了地方绿色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各试验区绿色贷款余额超过 2000 亿元，占试验区全部贷款余额的 12.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两个百分点。绿色债券余额近 1200 亿元，同比增长 83%，试验区绿色项目库，入库项目总数 2200 多个，绿色项目累计投资超过 1.87 万亿元。

志当存高远

进入 21 世纪，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最重大的环境与发展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且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自 2015 年 12 月 12 日《巴黎协定》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后，全球气候投融资总量有所增加。2017 年，全球气候投融资规模达到 6120 亿美元。但随着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变化，尤其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以及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不断下降，2018 年全球气候投融资规模骤降到 5460 亿美元。

近年来的国际实践表明，全球气候投融资进展迟缓，亟须创新性的变革。为此，一些重要经济体、开发性金融机构与私营部门相继做出了气候承诺，并逐步停止支持或即将从化石燃料投融资项目中撤资。

2019 年，欧盟提出《绿色新政》，计划在未来十年投入 1 万亿欧元，用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习近平主席的庄严承诺标志着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特别是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包括合理控制煤电发展规模；同时将加大非化石能源发展的推动力度，包括加大力度发展可再生能源，构建能够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工业。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为外界揭示了中国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可行性路径。如果中国气候战略按照该项研究推荐的路径发展，意味着中国将出台更具雄心的“十四五”节能减排目标和 2030 年自主贡献目标，并在 2030 年后进行快速和深度的脱碳。

2020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对外公布，《建议》提出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行当积跬步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宣示，生态环境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五部门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共同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提出五个方面共计 15 项措施，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加快构建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保证气候信息披露标准和建立气候绩效评价标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与外资进入气候投融资领域，引导和支持气候投融资地方实践，开展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营造有利的地方政策环境，鼓励地方开展模式和工具创新。这将有利于气候投融资政策在地方上的落地和实践。



在资金引入方面，《指导意见》特别强调要激发社会资本的动力和活力，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推动公共部门和商业部门合作，鼓励企业和机构在投资活动中充分考量未来市场碳价带来的影响，这将促进企业开展气候转型的风险管理，如在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中使用较高内部碳价的能力。在全国碳市场启动之际，《指导意见》指出，稳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建设，有序探索运营碳期货等衍生品和业务，探索设立以碳减排量为项目效益量化标准的市场化碳金融投资基金。

《指导意见》还充分展现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性，提出积极引入国际金融机构和外资在中国开展气候投融资工作，支持建立人民币绿色海外投资基金，鼓励境外投资者更多投资持有境内人民币绿色金融资产，通过借力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纽带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预计气候投融资活动将积极支撑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指导意见》还倡导中国企业到海外开展气候友好投资，重视和化解气候风险，特别强调了“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合作，树立中国投资者良好的形象。

■ 埃里克·索尔海姆 / 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前执行主任

绿色金融的“一带一路”



我们现在有理由乐观，因为中国已经承诺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这是自巴黎气候大会以来，全世界的领导人中做出的关于环境方面的最重要承诺之一。莫迪总理在印度德里召开的太阳能峰会上提出“一个太阳，一个世界，一个电网”计划，呼吁世界上各国要多用太阳能。我们也希望美国回到《巴黎协定》当中，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系。

有乐观的一面，也有挑战的一面，下面我讲一讲挑战。首先要将政策做好。有很多的污染问题，都是先污染后治理，这个循环我们看到很多次了。太阳能比煤炭发电还要便宜，它很有竞争力，所以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创造就业，发展经济，也不损害环境。

第二点，拜登承诺要投入两万亿美元注入美国经济，促进持续发展，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把以前的错误纠正过来，尤其要注意环境。习近平主席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说得非常对，我们要关注环境，要关注我们的地球。这对我们而言也是另外一个改变，那就是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可以创造很多的工作机会。我最近看到一个中国境内的良好实践，有一个项目专门培训煤矿工人，帮助他们掌握新的工作技能，以便他们能顺利进入新经济模式工作。

第三点，我们要创新，特别是把绿色金融、绿色经济跟数字金融、数字经济融合起来，这会创造很多的机会，也会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澳大利亚、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很多金融机构在投入新的绿色经济当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把一些交易成本降低了。我也非常高兴看到有 IFF

这样的论坛，正在推动创新经济。

我们需要政策上面的创新。比如提高能源效率的过程中有很多机遇，也需要很多创新，可以降低碳排放。我们在这些上面得到的回报与利润，也可以投到不同的行业当中，这样可以不断地更新技术。

中国正在做电气化，包括电动公共交通，比如电动巴士、电动汽车，这是一个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并且可以与绿色金融携起手来实现合作。

未来的发展当中离不开“一带一路”这样的举措。在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一带一路”是非常大规模的、涉及面非常广的一个国际合作机制。它带来了许多发展机会，并且把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好处与其他的沿线国家一起共享，在绿色基础设施——比如太阳能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投资。绿色的“一带一路”非常重要，“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也强调要通过“一带一路”去促进经济的发展。

当下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降低煤炭发电。现在像日韩这样的国家政府都作出了减少煤炭消耗的承诺，所以不管是太阳能还是其他的一些新能源发电，都要能够有效地降低我们在未来对于煤炭发电的依赖程度，降低对煤炭的消耗，把更多的这类能源转换成清洁能源。

对于“一带一路”而言，要有一个“一带一路”的清洁量化评价指标。希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的这些绿色项目能够有一个绿色的量化指标，来推动生态经济的发展。比如一个项目，是否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证明其在多大层面上降低了对于煤炭的消耗等等。“一带一路”可以在绿色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机制、评价体制来进一步促进，这样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让“一带一路”成为绿色金融的“一带一路”。

畅想未来的绿色发展其实是让人热血沸腾的，绿色发展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带来就业机会，并且能够保护我们共同生存的环境。

■ 叶燕麦 / 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

气候变化与公司治理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讲话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1 月 10 日，习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所以金融机构应该把自己的使命、远见和战略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大的话题进行研究。气候变化对金融业、经济的影响，都是非常全面而持久的，所以气候变化一定要成为公司组织的一个重大的话题，同时要积极与利益相关方互动，维护好公司的利益。

要在董事会、高管层里研究这个问题，也要确定正确的战略目标和风险偏好，要确定相应的激励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有效管理气候风险。同时根据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政策、制度和流程进行全面梳理。

在授信和管理制度上面，从客户的筛选、尽职调查、评价、评审、贷后、投后管理以及合同约定方面都体现了气候变化风险的要求。在资产配置的比例上要尽可能地减少高碳资产的配置，在风险管理制度上要有具体的制度。同时要加强对气候风险的计量，识别计量，缓释风险，要从多个维度去考虑这些问题。

许多银行还有很多煤炭资产，所以在能源行业要考

虑将来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特别是对新建的项目，要进行非常严格的控制。对一些以煤为基础的投资，比如煤化工等，都要进行非常严格的控制，以避免这些高风险的资产。

要加强信息披露，现在银行机构已经披露了绿色能源发展的一些情况，包括环境效益的一些指标披露。但从长远来看，还要加强对各类资产的披露，包括从低碳到高碳各类资产的披露，以适应利益相关者的需要。督促公司客户披露，在披露的基础上，公司客户面临的气候风险才能得以克服。

同时要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互动，对消费者、受影响的社区以及利益相关组织，对他们相关的抱怨和申诉进行相应的回应，建立起内部合作机制。同时积极参加国际合作，采纳国际商会的一些倡议和准则。银行金融机构还有保险机构都要加强能力建设，包括强化气候风险的意识，加强气候风险管理。同时特别重要的是注重气候融资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金融业的绿色转型，才能和国家的绿色转型、全球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衔接起来。

■ 安周奇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

多边机制体系下的绿色金融标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是历史最短、最新的多边机制银行,它在 2016 年开始运作,目前刚好完成了五年的发展。在发展初期 AIIB 的重要使命是促进有实际贡献行业的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AIIB 足迹遍布了一百多个经济体,投入资金已经超过一千亿美元。

AIIB 有几个重要的原则:

1. 多边机制, 多边治理。
2. 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的银行举措。
3. 国际项目的高标准。

通过这样的标准,把绿色金融纳入到 AIIB 的 DNA 里面。

在标准体系下,绿色金融是我们制定国际金融操作标准的一个重要环节。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绿色金融的最初探索和实践。当时金融行业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需求,就是希望金融能够帮助社会和经济实现一种安全的发展,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多边机制的银行,毫无疑问地要把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在这个原则指引下,从一开始 AIIB 就把绿色金融作为重要的使命之一。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使命是为未来的基础设施做投入,这不是一句空话或者口号,而是在实际落地层面去投入,服务于未来,服务于符合未来需求的基础设施,所以 AIIB 投资的基础设施都是符合未来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目标的基础设施。AIIB 所有的投资项目在重要的议题上面都支持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当中的重要议题,有一个环节就是绿色发展,所以 AIIB 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也都是符合国家绿色发展需求的。

为了能够实现 2030 年碳排放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 AIIB 进行了基础设施的部署和支持。中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美国未来也有望会回归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机制。我相信未来在美国回归以后,中美两国一起,在多边机制下会进一步繁荣绿色金融。

AIIB 目前的资金,在投入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尽管我们做了比较大规模的投入,但是相对整个需求来讲



还是杯水车薪,所以 AIIB 仍然需要找到更多元的投融资渠道,弥补资金的不足,这样才能够对未来的基础设施做出更积极的贡献。

跟国际的、国内的一些金融机构的合作,能够帮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投资未来的基础设施方面做得更好。AIIB 可以跟金融机构携起手来,一起去支持未来的基础设施。

现在 AIIB 也是遵循一系列的标准来做合作与支持。比如在绿色资产方面, AIIB 需要跟银行、跟咨询机构一起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通过这个循环,数以万亿计的投资银行的资本能够有效地引入到亚洲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未来的几年, AIIB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资本能够被引导进入到基础设施当中来。

首先,跟私人投资机构合作,给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司做投资。这是一些改善巴西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应对方案。AIIB 提供了一些分析数据和技术,提供给客户更好的服务。AIIB 提供了 3 亿美元的基金,

跟当地政府、跨国银行以及双边的一些机构和其他的投资公司合作做好投资。这个基金就是一个合作的最佳例子,是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在绿色金融、绿色经济合作方面的一个范例。

其次,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 MCD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Finance) 是一个跨国中心,是最近设立的跨国倡议,以发展合作为导向,用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在发展中国家做投资,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互联互通。也就是要鼓励投资机构和发展中国家,做好管制的透明度,应用国际银行监管的惯例,等等。AIIB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帮助很多上游的机构开展工作。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和峰会, AIIB 在跨国银行中建立了很多标准或者说推广了其标准。这些政策标准对跨国的金融机构而言,指引了他们的工作,尤其是在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方面有一些指导作用。特别是一些中国的合作伙伴,帮助他们建立好 ADB 的标准,有助于在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可再生能源中进行投资,而且是使用世界性和国际性的标准。

最后,是 AIIB 的投资组合正在做的一个合作项目,而这个合作项目是要做好一个绿色金融的投资组合。AIIB 在这个项目当中投了 50 亿美元,跟全世界的特别是亚洲地区的投资者展开了合作。另外,这个投资里有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使命是为未来的基础设施做投入,这不是一句空话或者口号,而是在实际落地层面去投入,服务于未来,服务于符合未来需求的基础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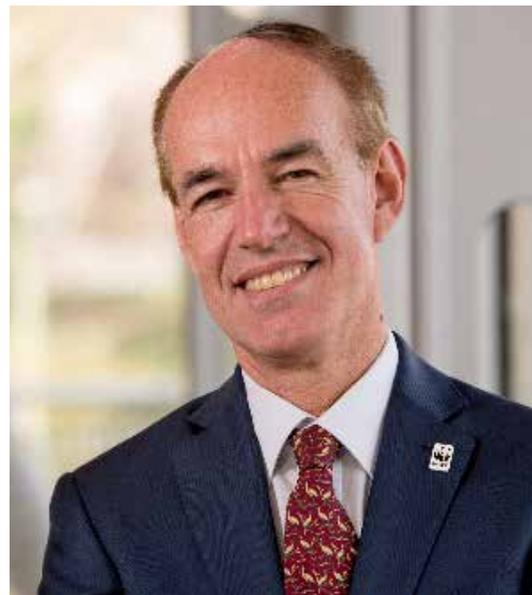
很大一部分资金用在教育上面,帮助教育公司在一些新兴市场建设绿色的基建。我们有了这些经验,期望在将来可以支持基建的资本市场。

举这些例子,是希望通过机构的投资人,从资本市场来帮助完成这些项目。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到 AIIB 的商业模式。公私营机构的合作可以带来很多机遇,也带来很多成功,非常期待将来应用国际的环境金融标准跟各位进行合作。



■ 马可·兰博蒂尼 /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总干事

创新性应用绿色金融工具 应对生态环境挑战



近些年，中国金融投资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在绿色金融债券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在保险方面的一些改进和做法。习近平主席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承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承诺也是给其他国家一些压力，有助于推动他们也同样做到这一点。衷心希望，更多国家和金融机构能够设定自己的目标，以应对气候变化。

现在很多科学研究发现除气候危机外，生物多样性的改变同样令人震惊。2019 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 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显示，至少有 100 万种生物濒临灭绝。2020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不到 50 年的时间里，全球野生动植物种群减少了 2/3。地球已经失去了世界一半的森林、珊瑚礁，85% 的湿地以及 90% 的海洋鱼类种群。毫不意外，2020 年 9 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强调必须采取行

动减缓并遏制进一步损失的紧迫性。

形势是严峻的，然而只要立即采取紧急而空前规模的行动，还是有机会遏制这种灾难性生物多样性改变的，而且只要努力还有可能在十年内扭转局势。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损失是生态环境面临挑战的两个方面，而且它们是密切相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气候变化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损失，自然资源的损失又反过来影响和加剧了气候变化。通过保护和恢复森林、湿地、红树林和海洋生态环境等自然栖息地，可以缓解气候变化的 30%。这样做是因为人类要跟大自然共生共存，就必须尊重大自然和大自然中一切生命，新冠病毒也证明了人类的脆弱。

解决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损失不仅是环境问题，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平的问题。要解决气候危机，就必须在 2050 年前把煤炭等化石燃料从全球能源系统中淘汰出去。另外，要扭转自然资源损失的局面，需要保护更多的自然空间，包括至少 30% 的陆地和海洋，必须遏制对陆地上和海洋中物种的不可持续性开发。还有关键一点，是要对造成破坏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粮食系统进行改革和转型。

金融机构在应对这些挑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始关注应对气候危机。在 2019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主要投资者齐聚一堂，成立了“净零资产所有者联盟”。该组织目前有 30 个管理资产规模超过 5 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联盟成员承诺在 2050 年前将投资组合转向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2017 年，法国、中国、荷兰等八个国家的央行和监管机构联合发起成立了“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合作网络” (NGFS)，承认气候风险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该组织已经发展到来自五大洲的 87 个成员国和 13 个观察员国，其 GDP 占世界 GDP 的 2/3 以上。金融机构现在可以通过《科学碳目标倡议》 (SBTI) 制定净零排放目标，世界自然基金会作为 SBTi 的创始成员倍感骄傲和自豪。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有 60 个金融机构公开承诺要根据《巴

黎协定》，通过 SBTi 倡议设定减排目标。期待中资银行能加入 SBTi 倡议，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与中国银行业协会以及其他合作伙伴一起，为中国银行业制定科学减排目标提供支持。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所做的《绿色金融专题政策研究报告》建议，为社会资本进入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提供战略性指引，以期阻止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将商定，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个会议将在中国举行。会议其中一项就是帮助金融机构识别、量化、规避各类与自然相关的金融风险。世界自然基金会正与 60 多个金融机构合作，建立一个相关的财务披露工作组，以便在 2022 年底之前提供一个共同的框架。

一些管控自然风险的工具，如水风险过滤器已经存在。这是一个领先的在线工具，由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 (DEG) 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开发，旨在帮助世界领先企业优先考虑水风险，并将风险评估结果与制定水管理建议联系起来。与《科学碳目标倡议》 (SBTI) 类似，在全球自然总体目标下，正在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自然目标，即到 2030 年实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净零损失。

投资自然的重要性

越看清所面临的自然衰退风险，就越应该知道善待大自然、投资大自然是多么必要且紧迫。世界经济论坛

最近发布的《新自然经济报告》指出，生态工作可以带来 10 万亿美元价值的产业和 4 亿个工作机会。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国际劳工组织共同编写的一份报告显示，农业、渔业、林业、旅游业等相关工作岗位可以达到十二亿之多，这就是说全世界有一半的劳动力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说法，为恢复生态系统而投资的每 1 美元，都能产生 7-30 美元的收益，这对投资者和自然环境显然都是巨大的投资回报。

最近成立了一些缓解气候变化的基金，气候变化迅速的地区将得到保护。其中荷兰气候与发展基金由荷兰创业发展银行、荷兰发展组织 (SNV)、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基金等领导。该投资基金可达 1.6 亿欧元，将推动 5 亿欧元以上可融资的自然和气候解决方案，促进淡水、森林、农业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以及改善水资源管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现在有许多投资者、政策制定者、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正在为减缓全球变暖与生物多样性危机努力，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此呼吁，金融机构将其投资与科学的气候自然目标相结合。对经济而言，2050 年要实现净零排放；对自然而言，2030 年要遏制自然资源损失，这两个相互依存的全局目标，都是为了让所有人享有平等、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为了自然和人类，为了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大家携手并肩、齐心协力、行动起来。这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世界需要拥抱一个公平、安全和可持续的未来。



■ 邹骥 /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碳市场推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源基金会是一个致力于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经济结构的慈善机构，在中国已经工作 20 多年了。绿色金融成为能源基金会工作的内容也已经有很多年，我们和有关的机构、有关的利益相关方也展开了非常良好的合作。

大家都在热谈绿色金融、碳中和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确绿色金融是碳中和新增长规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谈的不仅仅是保护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实际上也是在重构未来的增长路径和未来增长的故事。这里有一个基本概念上需要澄清，碳中和目标实际上是对作为自然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资产规模边界进行界定，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创造国民财富里面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自然资本，而自然

资本里面包含气候的稳定、空气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等等。

碳资产是自然资本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看成是国民财富构成的一个新的变化，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产生变化的话，这个时候来讨论绿色金融就成了其中应有之意。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要支持财富的保值增值，这都是天经地义的，所谓大道至简。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线图规定了不同时点的碳排放目标。比如“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要实现什么目标？现在在中国国内讨论 2035 年中期发展规划，乃至到 2050 年、2060 年，这个目标有什么时间分布，这样的时间分



布发出的信号是什么？从财富增长的角度来看，它发出的信号，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本的存量、规模是不断壮大的，投资流量、投资机会也会长期持续的存在。这是对投资者、技术研发者发出的明确信号，让他们在这个领域里投资，在这个领域创新技术。

如果我们划定了碳资本的边界和规模，那怎么分配这些自然资本呢？这就是国内公共政策里面把碳排放目标层层分解的过程。过去，分配的是碳强度的目标，现在碳中和要求建立并且分配碳排放方面的目标。在分配过程中要建立这么一个概念，过去是按照行政序列去分配，像层层政府，这里面分配的主要是责任。但是现在应该扭转这样的思想。未来碳资产的分配或者是说碳排

放目标的分配，应该主要向市场主体分配。也就是说向这些排放主体分配，包括主要的排放企业也包括居民。

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基本概念问题，就是我们在不仅仅是在分配责任，同时也是在分配碳资产产权和相应的权益。这个权益到底是什么？排放额度有价格，甚至能够涨价、增值，而且可以质押，这样才有人愿意投资、购买这样的额度，投资这样的碳资产。所以我们要在指导思想、基本概念上做这样的流转。

这其中我想强调的就是碳金融和碳市场要有机地结合起来，碳市场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在过去的实践中，尽管中国的碳市场实践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在基本概念上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它和碳金融是分割的。在碳市场官方标准设计中，没有把它和资本市场、金融结合起来。这样就很难期待碳市场的规模能够做起来。所以，在进一步推动碳市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有意识地、主动地把它和资本市场、金融进行有机的联系。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地配置一个以碳排放量作为要素的市场，也才会真正地利用市场来发现和形成碳资产的真实价格。只要有了价格，就不愁聪明的投资者和技术研发者为了追逐自身的回报和收益去投资和开发技术。而这些碳价是完全可以由政府目标设定的高低、执行法规的严格程度以及进入碳市场的可得资金流量来决定的。

为了实现 2060 年的碳中和，应该构造这样一个碳市场，就是要给投资者和技术研发者一个稳定的预期，在未来的 40 年，碳价要不断地上升，绝对成本昂贵的技术可以不断地得到采纳。但是他们的成本在整个收入过程中的比重不会上升，甚至还会下降，所以收入还在上升。这样的道理要给我们的政策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讲清楚，只要有市场确定的碳价，资本就会提供激励，流向碳减排和低碳技术的开发。投资和技术创新创造的排放配额的节省，就是收益，当下有很多潜在的投资和创新机会，为碳金融和绿色金融提供了针对性和方向。

我们讨论碳金融的时候，还要特别重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是我们的金融要支持谁，支持什么？比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数字化和传统产业的融合，提高能效在交通电动化、柔性建设发展中，怎么引领融资，怎么创造更低的融资成本。

比如最近讨论的西部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其开发潜力非常大，潜在装机容量也很大。现在把西部能源传送到中东部地区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但是中间有一个融资的问题。现在青海到河南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已经开通了，青海刚刚开始起步。大规模的开发，光伏和水能的互补，已经有非常好的基础条件了，但是

金融和财政的结合也是非常必要的。任何一个单独的工具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要探索一个政策的组合，实现向绿色低碳的转型，为碳中和提供强有力的金融制度的保障和金融操作技术的保障。

要达到碳中和，还需要很多的可再生能源。青海的领导说技术上可开发的有 10 亿千瓦，理论储量能够达到 30 亿千瓦。如果西部地区的可再生能源能够开发出来，绿色金融要给他们助力，让他们西电东送，送的不再是煤电，而是光伏 + 水能互补的、稳定的、又有储能的现代电力系统的绿色电力。比如现在从内蒙古给北京输电，输的好多是煤电，但是内蒙古完全可以、也有条件把蒙西的风电、光伏输到北京，这些都需要解决融资问题，绿色金融是完全有用武之地的。

最后再强调一点，金融和财政的结合也是非常必要的。任何一个单独的工具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要探索一个政策的组合，实现向绿色低碳的转型，为碳中和提供强有力的金融制度的保障和金融操作技术的保障。

■ 英格丽德·加布里埃拉·霍芬 /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 执行总裁

德国绿色金融的创新与实践

习近平主席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力争在 2030 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努力争取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在最近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可以看到中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坚强决心。绿色金融在其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它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国家制定了绿色金融资产的分类标准，出台了监管和激励政策，比如说环境信息的披露、绿色资产被列为合格抵押物品等等。从绿色贷款到绿色债券，再到绿色保险、绿色基金，各种绿色产品都很多。进一步加强中国的绿色金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可以通过国际交流和合作来推动，正如中国的一句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谈一谈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最新的绿色金融创新与实践。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 作为德国政府的首要代表在全世界推动可持续发展。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最近为德国联邦财政部提供了一些可行性建议，分析了发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德国联邦证券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评估相关的经济因素，总体框架条件以及相关的国家、地区、国际政策、原则和最佳实践。

2020 年，德国可持续金融战略已经发布，而 65 亿欧元的德国 10 年期零票息主权绿色债券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启动。它获得了 5 倍的超额认购，订单量超过 330 亿欧元，该绿色债券期限为 10 年，票息为零。价格比常规 10 年期德国联邦政府债券低 1 个百分点，收益率相当于 -0.463%。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两个值得关注：

首先，德国的绿色双债概念，让绿色债券投资者可以把债券跟相同期限和票息的传统德国政府债券交换。这个双债机制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创新机制，提高了绿色债券的适销性和透明度，保证绿色债券的发行不会对政府债券市场的整体流动性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提供了补贴。2020 年 11 月还推出了一个计划，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一条完整的收益率曲线，这给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收益率曲线的几个不同点上对固定收益组合



进行绿色化。

其次，合格支出。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合作和技术创新。因此，德国政府决定将专门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支出纳入其中。而且，政府还将研发方面的支出也纳入其中。这两类支出都属于政府的职责范围。

政府进入主权绿色债券市场有几个好处，它有助于表明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它为市场上的绿色债券产品树立了一个基准，为其他潜在的绿色发行机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促进了公众对绿色金融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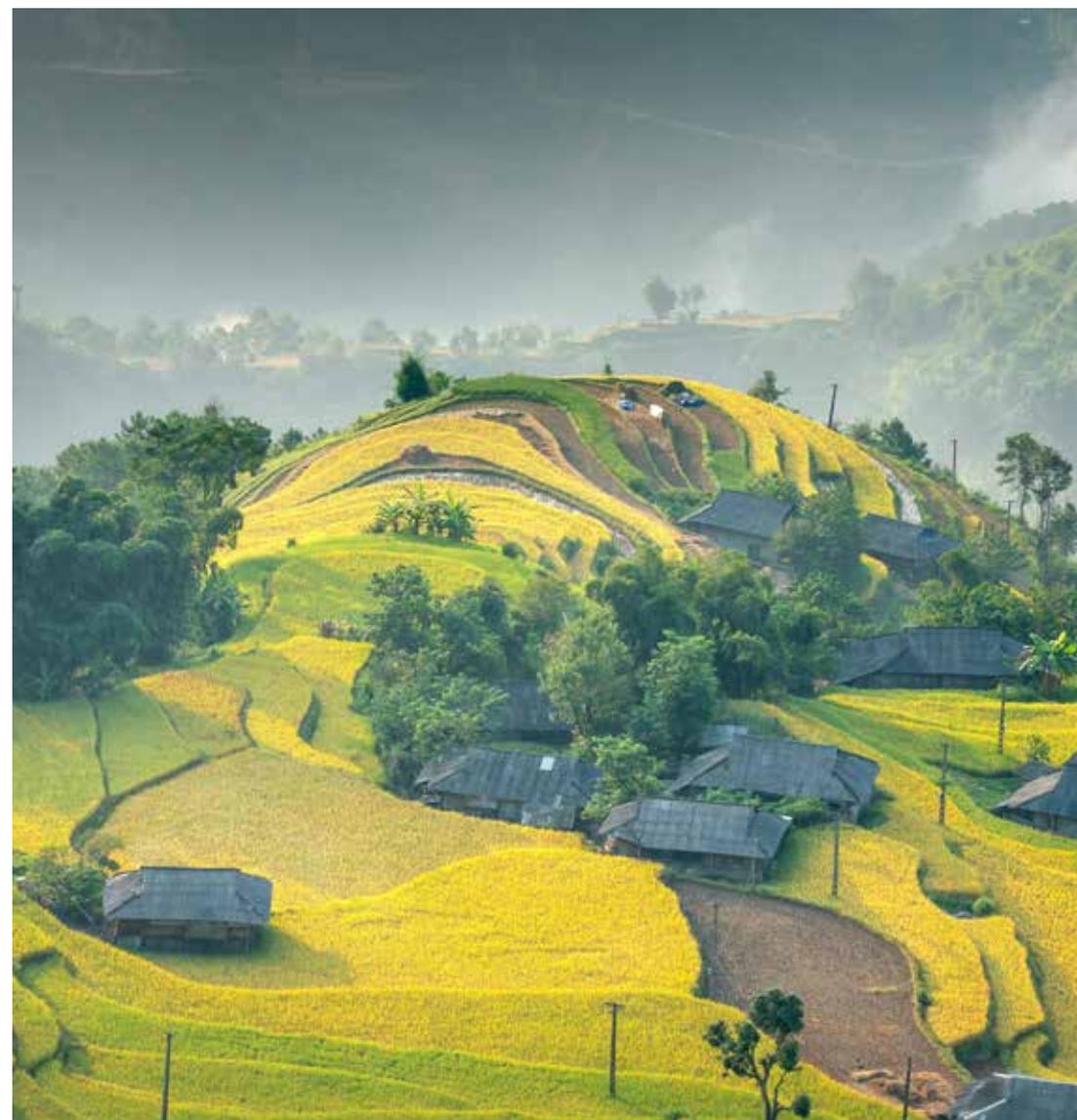
金融市场从不缺乏创新，但并非所有的创新都是平等的，绿色金融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创新的投资理念，让资本的力量为人类和地球服务。作为德国的国际合作机构，德中、欧中绿色金融合作的潜力巨大，GIZ 代表德

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促进中德关系中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展。支持建设欧洲可持续金融平台，该平台是实施和协调欧盟委员会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国际推广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是这个平台的创始成员，也是 GIZ 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也与其他新兴市场合作，加强可持续金融合作。GIZ 在巴西与财政部加大绿色金融市场的规模，例如把环境和社会标准引入到银行机制当中；与越南政府合作，实施其国家绿色金融战略，这促进了绿色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此外，还通过欧盟可持续金融计划来支持东盟绿色金融的复苏。

时不我待，相信一个更好的持续发展的世界是可以实现的，GIZ 期待着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共建这个美好世界。

德中、欧中绿色金融合作的潜力巨大，GIZ 代表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促进中德关系中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展。



国际金融论坛 (IFF) 2020 全球绿色金融创新奖



GLOBAL GREEN FINANCE INNOVATION AWARD

国际金融论坛 (IFF) 2020 全球绿色金融创新奖是由 IFF 于 2020 年首次发起。该奖项旨在对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进行表彰和奖励, 依托 IFF 全球网络与平台, 将有助于深化绿色金融国际交流与合作, 推广绿色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最佳实践, 为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实现其全球目标做出贡献。

自 2020 年 10 月 9 日正式发出奖项申请公告以来, 引起了国内外绿色金融领域的关注和热议, 收到了国内外众多机构的问询与申请。IFF 邀请国内外 15 位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重要领导人和金融界、环境界精英组成奖项评审委员会, 并借鉴良好国际实践制定了科学、严谨的奖项评审程序与标准。评审委员会从通过初选的 19 家机构中, 依据申请项目的创新性、可推广性、行业贡献度、盈利性和促进公共福祉五个维度,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严肃、有序、认真进行了申请材料的审阅、必要的核实和综合评议, 最终评选出 11 家获奖机构, 名单如下 (排名不分先后):

评审委员会名单	
评委会主席	
韩升洙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 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评委会联合主席	
赫尔曼·范龙佩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 欧洲理事会首任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珍妮·希普利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 丝路国际联盟 (SRIA) 联合主席、新西兰前总理
评委会委员	
陈文辉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
周汉民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祝宪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理事长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道德官
梁锦松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理事长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原司长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理事长 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
戴青丽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 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总裁兼副主席
弗兰克·莱博曼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 全球绿色发展署 (GGGI) 总干事
宾度·罗哈尼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绿色增长中心首席顾问 亚洲开发银行前资深副行长
吴晓青	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赵晓宇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亚洲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副行长
张慎峰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张红军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 美国能源基金会董事局主席

2020全球绿色金融创新奖获奖名单

以量化的环境效益为结果导向的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转贷项目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创新及贵州省的实践与示范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环境与社会治理 (ESG) 绿色投资指南服务工具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贵安新区绿色金融试验区的具体实践和贵州省绿色金融体系设计
贵安新区绿色金融港管委会



基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类债券及ESG战略咨询的绿色金融服务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开展污染治理与气候协同效应项目促进环境社会风险管控体系建设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NATIONAL INVESTMENT AND GUARANTY CORPORATION

助力深圳特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并实现绿色金融立法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智利新能源公交车国际招标采购及融资模式创新
世界资源研究所 (美国)



绿色资产证券化的“双绿”创新产品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Treelion绿色金融数字交易平台
大湾区创益区块链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



2020绿色金融特别贡献奖

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金精不朽 融通天下



- 传播交流成果，探索学术前沿，扩展国际视野，发表权威观点，服务金融事业，满足读者需求。
- 以服务中国经济界、金融界，服务广大读者为使命，致力于 IFF 信息的全面、及时、准确传递，与社会共同分享 IFF 的研究成果。
- 为国际金融合作交流搭建顺畅的信息平台，使对话交流中的重要思路、观念、观点得以传播，服务中国经济和金融业。

着眼宏观大局·关注金融动态·探寻内在规律

《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是反映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的高端学术刊物，面向广大经济界、金融界的读者，以传播中国金融国际合作交流成果，提高中国金融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为宗旨。《国际金融论坛》会刊具有天然的国际信息渠道、丰富的信息资源，利用自身优势，将国外金融信息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成为我国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充分发挥国内、国外双重信息资源的优势，以全球化的视野解读本土的金融事业，站在中国的角度对话世界金融市场，为读者展示一个完整的金融世界。



扫一扫加关注
微信：IFFweixin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战略文库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战略文库是集研究成果、演讲文集、金融领袖及国际金融论坛成员著作为一体的系列出版物，根据每年 IFF 全球年会和研究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出版。IFF 全球战略文库坚持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对全球金融经济问题深入研究。



出版声明:

- * 本刊仅供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得有任何商业用途
-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而成，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复印件、复制品或收入检索数据库系统。

General Statement:

- * This publication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commercial use is prohibited.
- *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materials.
- * Views in the articles of this publication are the original opinions from the authors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dat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whatsoever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written consent from the editorial team. Violators may be subject to legal proceedings.



We are dedicated to broader and more inclusive global cooperation based in China with a global vision. We are devoted to 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y playing a bridging role betwee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and main financial cities worldwide.

我们致力于开展更广泛、更包容的全球合作，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携手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城市，架起中国金融界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桥梁，建立全面、广泛的全球合作与对话。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Global Finance F20 (Finance 20)

北京·廣州·上海·香港·華盛頓